

# 理論建築

朝向空間實踐的理論建構

夏鑄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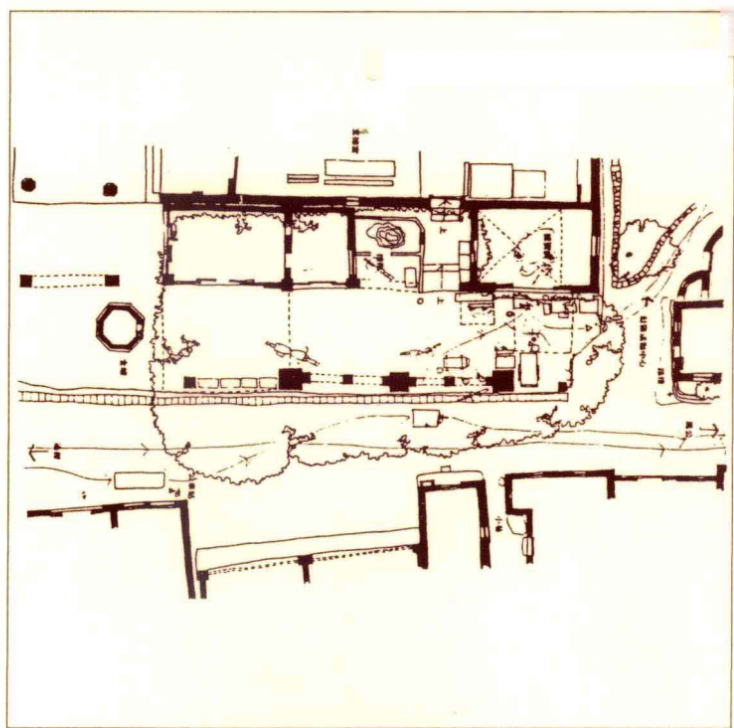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2

ISBN 978-986-6552-56-4



9 789866 552564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2



# 理 論 建 築

——朝向空間實踐的理論建構

夏鑄九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2

第三版，1995

理論建築：朝空間實踐的理論建構/夏鑄九 著  
三版——台北市：唐山，2009，12印刷  
面：公分——（台灣社會研究叢刊；2）  
含索引

ISBN 978-986-6552-56-4

1. 建築 2. 空間藝術

920.1

98023536

## 台灣社會研究

叢刊-02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Research Series-02 1992 (1993 再版)(1995第三版)

作者：夏鑄九

發行人：周渝

社長：夏鑄九

總編輯：瞿宛文

助理編輯：李佳靜

編輯委員

國內：王振寰、江士林、呂正惠、吳泉源、何春蕤、夏鑄九、陳忠信、陳光興  
張景森、傅大為、賀端蕃、甯應斌、馮建三、劉毓秀、黃程貫、蔡建仁  
趙剛、錢新祖、錢永祥、鄭村棋、瞿宛文（依姓氏筆劃序）

國外：丘延亮(香港)、陳溢茂(美西)、邢幼田(加拿大)

許連然(美中)、李榮武(美東)

編輯顧問

王杏慶、成露茜、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徐正光  
梁其姿、張復、鄭欽仁（依姓氏筆劃序）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三版二刷

定價：280元

國外訂購：美金14元

支票抬頭CHEN LUNGHAO, 寄至

Mr. Chen Lung-Hao, 201, N La France Ave., #B,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出版發行：唐山出版社，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333巷9號B1

排版：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優文印刷廠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6395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63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未經本刊及作者同意不得轉載

送給我的老師們：

莎娜、傑西、史畢羅與曼威

To Sara, Jesse, Spiro and Manuel.

## 謝 誌

本書<sup>①</sup>的寫作過程是一個學習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己被改變了。一個認識論批判的過程絕非說自己以一不變的結構去評量其他的知識傳統，相反地，在認識論批判的過程中，自己原有的觀點被論證過程中的爭論整個地改變了。定義確實是產生於辯論過程之中的。那麼，在這個改變與成長的過程中，我必需感謝：

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設計學院建築學系的莎娜·石川教授 (Sara Ishikawa) 對空間與人的敏感、真誠與溫暖，以及對我個人的種種協助。建築學系的傑西·賴卻克教授 (Jesse Reichek) 的銳利，提供方向，對我的啓蒙。當我離美回台時，傑西一再叮嚀，對第三世界的學生言，我的論文要轉譯為自己的語文在自己的社會中發表，以擴大其效果。這是我在論文完成之後還願意將其出版的最大動力。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設計學院城市與區域規劃學系的社會學教授，曼威·柯司特教授 (Manuel Castells) 提供我知識與分析架構，更重要的是：避免教條主義。沒有他們，這本書根本不可能存在。在撰寫過程中，第二章受惠良多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設計學院地景建築學系的麥可·邵斯華茲教授 (Michael Southworth)，第三章則感激同是地景建築學系的克蕾·古柏·馬庫思教授 (Clare Cooper Markus)，以及建築學系的社會學教授羅素·艾利斯教授 (W. Russel Ellis, Jr.)，第五章則需感謝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史教授瑪麗·麥克里歐教授 (Mary McLeod) 給我的建議。此外，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巴雷特建築與規劃學院 (目前已經在曼徹斯特大學任教) 奈希·提默教授 (Necdet Teymur) 提供我資料，傅爾布萊特基金會提供獎學金協助我的論文撰寫也都是

① 論文之原名為“建築之美學理論的認識論批判：朝向一個空間文化形式的社會理論”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 Theories on Architecture: Towards a Social Theory on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

需要誌謝的。然後，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設計學院建築學系的建築史教授史畢羅·考斯多夫教授（Spiro Kostof）是我的輔修指導教授，他對我這個外國學生的特別照顧一直使我難忘。史畢羅一直以他的好友，我在耶魯的老師，文生·史考利（Vicent Scully）的話激勵學生——要求學生畢業後以硬皮版本著作出版（指正式的學術出版物）為第一個度量指標。由於史畢羅目前絕症纏身，希望本書還能趕得及做為一份學生遲來的禮物（作者補註：在本書謝誌二校時，史畢羅已經去逝）。此外，柏克萊加州大學地理學系的艾倫·普瑞德教授（Allan Pred）的方法論課程對我的啟發，提供了論文前的知識準備。最後，我必需謝謝劉可強，他是我的好友兼師長，我之所以會去柏克萊享用那兒的自由與知識之美好時光，都與他有最密切的關係。以及必需一提，謝謝這幾年中在思想上相互勉勵的一些朋友們。因為，是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造就了我們今天的認識，拓展了我們對明日的視野。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要出叢書是這本枯燥的論文得以付梓的機會，謝謝這五年的共事經驗。以及，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研究生黃麗玲同學協助早期之校對與書目再整理工作，柏蘭芝同學協助編輯的工作。同時，我們增附了一些插圖以增加本書的可讀性。老實說，假如再不逼著今年出版，這本書將永遠不會再出版了，相信這是不少論文撰寫者的共同感受。現實的“空間與社會”以及知識的壓力驅迫我們繼續上路，留下這點時間的注腳。

## 第三版序言

三年前，《理論建築》出版。沒有料到在一年內即匆匆修改了當時已發現的一些錯字就再版了。今天，在第三版之前，覺得有必要針對這本書的性質，在裝訂技術的容許範圍中補充幾句話，做為三版序言。

由於建築專業（國內外均然）長期以來缺乏研究的傳統所以沒有理論的訓練。本書的主要目的則在於針對當前教學所需，就設計理論與社會理論提供一點理論思考。簡言之，由於受到社會運動的衝擊所造成的社會科學過去這些年的反省，本書是由社會理論（social theories）借取其思考角度再轉而重構建築理論（architectural theory），尤其是其中的設計理論（design theory）。社會科學的社會理論，或者說，社會科學的哲學與方法論存在了諸多爭論，這些爭論有其社會根源。本書試著提供一點體會。這體會是由理論干預到經驗研究的準備。經驗研究才是我們進入真實的空間與社會之依據，“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誠哉斯言。然而，理論與概念的活動却是有意義的經驗研究所必需的，不然，連研究的發問（problematic）都抓不住要害。這是理論建構之起點。然後，我們必需謹記，經驗研究才提供了理論建構的必需素材。對於設計師，專業分工與教育分化使得我們有手無腦，我們必需學會獨立研究，不然做什麼實務，為什麼失敗都弄不清。當然，設計者的行動能力提供了我們對理論的要求：實踐性認識。專業訓練要求的務實，所以不願把言詞誤為真實，不會把自己推向象牙塔的悲觀囚徒。

由另一個角度思考，本書潛藏的關心在後記中已表白——空間。就空間論層次，本書聚焦於空間的文化形式（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或者說，空間性（spatiality），即，空間象徵（spatial symbolic）也，雖然，空間結構與動力仍然是掌握空間象徵所必需的知識。本書後記中提及的亨利·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他在近年的影



響是必需多注意的。但是，列伏斐爾的語言曖昧是其理論啓發之源，也正是其爭議之處。由於洛杉磯加大（UCLA）的後現代空間論主張者愛德華·蘇雅（或，索雅）（Edward W. Soja）曾在近年來訪台大，也帶來了進一步啓發，將在另文與另處處理，此外，有些目前尚未有定論的爭議只有暫時按下不表。譬如說，蘇雅與高迪勒（M. Gottdiener），以及安德魯·賽耶（Andrew Sayer）等人之間對列伏斐爾著作的南轅北轍評價及不同解讀。這些並不是我們理論思考的重點，雖然這些是有助於我們（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研究者與專業者）理解理論爭議的脈絡性資訊。

最後，還是要謝謝王品同學校正錯字，以及其他提供錯誤修正的朋友。

夏鑄九，台北 1995

## 目 錄

目錄 .....	i
圖表目錄 .....	iv
謝誌 .....	v
第三版序言 .....	vii
第一章 總導言 .....	1
一、研究的問題	
二、建築研究與建築理論	
第二章 城市形式與城市設計理論的認識論批判：開文 · 林區及其知識上之同道 .....	20
一、導言	
二、空間形式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四、應用層次	
五、認識論的批判	
第三章 英美傳統中的環境唯心論與社會工程學的認識 論批判：環境—行為研究 .....	48
一、導言	
二、空間形式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 四、應用層次
- 五、認識論的批判

第四章	模式語言及非正式營造系統的認識論批判：亞歷山大及其同志 .....	86
	一、導言	
	二、空間形式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四、應用層次	
	五、認識論的批判	
第五章	批判的歷史計劃：曼菲德·塔夫利與威尼斯學派 .....	126
	一、導言	
	二、空間形式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四、應用層次	
	五、認識論的批判	
第六章	由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賀龍·巴赫德 .....	158
	一、導言	
	二、空間形式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四、應用層次	
	五、認識論的批判	

---

第七章	由經修飾的阿圖塞主義到政治批評：泰雷·伊格頓及其他 .....	192
	一、導言	
	二、空間形式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四、應用層次	
	五、認識論的批判	
第八章	結論：空間文化形式之解釋性提綱 .....	222
第九章	後記	
	建築論述中空間概念之變遷：一個空間實踐的理論建構 .....	242
	一、導言	
	二、空間專業分化的趨勢與空間理論的貧困	
	三、空間論述的變遷過程	
	四、對七〇年代批判之批判	
	五、結語	
參考書目	.....	274
索引	.....	302

## 圖表目錄

圖1-1	建築師形象	19
圖1-2	建築師字源學圖解	12
圖2-1	林區及環境一行為研究影響下的調查圖例	20
圖3-1	環境心理學與建築專業之交流與鴻溝	48
圖3-2	阿莫士·拉普普所提出的在現實世界與被知覺到的世界之間 所中介的認知表徵	59
圖3-3	奧圖曼與齊默爾提出的文化與環境關係模型	59
圖3-4	摩爾，都鐸與豪威爾提出的環境設計研究模型	60
圖4-1	公部門、私部門與自力營造之非正式部門	86
圖4-2	模式圖例	111
圖4-3	柏克萊臨水岸的威尼斯村想像圖	123
圖4-4	像柏克萊般環境中的生態城市	124
圖5-1	雷奈·馬格瑞提的“這不是煙斗”	126
圖6-1	結構主義時尚	158
圖6-2	符號學的歷史	191
圖7-1	論述分析與福寇的貢獻	192
圖8-1	理論與實踐	222
圖8-2	空間結構中之空間文化形式動態過程圖	241
圖9-1	美國亞里桑納州塔克林社區設計中心標記	242
圖9-2	英國刊物《社區行動》之封面	242
圖9-3	林區式之空間感覺圖解例	252
圖9-4	空間與時間圖解例	253
表8-1	不同理論傳統要略表	226

## 第一章 總導言

“冷戰之後，各國的關係已由政治聯盟改變為經濟合作，因此我在這方面活動空間很大。但是空間大沒有用，必須有營造，才可以解決問題，保護 … 的利益。”

——辜振甫（周美里漢城 APEC 會議報導，《自立早報》，1991，11月15日）

“我們要考察的是專屬於人的勞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意象中存在着，即已經觀念地存在着。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着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作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志。”

——卡爾·馬克斯（Marx, 1861-79/1977: 283-284）

（中譯引自《資本論》，卷1，頁20頁）



## 一、研究的問題

一般說來，至少對目前當令的主要設計流派言，建築設計並非是由人的角度，或者是由社會歷史的脈絡來處理空間，它往往反而是在孤立的情境中，脫離了人來進行思考。(參考圖1-1，頁19) 在今天，“建築”(architecture)到底是什麼？如何能在一較寬廣的社會歷史脈絡組織中來看待建築，事實上已不只是一個純粹概念的問題，而關係具體的實踐問題，它關乎當前資本主義中的日常生活。本文試圖提出的問題是：在社會理論與建築理論，以至於設計理論之間是否存在一種理論的橋樑？這似乎也關乎所謂社會學的美學範疇。換言之，本文之基本前提一方面是針對“理論”的研究，而另一方面，則以“空間形式”做為理論關切的焦點。我首先對本研究的時勢(conjuncture)作一初步表白：

### (一)研究的時勢

#### 1. 社會與理論時勢——尋求空間之文化形式的新研究途徑：

一方面，60年代有許多環境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曾試圖將社會科學應用於環境設計的領域，然而，他們大部份的努力並未成功地將社會性的課題帶入實踐，帶入營造活動，連接上規劃與設計活動的核心。

由更近的時間來看，設計專業目前陷入了一種由實證主義的環境心理學與社會學倒退的氣氛中。設計者退回傳統的、純粹美學的領域(例如，80年代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建築)。甚至，許多規劃師也離開了社會科學的思考方式(例如，所謂“決策中心”(decision-centered)理論，或“規劃的理論”(theory of planning) (Faludi, 1973/1984))。

另一方面，自70年代起，都市社會學中的新範型已經提出了一種批判性的、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它替代了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社會學。基本上，傳統都市社會學持續社會整合與都市文化的意識形態傳統，認為都市與文化是都市生活的決定因素。而批判的都市社會理論則針

對空間轉化的結構邏輯，認為這些規律深藏於，以及導源於資本的變化過程之中，即，生產、交換、消費、管理的不同過程之中。國家的角色、區域與都市政策、意識形態的機器、以及來自底層的社會運動是這個空間變遷過程的核心。空間形式的組織與表現也反映了潛藏於底層的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力的再生產之邏輯。這個範型已經提供了一有系統之都市空間概念發展的堅實理論基礎(Castells, 1972/1976/1977; Pickvance, 1976; Saunders, 1981)。然而，植基於都市社會理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却很少針對空間的特殊社會與文化層次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與發展(King, 1980:5)。社會文化組織的層次經常被當成像一種未經檢驗的資源，在靜態抽象的結構中被假設著以及將其表現出來(Francis, 1983)。然而在不同的學域，對人工造物（文物）(artifacts)之文化生產與再生產，却被像建築史、藝術史、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的新馬克斯主義研究途徑視做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試圖將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擴展至社會文化層次，針對“空間產物”的“文化包裝”提出理論的架構。它也是由社會學的美學來處理有關空間形式的課題，這也就是說，尋求將空間視為特定社會、歷史情境產物之角度來解釋空間本身。換言之，營造形式(built form)之社會生產（或者更精確地說，空間的文化形式(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的理論要被進一步地建構起來。

## 2. 空間與空間意識的連結——意識形態的中介斡旋過程：

空間與空間意識之間，在認識論的層次上有一辨證關係：即，空間是如何被理論化，以及將空間整理使其在社會科學中互相連貫統一？而另一方面，空間是如何被覺知，即空間是如何被經驗為意識形態的建構(ideological construct)。所以，空間形式不僅是被認知與抽象為理論的形式，而且空間形式為人類感覺活動的意識形態產物。然而，前者的理論知識與後者的知覺知識並非絕對地對立。我們也需要在社會科學之中，經由理論的建構來掌握意識形態的感覺經驗。進一步，理論的新取向更會要求：做為一種新的論述來解讀與分析感覺經

驗。感覺有賴於物質化了的空間形式作為其感覺馳騁的基礎，而且依仗著人主體的主動建構經驗。被感受到的空間的最基本性質往往被稱做為地方感(sense of place)。假如將地方感用概念來做更準確地建構，稱為“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Williams, 1977; Pred, 1983)，正是在處理形式創造與形式使用時關乎主體經驗特殊性的課題。所以，空間的社會理論，需要能充分掌握感覺的結構，它貫穿生產的過程，以及由此而獲致了解（或者說，消費或遊戲）的過程。簡言之，社會理論需掌握意識形態的中介斡旋過程。

### 3. 營造實踐為一種社會實踐：

自1960年起，一些規範性與程序性的設計理論在設計領域內比較成熟地浮現出來，例如，營造的模式語言(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77)、原型與城市設計模型(Lynch, 1981)、歷史的類型(Rossi, 1966/1982)等提法。他們碰到了關係著地方感這議題的營造實踐課題。本文試圖將地方感視為空間的意識，並將前述諸人的努力納入一更寬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脈絡組織之中來重新思考。

### 4. 歷史的批判：

歷史的角度要求我們通過社會歷史變遷的過程來考量空間。這裡所提議的社會理論和社會學的美學與歷史均不宜視做不同的學域而分離對待。何況即使美學本身也應由該學域的社會史的角度來加以了解，這就是論述的歷史。進一步，空間若被視為一種歷史關係，一種歷史地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那麼，對風格或美感經驗的理論分析也需歷史化，這是歷史與批評領域中戰鬥的知識之基礎。

這些是我們出發的基礎。

## (二) 預期成果

本書期望在以下三個層次獲得初步的知識性成果：

### 1. 解秘(demythification)

針對強化支配性社會關係再生產的意識形態過程的神秘化功能，

本書試圖能提供解構之道，即，在空間論述中解秘的理論性工具。這是吾人理論性思考的必經過程。

## 2. 解釋與轉化：

本書旨在解釋營造、設計與規劃過程中意識形態的中介與斡旋。去知道這中介過程，就是去試圖了解：人們僅僅是經過空間這個特殊對象（媒介），而經驗到的意識、感覺和價值。這樣的理論性分析然後將有助於空間的生產，進一步，改變吾人社會的實踐。它不僅僅是為求知識上的多樣性中的一種學術研究的方法，而是解放經濟上受剝削與政治上受壓迫人們的理論與實踐工具。簡言之，一方面，只要理論夠透澈，就可以使人們信服。然而，另一方面，武器的批判不能被批判的武器所替代。

## 3. 批判的傳統

本書在方法論上不僅受惠於批判的都市社會學，而且承批判的文化研究、文學批評、藝術史與建築史的滋養。本研究自是一更大的理論與實踐整體的一部分，希望能豐富批判傳統這個偉大而漫長的人類勞動。

目前在建築與都市設計領域中，僅存有些一般性觀點的應用，僅有工作手冊而沒有理論。這研究期望能創造一種知識生產的理論條件。知識生產的過程意謂著“既定原料（科學的知識和／或前科學的表徵）轉化為某一定產品（新的科學知識）；這個轉化過程是由特定的科學生產作用者（agents of production），使用特定的勞動工具（概念、理論方法），在特定的生產條件（包括物質與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的”（Castells and de Ipola, 1976:113-114）。在此，理論性思考的目的在於知道在空間形式之後是什麼——空間產物的文化包裝要如何掌握——即，對現實的理論分析。它關心知識生產的過程，但是它不是為了知識生產目的而造就的無用的“社會學理論”。

### (三) 研究的問題

研究的問題可以總括為一句話：如何能一舉分析形式與社會，這也就是說，期能掌握正文與其上下文為一整體。換言之，處理社會與空間的關係時，是否能發展出一種社會性理論，它同時對空間的社會歷史脈絡的解釋以及處理經由空間形式關連意識形態層次的活動（經常是美學的、設計理論所關心的），我們對解釋性與理論性工作的發展有急迫的需要。本研究試圖以一種認識論的工作來反應這個問題。認識論是一種科學活動之概念的與方法論的操作之練習。我基本上仰仗著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與艾米洛·伊波拉(Emilio de Ipola)對社會科學的認識論實踐的觀點做為起點。這篇早期的理論著作超越了阿圖塞的理論實踐的形式主義，然而它却將檢驗理論的過程化約為政治的實踐而仍陷於形式主義的教條之中，這是本研究要避免的。

#### (四)分析過程

理論發展的過程主要關心認識論實踐的過程，我們將其設計為三個階段：1. 理論研究途徑之類型(*typologies of theoretical approach*)；2. 認識論批判的分析結構(*analytical structure*)；3. 認識論的重建，以下，我試著闡釋這三點：

因為研究目的集中於“形式之創造”與“形式之使用”的社會性研究途徑，研究者於是選擇社會性的研究途徑方面的一些主要的知識傳統。它們被當作知識傳統的主要類別，而不在個人，因為它們的認識論的模型清楚地或不清楚地主導了它們的研究與實踐。有些理論的研究方法是特定意識形態所存在的特定理論的類型。他們經由制度(或機構)的機器(*institutional apparatuses*)來發揮其功能。事實上，支配性的“理論”經常是理論的意識形態(Castells and de Ipola, 1976: 118)。它們是意識形態的構造，而被制度(或機構)化為“理論”或“科學”。所以，對這些理論的研究方法的選擇是基於兩個內部準則：(1)它是一種社會性的理論，(2)它以一個整體的方式來注意形式的議題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歷史的脈絡組織。換言之，我的目標不在於處理建

築的不同思想，而是在於它們如何應付空間形式的社會變動(the social dynamics of the spatial form)。所以，七個不同的理論的研究方法由環境與空間論述（包括了規劃、設計、設計研究、歷史與批評）、符號學、阿圖塞學派（包括了文化研究、文學批評、藝術史、藝術社會學等）等等，茲條列於下：

### 1. 理論的研究途徑之類型

- (1)開文·林區(Kevin Lynch)及其知識上之同道，
- (2)環境—行為研究(Enviroment-Behaviour Studies)，
- (3)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及其合作者，
- (4)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與威尼斯學派(the School of Venice)，
- (5)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
- (6)阿圖塞學派(the Althusserian School)。

當然，這裡給每一個理論的研究方法貼上作者名字的標籤並不必然認為歷史是作者的歷史——不論它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還是理論家。相反地，賀龍·巴赫德(Barthes, 1968/1977:148)教導我們“作者之死”：他們是在一種理論的論述之中社會地與歷史地生產。主體得做為論述中複雜的與不同的作用者來分析，即，去掌握其作用者、主體在論述中之干預才是重點所在(Foucault, 1969/1979:28)。

然後，“空間形式”的課題是認識論批判首要的對象。研究者試圖設計一種結構當做是對空間形式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分析架構，來帶入每一個理論的研究途徑中，來檢視它如何處理空間的社會變動。

### 2. 認識論批判的分析性結構

首先，對每一理論傳統之歷史形成過程與脈絡組織的摘要說明做為導言。

然後，第二點為每一理論傳統做為一種歷史實體的論述形式，即，在特定的歷史時勢下，論述之疑旨(problematic)形式決定了其組織概念、其發言與其保持沈默的方式。它包括了兩部份：



(1)這理論研究途徑涉及空間形式的部分所說明的是什麼？

- a. 主體－客體關係（使用與經驗）；
- b. 價值－形式關係

(2)這理論研究途徑論及形式與脈絡組織間關係的說法是什麼？

- a. 文化脈絡組織－形式關係
- b. 社會關係－形式關係

然後，因為理論、寫作與實踐不是直接地透明易見（或被識破）我將檢視：這理論研究途徑如何能應用於專業的實踐。

最後，論述的形式將被放在一更大的脈絡組織中來察看其論述形式上的盲點與當今面對的問題，即，認識論的批判。

### 3. 認識論的重建

批判是爲了建立新的疑旨。所以，在有系統地干預不同的理論研究途徑之後，對空間的文化形式之解釋擬定理論的架構，以期能在最後由認識論的重建來重新做有系統的陳述。研究的結論是經由完全或部分地修正了已有理論的規定來從事認識論的重建。這個重新來過的，有系統的陳述並非宣告其修正過的觀點與定理無效，而是給予它們新的理論的地位。

同時，本書僅是理論營造的第一步。我們並沒有什麼先驗的方法論，或是先驗的認識論模型。知識生產的過程是一種抽象化的過程，然而它却不以純粹的形式存在，它是在科學實踐之中，以及連同特定的意識形態實踐，連結其他的生產過程而存在(Castells and de Ipola, 1976:114)。在經驗的層次上，這個暫時的理論架構應由在現實中的科學實踐來檢驗。認識論實踐的本質爲在科學實踐的時勢上造成其影響。並沒有什麼永恆的、預先設定的理論之科學性準則。所以，對支配性認識的障礙的批判與暴露仍然是不完全的。它有賴於社會的實踐(p.119)。認識論的論述表現了對對應著科學實踐的理論時勢的一種論述干預。時勢的轉化意謂著一個在認識論論述中互動的轉化(p.120)。

最後，本研究不是由定義開始而是由實踐開始。因此關於術語的

界定，一方面，每一理論的研究方法中都有其不同的字眼、觀點、概念、認識論的類別。它們的觀點／概念是爲了有系統地研究世界的意識形態／科學的建構。基本的認識論的類別表達了關乎知識生產、科學實踐與認識論障礙的基本命題(Castells and de Ipola, 1976:113)。它們會在每一章節中處理。另一方面，本文運用了一些一般字眼。語言在論述中像意識形態般地被建構。我有意避開模糊的字眼，像在描述中的“藝術”(art)、“建築”(architecture)、和“都市”(urban)，有時甚至包括“環境”(environment)(Teymur, 1982)，我代之以“人工造物”(文物)(artifact)、“營造”(building)(營建的工程與工作)，或“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空間”(space)，“實質周遭環境”(physical surroundings)，“空間產品”(spatial products)等等，用來分析與區分真實對象、物質元素與論述的概念元素。再說一次，本研究不打算植基於一系列唯心主義的笛卡兒邏輯的、純粹的、概念的定義。經由認識論的爭論，辯論的結論就是定義。概念是知識生產過程的產出物。它們是產出物而非工具。所以，理論的建構，或理論的對象或社會學的理想都會在認識論批判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

## 二、建築研究與建築理論\*

### (一)建築學？

“我們生活的地方有問題！”對一般人言，這確實是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的一種經驗。至於建築專業者則往往會關心“建築問題”。然後，很自然地，這些“建築問題”就需要“建築研究”來處理。最後，研究的成果就對“建築實務”有幫助，解決了或是改善了“建築問題”，或者是，又製造了某些新的“建築問題”……。

\* 此節部分原文曾發表於建築學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專題演講，1979年4月15日。

由上述的角度看待“建築問題”、“建築研究”與“建築實務”之下，假如我們生活的地方的問題都是很單純，是些技術性問題的話，或許這種研究途徑也大致差不多了。可是，現實的情境却告訴我們建築問題往往不這麼單純。目前讓我們最頭痛的問題往往無法單純視之為技術的問題，而是關乎社會文化的問題。只要有一些實務經驗的人都體會得到，技術是爲人所用，它與社會文化的問題糾結在一塊，盤根錯節。所謂“建築問題”，在最近的未來，棘手的部分大約都與此相關。

在這樣的現實上，前述的“建築問題、建築研究、建築實務”的常識性、經驗性提法似乎忘記提醒我們一些隱藏著的根本問題，就是：“建築問題”到底是什麼？以及，“建築研究”的問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說，研究者是怎麼問問題的？這幾乎是研究的方法論之基石，在其上，才是如何研究，研究與實務的關係等。我們其實總是透過一些辦法的幫助來問問題的，這些問題藉由概念架構的引導而出現。所以，假設的提出並不在於“膽大”與否，倒是研究者往往視而不見其自身概念架構的存在罷了。研究經常爲一組概念所建構（概念正是論述的對象），概念與問問題的方式（概念的架構）密切連結起來，成爲知識構成的基本架構。

碰到知識構成的問題，建築研究就碰上與其他領域相較下的困窘，就是：建築學是什麼？什麼是建築的學問或知識呢？到底有沒有建築學呢？它是如何被理論建構的呢？

## (二) 建築理論

或許，建築界由於其專業的技藝傳統，缺乏研究的傳統，因此，建築教育與訓練並不鼓勵分析性的思考。甚至許多專業者相當反對“理論”。然而，若是沒有某種理論的話，無論“建築的理論”目前是如何粗糙或是不明顯，我們其實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建築”(architecture)。拒絕“建築理論”的人其實正好說明了他不知道自己也戴了付

眼鏡。所以，“建築理論”不管它用什麼形式存在著，只要“建築理論”存在，其實就存在著“建築”來做為理論的對象。那麼，更根本的問題應該是“建築到底是什麼？”，“它是如何被建構的？”

建築理論告訴了我們建築是什麼，源自不同知識傳統的不同理論嚐試用不同的角度界定建築。例如，你可以由形式上區分建築(architecture)與營造(building)，只有像林肯大教堂這樣的建築物才是建築，腳踏車棚則不是，這是形式主義者尼古拉斯·派夫斯勒 (Nikolaus Pevsner) 的觀點 (Pevsner, 1943:15)。也許，如同現象學者，你可以由涉入者的感受下手，認為人對形式的想像與經驗涉及某些普同性的“地方感”才是建築的本質。或許，你甚至可以這麼說，建築根本就沒有什麼本質，建築與營造不是本體上的差異，而是功能上的差異。建築與營造的區分說明了某些空間，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的作用與區別方式，它關乎空間被賦與的價值、以及被人們使用的不同方式與被賦與的不同意義等等。因此，“建築”一詞是一種形式上的定義，是需要暫時用引號標明出來的字眼。

或許，此處在行文上做暫時之繞道，先提供一點參考性的資料是有幫助的。今天一般通用的“建築”這個詞所代表的觀點，基本上是近代由歐洲經日本傳入的。就中國的歷史脈絡言，並沒有近代觀念的“建築”(architecture)這個詞，而是稱為“營造”(building)，包括了修路、築堤、開渠、造橋、蓋房子、建城市、闢園林…等，工作則主要由工匠師傅來從事，像木匠、石匠、泥水匠、花園子…等。其中，中國古代的“工師”的地位與作用，頗值得我們進一步了解。“工師”的名稱起源於戰國，漢代稱為“大匠”，既稱匠師，他們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於普通工匠。他們負責大規模的宮室建築、城市建設以及造園中的選址、移石、蒔竹，到經營樓館的全部過程。他們的名稱雖然不叫做“建築師”，但實際上所從事的工作內容，就正是今日建築專業所從事的。師徒之間，薪火相傳，則藉助於操作示範和口語相傳，但並非所有的匠人均能“主大營繕”，而上升為“工師”的 (林宣, 197?)。他

們所表現出來的對專業技能的精到、效果與品質保證的專業精神，在後面的分析中會進一步地用“空間措辭”(spatial rhetoric)或“營造措辭”(building rhetoric)的概念來進一步處理。

在工業社會以前的西歐社會中，建築則被稱為是工匠營造(master building)。就“建築師”(architect)這個字的字源學言，它起源於希臘文“ἀρχιτέκτων”，而由“ἀρχι”與“τέκτων”兩部分複合而成。前者的意思是“重要的”、“首長”(chief)，或“師傅”(有資格收徒的匠人)、“精通技藝之專家”，也就是“能控制局勢，應付裕如之人”(master)。後者的意思是“木匠”(carpenter)、“手藝人”、“工匠”(craftsman)、“營造者”(builder)。所以，兩個部分結合起來之後，說明的建築師就是“高明熟練的營造者”(master builder)(Whittick, 1974:81)，而“建築”則為“高明熟練的營造者之作品”。

(圖 1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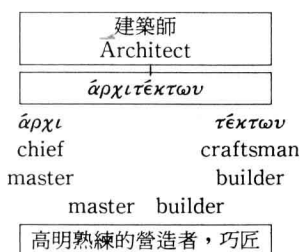


圖 1 - 2 建築師字源學圖解

當前建築論述中所習用之觀點，視建築為“營造之藝術”的觀點，其來源首見於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佛羅倫斯的人文主義者阿伯提(Leon Baptista Alberti)：之《建築十書》。十八世紀的西歐哲學家，如黑格爾、史賓塞、孔德…等，則進一步將建築與繪畫、雕塑、詩與音樂一般刻意分類為美術(fine arts)之一支，而以審美價值來區分“建築”與“營造”，強調好的建築物要合乎“美”，才能算是“建築”。

(architecture)。譬如說，十九世紀的英國評論家福格森(J. Fergusson)認為建築就是工程加上裝飾（裝飾是在美化營造），所以他認為約瑟夫·巴斯坦(Joseph Paxton)在倫敦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因裝飾量仍不夠多而不能歸於美術的範疇之內。到了世紀初，法國的建築師勒·柯必意(Le Corbusier)則宣稱：“工程師為經濟的規律與數學的計算所指引，按照宇宙的規律安置萬物，因而獲致和諧。建築師，則經由形式的安排而獲致一種由精神上的純粹創作所獲得的秩序…吾人因而經驗到美”。至於當代的建築評論家彼德·柯林斯(Peter Collins)則認為建築確實存有美學上的吸引力，然而以上二說俱為偏見。福格森以裝飾為美，其裝飾的程度與意義很明顯地是視其在一特定審美論述之內的價值而定，很明顯地受到財富、權力與社會威望的直接影響。柯必意認為建築之美重於和諧，其區別美與和諧明顯地反映了柯必意的建築審美觀點上的偏好與決定這偏好的“古典”建築論述（雖然柯必意是建築的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之中的大將）。柯林斯則認為：建築應以對理想空間的價值判斷為衡量之關鍵所在(Collins, 1974:112)。由於美感經驗有其社會性之差異，而專業教育所鞏固的又與上層社會之品味有微妙的關聯，往往使專業者困於偏狹的美學價值判斷。我們與其以“品味”做為教養與身份區分方面的爭議，實不如先澄清建築與營造之間到底有無空間本質上的差異？簡言之，即使是柯林斯所謂的“理想的空間”的價值判斷，仍然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所以“建築”也者，其實是按照不同歷史角色對空間意義所賦與的不同任務、要求與目的而決定的，建築關乎特定歷史與社會對空間意義的象徵性表現。

以上福格森、柯必意與柯林斯等的觀點對“建築”的界定雖然有分歧，然而大體上仍是主流建築論述的組成部分，其分歧正是說明了工業社會分工過程中，在專業界定上的論述分歧，以及，在空間的文化形式上象徵表現方面的分歧。因此，主流建築論述大體上都籠統地將建築界定為營造的藝術與科學。



即使我們參考70年代蘇聯大百科全書對“建築”條目的界定，“建築”被當做是：“生產資料的必需部分，以及，人類社會存在的物質資料。建築的藝術形式則在社會的精神生活層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築的功能、結構與審美的品質（使用、強度、美）三者相互整合”（Ikonnikov, 197? :257）。在一定程度上，上述之界定有唯物主義的清晰，然而，在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上，尤其是對建築美學的理解上，其實仍然為古典建築論述的疑旨所支配，語言上仍然是古典建築論述之俘虜，仍需要在理論上做進一步澄清。

接著，這樣的質疑建築的既有種種定義的後果却意謂著所謂的“大師傑作”，或是“建築經典之作品”竟然是在特定的社會，在特定的階段所建構起來的一條“傳統”罷了。同樣的，甚至所謂的“民族建築”無可懷疑的“偉大傳統”，不管是“中國建築”也好，“日本建築”也罷，這個詞的形成原本是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形成過程密不可分。它的同胎兄弟是民族文學與民族藝術，並不是古已有之的。所以，“建築”是為“建築理論”所界定的，而“建築理論”其實是在建築論述(discourse)中展現其意義的，這就是說：建築理論是一些系統化的陳述，包括了說的話、畫的圖、使用的語言等等，它們在一種隱藏的價值範疇的網絡裡活動，由潛藏著的觀念架構所構成的，表達了意義的論述(discourse)。有了這論述我們才有話可說，話也才有意義。這些建築的感覺、評價、認識或信念的模式却往往與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的權力結構，以及要維持這體系的運轉下去有密切之關係。這種關乎我們期待建築應該是什麼，以及由建築中獲得什麼的經驗所形成的人們“自發地”分享的認識空間的習慣，不僅涉及個人的品味，而且涉及某些社會集團賴以行使和維持其權力的種種假定。在這樣的知識基礎上，我們就可以說：建築是一種制度 (institution) 了。這些觀點在建築圈子裡驟然聽來或許十分刺耳，然而，放在我們現實的社會中，尤其是我們的社會與文化之中，反而遠比歐美日本的社會容易看清楚得多。我們傳統的社會中，營造與建築之間並未有社會性

的區分（尤其是指現代的區分）。到現在，國家的高等考試中建築的分類仍然從屬於土木之中也就不足為怪了。對於一個以工匠營造與廣大官僚制度下所需要的工官制度言，對建築物的要求不會是建築物建造的起源時間，而是在於建築物的社會目的。因此，對30年代起引入的建築史研究者所熱衷的建築物的建造日期最好是越早越好的價值觀言，傳統建築（其實是營造）所重視的更新，自然是格格不入的。至於到了當前在古蹟保存的要求下，重視“原件”與“起源”的評價方式，在傳統文化價值觀下掙扎的“古蹟”界定那就更是困窘了。

### （三）多範型抗爭的局面

如前述，“建築”到底是什麼？如何能在一較寬廣的社會歷史脈絡中看待建築，事實上已不是一純粹概念的問題，而是關乎設計，關乎具體的實踐的問題，它關乎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日常的生活。前述由“建築理論”的層次來理解建築論述發展之動力是意謂著知識生產活動不能簡單化約為社會力量變動的直接支配。然而，我們終究得看到其社會力量的根源。建築論述一方面在社會的分工要求下，一方面在認識論的範型轉移下，二次大戰後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傳統美學範疇支配的建築範型已不能負荷福利國家社會在國家大規模干預形式下的建設方面之任務。技術官僚的理性產物正是實證主義科學方法對傳統範型的改造，以及文化上的現代主義風格。這個凱恩斯模型在60年代末受到了社會運動的挑戰，以及在7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中被宣告放棄。在建築論述中，我們看到環境—行為研究與建築實務工作者間的交流、隔閡與挫折。設計者放下當年對現代主義攻擊時所揭櫫的社區取向、使用者取向的號角，在正式升起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大旗之後，退回傳統的、純粹美學的領域，轉播再結構過程中社會兩極化之下文化精英的象徵價值。

當前在領導權（霸權）的(hegemonic)抗爭中，建築論述中正統的、主流的建築理論還未能與不同的理論傳統在近年的重要理論創見合

流，充份汲取在文化研究、藝術史、建築史、文學批評、社會學等方面的乳汁。然而，我們確實也可以見到一些平行於上述的，對建築論述展開全面的社會批評已經開始登場，譬如，1982年以後陸續在紐約建築與都市研究學院的會議所出版的書籍(Ockman, et al. 1985, 1988)。以及，馬可·戴安尼與凱瑟林·英格罕 (Marco Diani and Catherine Ingraham) 嚐試重構建築理論的集子 (1989)，還有丹尼斯·克羅 (Dennis Crow) 所編的《哲學街道》(Philosophical Streets) (1990) 等等。同時，1990年在土耳其安卡拉召開的國際人與環境研究學會(IAPS)的會議提綱中，幾乎已全盤拒絕了環境—行為研究的範型 (IAPS 的誕生與發展正說明了環境—行為研究與建築師之間的互動過程<sup>❶</sup>)，而以文化、空間與歷史為主題，在理論、歷史研究、空間研究、教育、實務各層面同時並舉。相對於社會科學的領域，似乎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遲來的新的範型正在建築論述中浮現。

假如我們暫時放開專業分工任務下的狹義界定 (建築最主要關心的是空間的文化形式，即，空間的象徵表現，或者用傳統的語詞說，風格)，廣義界定的建築應當包括了相關的專業 (如都市計劃、地景建築等)，我們很可以確定目前建築論述的理論領域正處於一個多範型抗爭的局面。它使得傳統的美學左支右絀。然而，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中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危機除了實證主義方法論已失去了其做為共同科學的真理地位，而且還包括了它與實務應用關係上的脆弱連結。這也是開文·林區(Kevin Lynch)提出“規範性理論”的理論時勢所在。然而，在可見的未來，理論上定於一尊的時勢已不可能，建築論述的多範型抗爭局面才是林區式二分問題的現實根源 (譬如說，在知識片斷化困境中致力於功能理論與規範理論的連結)。除非拒絕多範型抗爭現實，不然功能理論與規範理論如何能整合。這也就是說，多範型抗爭的結果與實證主義認識論預設才有“規範性理論”的提法出

❶：參見拜倫·麥克利斯(Byron Mikellides)的《Architecture for People: Explorations in a New Humane Environment》，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0。

現。對理論的探索而言，這局面是百花齊放的戰國時代，然而，連繫現實的分析，這却是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建築論述中理論的精神分裂狀態。

#### (四) 台灣的現實

或許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對第三世界之學術研究者與專業者(這兩者根本不宜如此劃分與對立，這是美國式學院分工中實用主義的產物，是將知識庸俗化、將人工工具化的產物)的建議頗值得我們玩味<sup>②</sup>。我的看法是：

我們需具備理論診斷的能力與專業實務的技能，然後，生根於本地。理論診斷是指分析特定情境的能力。我們需要理論的訓練來因應新的改變，尋找新的工具。同時，我們也需要特殊的技能來將理論分析的內容轉譯為改造空間的行動與策略。理論與實踐，學術理論與專業技能之間，全球性的一般知識與台灣的特定經驗之間，需求取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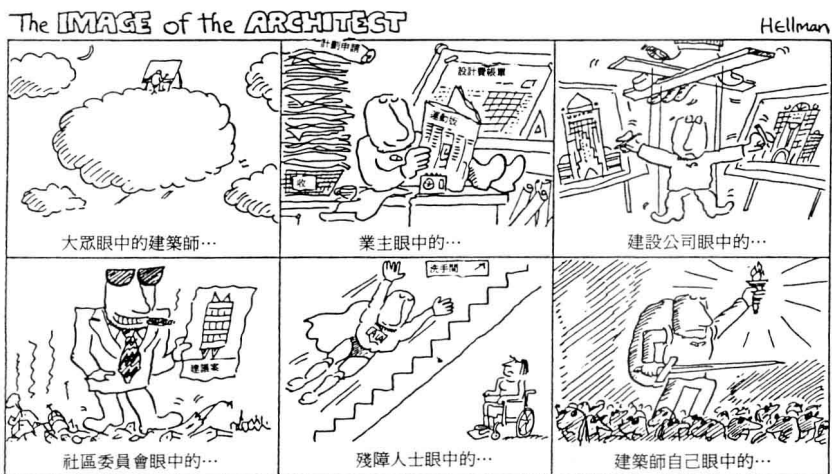
至於如何將中心國家這些知識積累中心的理論轉譯到第三世界呢？我們需要的不是學院或形式主義的心智產物，而是情境與理論知識之上的具體知識。它不是形式主義強調自身內在邏輯的論述建構、自主的理念系統，而是根據在社會與歷史現實中的知識生產工作。換句話說，沒有什麼自全的“專業理論”(如設計理論、規劃理論)、甚至也沒有什麼自全的“社會理論”，在理論的層次上，也沒有什麼互不相關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分，而只有歷史科學。我們必須經過的過程是經由在社會中發生的實際過程來加以分析，不然，即使能做出一些優雅奇特的理論建構，也仍然是形式化、與歷史與社會關係所發生的事沒有關係的語言。畢竟我們從事的仍是實驗的科學，而不是形式的科學。

<sup>②</sup>參見“訪問曼紐·卡斯提爾”，訪問者：謝國雄、邢幼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夏秋季號，1988，pp.339-360。至於譯名，從其西班牙發音宜改為曼威·柯司特，也是柯氏訪台後討論之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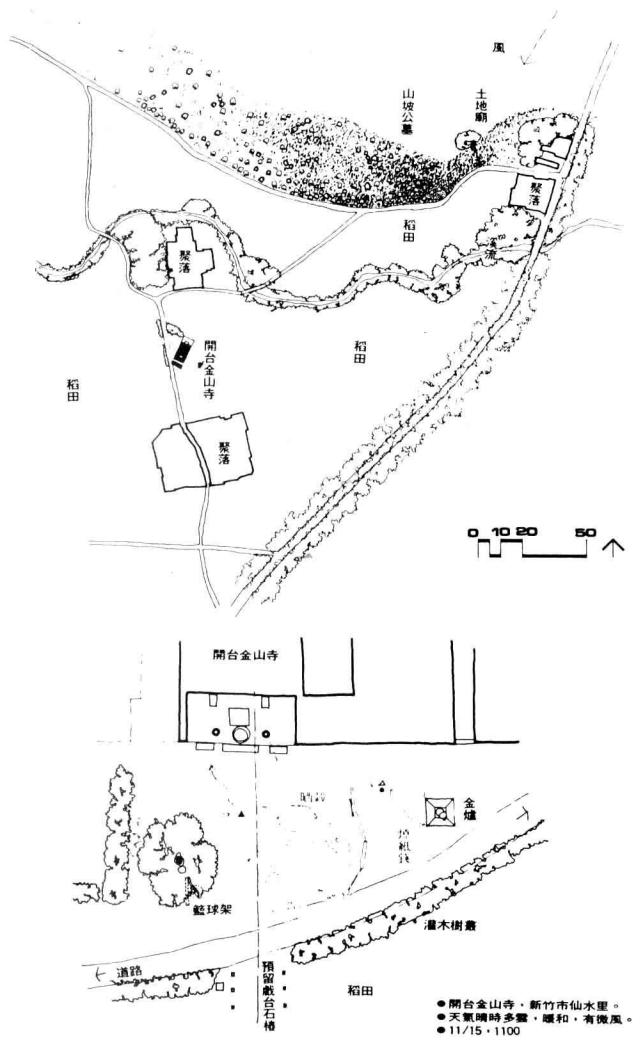
或許，一個批判性的學習／實踐過程是必需的。用通俗的話來說，一學（先好好學了，拿來用），二批（批判的自覺是知識生產所必需的），三改（批了才能針對特定情境修正），四創（具體的知識才產生，而它不是靜態的）。換句話說，我們需要調查研究的過程，不然自己在做什麼都不清楚，而理論的診斷正是關鍵。最後，再補充一句，是什麼在左右我們的改變呢？是現實的情境。

我想，(1)自外於當前先進工業國知識積累中心的做法是駝鳥式的，(2)不自覺地被塑造而又無批判之習慣，見了“批判”這個字就不安，更是知識侏儒。這兩者都是保守主義的心態，對我們現在的台灣（以至於第三世界）而言，是根本沒有資格做如此打算的。在當前的理論時勢下，無論是功能主義、結構主義，或是現象學，還是馬克斯主義，研究者已很難再願意回到靜態的、固定的、理論的形式主義。然而，也不願接受庸俗短視的、經驗主義的理論相對主義。我們需要的是複雜微妙、多面的動態關係與更開放的理論架構來考慮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而不是耗竭心力去重建一個替代性的理論模型。或許，針對現實的問題所建構的假設性提綱能夠暫時指導我們的實踐（包括了專業實務），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我們終會深化原有的認識，進而發展，甚至顛覆原有的理論提綱。

圖1-1 建築師形象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No.12, 1990, p.94, 本圖第一次出版於《Artitect's Journal》;繪圖:路易斯·海曼 (Louis Hellman))



© Louis Hellman/October 25, 1990. A version of this cartoon first appeared in the Architect's Journal, London.



新竹仙水里開台金山寺廟埕活動觀察記錄  
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都市計劃研究室 1978

圖2-1 在林區及環境一行為研究影響下的調查圖例

## 第二章 城市形式與城市設計理論的 認識論批判： 開文·林區及其知識上之同道\*

“地景世界之更新，若能伴以社會之更新，是多麼快活的事業啊。”

——開文·林區 (Lynch, 1975 : 46)

開文·區(Kevin Lynch)是過去二十多年中環境設計方面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他不僅生產了龐多的學術著作，而且累積了豐富的實務經驗。他不僅在美國與西歐享其盛名，而且在第三世界也有崇高的聲望。他不僅是環境認知與都市意象等研究的開拓者，而且也是都市設計、城市規劃與公共政策<sup>①</sup>方面指引方向的大師。

### 一、導言

開文·文區是生於芝加哥 (1918 年) 的第三代愛爾蘭裔美國人。他的基本學習與信念奠基於法蘭西斯·派克中學(Francis W. Parker)——一所以杜威哲學為教育原則的學校。在這所進步的學校中，林區與安·波德(Anne Border)<sup>②</sup>共同接受了激進教育的社會信念，終其一

\* 修訂前之原文曾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3卷，第1期，1987年9月，pp.119-131。

① 林區再三致意之處的城市意象與城市形式研究之目標之一為提供都市與區域政策的決策，參考(Lynch, 1984b:159-160)。

② 安·波德為晚林區數班之派克中學學妹，後成為林區之妻子。



生未有改變。在 1935 年畢業後，面對大蕭條、30 年代頑強的勞工運動與西班牙內戰，在此歷史時勢的塑造下，林區決心獻身於社會主義之信念。其後，他進入耶魯建築系，因無法忍受當時耶魯因襲保守的巴黎美術學院之重重規範而轉就法蘭克·羅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之塔里生(Taliesin)。他自己說，在萊特這裡，他才學會了如何觀察世界。之後，他又至羅森萊爾(Rensselaer)工藝學院接受了土木工程與生物學的訓練。二次大戰期間，林區進入陸軍工兵，在南太平洋地區服役。最後，他到了麻省理工學院，於 1947 年獲都市計劃學士學位，並在北卡羅萊納綠市(Greensboro)擔任地方的城市計劃師工作。1949 年，麻省理工學院慧眼識英雄，不顧其無更高學位之背景，提供林區教席。在此，林區一教三十餘年，巍然建立了林區式都市形式研究——對都市形式與人類目標之間關係的一種有系統思考——的一生事業。非僅於此，由於林區與弗烈·亞當斯(Fred Adams)、傑克·霍華(Jack Howard)與羅伊·羅文(Lloyd Rodwin)等人之共同努力，麻省理工學院的規劃課程在他們手中才獲得了完全的發展(Carr, Rodwin and Hack, 1984:523)。

開文·林區針對都市形式所發展出來的哲學角度可以當作是在一特定歷史時勢中之環境論述(environmental discourse)的一種典型。它可以由兩個層次來探討：

#### (一)實質規劃與設計取向的專業實踐方向與技能：

美國的城市規劃在過去二十年中曾經經歷了不止一次的領域劇烈擴張與專業範圍改變，然而，在幾次的範型移轉之中，林區始終不改其方向。我們甚至可以說，在他的引導之下，麻省理工學院的規劃課程是個美國規劃學院教育中的例外，在過去二十年中從未放棄對實質規劃領域的關注。事實上，林區把環境規劃與設計當作是一門古老的社會與環境的藝術——它是塑造與經營一般人日常生活的時間與空間環境的一種方式。他的觀點不僅目前仍然成為建築師、地景建築師與

城市規劃師之間可以分享的成果（這在時下之專業分工與知識零碎化的情況下是十分罕見的）<sup>③</sup>，而且還經常能為研究者提供有探索性的新見解。由於林區與其知識上的同道長期致力於研究與實務間的溝通與銜接工作，作為一種專業技能的城市設計藝術才一步步地變得成熟，變成都市設計、實質規劃——或者說，“城市的創造(造成)”(city making)——的發展核心。

## (二)人文主義之環境論述的一種典型：

開文·林區之哲學角度不僅僅是個人的宣言，也是一個特定的社會與歷史階段中為一群人所分享的典範。在環境設計領域中持有相同的信念與共同看法的成員，主要分居美國東西兩岸，像唐·愛坡亞(Donald Appleyard)、史提芬·卡爾(Stephen Carr)、葛雷·亥克(Gary Hack)、阿倫·傑可布(Allan Jacobs)、湯尼·李(Tunny Lee)、盧偉民(Weiming Lu)、與麥可·邵斯華茲(Michael Southworth)等等。他們與許多時下的規劃師不同，不傾向於宿命地、似乎未加干預地仰賴某些對過去做形式主義式的投射。林區認為，一個社會若能按照它的期望與需要來表現，規劃師則能有助於塑造人類未來的世界。簡言之，理想主義與設計之間是高度相關的。

更進一步說，林區式論述中哲學角度與人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歷史所決定的論述。林區式論述透過其知識論的中介，在大學與研究機構中生產與再生產，關係著社會力量之變動，茲分兩點闡釋於下：

### 1. 城市蔓延、都市更新、都市間之高速公路系統的歷史脈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福利資本主義的結果。

空間的生產高度仰賴於國家干預中技術官僚之理性。一方面，林

<sup>③</sup>例如，斯圖加德(Stuttgart)大學及波爾(Ball)州大均贈予林區榮譽博士學位。他特殊的成果也被專業的學會一再認定：如1974年之美國建築協會之相關專業獎章，1967年美國都市規劃協會第十五週年獎，第一屆阿爾登·貝曼(Alfred Bettman)都市規劃獎等等(Stea, 1984:197)。在林區逝世前，他被提名為第一屆雷克斯弗·屠格威爾(Rexford G. Tugwell)獎——對城市規劃者最高榮譽的象徵(Carr, Rodwin and Hack, 1984:524)。

區面對城市知覺形式的課題，提出城市意象的觀點。他覺得在技術的因素之外，有必要在都市經營管理的過程中，在感覺形式的層次上，處理異化了的的城市與高速公路(Lynch et al., 1964; Lynch, 1968b: 146)。另一方面，可說是前論述地決定了的(prediscursively-determined)人文主義價值與利益要求林區關注人們如何看待城市。事實上這種專業論述與社會關懷的結合是林區畢生全力以赴之處。

**2. 到了六〇年代末與七〇年代，在社會騷動與社區抗議的脈絡之中，林區之人文主義立場就更積極地整合在他對城市形式的視野之中。**

林區致力於鼓吹這樣的觀點：時間意象、區域的感覺品質、保存的意識形態、社區參與、多元價值與局部漸增的、分散的決策過程等等。這要求一種更細緻的，社會—人文的，與行為—心理的方式經理城市，建構更細緻微妙的城市形式準則。在更廣的層次上說，我們甚至可以基於覺察自身的位置與城市整體，就當前政治文化模型提出空間的議題，進一步連繫上正在浮現中的晚期資本主義對文化的支配，即，關係著如何在後現代主義的邏輯中重新定位，重獲行動之能力(Jameson, 1984)。

我們列舉林區之主要著作：《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1960)，《道路之視野》(The View from the Road) (Lynch et al., 1964)，《基地計劃》(Site Planning) (1962，二版 1971，三版 1984)，《斯地何時？》(What Time is This Place?)(1972a)，《經理區域之感覺》(Managing the Sense of a Region)(1976c)，《美好城市形式的理論》(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1981)；第一，他開始於對空間意象的經驗研究；其次，在深獲他本人喜愛的一本書中（即，《斯地何時？》）思索時間的意象；然後，由計劃案基地的尺度擴展至區域尺度的感覺品質的經理（即，《經理區域之感覺》）；最後，他以一種“規範理論”<sup>④</sup>的形式對城市設計提出完全的總結。《美好城市形式的理論》或許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城市規劃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因為它綜

合了各種不同的領域與城市規劃有關的資料與想法。規劃長期以來一直為專業化的技術狹隘問題所苦，然而，林區在此處却顯示出其通達並蓄，如何處處關係著都市的形式。在這些書籍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文章與編輯出版：〈在城市中成長〉(Growing up in Cities)(1977)——林區編輯，以比較的角度地摘錄了一系列的初步研究，涵蓋了拉丁美洲文化、英美與斯拉夫文化中的不同聚落，注意年輕人的空間經驗。〈環境調適性〉(Enviromental Adaptability)(1958)——他關心環境如何能致力於個人的成長與發展的問題。這是杜威式訓練的線索——由動手做來學習<sup>⑤</sup>。〈都市形式之理論〉(A Theory of Urban Form) (Lynch and Rodwin, 1958)——他與羅文合作，試圖發展其早期的理論架構，在一整體的系統中分析都市設計，提出對城市的“目標—形式”間的關係。一個關乎實質環境不同形式效果的強有力構想逐漸開始形成了。〈開放空間的開放性〉(The Openness of Open Space)(1964/ 1972b)——它由都會區開放空間的整體系統直接反應人類需要的觀點，提出了一種早期的規範理論。所謂“開放性”的觀點，也就是由選擇、熟練與主宰性、新的刺激、社會接觸、意象與調適等價值來建立開放空間的設計準則。〈都市設計〉(Urban Design) (1974)與〈城市設計：它是什麼以及它要如何教？〉(Urban Design: What I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Taught?)(1980)——前者給予都市設計專業實踐一個一般性的視野，包括了專業的失敗、設計元素、社會政治過程、典型的問題及其展望。後者取代了傳統界定的“計劃案設計”(project design)的限制，於是一個更寬廣的城市與區域設計(city and regional design)的看法終於提了出來。

④在1983年出版的普及版中，林區將本書之標題改為“美好的城市形式”(Good City Form)，將“理論”的字眼刪去了。

⑤雖然林區本人對個人發展的主題並未再作太多進一步的發揮(1958, 1972b; Lynch and Carr, 1968)，他的學生卻如此做了——特別是像羅賓·摩爾(Robin Moore, 1974)，以及麥可·邵斯華茲(Southworth and Southworth, 1974)等。

與一般的建築師和都市設計師對形式與風格的傳統興趣不同，林區強調“展現”(performance)，即，一個地方是如何服務於人類的需要。一個設計得很好的環境不見得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或有風格的地方。這包袱困擾了許多設計師，他們把東西弄得漂亮、令人注目、或視流行為萬事之先，至於它的社會性目的是否達成則淪為次要，甚至被略而不顧。一般說來，林區的作品涵蓋了都市設計的不同主題：都市形式的理論、城市設計、個人發展等等。現在，我試著針對林區對城市形式的角度，提出批評性的回顧，它包括空間形式本身，形式與脈絡組織的關係，應用的可能性等方面。

## 二、空間形式

以其早年對城市形式的界定為基礎：動線、主要的土地使用、關鍵性焦點(Lynch, 1960:91)，以及其後考慮人類知覺對形式品質之經驗(Lynch, 1971:189)，開文·林區終於給予城市形式一種較寬廣的描述性定義。城市形式，聚落形式，一般是經由關乎“實質環境”的空間模式來加以考量的。然而，為了完全地了解一個地方，林區強調必需以社會的、生物的、與實質的整體來看待所有的地方。換言之，他將空間形式的定義作了進一步的探究：空間形式不再限於實質的事物。它是人類實踐的空間安排，人、財貨與資訊空間流動的結果，以及與這些實踐有關的，表示了某種意義的，修飾空間的實質容貌。對城市形式的描述包括了對空間的分配、對空間的控制、對空間的使用與對空間的知覺。進一步，對林區而言，面對在一既定文化與歷史中城市形式的社會與空間結構時，他將行動的人這個因素分離為其規範性理論的最終依據，這理論處理人與地方間之關係，致力於為達成人類目標所需之空間模式的品質(Lynch, 1981:47-49)。

姑且將林區之規範性理論擺在一旁，以下試著先闡釋林區由感覺經驗與感覺評價的觀點看待空間形式實體層次的理論角度：

### (一)主體與客體之關係

由空間意象的研究開始，知覺的、感覺的形式一直是林區對城市形式理論角度的核心。按林區的說法，環境意象是“個人所具備的對外在實質世界一般化了的心象圖繪。這意象是直接的感覺以及過去經驗的記憶之產物，它一向用於詮釋資訊以及界定行動…清楚顯明的意象…能為象徵和群體溝通之集體記憶提供原料”(Lynch, 1960:4)。其次，外界的地景可被組織與結構於知覺的相對穩定的系統之內，它能被特殊地描述成一組焦點，或是分成一些命了名的區域，或是為一些還記得的路徑所連繫。林區將城市意象的元素分為五種類型：通道、邊界、地區、節點以及地標(pp.47-48)，它能以賦與“自明性”，空間“結構”以及溝通的“意義”(p.8)的觀點來加以分析。這正是實質形式與知覺過程的結合(Lynch, 1981:131)。

開文·林區有意結合地方(place)與使用者成為一種感覺的地景，而非孤立地分析實質環境本身。換言之，他較傾向於將空間當做一種對地方的感覺經驗而非抽象的幾何空間。林區質疑專業者所不自覺地仰仗的形式主義之價值和知覺，並拒絕那些被認為是事物本身的屬性，像和諧、美、變化以及秩序等觀點(Lynch, 1981:150)。

其次，空間形式或是對地方的感覺經驗，意謂著清晰性的程度，它會被使用者在時間與空間的結構中知覺到並加以辨明。這種描述空間形式的方式不僅聯繫起事件與地方，知覺與形式，而且連結了空間意象的心象結構和非空間的概念與價值(Lynch, 1981:118,113)。林區之理論角度已被發展來組織感覺形式的具體元素與材料，和一系列城市設計的感覺品質，使其連貫為一種城市設計專業論述的整體(Lynch, 1968a:251-261;1971:190-228;1974:1054-1058;1981:131-144; Lynch and Hack, 1984:154-188)。

所以，基於其早年對城市意象研究，林區詳盡說明了地方感覺經驗展現向度的架構。茲開列如下：

#### 1. 自明性(identity)：

地方感與時機感。

**2. 空間結構(spatial structure)<sup>⑥</sup>：**

空間的取向與序列，時間的取向等等。

**3. 符合性(congruence)：**

環境結構與非空間結構的配合，是有意義環境的知覺的基礎。

**4. 明白性(transparency)：**

能直接知覺到不同技術功能，活動和社會與自然過程操作的程度。

**5. 可辨認性(legibility)：**

居民能經由象徵的實質容貌彼此能正確溝通的程度，象徵意義的結構。

**6. 意味與展露(significance and unfoldingness)：**

最深層的可辨認性；意義展露的創造性，經由居民創造自己的世界，鼓勵新意義的建構。

自明性與結構是感覺經驗形式的組成成分。其餘的部分則是處理溝通意義的課題，它是林區對其在城市意象一書中，因忽略了意義的討論而遭致批評之後所做出的反應(Crane, 1961:154; Rapoport, 1977-116 ;Appleyard, 1978:553)。符合性、明白性與可辨認性連繫著我們生活中空間與非空間的價值。所有的這些都能以一種相對客觀的方式來分析。然而，意味與展露是最深層的可辨認性，這方面的問題在林區式的論述中仍然還沒有進一步解決。

## (二)形式與價值之關係

對林區言，空間形式是一種被賦予價值的形式。一方面，了解價值與空間兩者的連接是關鍵的，就像為何人們生產形式，以及他們如何感覺到形式。這就是使用者之意象的觀點，這是他們的感覺經驗價

<sup>⑥</sup>此處之結構，是經驗主義眼中的“結構體”，與後文中提及之法國結構主義者所強調的結構全然不同。

值之來源，以及感覺世界內在的意義。另一方面，設計是一種改變空間的有目的的社會性行動。林區致力於以規範性理論來處理設計之過程、形式及其品質的課題。基於其人文主義的、多元主義的價值，他清晰並有系統地陳述了地方形式及其價值間的一般關係。這是審美價值與審美評價的課題——即使美和“感覺”的呈現（見前節）並不必然與地方品質相等。但是什麼是城市之“美”呢？<sup>7</sup>林區以使用者感覺之經驗替代了個人主觀的品味。他的經驗取向提供了一個澄清審美判斷曖昧不明的可能性，並全然動搖了傳統觀念論以先驗的語言（如，美）所支配的審美論述的知識基礎。

進一步，這也關乎環境意義的課題。經由環境意義的觀點來分析形式與價值間關係的課題，也能超越審美評估的傳統觀點。在評論唐·愛坡亞未完成的手稿：《自明性、權力與地方》(Identity, Power and Place)等，林區提及與他老友之間的一段過去的爭論，這爭論是愛坡亞亟力主張意象研究應不只是自明性與結構<sup>8</sup>，還應從事對意義的分析。事實上，在愛坡亞生前的最後幾年中，他集中全力於環境意義的研究。雖然愛坡亞工作並沒有完成，或許，我們仍能將其視為林區對環境意義這課題之觀點的補充<sup>8</sup>(Lynch, 1983:4)。

<sup>7</sup> 麥可·邵斯華茲提及意象性的限制：“一有清晰意象的城市可能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地方；美與可意象性並不必然是完全重疊的品質”(Southworth, 1985:58)。這確是如此。然而，由林區所界定的“感覺”展現的整體架構來看，我認為林區的方法是一種對傳統美學的社會性批評。

<sup>8</sup>：唐·愛坡亞，原籍英國，1954 於倫敦建築協會(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取得建築學位後在麻省理工學院進修都市計劃。他與林區在一起工作，例如與林區、約翰·邁爾(John R. Myer)合作的《道路之視野》(The View from the Road, 1964)。1967 年愛坡亞任教於柏克萊加大，之後，他與傑可布一同在城市與區域規劃系和地景建築系之間開發出一種都市設計的共同課程，並將柏克萊環境模擬實驗室發展為一種規劃過程中處理視覺形式的公共反應的工具。愛坡亞與林區與一般從事實質規劃與設計的專業教師最大的不同是在他們兩人在專業實務操作之外，同時對社會性理論有相當濃厚的興趣，是社會科學與規劃與設計專業結合的橋樑工作人選。因此，弱此二人，卻正好暴露了一般專業教師與社會科學訓練的、理論取向的教師間的差距，他們的去逝誠然是學院中科際合作機會的消失，也是專業與研究結合工作的損失。



唐·愛坡亞追求在社會結構與空間意象之間一種完全的連繫(Appleyard, 1978:553)。這是環境象徵的研究。他認為環境象徵的概念為重建實質環境與社會政治結構之間連結的方式。這是實質規劃與社會規劃間的橋樑(Appleyard, 1979:144;Lynch, 1983:4)。

愛坡亞比喻城市為一種凍結了的言詞與一種凍結了的社會行動。經由社會層次的分析，空間的任何部份都能是具有龐大力量的象徵。所以，愛坡亞開始建構環境行動的觀點，將空間當作社會象徵來分析。首先，這觀點試圖解釋實質環境如何中介、斡旋於主體（例如，生產者）與客體（例如，使用者）之間象徵互動的過程中。其次，這觀點試圖闡明知覺環境與世界之間的關係(Appleyard, 1979:144;Lynch, 1983:4)。

然而，在愛坡亞 1982 年逝世之前以及林區在 1984 年逝世之前，愛坡亞與林區都未能完成他們對空間形式象徵意義的研究。現在，讓我們來討論後設環境研究的課題：形式及其脈絡組織之關係。

###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 (一)形式與文化脈絡組織

按照林區之說法，地域性(locality)為空間的獨特個性，可以經由兩個方法的整合來了解。第一個包括了對“感覺的外部地景”提供空間與行為的分析。第二個則包括了對“心靈的內部地景”提供意象的調查。前者為較客觀的分析，後者則為對感覺到的空間內在的感覺與更深的意義做較細緻與主觀的分析。對林區言，這兩個分析的結合可以連結感覺形式與文化脈絡兩者(Lynch, 1976c:61)。

然而，為了建構規範性理論，林區一再提出一些人文主義的假設，作為共同的文化規範與共同的人性經驗。他認為每一個文化均有其自身對空間形式的規範與價值。但是，首先“某些生理效果可能遍及各物種的，在人性與文化中有某種規律(Lynch, 1981:101)…人類有某種

基本的需要以及任何既有的文化中有著重要的共同價值”(Lynch, 1981:103)。其次，林區假設“某種對形式的關注是超越特殊的文化，然而對這些關注的解決辦法却是特殊的”(Lynch, 1981:101)。這就是說，林區建議一些共通的“動作展現向度”，它針對不同的文化提供特殊的解答。基於一組共同的人性價值，在一般價值與實質的解決辦法間的連繫，就能當成是建構規範性理論的基礎。

## (二)形式與社會關係

如林區及愛坡亞所言，藉著專業的角色與功能，專業者往往傾向於解除環境的象徵，往往以非政治的、技術的語彙來處理論述中的環境象徵(Appleyard, 1979:144; Lynch, 1983:4)。林區之城市意象研究最意外的併發症就是專業者經常採用意象研究中有關形式元素的術語，加諸他們的專業價值於意象研究之上，而未言及社會與歷史情境的諸多差異。這種併發症或許說明了規劃結果為何經常與社會關係的現實毫不相干(Lynch, 1976c:61,71;1984b:156;Appleyard, 1978:552)。相反地，林區要求城市規劃要更加努力地對不同的使用團體有所反應。所以，林區強調“溫暖的”對話——他稱為環境分析與行動策略方面的“地方諮詢”。對話的目標能幫助人們發現他們自己的期望、喜好、價值與意義(Lynch, 1976c:62)。甚至加上人道主義的價值，林區試圖保存地方的歷史，表現環境的地方訊息(Lynch, 1972a:38;1976c:188-197)。至於被選定的使用者團體，“由使用或習慣的地區來界定，或由階級、年齡、性別、種族、或它們關乎環境的角色來決定”(Lynch, 1976c:62)。林區一再地為缺席或無聲的業主發言，而不強加專業精英的價值於他們身上。對他而言，設計者應扮演鼓吹者、中介斡旋者與催化者的角色，而不是權威(Lynch, 1971:98)。

## 四、應用層次

### (一)城市設計

誠如一位都市設計之專業者所言：至少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林區在都市設計的觀點使其影響力一如柯必意(Le Corbusier)之於現代建築(Lu, 1985:4)。林區參與了許多城市的計劃案，如波士頓、白林屯、克里夫蘭、哥倫比亞、達拉斯、底待律、洛杉磯、明尼阿波里斯、鳳凰城之里約薩拉多、聖地牙哥、舊金山與華盛頓 D.C.等等。1978年，他由麻省理工學院退休，與史提芬·卡爾一同組成了卡爾林區公司參與環境設計的實務。一位林區從前的學生提醒我們，林區並不認為他自己主要的角色是一位理論家。“他致力於連結都市形式與人性的需要，直接朝向解決實際的問題——同時將創造烏托邦當成一實際的問題”(Brower, 1985:3)。按照專業實踐的需要，設計經常得處理品質的問題，連繫形式和過程中的目標與價值。首先，林區在基地的尺度上描述一設計的實際過程(Lynch, 1964,1971; Lynch and Hack, 1984)。對他而言，“基地計劃是在土地上安排結構體，在其間塑造空間的藝術，一個連繫建築、工程、地景建築與城市規劃的藝術”(Lynch and Hack, 1984:1)。然後，他整合規劃與設計，由細小的尺度到區域尺度來經理空間與時間形式，由地方性街道的使用與鋪面到住宅、新鎮與海岸線的經理(Lynch, 1976c)。至少，他提供了規範性的理論角度，一致地呈現了形式的“展現”的向度，以“城市設計”(city design)之名彙集了他所有早期的工作(Lynch, 1968a;1974a;1980;1981;1984a)。對林區言，城市設計是為使用、經理以及未來空間與時間環境的形式來擬定可能性，以使用者日常生活的效果來評價的專業技能(Lynch, 1980:48 ;1981:290)。林區的研究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針對規劃與設計過程中隱藏的價值開啓對話的機會。所以，認識到價值是專業實踐之必需，林區發展出規範性的理論，它不僅提供了實踐的過程，而且為了溝通，開啓了價值判斷的黑箱。林區認識到地方居民之價值與經驗才是專業實踐的根本，因此，拒絕了狹意的、常規性專業所界定的、以實質形式為關心焦點的都市設計(urban

design)，轉而重新界定了城市設計的領域，這是在70年代美國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影響下的社會性設計（social design）。

## (二)模型與原型

然後，開文·林區之哲學角度如何能應用來分析空間的形式呢？對林區言，爲了集中於連繫功能理論與規範理論，城市模型(city models)與原型(prototypes)可以當做是組織環境元素以獲致具體效果與實質“展現”的技能與技巧。事實上，一個關乎城市的目標與形式關係之規範理論，形成了貫穿林區整個工作的主線。

城市“模型”是要遵循的形式標準。林區界定城市模型爲“環境應該如何製造的圖繪，原型所遵循的形式或過程的描述”(Lynch, 1981:177)，“大部分的環境設計都是在調適修正以前所使用過的方法，形式被當作模型來效法就變成了原型”(Lynch and Hack, 1984: 129)。在實質模式與價值之間有一個相當穩定的連結。“有兩種設定形式規則的方式：由指定處方的方式或是由規定‘展現’的方式。模型則是更像前者，…但是它的區別並不像它所顯示的這樣明顯(Lynch, 1981:278)…一個混合的規定可能規定一種可接受、傳統的形式，…以及也規定所要求的‘展現’，以致這些規定可能爲了達到目的而提出一新的形式”(p.279)

既然模型與原型關乎品質與模式，它們就像爲了設計溝通或漸增式設計決策的設計準則與原型一般，十分有用。當然，首先，設計者必需知道原型的容量與能力並有意識地檢視它們的應用情形。其次，他必需了解其應用所依仗的具體情境。第三，他必需能認識到要求發明新原型的問題(Lynch, 1971:272)。

模型與原型也能用做在規劃執行過程中規定形式“展現”的準則、標準與控制準則。爲了獲致強烈的個性而經理空間與時間的連續性，同時避免提供一僵硬的形式與清楚的計劃，模型與原型能由研究而生產，可以用來界定主要形式可能的性格。發展以及分析原型可以

成爲設計與研究之間的橋樑。收集原型，描述它們的適當脈絡組織與目的，以及試驗在形式與價值之間，空間形式與社會脈絡組織之間的假說，是找到城市設計邏輯的基本工作。真實的形式及其所伴隨的假說要經過修飾，就像要收集起“展現”的訊息，一直達到令人滿意的狀態，或者是遭致明顯的失敗爲止(Lynch, 1971:285 ;1981:453:Lynch and Hack, 1984:131)。

最後，我們還必需連繫起城市模型與原型和歷史研究。目標—形式的研究能夠在規劃史中應用，用來檢視目標的形成是否適當，以及它們是如何關係著所擬議的實質形式(Lynch 1958:214)。對林區而言，吾人必需分析過去的作品，收集歷史的經驗，發展出目標與形式之間的關係的資料。這些分析經由檢視形式“展現”與其價值間的連結，提供我們一個關乎形式可能性之歷史寶藏(Lynch, 1971:6,199:Lynch and Hack, 1984:154)。有些歷史的形式仍舊是使用者經驗的一部分，仍舊是生活傳統的一部分，及仍舊吻合現有的問題。爲了避免表面地抄襲歷史的解決辦法，形式類型與其結果間的連結給予我們使用過去經驗的基本知識。

前文已提及，相較於目前都市設計中影響廣大的後現代取向，林區式的形式原型由於將使用者的價值觀與經驗做爲專業選擇的基礎，所以不致於全盤落入常規性專業者(尤其是建築師們)與建築史學者，過去在時代風格的觀點下，自覺地與不自覺地，在規範性價值間恒常的爭辯。林區不但使得價值判斷的黑箱得以開啓，而且，使設計專業實踐有了可交待的社會立場。然而，承認並開啓了專業價值判斷的黑箱，却並不必然使我們得以辨明自身已然潛藏的價值觀(因爲它常常被假設爲已知)，以及，更重要的，不必然使我們具備分析價值觀是爲何產生的社會結構，社會行動得以存在的歷史情境。這時，我們有必要開始下面的理論反省。

## 五、認識論的批判

總結這個認識上的回顧，對林區式關乎城市形式之論述之哲學角度的社會性批判將集中於其人文主義與經驗主義知識根源方面所造成的方法論問題。茲分三點敘述如下：

### (一)論述中方法論的預設

林區式論述中對城市形式的哲學角度可說是歷史地、社會地以及制度地建構了的認識論的模型，而烏托邦的價值觀經常在林區之知識旅程之中被當作是預擬未來空間形式之基礎。林區式的論述中對城市形式的分類範疇、形式與社會生活間關係的思考角度等預設了一組既定社會的價值與其邏輯。例如：對林區言，處理“環境”(environment)這觀點時，這詞語是以一組流動與相對主義的觀點面向現實，而不能以嚴格的因果關係的方式來進行分析(Francis, 1983:133)。在處理形式及其脈絡組織間的關係時，形式經常被林區當作是知覺經驗上的已知事物(perceptual given)，而非分析性地看到它關乎一歷史地束縛在社會關係中的意識結構(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例如，處理形式與人之間的關係時，人被分類為階級、種族、個性或角色(Lynch,1971:97)。譬如說階級被當作在收入、地位、聲望、心態之中影響使用者行為模式與環境意象的一項因素，而非在特定之歷史情境中的一組社會關係，即，人是使人們彼此相接觸的物質關係的人類承擔者(human-bearers)。進一步地說，階級是一種歷史關係，是在特定情境下衝突過程的結晶。然而林區將主體變為一種可自由飄浮的、與社會結構條件脫離的人類作用者(human agents)。

再例如，處理形式與價值的關係時，價值被當作一種文化上既有之喜好，而非追溯其社會與歷史的根源。換言之，困難不在於了解城市是一種被賦與了價值的地景(valued landscape)，而是在於發現為何一種價值被安置於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中，它是如何關係社會經濟關係的邏輯，以及價值能經由什麼方式變成一種文化的事實，使分化的個體得以建立共識。因此，處理意象的分類時，五種視覺元素：

像通道、邊界、地區、節點與地標被當作爲分析過程中一種“先驗的”度量(Hudson, 1982:263-264)，而非爲特殊的空間類型、空間類別、空間語彙，或在特殊社會歷史脈絡中能做多重閱讀的空間語彙。關於視覺元素我們有必要做一說明：

在林區早期對城市意象的研究中，這些廣爲人知的五元素受到現代建築視覺藝術之強烈影響，譬如，來自喬治·開派希(Gyorgy Kepes)的影響即爲一例。在其後期作品中，形式的觀點由前文已提及的“感覺的形式”的觀點來闡述。這與傳統形式主義面對形式的觀點有一些差異。這些林區式的類別不是簡單的抽象與靜態的類別。這就是爲什麼克里斯欵·羅伯—修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認爲林區的意象觀點爲一種“地方”(place)、通道與範域的類別，歸於關乎人體的經驗與記錄(而不只是“視覺”)之“生存空間”陣營(Norberg-Schulz, 1971:15)。在設計論述中，近年來生存空間與歐幾里得空間的範型對抗，可以連繫起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現象學與實證主義的對比，可以連繫上資本主義福利經濟下積累邏輯與管理要求所衍生的，分別以技術官僚與人道主義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相對體。就生存空間的觀點言，經由利用人類經驗的空間元素爲設計語言，在城市意象分析與設計規劃之間就有一種連結的可能性了。此處對林區式五元素的批評並不在於其空間性(像有些社會科學家所批評的)(Gulick, 1963:167; Moore and Golledge, 1976b:4)，而是在於其經驗分析中將意象元素當作是一種先驗的度量。此時，我們可以套用米凱·巴赫定(Mikhail M. Bakhtin)的話：這些空間的元素是“意識形態的元素”(ideologeme)，意即意識形態所包裝的最小空間單位。它們不同於一般性的意識形態，而與藝術的(環境的，或都市的)意識形態之容貌有一種特殊關係(Bakhtin and Medvedev, 1928/1978:22)。然後，以下將強調意識形態的課題，因爲任何感覺的、空間語彙都必需以意識形態的分析來對待，它們是處於一定情境中的空間意象。

所有的這些論述之預設都不是“理論出發的中性情境”，而是關

乎林區的方法論之視角，它們在在限制了林區對形式、意象以及實質環境與社會行為間的行動的詮釋。然而，對像林區這樣的經驗主義者而言（推至某種極致，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甚至認為林區之疑旨受限於現象學的限制之內）(Jameson, 1988:353)，若能浸浴在眾都市形式之豐盛之中，經得起考驗的理論與知識即自然會浮現。所以，對理論欠缺自覺成為林區式研究途徑之最大內在限制。

最後，我必須對林區城市意象的經驗研究再提出一點看法。一方面，城市意象確實是環境認知方面的先趨性研究。具支配性的實證主義觀點，教條地去考量研究的操作性定義、科學資料的複製性、客觀性、量化與可觀察性。正如大衛·史戴(David Stea)所言，由世紀初起，約有四十到五十年，意象研究事實上是被實證主義純粹行為取向的狹窄心靈所摒棄，視其為不合科學的研究要求。在實證主義的氣氛下，林區的意象研究像是由後門溜了進來的幽靈，然而却取得廣泛的影響(Stea, 1981:110)。在另一方面，對這個先驅性作品一些研究方法方面的問題，曾經被提出來討論，並且由後繼研究者陸續加以改善。例如，受訪者繪圖能力的問題(Appleyard, 1970:112;Southworth 1970 ; Ittelson et al., 1974:294;Lynch1976b:vi-viii;1984b:154;Moore, 1976:298;Wood and Beck, 1976:351-352;Evans, 1980:264;夏鑄九, 1981;Hudson, 1982:263)，關於樣本的問題(de Jonge, 1962:262-263 ;Appleyard, 1976;Lynch, 1984b:153)，關於意象合成圖的信度與效度問題(Pocock and Hudson, 1978:43-47;Hudson, 1982:264)，對社會因素做更細緻的分析(Appleyard, 1970;Ladd, 1970;Altman and Chamers, 1980:56;Francis, 1983:134;Lynch, 1984b:156)，以及都市意象的結構(Aragones and Arredono, 1985)等等，不一而足。三十年前的意象調查其量度方面的內部技巧問題已經被社會科學家們加以擴充，同時林區本人也曾有所反應(1984b)。這並不是本文之重點。然而，這些課題的一部分却涉及了認識論的課題——意識形態的分析以及林區式論述的限制——這正是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題材。



## (二)處於一定情境中的環境意象(Situated Environmental Image)

按照我前面提過的林區之廣義界定，空間形式不僅限於實質元素，而且擴及經濟、制度與空間的知覺向度。形式被當作是一經由知覺者經驗所掌握的知覺形式。事實上，甚至早自其在派克中學的經驗開始，林區即深深地接受了來自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哲學與方法論影響。例如，實際地做是學習的最好方式、“交流”(transaction)——有機體與環境間的主動互動——的觀點、有機一元論的“經驗”整體等等(Dewey, 1935/Ratner, 1939:958, 968; Lynch, 1984; 152)。然而，林區之理論模型從未將意象抽象為意識的一部分，即，從未將感覺形式看待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表徵(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換言之，意象或象徵與社會生存的經濟與社會認識現實間的關係必需被處理。

### 1. 由社會實踐來認識意象：

既然意識形態表示了個體對其生存的真實條件的一種想像關係(Althusser, 1969/1971:162)，環境意象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特殊表現，即人們以一種想像的空間形式來表示他們生存的真實條件。意識形態是一個具體社會關係的產物。使用者意象或環境象徵的研究，必需考慮空間形成的特殊性與社會實踐的關係。這也就是說，環境意象有其與社會實踐的相對自主性。環境意象處於社會關係的情境之中，並被束縛在生存的經驗之中。環境意象的意義與轉化僅僅能由它與歷史所指定的社會實踐情境的關係來了解(Castells, 1972/1976/1977:217)。舉例來說，蘭嶼雅美人對核廢場地方的危機感是歷史的恐懼感與現代的恐懼感疊加的產物。對核廢場空間意象的象徵意義必需放到核廢場做為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造成的能源廢料貯藏功能，以及蘭嶼做為台灣之邊陲離島而納入台灣社會的關係中，國家，民族，與雅美族之間對空間意義賦與的歷史性衝突過程中，才得以了解(夏鑄九，陳志梧，1988)。

## 2. 專業論述與方法論的疑旨：

為何在林區之理論視角之中不可能分析環境的意象？方法論方面的理由是林區沒有任何嚴格的理論工具與新概念來知道以及解釋意象。詹明信將意象圖（認知圖）繪製、地圖繪製，地球儀製作的製圖過程當作是社會繪圖與象徵的表現。他在意象與意識形態之間開展了一個新向度與新見解，這也是林區從未涉足之地帶。意象圖繪製被當成像一前製圖操作中的旅行路線的繪製。基於經驗主體的感覺與生存的訊息，環境意象是以主體為中心的圖解組織起來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必須與對現實的抽象、科學的知識統籌調和起來（像地圖繪製）<sup>9</sup>。然而，現存未解決的困難是生物上與方法論上“不能表達”的問題，而非“不能知道”的問題（就像沒有真正的正確地圖這個難局）：媒體與語言的本質結構，表徵符碼的性質，以及我們如何能看到以及表達，在不同歷史情境中，作用著的與活生生的意識形態的生產（Jameson, 1984:84-92）。生物與意識形態的限制根植在主體從事的社會活動中。這些社會限制事實上由生產方式的功能與過程中的角色所結構。所以，方法論的批評是研究工作所必需的過濾器——為了避免文化的偏見而形成一種與意識形態的距離。此處，我們可以用詹明信的邏輯來指出林區方法論的盲點。林區的工作完全受限於其方法論。林區的工作完全被其專業的論述所限——城市形式的疑旨（the problematic of city form）。他沒有新的工具來暴露（知道以及表示）作用著的意識形態。

## 3. 實踐的感覺活動與空間的意義：

有別於一般形式主義的取向，林區經由人類知覺——主體的感覺經驗來處理形式。即使如此，感覺形式與環境意象的觀點僅僅植基於一種簡單的、唯心的經驗主義模型，而與歷史與社會的脈絡脫離。

主體的感覺活動必需視為一種客體方面的“對象方面的活動”

<sup>9</sup>：空間是什麼，空間如何以概念來理論化是理性的過程。另一方面，空間如何被知覺，則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對空間與空間意識的研究，在認識論層次上宜有一種辨證的，不相互孤立的關係。

(objective activities), 即, 實踐的, 人類感覺之活動。在人類實踐的過程之中, 主體與客體互相改變。客體(環境)的改變與主體(人)的活動相互一致, 可以看作是一種主體對客體的實踐, 客體對主體的改造。所以, 勞動是一種人與自然間之轉化過程, 主體經由其自身的行動, 斡旋、規定與控制它自己與自然間的形式轉換。然而, 杜威—林區之模型則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覺活動本身, 以致不能抓住“實踐批判的”活動之意義。

若不參照特殊的脈絡與利益, 意象與感覺就變成安置於人們心中的靜態產物, 它們被假設為憑其本身就能影響行為(Francis, 1983:134)。在某種程度上, 形式、空間類型與歷史的意義變成獨立地在運作。這也就是樋口忠彥(Tadahiko Higuchi)以主觀的形貌(空間意象)與其實質真實(空間形式)來審視日本地景時, 這種林區式研究的隱藏的疑旨(latent problematic)對研究的限制(Higuchi, 1975/1983)。它忽略了意象是如何被建構, 以及如何被再生產所維持下去, 以致於個體就成爲一個自由的作用者。地方之歷史經由時間感的角度來考量(Lynch, 1972:120-121), 然而, 集體之記憶已被肢解爲片斷零星的部分, 以求可插入空間的功能運作的過程之中(Boyer, 1983:287)。同時, 複雜的溝通符碼與過程被化約成簡單而機械的“人與環境關係”(Francis, 1983:134)。

即使吾人拒絕了結構主義的化約方式(它將都市研究化約爲空間符號組合的規律, 於是社會行動被化約爲一種語言, 而社會關係則爲一種溝通系統; 社會組織有如一組符碼, 而空間結構就是一組神話了)(Castells, 1972/1976/1977:216), 結構主義的記號學對林區的批評仍然是有意義的: 林區的研究仍有若干曖昧, 這些彼此不相關的意象元素的語彙必需與意義有關。然而, 林區的城市觀點是“完形心理學式的”(gestaltic)重於“結構性的”(Barthes, 1967/1970/1971/1973:155)。或者說, 林區式論述的限制是只停留在記號指意的(denotative)層次上, 忽視了延意的(connotative)層次(Gottdiener and

Lagopoulos, 1986:5)。意義的生產必然關乎形式的生產過程並涉入社會所決定了的內容。林區之研究方法本身無法在分析性概念方面連結意象元素與意義，因為其方法論上的矛盾正在於它給予形式一種自主性的邏輯。這就必定造成意象研究在社會意義方面的武斷性(Castells, 1972/1976/1977:216-217)。

即使是晚期的林區，甚至是將環境意義連繫上政治與權力的愛坡亞，他們擬議的環境意義仍然在於解釋主體的環境建構行動，空間是一個靜態的言詞與表徵。它不但未能對社會結構的條件性限制加以分析，看不到歷史性的主體行動所必然存在的，充滿了衝突的社會過程，也無法認識到城市是一種偽正文，透露了社會的矛盾(Ledrut, 1973/1986)。空間形式的指意，其實是記號延意的層次上導引出來的。因此，人民與城市的關係並非只是調適(adaption)，相反的，市民經由都市實踐(urban practice)，在城市氛圍(urban milieu)生產與使用上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Gottiener and Lagopoulos, 1986:7)。主體不是靜態地去適應客體（我們得看到意識形態的中介），主體經由實踐，改造了空間，也改造了它自己。用社會記號學的角度來說，人們了解城市，是基於他在那裡做什麼，以及基於他們自己的象徵世界，並非可意象的知覺本身。因此，高迪勒(M. Gottdiener)與亞歷山卓·拉哥波羅斯(Alexandros Ph. Lagopoulos)甚至宣稱林區式論述所直接導引出來的認知地理學在認識論上問錯了問題，也研究錯了資料(p.9)。

所以，經由感覺形式的方式與覺知世界的特殊方式，空間實際上是被意識形態所中介與斡旋。空間的閱讀不是一單純的對形式的解碼（社會行動凝結的痕跡），而是經由在既定的時勢(conjuncture)之中，社會關係所生產的，實際意識形態的過程，這也就是說空間的閱讀表現了意識形態的中介與斡旋(Castells, 1972/1976/1977:219)。更進一步說，空間形式的意義所包括的不僅是空間形式的靜態心象表徵，而且是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的特殊社會變動過程的表現。空間形式為其功能與意義所共同決定。它是由“空間功能中的社會與歷史衝

突“以及“空間意義的表現”二者物質化的結果，是二者歷史疊合的象徵性表現(Castells, 1983b:302-303)。

### (三)人文主義價值

林區以其唯心主義的價值為基礎，追求美好的城市形式，這個價值觀根源於人文主義的規劃傳統。如前所述，林區之社會主義價值能夠溯及進步的學校——法蘭西斯·派克中學之薰陶，和受到美國在10與20年代進步主義歷史影響下，以杜威為代表的現代自由主義的影響，以及，西班牙內戰對進步知識分子的衝擊，以及30年代勞資間的抗爭所形成的歷史時勢。進一步，林區在規劃論述的歷史中安置了他的社會主義價值。這裡有一條在無政府主義之社會主義土壤中所衍生的烏托邦規劃傳統之長流，像羅伯·歐文(Robert Owen)，聖·西門(Saint-Simon)，查理·傅利葉(Charles Fourier)，珍·巴布提斯特·戈定(Jean Baptiste Godin)，和伊丁尼·柯貝(Etienne Cabet)。他們的火種為派屈克·蓋第斯(Sir Patrick Geddes)，和伊伯利沙·霍華(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市所接續(Benevolo,1967)，然後為劉易斯·孟福(Lewis Mumford)和他的一班朋友攜至美國，像克雷恩斯·史登(Clarence Stein)，班頓·馬凱(Benton MacKaye)和凱瑟琳·包爾·鄔斯特(Catherine Bauer Wurster)等。這條社會與都市改革的和平之路，不僅適應在美國汽車年代之中，而且影響了法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政規劃(Von Eckard, 1978:108-116)。跟隨這枝由孟福及其友人至赫伯·甘斯(Herbert Gans)與珍·賈可柏(Jane Jacobs)的美國人文主義傳統，開文·林區將社會性的課題帶進專業領域之中<sup>10</sup>，這正是處身在40年中葉與70年危機之間這年代之社會福利國家意識形態的準確航道之上，在此處，社會正義是做

<sup>10</sup>林區為劉易士·孟福(Lewis Mumford)的書所鼓舞，像技術與文明(Technic and Civilization)以及城市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然後他決心到麻省理工學校攻讀都市計劃(Carr, Rodwin and Hack, 1984:523)。

為對積累所需要的效率的相對體而存在的。商品生產與社會關係的經理所需要的意識形態配對正是效率與社會正義。這不正是林區規範性“理論”架構的重要兩大元素嗎(Lynch, 1981)? 終究, 資本積累與國家正當性之間的一般性矛盾, 一再地, 成為社會福利國家的中心問題。

事實上, 人文主義是在社會關懷與林區之專業論述張力間僅有的妥協答案。林區經由“訪談”的方式建構他的視角; 和使用與覺知者訪談以及對話(Drzewiecki, 1979:105)。然而, 問題的關鍵並不僅在於人們回答態度的消極或積極, 我們更需知曉人們為何如此, 人們的思惟方式及其限制。我們不但需要知道我們要問什麼, 以及, 我們終究需要理論分析的能力, 然而, 對林區式的專業論述言, 為了建立一組永恆通用的人類價值作為其規範性理論的基礎, 林區割裂了人和其社會關係與現實, 將它們當成一種心理與生理人(Lynch, 1981:101)。對林區言, 人文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永恆真理、理性與正義的表現, 它們獨立於時間、空間和歷史的情境之外。它們產生的時間與地方僅是一種偶然。最後, 公平、權利與壓迫終究會被植基於不能讓渡之人權的永恆平等與正義所取代。所以, 社會將由人們的想像與價值, 而不是由社會運動與歷史矛盾之邏輯所改變。對林區言, 社會經濟關係是既定的。所有他的努力都是植基於他的價值。我們可以說, 事實上, 他的人道主義的環境論述(不論其是否是“自由主義的”還是“保守主義的”)運作起來像一種意識形態支配的機制, 經濟的再生產與文化的連續性, 它支持政治的正當性(Scott, 1982:152-153)。這也可以說, 自由主義的人文主義者無由戰勝工業資本主義的支配意識形態霸權, 只有用對技術官僚政治的反感和在對立面培育完善之人格來軟化對手, 進而退化為溫文敏感但軟弱無能能的道德思想(Eagleton, 1983: 199)。

林區在美好城市形式的理論的開場白中發問: “是什麼造成了一個好城市?” 此處, 即使我們同意和分享林區所揭櫫的價值, 我們也首先必需接受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之批評。即, 我們先得清楚——這樣的一個城市是為了誰以及被什麼人生產出來(Castells,

1983b:335-336)? 以及,這樣的一個地方被誰,在何時,以及是何理由,被認為是好的?這只有經由具體的社會歷史分析才能做到。事實上,這樣的問題已遠遠地超過了專業的論述(科學、知識與合法的專業實踐與專業角色)所處理的範圍。規劃者與設計者的任務已經被決定,它得接受既定的社會構造,在論述中去使環境更可意象或是更可辨認,而不是去質疑基本的邏輯,暴露意識形態的障礙,建議替代之選擇(Hudson, 1982:265)。致力可意象性工作的弱點之一為:在同一地理空間內,不同社會群體的相互衝突的一部分。除非在一政治過程中加以考慮,否則它們根本無法了解,無法真正處理,以下我將林區方法上的弱點做一闡述——它忽視了社會的分析。因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對林區言,他也多多少少地根源於烏托邦知識分子“宣言式”傳統之中。領導性的設計者“鼓吹”他們的理想、價值與專業技巧,就像萊特、柯必意與霍華等。現在,它們的說詞被冠以“規範性理論”(Perin, 1982:259)。林區根源於美國社會中領導權(霸權)的(hegemonic)深處。有些字眼可當做是一種集體社會經驗的表徵,即,一種晚期資本主義機械文化的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譬如說,城市是如何“作用”(work),“展現”(performance),“多產的”(productive),“熟練與主宰”(master),“控制”(control)等等。前述林區割裂了人和其社會關係與現實,將它們當成一種心理與生理人。因此,當他提及開放空間的開放性時,是對比或城市實體的實用性的譬如說,提供工作的,或與生產有關的土地使用。

他建構開放性的價值觀於:選擇、熟練(主宰性)、新的刺激、社會接觸、意象與調適等,恰恰與60與70年代中發展成形的主流休閒社會中功能論的社會形式主義對工作—休閒二分的觀點,在認識論上的取得一致的基點。譬如與個人發展(Dumazedier, 1967),自我決定、自由時間、愉悅感受(Burch, 1971),以及選擇性、彈性、自發性、自我決定(Parker, 1981),或是制度性的限制與義務降至最低的社會生活經

驗(Kelly, 1983)<sup>①</sup>等等。在這種二分的概念所暗示的個人與社會關係中，社會是一個像東西一樣的客體，社會存在於個體之外，或之上。社會不再是由彼此互助與對抗中的作用者的組成(Rojek, 1985:94)。

林區的研究取向其實是個人主義在知識論層次上的論述產物(Pipkin, 1983)。因此，他的規範理論被應用於實質形式的問題和心理與行為的因素，而非從屬於社會的分析。即使是愛坡亞也曾批評林區對政治考慮得不夠(Appleyard, 1978:554)。或許這是源於美國新英格蘭自由主義的制度與機構的脈絡組織。林區之人文主義完全為其知識的以及制度的社會脈絡所限。他的人文主義價值決定了其方法論方面對經驗主義的選擇，以及其專業的價值決定了其城市形式的哲學與城市設計的專業實踐。林區對都市形式之取向是鄉愁的回歸，它由現實遁回烏托邦。看起來正像是將開米洛·塞提(Camillo Sitte)的觀點，在一更大的尺度上再度地提出類似的主張(Tafuri and Del Co, 1979: 386-387)。這是種在制度上建構起來的人文主義，這也是為什麼即使他看到了問題的緊急性同時作出批評，林區的擬議仍與這些現實無關：像美國都會區內城的少數民族，西歐都會區內的移民勞工，第三世界的都市化問題。以下我以第三世界的情況為一個例子來檢視林區的弱點。事實上，在中心國家的少數民族與貧民情況的邏輯也是類似的。

即使早在1968年，林區即已開始關心第三世界的都市問題。他不贊成第三世界的設計者常常不加批判地複製美國與歐洲對形式的成見。他宣稱最緊要的問題就是廉價自助式住宅<sup>②</sup>、土地處理、道路發展、為積極使用創造一個完全的環境等等(Lynch, 1968/Banerjee, 1985:28-29)。在林區的工作中也曾涉及一些第三世界的城市，像墨西哥

<sup>①</sup>此處休閒經驗的討論以克里斯·羅傑(Chris Rojek) (1985)的論點為基礎(夏鑄九, 1989)。

<sup>②</sup>基地計劃(Site Planning)一書中，林區與亥克提及和荷拉提歐·開米洛(Horatio Camino)與約翰·透納(John Turner)有關的“自助式”與“基地與服務”的第三世界連建和非正式部門的住宅過程。然而，他們對第三世界住宅問題的建議失之太簡單與太浪漫。



市、波多尼哥、薩爾瓦多和維內瑞拉的一些城市等。同時有些意象方面的個案研究（像在城市中成長一書中所提的例子）也由他指導。然而，林區之擬議並不能吻合第三世界的現實。首先，規劃並不僅是許多關乎不同專業學門的技術工具，譬如像城市設計師，基地設計師所為。再者，規劃也不僅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論述來投射一意象——以空間的詞語來表現社會的組織——這意象是一個憧憬的城市，以也就是一個嚮往的社會，譬如像可意象性與環境象徵意義的品質。最後，規劃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個磋商的過程，它在既定的權力結構限度之內磋商決定，在社會經濟利益與權力衝突之中抗爭。在不同利益與衝突之間的社會與政治協議被傳譯為空間發展的可見形式。所以，這個規劃過程及其所需的折衝能力基本上是一個政治過程。這過程的核心就是在一個特殊的脈絡組織之中能執行實施我們的計劃與構想的磋商能力。簡言之，脈絡組織決定了規劃的性質。假如我們不了解政治過程，我們就無用武之地。所以，對第三世界的規劃師言，對特殊情境的社會分析提供了最具批判性的知識來接納不同的規劃技術的工具。這是林區面對第三世界之方法上最主要的疏漏之處。他強調城市形式的设计層次，但是忘記了在衝突中的被過度政治化的現實世界中的規劃者的主要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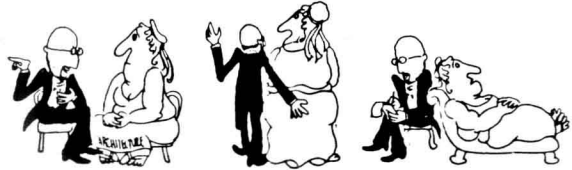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城市形式不是一中心課題，但是是一必需的部分。“時間的與地方的環境意象能夠在必然的改變中扮演一加速的角色” (Lynch, 1972a:242)。然而，我們不能只是在等待“在其上大地與人類聚落的更新” (Lynch, 1981:317)，以及想到“城市設計的藝術將恭候一種非正式的與批判性的觀眾” (Lynch, 1960:117,120)。畢竟，我們已經知道：社會主義（這正是林區所嚮望與追求的）不是一個要去建立的形勢，一個現實必需調整的理想，而是在現在存在的前提中產生的現實運動。當我們“進一步邁向美好的城市與美好的社會”的善意，遠遠超過了我們對這題材的知識之時，這似乎正是對我們的知識、實踐在社會中的角色作批判性的回顧的時候。林區之貢獻可以在一個新

的與更寬廣的視野中重新再作有系統的陳述，以致環境形式與意義的觀點能被修正，環境意象的觀點能與空間的概念統籌起來，我們的論證也會更嚴密。所以，林區式論述對城市形式的觀點對我們的實踐可能仍然有用，只要我們能將其納入一更寬廣的社會、政治與歷史的脈絡之中從事概念上的轉換。

1. 唐納休  
(Dalandhui) ,  
1960年：  
追求期



2. 京士頓  
(Kingston) ,  
1970：  
了解期



3. 龍德  
(Lund) ,  
1974年5月  
新生希望



4. 蘇里  
(Surrey) ,  
1974年10月：  
心理第一，  
建築第二。



5. 雪佛  
(Sheffield) ,  
1975年：  
教育一參與  
和馬克斯



6.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  
1976年：  
空間占用



圖3-1 環境心理學與建築專業之交流與鴻溝 (繪圖：路易斯·海曼 (Louis Hell man)) (Mikellides, 1980 : 13-20)

### 第三章 英美傳統中的 環境唯心論與社會工程學的 認識論批判： 環境—行為研究\*

“就正是這個環境的品質提供人們“地方認同”之感，以協助界定他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威廉·伊甸生，荷羅·伯辛斯基，  
里寧·瑞夫林，葛雷·溫克

(Ittelson, et al. 1974: 14)

…市場不能反應需要而只能反應貨幣…二十世紀不是為人而營造而是爲了錢…1960年有許多不幸之事發生，不過這不包括專業者對服務不足人口日增的責任感。

——羅伯·蘇默 (Sommer, 1984: 9)

“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behavior studies)(E-B studies)是在環境論述(environmental discourse)中浮現的一個學科；在英美，過去三十年中環境—行為研究是環境設計關於社會與行為因素方面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 修訂前之原文曾發表於《國立台灣大學工程學刊》，第44期，1988年9月，pp.79-129頁；部份以英文發表：“A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Environmental Idealism and Studies”，《Architecture and Comportement》，Vol.4, No.4, 1988, pp.275-293.

## 一、導言

環境一行為研究按研究者原先出身的學科而有許多不同名稱的標籤，像環境一行為研究(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環境與行為(environment and behavior)、環境與人(environment-and-people)、人與環境關係(man-environment relations)(MER)(person-environment relations)、環境與社會生活研究(environment-and-social-life studies)、社會空間關係(socio-spatial relations)、人與環境界面(man-environment interface)、環境設計研究(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EDR)、環境心理學、環境社會學、建築心理學、生態心理學、社會生態學、社會與行為因素、人類因素(human factors)、行為建築、計劃書製作(programming)、使用者需要(user needs)、使用者研究(user studies)等等。這些不同的標籤正說明了環境一行為研究發展的多學科傾向，它包括了由心理學、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和規劃與設計專業的共同貢獻。環境一行為研究確切的領域到底在那裡？目前並沒有清楚的邊界。目前，它的名稱日漸由人與環境研究(people-environment studies)取代了有性別偏見暗示的“男人”與環境(man-environment)，以及較狹意的環境與“行為”研究。然而，假如我們暫時不討論近五年左右在研究方法上的多範型分歧（已不只是原有的多學科傾向而已）的話，至少就五年以前的過去成果言，它的核心部分可以相對地界定為一種實證主義的環境心理學(positivist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環境一行為研究可以界定為關乎實質環境與人類行為間互動的研究。有兩個環境一行為論述的課題值得先在此加以討論：

### (一)環境與行為的關係

環境一行為研究強調環境一行為“關係”為一種“動態的互換”(Ittelson et al. 1974: 5)①。這是環境一行為研究認識論構造的基本前

題(Hillier and Leaman, 1973: 507)。環境—行為研究關心人類行為的地方特殊性(place-specificity)。大部分早期環境—行為研究的立場都傾向於假定“環境”(E)施以直接的因果影響於“行為”(B)之上。這個  $B=f(E)$  假設，事實上代表實證主義的環境決定論的刺激—反應(S-R)關係。

然後，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挑戰之後，大部份的環境—行為研究者對環境—行為關係其實已逐漸接受了一種修飾過了的環境—行為關係的觀點。例如，由赫伯·甘斯(Herbert Gans)(1969)或珍·賈可柏(Jane Jacobs)(1961)等開始，目前的研究者的立場可說多已修正為“環境可能論”(environmental probabilism)，它們認為“環境”提供了“選擇的可能性”而非決定的因素(Rapoport, 1977: 2)。所以，人被認為是較主動認知的。在另一方面，“地方”則關乎一種“知覺到的”地理單位(Russell and Ward, 1982: 652—655)。所以，環境被阿莫士·拉普普(Amos Rapoport)界定為元素與人之間的一系列關係。這些關係是有秩序的，也就是說，它們有模式與結構，而不是事物與人的偶然集合(Rapoport, 1977: 9; 1982: 178)。同時，丹尼爾·史托克爾(Daniel Stokols)關心“環境與行為的分子單位”(1983: 269)，以及假設“人與環境的最適化”(human-environment optimization)為環境—行為交流中的主題。他界定環境最適化(environmental optimization)的概念為假設“在理想狀態下的人會在人認知與行為的循環周期回饋模型上爭取獲致‘最佳環境’(optimal environment)”來達到他們的目標(Stokols, 1978: 258)。不論是環境決定論還是修飾之後的環境可能論，它們對環境行為間關係的基本前題仍然是在實證主義的論述架構中進行知識與制度的生產與再生產，是一種典型的英美經驗論的形式，這點我們會在本文最後的部份提出認識論的批判。

①或“相互關係”(inter-relationship)(Holahan, 1978: 9, 1982 :3)、“互動”(mutual interactions)(Rapoport, 1978)、“相互關係”(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ix)、“互動”(interaction)(Canter, 1975)、“界面”(interface)與“交流”(transaction)(Stokols, 1978)等等。

在英美的經驗論傳統之中，僅有一小部分的環境一行為研究者由歐陸之理性主義模型之研究角度出發，它們以天賦論或半天賦論的觀點看重決定行為的遺傳與生物因素，知識被視為經驗之前既定的天賦觀點，環境則為存在於世界之前的人之意識所形成與結構，所以環境應符合自然的人的傾向性 (Moore and Golledge, 1976b: 13, 24)。這種受到歐陸理性主義影響的觀點將於後文陸續處理，請參考第四章。

進一步，在認識論上的一種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立場所思考的環境一行為的關係，像新康德主義，已由一些心理學家引介了進來。他們之中較極端的成員認為現實是由心理所形成，由認識操作的產物所形成的(Moore, 1976; 1979a)。這種研究方法事實上質疑了前述之實證主義主客體間關係的基本前題，我們會在下節再度提到這點。

在最近這些年，以一種更先進的觀念論角度浮現的現象學模型對環境一行為研究造成了重大的衝擊。它們拒絕了環境與行為的雙元對立預設，強調在持續與環境互動中的人所建構之世界。我們將在第四章以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的設計理論做為例子略做分析，同時，到了本書後記(第九章)中我們還會再次提及對現象學取向的質疑。

## (二)環境一行為研究的應用：

對設計與規劃出身的專業者最吃驚的事莫過於在環境一行為研究中從事研究工作的人經常對應用都沒有什麼興趣。然而，對有些人而言，基於連接社會科學與專業的理由，認為環境設計研究與設計相關而又不同於設計，它們之間的區別對於研究而言是十分關鍵的(Brill and Vilecco, 1981; 29; Bender and Parman, 1984: 60)。“環境設計研究”(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被界定為“是一種基本的研究與應用性的研究，它的研究應用於處理環境一行為關係以及應用於使環境政策、規劃、設計與教育做得更好，以致能改善生活的品質”(Mooer, Tuttle and Howell, 1985:3)。簡言之，環境設計研究等於環境一行為研究，或者更準確地說，環境一行為研究加上應用(p.19)。同

樣考慮到應用的層次，對羅伯·蘇默(Robert Sommer)而言，設計、社會科學的概念與參與性的規劃方法，却是在“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的標題下整合了起來(Sommer, 1983: 13)，這尤其與70年代加州獨特的歷史與政治條件所形成的時勢有關。

以下將環境一行為研究的主要焦點、邊界、歷史脈絡、專業與學術組織和期刊，簡單交待以說明其理論的論述。

對環境一行為研究的多學科個性而言，它的主要旨趣至少包括了：

1. 由微觀空間行為(集中於個人空間、擁擠、私密性、密度、領域等等)到自然環境與都市環境的空間行為；

2. 環境知覺與認知；

3. 環境評估(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計劃書與設計準則、參與性的設計、規劃與設計中的價值觀等等。

在環境一行為研究之中，每一個研究者都有自己原有的興趣，由之建構與研究者原先出身學科有關的環境現實，即使如此，一種理論的論述仍然還是慢慢地發展出來了。例如，蘇默提出在關乎設計專業與社會科學之間六項主要的領域(Sommer, 1983: 18)：

1. 空間的人類使用；

2. 環境認知；

3. 環境喜好；

4. 使用者需要分析(UNA)；

5. 參與性設計；

6. 用後評估(POE)。

至於在環境設計研究(EDR)在這個新浮現的領域中，其範疇則按照六條主線組織其發展(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1. 地方(place)：

人類事件所發生的場所；



**2. 使用者群體(user group) :**

在地方中的人；

**3. 社會一行爲的現象：**

對環境的生理、心理、行爲、社會與文化現象與反應；

**4. 演化：**

環境一行爲關係歷時性之演化；

**5. 理論：**

理論與概念的發展與檢驗；

**6. 過程：**

在環境政策、規劃、設計與教育中應用研究所產生的知識之過程。

結果，環境一行爲研究的任務即在於“調查、記錄、以及解釋在所有人類經驗的層次上與所有實質環境的尺度上，這六組向度的關係，以及指出其應用的情形…” (pp. xviii-xix)。換言之，除非它關乎由知覺、行爲或情緒的反應，來拓展對環境形式與現象的需要，才能算是環境一行爲研究(Moore, 1984: 96)，清楚界定了環境一行爲研究領域的邊界。

環境一行爲研究自 1950 年代末期起就逐漸被塑造成為一門學科。我試著同時追溯理論論述的內部與脈絡的起源。首先，關於都市生活與實質環境的早期社會科學著作可以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喬治·西摩爾(Georg Simmel)與羅伯·派克(Robert Park)的著作中找到它們知識的根源(Zeisel, 1975:3-5)。有些並不是特關注實質環境的著作，在此時却開始提供了環境一行爲研究一些洞見，例如，社會學家李昂·法斯丁格(Leon Festinger)，生態心理學家羅傑·巴克(Roger Barker)，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等的著作。對環境一行爲研究有著特殊關心的學者如：社會心理學家羅伯·蘇默，以及威廉·伊甸生(William H. Ittelson)、荷羅·伯辛斯基(Harold Proshansky)、里寧·瑞夫林(Leanne Rivlin)在 1958~1959 年左右，開始了對精神醫院中病房設計對病患行爲影響的研究。不論研究

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繁多，所有他們的工作都逐漸具備了一種環境行為研究內部知識結構的可能性，這也就是說，環境一行為論述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架構逐漸建立了起來。

其次，環境一行為研究是在社會與歷史的脈絡組織中建構起來的，因為知識經常是社會問題的心智產物。在福利資本主義公共政策的國家干預邏輯下，可找到兩種對立的實踐、理論、意識形態與認識論，它們代表了在單一社會現實下呈現的兩種不同面貌。一個是技術理性的控制：商品生產與積累的空間基礎；另一面則是人類關係的經理：再生產與正當性的社會、文化與心理考慮(Scott, 1982; 147)。環境一行為研究為盎格魯—薩克遜福利國家意識形態層次的“人道主義”論述的一部份。他們的社會的／環境的覺醒關乎建築、制度與城市環境的異化，以及自然環境的枯竭，關乎人道主義的價值，以及參與性的鼓吹(Perin, 1970; Ittelson et al., 1974; Porteous, 1977 ; Mikellides, 1980a; Holahan, 1982; Appleyard et al, 1982; Sutton, 1984; 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因此，環境行為研究也擬議了一種“環境人”的概念，以區分“自然人”與“心理人”(Ittelson et al. 1974; 7-10)。

雖然心理學家現在參與在環境一行為研究中有較高之比例，在發展中也顯示出他們投入了較多的心力，而環境一行為研究中的古典作品仍然為社會科學家和設計與規劃的專業者共同的貢獻所締造，像開文·林區(Kevin Lynch)(1960)，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64)，阿莫士·拉普普(Amos Rapoport)(1969)，赫伯·甘斯(Herbert Gans)(1962)，珍·賈可柏(Jane Jacobs)(1961)，威廉·麥可生(William Michelson)(1970)，羅伯·哥曼(Robert Gutman)(1972)，艾文·奧圖曼(Irwin Altman)(1967)，甘尼斯·克雷克(Kenneth Craik)(1970)，大衛·史戴(David Stea)(1969)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分設於美國與英國的兩個中心基地是：伯辛斯基、伊甸生與瑞夫林(1970；1976)在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以及泰倫斯·李(Terence Lee)

(1971)，大衛·甘特(David Canter)(1970)，彼德·史崔格(Peter Stringer)(1975)在英國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於70年代建立了環境心理學的特殊學程。

在這個領域中的國際會議也陸續開始舉辦。例如，第一屆國際建築心理學會議(IAPC)於1969年三月在蘇格蘭達蘭輝(Dalandhiu)舉行(Mikellides, 1980b: 16-18)，到了1982年，基於種種內外條件之轉變，它更名為“國際人與環境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eople-Environment Studies, IAPS)，今年(1992)夏天在希臘舉辦第十二屆大會。在北美洲，環境設計研究學會(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Association, EDRA)則於1969年舉辦了其第一屆年會，也是推動在環境一行為與設計之科際間實務與研究的主要專業與學術組織。許許多多的期刊被出版，目前仍維持出刊的，包括了在美國的環境與行為(Environment and Behavior)，建築與規劃研究(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在英美兩國的環境心理學(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與在瑞士的建築與行為(Architecture et Comportement)(又名 Architecture and Behavior)。許多課程、學程與學位現在都開始制度化了。在80年代初，在英語世界含有超過六十間大學提供了正式與非正式的研究所訓練(Sommer, 1983: 171; Stokols, 1978: 254)。一系列的課本、讀本、研究發現、字典與書目被相繼出版(Porteous, 1977: 369-397)。環境一行為研究在歐洲大陸的影響雖不如英美，然真正較少受影響的也只有義大利罷了(參考 Fslice Perussia 的觀點，1983)。人與環境研究學會(Man-Environment Relation, MERA)則在1980年九月於日本創立，第二屆美日環境與行為研究研討會在1985年舉行，而相類似的團體在澳洲則組成爲“PAPER”(People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Relation)。在70年代，環境行為研究也甚至在第三世界中開始有課程之開設、著作翻譯，以及小量的研究產生，其中土耳其的情形可能是最特殊的，此外，像在一些拉丁美洲國家(Sanchez, Wisen-

feld, and Cronick, 1985; de Qveiroz Pinheiro, 1985; )以及一些亞洲國家之中，如近年的台灣。所以，我們能夠說，這個植基於英美學院中的環境一行為論述現在已經世界性地建構起來了。如同它的實證主義兄弟，社會行為科學，環境一行為研究隨著戰後美國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擴張，以及學術制度的影響力擴張，成為影響邊陲第三世界最大的主流論述。

按史托克爾(Stokols, 1977)的說法，環境一行為研究的科學—知識的結構仍是一種前範型的階段；按照克雷克(Craik, 1977)的看法，環境一行為研究反應了多種的範型；按照葛雷·摩爾，保羅·都鐸與仙杜拉·豪威爾(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的說法，它則面臨著對主要理論與概念的緊急需求。雖然，目前環境一行為研究並沒有一種單一的連貫一致的理論角度，它仍然值得我們去檢視關乎空間形式的一些理論著作，它們彼此互相競爭，為大部份成員分享為環境一行為論述的基本元素。我的目標不是要去涉獵所有的相關研究、理論、方法與發現，也不是要去摘要說明它們。為了避免一種膚淺的收集，艾文·奧圖曼，克蕾·古柏·馬庫思(Clare Cooper Marcus)，葛雷·摩爾，威廉·伊甸生與阿莫士·拉普普與約翰·柴榮(John Zeisel)等人的著作被選為我們評論的主要對象。而其結構則順著它們對空間的形式、形式與脈絡組織的關係、以及應用的層次來逐一討論，最後，再給予方法論與認識論上的批判。

## 二、空間形式

環境一行為研究經常留心的是關乎空間功能的側面(Moore, 1979: 46)。研究者並不會有意忽略形式的課題，或者說，美學的課題，然而，他們確實有意要求以使用者的準則來評斷形式(Sommer, 1983: 10)。環境一行為研究經由人與環境的關係來考量空間的形式。這就是說，它經由人們如何塑造環境，以及環境如何影響人來考量形式的課題。環境一行為研究傾向於去顯示人們如何看以及感覺到環境。

以下將試著經由環境知覺與認知研究的角度評論形式的課題。

### (一)主體與客體之關係

對環境一行為研究言，空間形式被當做是基於一種知覺單位的知覺形式。雖然人們是以不同的刺激—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在覺知環境，刺激的整體決定了人們如何對環境反應(Ittelson et al.,1974: 12)。面對行為與環境間的關係，在主體與客體之間有一種“動態的過程”存在。

首先，我們面臨理論的建構。阿莫士·拉普普(1977)區別環境知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環境認知 (environmental cognition)與環境評價(environmental evaluation)：環境知覺傾向於描述直接的感覺經驗；環境認知則描述人們使用心象圖(mental map)來結構他們所知覺到環境之方式；環境評價或喜好描述人們如何評價他們所知覺到的環境，以及按其價值觀所採取關乎環境之行動。即使如此，環境知覺、環境認知、環境評價、環境意象(environmental image)、認知圖(cognitive map)、認知表徵(cognitive representation)等在有的時候可以互換使用(Altman, 1980: 44)②。

對環境認知的一個形式的定義是“由一系列心理上的轉化所組成的過程，這個心理轉化是一個人對位置之獲取、符碼化、儲藏、回憶的資訊，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間環境現象的象徵”(Downs and Stea, 1973: 9)。環境認知像是處理“外在表徵”與“內在表徵”間關係的一種假設的建構。這些由外部環境抽取出來的資訊存在於心理空間的一些類型中，即，(心象的)意象(mental image)。很明顯的，並沒

②為了方便的理由，我們僅用它做為溝通之用。這是環境一行為研究多學科的性質造成的混淆之一。例如，對許多心理學家言，認知(cognition)超過了感覺欣賞的層次。然而對地理學家言，所稱的環境知覺，或環境識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的研究卻正是心理學稱為環境認知(environmental cognition)的部分(Stea, 1980: 103)。或許，對我們的分析目的言，空間的感覺的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是比較清楚的理論建構所需的觀念(Pred,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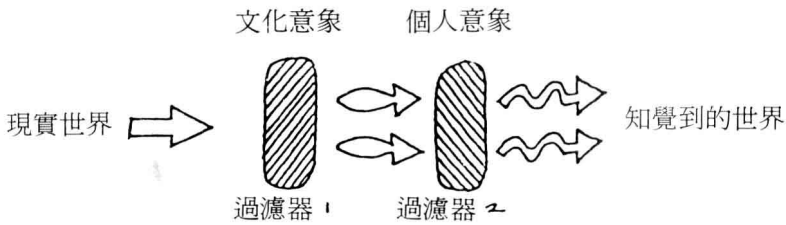


圖3-2：阿莫士·拉普普所提出的在現實世界與被知覺到的世界之間所中介的認知表徵 (Rapoport, 1977: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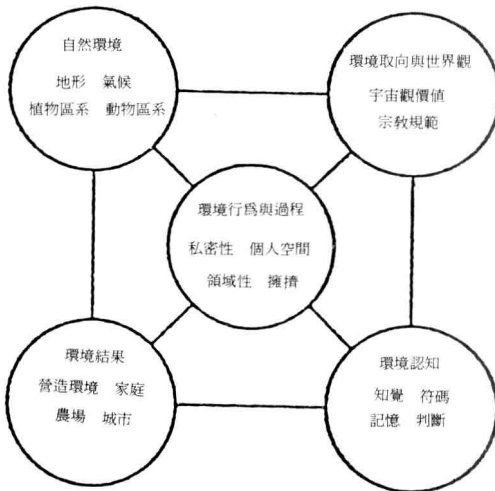


圖3-3：奧圖曼與齊默爾提出的文化與環境關係模型 (Altman and Chemers, 1980: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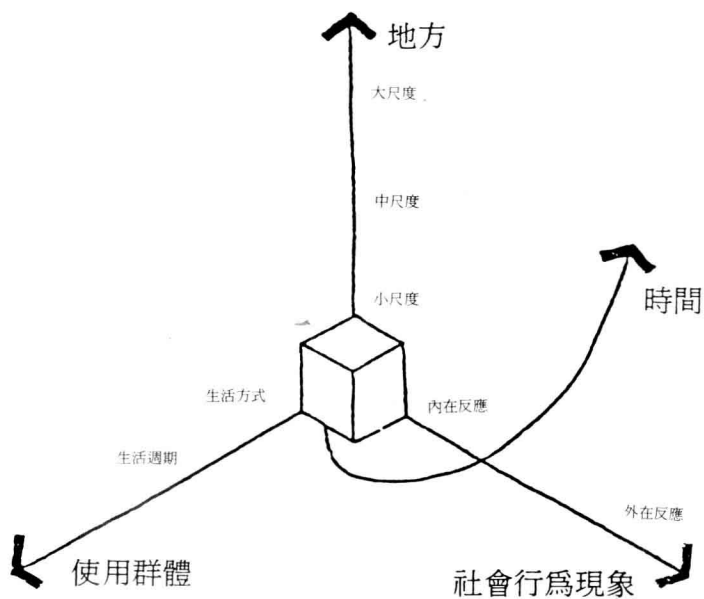


圖3-4：摩爾，都鐸與豪威爾提出的環境設計研究模型。(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36)

有直接的一對一關係存在心理空間與相同對象的實質空間中(Moore and Golledge, 1976b: 9-10)。處理一個主體如何接收、選擇、組織、感覺、知覺、知道一個對象，在環境一行為研究中至少有兩種主要的認識論的立場<sup>③</sup>。

### 1. 環境一行為研究的主流認識論模型是經驗主義的。

環境行為研究的重要研究，“明白表示地或未明白表示地”順著實證主義立場的就是心理學與社會學中的“行為主義”，以及地理學與人類學中的“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像巴克(Barker, 1968)，克雷克(Craik, 1970)，波辛斯基、伊甸生與瑞夫林(Proshansky, Ittelson and Rivlin, 1970)，哥曼(Gutman, 1972)，以及何威爾與卡森(Wohlwill and Carson, 1972)等均是其中代表(Moore and Golledge, 1976b: 23)。他們完全經由現有經驗來處理知識。對空間形式的了解基於感覺到的資料。環境(客體)被當做是獨立於知覺者(主體)的真實客觀的存在。環境表徵或環境意象經由感覺經驗來表現對象(客體)，它假設為在刺激(S)與顯然的行為反應(R)之間斡旋與中介。這是中介的刺激—反應(S-R)理論與認知行為理論的經驗論模型(Moore and Golledge, 1976b: 12-13)。

### 2. 新康德主義模型

有些學者為了反應對實證主義的批評，試圖避免環境決定論與天賦論之間的衝突，同時連結起經驗論與觀念論的差距，最近，在環境一行為研究之中，一個新康德主義的認識模型已經被一些研究者採納了，像摩爾(Moore, 1979a; Moore and Golledge, 1976b: 14)。進一步，他們認為被觀察到的環境並不必然是“真實的”環境，而為一組心象(智)的意象(Ittelson et al, 1974)。這種極端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的假設已經“沒有‘環境’，更確實地說，‘環境’是一種

<sup>③</sup>前面提到的歐陸理性主義的模型，對環境一行為研究中的經驗論言是種少數，但是對更強調先驗自我的現象學而言，它確實有助於化解在封閉系統中的實證主義片面性與技術取向，也在近年取得了重要影響(參攷第四章，第九章)。



心象（智）的建構”（Moore, 1979a: 35）。環境（客體）的經驗現實（或物質）只能經由特殊心靈（主體）的努力來‘主動地建構’。所以，不可能由主體的性質與其社會—文化脈絡來劃分主體與“現實”，同時，“不可能脫離知覺與認知的個體來界定‘現實’”（Moore and Gollidge, 1976b: 14）。反過來說，建構主義却並不一定是採取康德主義的認識論立場的，詳見後文。

## （二）形式與價值之關係

由一開始起，處理價值與空間之間的連結就是環境—行為研究中的主要研究角度。價值被當做是文化系統的一部分，或是行為規則的一部分。價值“不是群體的結構，也不是生活方式；它們是人們經由社會群集獲致的抽象目標”（Michelson, 1970: 131）。對價值的關心表現在環境—行為研究所強調的環境知覺、態度、喜好與滿足等等方面（Porteous, 1977: 213- 239; Altman, 1980: 61-64）。一般說來，在實證主義的研究傳統之中，形式—價值關係常常被有意地忽略了，然而這是連結社會理論與設計理論、社會科學家之間與專業者之間差距的橋樑，因此，形式—價值關係在環境—行為研究應用的層次上成爲‘用後評估’的重要對象，我們在後面會進一步討論它。

在某個程度上，建築師及人類學家阿莫士·拉普普超過了前述實證主義研究傳統的這個限制。基於其早期對住屋形式的文化關係研究，以及借助了一些象徵互動主義研究傳統中所關心的主題（Ellis, 1971），拉普普（Rapoport, 1977）擬議了一份文化的理論架構，將環境知覺與認知當作價值與環境形式間之心象上的相互關係。他認爲環境形式是價值系統，或不同群體的規則系統。然而拉普普也指出，在行為與價值之間，在文化（或副文化、世界觀、生活方式）與環境之間，並沒有這種一對一的互動關係，雖然這些關係存在。關鍵的連結就是意象，或圖式（schemata）。價值存在於不同的意象之中，它導致某種特定的選擇。然後，這就導致了在環境—行為研究中的環境知覺、環

境認知、與環境評價的概念(Rapoport, 1977: 20,24-25)。意象、圖式、或認知表徵，是在被知覺到的世界與現實世界間的過濾器(p.40)(圖3—2)。首先，認知圖式被賦予符碼（被表現）在營造環境中；然後，它能被解碼（閱讀），只要它能符合接受者的圖式（p.109）。然而空間有比三度空間更多的特性，環境形式是一意義的組織。

在最近這些年，超過了僅依靠傳統的文化象徵的研究角度，而發展到使用者環境意義，以及日常環境意義的研究<sup>④</sup>(Rapoport, 1982)，拉普普提供了一個思考環境意義的架構。他至少已經界定了三種特點：

### 1. 多重管道的溝通

然而，視覺的管道被假設是近代西方文化中比其他管道重要的管道，非口語的溝通仍涉及其他的感覺線索，像聽覺、觸覺與嗅覺等等(Rapoport, 1982: 49)。

### 2. 意義與行爲

非口語的取向通過“語用學”(pragmatics)而非“語法學”(syntactics) (符號的結構：在符號系統之中符號與符號的關係) 來處理環境的意義，考慮營造環境的意義與行爲，這也就是說符號與行爲的關係。它尋求能顯示非口語線索與情境、行爲之間關係的潛在規律(Rapoport, 1982: 50)。

### 3. 營造環境線索的情境

對環境線索的了解有賴於社會場合、情境或絡脈組織，它部分是關連在溝通之事物，部分也關乎文化符碼的外部關係(Rapoport, 1982: 51-53)。

所以，拉普普建立了一個考量空間的理論架構，它由四種互相關聯的元素結構而成；空間的組織、時間、意義與溝通傳達。此處“溝通傳達”(communication)關乎人與人之間的口語與非口語的溝通，

<sup>④</sup>另一個處理意義研究的團體為記號學(semiotic approach)，他們選擇語言的模型而非環境—行爲的關係，將於第六章另行討論。

而‘意義’(meaning)則關乎人與環境之間的非口語溝通傳達”(Rapoport, 1982: 178)。

一個再結構傳統審美價值與空間風格的價值—形式關係之更寬廣的理論架構，可以界定為：以社會團體的規則與準則為基礎的選擇系統(Rapoport, 1977: 16)。所以，價值與空間形式間關係的課題，不能脫離環境認知的中介與斡旋。環境—行為研究聲稱空間深深地根植在其脈絡組織之中。因為環境—行為研究的興趣是在人與環境的關係上，他們對形式—脈絡組織的關係也更加注意，這也正是我現在要在下面談的。

###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由一開始，環境—行為研究中的經驗研究就集中在社會—行為與實質環境的互動。環境—行為研究多學科的個性意謂著研究涵蓋了由內在心理行為到外在文化行為等許多不同層次的人類行為(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51-52)。首先，我來討論由艾文·奧圖曼與馬丁·齊默爾(Martin M.Chemers)(1980)提供的概念模型。我們以它做環境—行為研究中處理文化脈絡與形式關係的個案。其次由摩爾、都鐸及豪威爾(1985)提供的一個架構將用來檢視如何考量不同社會關係與營造環境的課題。事實上，這兩者的工作都致力於理論的建造，試圖綜合過去的貢獻以指引著環境—行為研究未來的研究方向。

#### (一)形式與文化脈絡組織

按奧圖曼與齊默爾(1985)的說法，文化有四個主要元素(pp.3-4)：

1. 文化關乎信念和知覺、價值和規範、習俗和社會與群體的行為。
2. 文化被用來指明在群體中以共同方式分享的認知、感覺與行為。
3. 文化意謂著這些分享的信念、價值的及行為風格能傳遞給他人，尤其是傳遞給孩童，與文化新成員之社會與教育，幫助由一代至

下一代保存共識。

4. 實質環境是現實的對象，它能劃分為自然環境與營造環境，同時有不同的尺度(Altman and Chemers, 1985: 4)。

心理過程連繫文化與實質環境，它包含了心象活動（內在的）與行為的（外在的）(Altman and Chemers, 1985: 5)。

然後，他們針對環境與行為的關係擬定了一個理論的，社會—心理研究角度。他們的興趣在於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以加諸於社會關係之上的知覺、認知與態度，作用在實質環境的脈絡組織之中。他們採用了一些心理學的與人類學的文化生態學分析，認為在文化與實質環境之間很難指出確切的因果關係，雖然，實質環境對文化實踐有很明顯的重要性。結果，在實證主義的形式理論要求之下，文化—環境的關係只得擬議為一相關變數的網絡關係(Altman and Chemers, 1985: 5-9)。(圖3—3)

最後，奧圖曼與齊默爾的概念模型擬議為文化—環境關係的一般性陳述與相關變數的架構。這也就是說，他們的概念模型提供了一種去觀察網絡的方式而非是變數之間確切關係的精確陳述(p.9)

## (二)形式與社會關係

超過葛雷·摩爾自己早年的陳述(1979b)，摩爾、都鐸與豪威爾(1985)提出了一個描述環境—行為研究概念組織的新架構，期望能表達這領域中不同觀點間的一種結構性連結，幫助環境—行為研究的成員們能以一種一致的方式彼此關連起來。這個架構是在諸多早期貢獻之上建造起來的，也說明了這個領域未來研究所將遭遇的隔閡(p.34)。

這個架構由四個元素所組成：範疇的觀點(notion of scope)、理論的角度、過程、以及脈絡組織。

### 1. 範疇的觀點：

任何環境設計研究(EDR)或環境—行為問題都可沿著四個角度來了解：地方(places)、使用群體、社會—行為現象、與時間(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35) (圖3—4)。這個概念建構了人與地之間的連繫，闡明這些課題可告訴我們這個架構是如何來考慮社會關係與形式。

(1)地方的課題以三種尺度組織起來：

大尺度關乎自然環境、區域、與都會區（為資源管理者、都市規劃師、地景建築師、都市設計與土木工程師的工作範圍）；中尺度為工作場所、集合住宅、再用住宅或其他的建築物類型（為建築師、建築物設計師、顧問工程師的工作範圍）；小尺度則為室內、產品與材料（為室內設計師、產品設計師、工業設計師以及圖案設計師的工作範圍）；以及地方的概念性課題（為地理學家與環境心理學家的工作範圍）(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58-73)。

(2)使用群體的課題組織為：不同的生活方式，特殊的生活週期需要更高程度的環境支持（孩童、老年人）；被環境高度影響的群體（殘障者）；以及政治上與經濟上不能表達的群體（少數民族）；一般人，新的使用群體等等。

(3)社會一行為現象則分類為內在生理行為、內在心理行為，外在個人行為、外在社會團體行為、外在文化行為(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84-91)。

## 2. 理論的角色；

理論機制的命題能連整起這四個向度：人、地方、行為與時間。

“理論是一組有系統的假設、已接受的原則、以及設計，以解釋特殊的一組環境一行為現象的性質之建構(constructs)的發展”(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36)。

## 3. 關於“過程”：

環境政策的規劃、設計、評估以及研究是一個螺旋形的模型(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84)。

## 4. 關於“脈絡組織”：

這涉及一急迫的環境問題以及改變中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氣候的

脈絡組織(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109)。

所以，這個架構期望提供一種看到這領域中所有有用的資訊的範疇，以及為環境設計研究貢獻一個潛藏的概念結構。

#### 四、應用的層次

在1968年設計方法團體(DMG)的第一屆國際會議之後，DMG推動形成了環境設計研究學會(EDRA)。次年，在英國則出版了建築心理學通訊(Architectural Psychology Newsletter)的第一期。在環境—行為研究中，原來對設計方法的興趣仍然存在著 (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11-12, 99)，某個程度上，譬如說，它帶有這樣的觀點：設計決策的自我意識過程是能夠經由理性的分析而改善的 (P. 99)。

在這個假設下，規劃與設計的定義是相似的，不論它是政策規劃或是實質規劃。規劃與設計的差別僅是尺度上的<sup>⑤</sup>。環境設計研究的應用包括了：公共政策的形成、環境計劃書製作、電算機輔助設計、參與性設計方法、用後評估(POE)等等。

社會科學家由於訓練及制度使然，他們經常忽視研究的應用。而環境—行為研究，無論如何，是問題取向的。環境設計研究提醒我們，設計與研究必須相互作用(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38, 53)。

現在，將環境計劃書的製作、設計準則、以及用後評估，當成環境—行為研究在應用層次上最關鍵的部分來作為考量的例子。

##### (一)環境的計劃書製作(environmental programming)

如前所述，環境計劃書，或設施的計劃書(facility programming)是60年代早期設計方法團體評論與批判建築的產物。有時，它的早期

<sup>⑤</sup>拉普普加上一假設，即規劃(planning)較有意處理區位與政策決策，更勝於處理體驗到的都市元素及其關係(1977: 6)

名稱是“計劃書製作”(programming)、“使用者研究”(user studies)、或單純地“研究”(research)而已(Silverstein and Jacobson, 1978: 8)。這個定義可被當做是一種目標的表明,以及設計過程中不同使用者、業主與設計者的準則的辨別(Palmer, 1981);或者說界定問題的過程,設計之解決方案的過程,以及來擬定準則(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99)。簡言之,設計是解決問題的過程。

因為計劃書之製作可以被看成是設計過程的開始,它是能夠分析與再界定基本的關係與制度的形式以導致新的空間解決方案的最關鍵的階段。它並不只是好的設計產品所必需的基礎,而且是不同學科能交會一起,提供構想,指引未來設計方向的時刻(Lindheim, 1983)。研究與設計在此處交會,期望能保證未來環境的品質。換言之。環境計劃書有一種影響社會—實質形式的強大潛能。在計劃書的結構中鑄造了一強大與基本的形式,它提供了建築物性質的粗略架構(Silverstein and Jacobson, 1978: 7)。所以,某個程度上,環境計劃書製作的專業合法化過程看來像結構工程師、規劃師、地景建築師在數十年前由建築專業中分工出來的最近例子。

計劃書有不同的類型。例如,模式語言的早期形式(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68)與環境—行為研究的成長過程不只是有互動關係,而且有相當的貢獻<sup>⑥</sup>。今天的環境計劃書製作,涵蓋了許多不同的活動,由經濟可行性研究、活動分析、用後評估、使用者需要,空間配備(space layouts)、消費者參與、設計準則、以及對是否應該建、什麼時候應建、營造範圍、何處應建的決策過程(Lindheim, 1983)。

環境的計劃書製作者在決策過程中可以有一些折衝轉圜的餘地。他有機會與不同的使用團體溝通,或者甚至幫助無聲的團體使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得到。他能擬定其他的價值與準則。他也可能形成對

<sup>⑥</sup> “模式語言”不在環境—行為研究或環境計劃書製作這兩部分中討論,將於下章另行探討。

非設計者難以選擇的替選方案。最後，他經常能離開其業主的主要興趣——像集中於利潤、或政治反應、或時間與預算的壓力——來獨立地作出決策(Lynch, 1974: 1060)。

當然，專業的限制仍然存在。當環境計劃書在進入製作時，答案可能已經早就決定了。政治、經濟的規律已經被設定了。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的計劃書製作者致力於將其當做社會變遷的工具，找到在異化的、社會上反動的計劃書背後所隱藏的計劃書，因為它們經常強化、鞏固了現狀(Silverstein and Jacobson, 1978: 9-10)。

## (二)用後評估

順著環境計劃書製作的討論，評估研究被界定為：為了改善未來的環境品質而度量計劃書之成效是否與原來目標相符的程序。過去十年中有三條平行的發展，就是營造環境之用後評估(POE)、計劃評估、設計評估。用後評估是他們之中最受到發展的(Marans, 1984: 116)。

用後評估，或者翻譯為使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ost-construction evaluation, after-the-fact evaluation)的定義，克雷克·吉姆林(Craig M. Zimring)與珍妮·雷生斯(Janet E. Reizenstein)界定為“檢驗所設計的環境在使用之後人們利用的成效”(1980: 429)。簡言之，使用後評估為對使用之環境的評估”(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102)。用後評估能集中於分析與評估所設計的單一類型場所，或是評估案來了解許多理論性的課題(p.102)。

用後評估傾向於針對場所，描述其性質，而非操縱與應用取向。用後評估目標的三個向度可以說是：對結果有意地一般化、焦點的深度、應用時機(Zimring and Reizenstein, 1980: 431-453)。

然後，用後評估的這三個向度有三項方法論上的意涵：

1. 在時間與場所上，可一般化的評估必須廣泛地取樣。

2. 有系統的評估應考慮組織的課題、多種方法的技巧、以及設計過程。



3. 評估是有意要直接應用的，它涉及組織的成員研究不同使用者的不同需要，以及特別界定得很好的表達(Zimring and Reizenstein, 1980: 439-446)。

雖然大部分的用後評估的作品已經集中在住宅、鄰里、大學宿舍、工作場所、新社區、遊樂場所、機關所在場所(Marans, 1982: 117)，甚至處理消費者的抱怨(Sommer, 1984: 137-139)，這工作仍然有一粉碎傳統美學根基的潛力。為何如此？明顯地，用後評估的基石是使用者取向的(Friedmann, Zimring and Zube, 1978: 2 ; Zube, 1980: 12 ; Marans and Spreckemeyer, 1981: 5 ; Cooper Marcus, and Sarkisian, 1986)。經由使用者的知覺與行動的評估是與傳統建築批評最明顯的區別。傳統的建築批評主要基於審美的評估、審美的愉悅與審美的判斷。這有主觀性的問題，對不同的判斷不能保證得到相同的結論(Marans, 1984: 117)。更有甚者，傳統評論家具有狹窄的職業審美品味，但是它的角色却是隱藏在不受到挑戰的共通的審美的價值表面的背後，不容易被覺察到，我們在第五章中會進一步處理這個問題。

### (三)設計準則

按照用後評估直接的應用要求，它要求以有效的方式來組織以及呈現研究結果。設計準則是使用評估之研究產品之一<sup>⑦</sup>，它可以具體地連結研究與設計間的差距，直接連繫環境計劃書與實質設計。

設計準則能被界定為形式、過程或環境與行為間關係的描述，在設計過程中，它們是被當作參考來遵循的推薦模式。它們有三點主要的特性：

#### 1. 使用者準則：

既然設計準則大部分來自用後之評估(POE)，設計準則則基本上

<sup>⑦</sup>其他的產品包括使用者的寫照(user profiles)、脚本(scenarios)、註解計劃(annotated plans)(Cooper Marcus, 1985: 4)。在本文中，將設計準則(design guidelines)當做是最重要的例子。

是使用者取向的，連結著使用者的需要、喜好與意象(Zeisel, 1975: 30; Cooper Marcus, 1982)。

## 2. 環境模式：

在既定的文化與社會中，總有些相對穩定的模式、原型、或人與場所間的關係。它們會一再重複(Cooper Marcus, 1985 : 5)，以及給予地域性(locality)基本的特性，它們是深植在地域性質中的原型(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77; Alexander , 1979)

## 3. 有目的、有計劃的價值觀：

設計準則提供了一方向與原則的架構，由目標到計劃書到設計過程之步驟是一制的(Cooper Marcus, 1985 :7)，在同樣的範型之中，設計準則開啓了作為設計決策過程基礎的規律與價值。事實上，這是為何設計準則能連結分析性研究與綜合的、價值取向的實踐之理由之一。價值觀是政策與設計所必要的。只是我們需要闡明的問題是：它們是何人之價值？

設計準則的基本格式可以分類為：(1)行為與態度上的陳述，(2)或者，作業標準，(3)或者，慣例性的準則(Cooper Marcus, 1985: 8-10)。或者，以另外的方式來說：(1)規定處方，(2)指定標準(Lynch, 1981 : 278)，最近十五到二十年，許多環境—行為研究的成果都以設計準則的形式來載明，針對特殊類型的場所以及特殊的使用者團體，來改善未來的設計品質。例如：兒童中心(Osman, 1971)，兒童醫院(Lindheim, Glaser, and Coffin, 1972)，住宅區內之兒童(Cooper Marcus, 1974)，老年人的低層住宅(Zeisel, 1977)，高層住宅(Cooper Marcus and Hogue, 1976)，老人住宅中的開放空間(Carstens, 1985)，秘魯的低收入(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69)⑧，高層大學宿舍(Van der Ryn and Silverstein, 1967)等等。

⑧ 模式語言(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77)可以當做朝向一般性類型的場所之設計準則。它與早期環境—行為論述有互動關係，但是最後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認識論研究方法，將在下章另行討論。

有部分都市設計準則並沒有包括在這裡，因為它們是純粹形式主義取向，只關心視覺與材料的規定，像英國愛塞克斯 (Essex) 郡住宅區規劃師的設計準則(1973)。它們不是基於環境一行為研究或是使用者分析。然而，設計準則並不必然限於社會一行為的課題。它也能夠經由環境認知的研究來傳譯使用者的意象。經由研究來支持，設計準則是一種假說，這並不僅關乎環境一行為的關係(Cooper Marcus, 1985: 24)，而且關乎主體 (使用者) 與客體 (環境) 間感覺的經驗與空間象徵的特殊性。我的看法是，傳統審美管制的規定確實有可能被更有說服力的、有研究為基礎的設計準則來取代。有別於傳統營造技術的作品取向，以及工業化營造技術的產品取向與類型取向特性，為了對未來空間形式之經理與在更複雜的決策過程中對空間品質做有效之掌握，以過程為取向之設計準則是值得注意與進步發展的。設計準則其實是空間的文化形式之語彙，它是可多重閱讀的空間象徵。

現在的問題是：感覺的經驗，即，意象，如何中介與斡旋於擬定形式的過程之中？空間語彙如何關係著空間的象徵？這是意識形態中介斡旋過程的問題，以及，這也是我們為何要在認識論的層次上來處理環境一行為研究論述的原因。

## 五、認識論的批判

環境一行為研究一如開文·林區的哲學角度，是過去二十幾年中環境論述的主流之一。它們兩者在相似的論述構造上由兩方面分享共同的觀點：前者為社會科學，後者則為專業的代表。按照前面的描述，大部分的環境一行為研究的價值取向都委諸人文主義的價值，它可以說是歷史地建構為社會計劃(social project)的一部分，這個社會計劃是在1970年代經濟危機前之社會福利國家模型所提供的。同時，實證主義的“行為主義”的方法論層次的研究觀點卻可以說是相當技術官僚取向的。這個價值與方法論的結合，可以經由對其認識架構的分析來了解。之後，我將轉向其在環境規劃與設計應用上明顯的欠缺與脫

漏。

### (一)環境論述意識形態架構中的環境—行為疑旨(problematic)

在環境—行為研究的實體知識的主體之外，我們還需就其論述的、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層次做一分析。這就是說，環境—行為研究的知識是如何構成的進行理論分析：

#### 1. 環境—行為研究如何形成他們的問題？

這是關乎其理論時勢(theoretical conjuncture)的首要課題所在。環境—行為研究往往將其研究的問題建構於人與環境交流的模型之上。環境—行為關係被當做是範型的基礎。

#### 2. 環境—行為研究的“研究對象”與操作過程的“方法論假設”是什麼？

經由“可觀察到的以及研究對象自己報告出來的互動”的方式所產生的分析性基本單位，被環境—行為研究當做是資料來源。一般而言，環境—行為研究的哲學基礎與實證主義息息相關。這個操作主義的研究方法以所謂的五原則來處理研究的過程：化約的與操作的定義、資料的複製可能性、價值中立客觀性、研究對象的可量化性以及可觀察性(Stea, 1980: 110)

#### 3. 環境—行為研究知識的社會脈絡與認知的利害關係是什麼？

環境—行為研究產生於經驗分析的行為科學之認識論，以及在凱恩斯模型的工業資本主義的脈絡中成長。福利國家社會有一種機制：技術人員的意識形態建構了一種論述，它使技術專業者與社會工程師們能運作、思考、表達、溝通於其中，以及，環境—行為研究其客觀化的研究過程有助於技術控制的制度與認知上的利益。

簡言之，這些認識論的假設預先決定了審視現實、建構知識的角度。它也是當前知識細碎化以及專業孤立化的認識論根源。所以，暴露其社會與政治的原因，解構其認識論的機制，發現環境—行為研究潛藏著的疑旨之中心前題與遺漏、發言與觀點就是必須的工作了。

環境一行為研究的問題是其假設界定在一個基本上決定了其陳述的性質的論述架構 (framework of discourse) 之內。奈希·提默(Necdet Teymur)一再指出環境一行為論述的認識論預設是其方法論上最不易為研究者自覺的弱點。他認為環境一行為的論述為一組概念(論述的對象)所建構,它與一個或更多個的“疑旨”(概念的架構)密切連繫於一起(Teymur, 1981 a: 79),對環境一行為的論述言,除了“人”與“環境”之間以外,似乎完全沒有其他的矛盾了(Teymur, 1982 : 188)。這是一個典型的功能理論,僅僅處理選擇過的,呈現展示出來了的變數之間相互的關係,忽視了論述表達上的空白,環境一行為研究傾向於由它們生存的物質條件中移開了真實的社會與實質的問題(Teymur, 1984: 232)。它使人們不自覺地生產某些陳述,接納某種架構。像“環境”(environment)、“建築”(architecture)、“社會的”(social)、“行為的”(behavioral)……等等,似乎對每個人言都是既定的,視為當然的。相反地,它們在理論的一般化上反而是模糊的,以及有預設的(p.4)。問題被概念所預先設定了,以及被制度化了,却又經常對根本的矛盾不發一問。這也就是為什麼它們的人文主義價值是福利資本主義社會改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之理由。甚至在後期,它們部分的價值已被設計師視為當然,以及變成政府官方政策的價值了,而現實却仍然未有改變。

即使環境一行為研究有其在社會構造中的立場與其自己的一套假設,環境一行為研究仍無法被忽視與擱置:無論如何,它們的假設與立場需要被暴露、解構以及轉化。就像這些術語及關係被安置在環境一行為疑旨中一樣,我們需要完全改變這些術語以及它們的關係。“設計師所設計的,以及規劃師規劃的,並非是‘環境’,而是一組複雜的對象與關係,它們的實質存在一如其理論的概念,都是社會性地被決定了”(Teymur, 1982: 191)。事實上,空間與社會並非像在環境一行為疑旨中被建構成為一概念上的連結體(a conceptual couple)那般原是兩個分離的事物。空間其實就是社會。我們不能忽略概念上人為的

分離只不過是暫時爲了研究分析上的方便而已。我們不能忘記它與現實的連結，以及它是社會地預先決定了的“理論的想像”。這也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空間性質的理論問題。

在對環境一行為研究的理論論述的評論之後，也可以對它們的實體理論本身之適當與否提出一質疑。我將經由關乎具認識論架構的理論建構的抽象，來指出其理論的局限性。這些實體知識的問題是：空間的社會性質，以及認識主體在建構活動。

### 1. 空間的政治經濟性質

雖然環境一行為研究仍然是在前範型的階段，大部分的“理論”仍是在分類學上的，在環境一行為疑旨中調查忽略了細小表面之描述性理論(Stokols, 1983: 268)，中程的解釋理論被理論家與研究者當作是突破理論現況的最主要的理論任務(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ch.5)。然而，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却無人有任何一點理論的努力(Teymur, 1984: 231)。如前所述，像如拉普普(1977, 1982)所提的對環境形式與意義的跨文化理論架構，以及奧圖曼及齊默爾(1980)所提的文化與環境理論架構，文化中屬於建構的以及屬於物質的社會過程之性質完全被忽略了。以下我將做進一步的闡釋。

在拉普普的理論架構中，他確實超越了我已提過的環境一行為研究忽視形式的問題。他借用了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的觀點表明文化係社會的“整體生活方式”。以唯心論的方式建構文化的觀點，它提供了產生意義、價值與實質事物的一般性過程。然而，意象與圖式並非是自然地存在著的靜態過濾器。它是如何建構，如何維持，以及被再生產都必須將其置於歷史的與物質的社會脈絡中去分析。否則，人就變成了自由的作用者，具有了一致的世界觀，然而却缺少了存身之處。因此，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會認爲空間形式與意義的生產是意識形態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Williams, 1977: 55)。這也就是說，象徵與溝通符碼的文化生產是在一特定社會歷史構造中的社會實踐。

在奧圖曼以及齊默爾(1988)的情形中，它們的主要實體問題也與其方法論有關。經驗主義的概念與在意識形態指示下的模糊現象弄在一起，像“文化”、“環境”、“心理過程”等。他們未言及任何針對空間的特殊性、實質環境(surroundings)與社會等等，其實，這些概念都是以非社會、非歷史的方式處理的。例如，關乎“文化”與“心理過程”這些字，任何對文化的嚴格分析都必需在更廣的歷史成長脈絡中來審視文化的概念。“文化”(culture)這個字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在十八世紀末是如何與“文明”(civilization)這個字的意思混合起來的？然後，它如何與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歷史與經驗的變遷相互影響的呢？(Williams, 1977: 11-20)“文化”與“心理過程”在研究過程中很難分離。

一方面，當文化關乎“知識生活”與“藝術”等的時候，文化的觀念本身就包涵了“內在過程”的意思。這個建構的人類的文化過程必須在社會經驗與意識的層次上精確地分析，而非“文化”這個模糊的字眼。此處，威廉斯(Williams, 1977)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這個概念，可以看做是對文化分析方面不同的理論的研究方法的例子。

爲了掌握對地方體驗的特殊性，以及超越現象學者所提出的“地方感”觀點中，所暗涵的自由漂浮的主體經驗，艾倫·普瑞德(Allan Pred)借用威廉斯的“感覺結構”概念，將其界定爲一種生活的特殊感覺，它是不需特意表現的特殊社群經驗。這種機會經驗感是在一個特殊地方和時間之生活品質的感覺。其實，理性認識與感性認識無需如此人爲地對立起來，感覺的結構可以進一步處理感覺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感覺(Pred, 1983)。另一方面，“心理過程”也涉及在社會關係中對空間的使用。像建構的社會過程，“文化”是一種社會再生產的改變了的形式。它必須建立理論的建構來連結在理念和人類實踐的其他層次之條件的相互關係。甚至，文化還必須連結有無人類實踐之社會政治過程。否則，它不可能在基本的與表面的變數之間區分辨證的矛

盾。結果，在奧圖曼及齊默爾的模型中之互動關係，不可避免地變成變數間的一團模糊網絡。整體言之，理論的抽象必須能在意識與經驗的內在過程之社會層次上，與開放的社會政治上連貫“文化與心理的過程”。

一旦我們提及價值、經驗與環境品質的觀點，我們就必考慮潛藏在空間的組織之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的層次(Pol, Muntanola and Morales, 1984)。然而，大部分前面提過的理論架構——拉普普、摩爾、奧圖曼及齊默爾——都未具體表現對意識形態的警覺與分析。或許，這個認識論上的空白代表了他們認為“意識形態終結”(end of ideology)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這是空間生產與消費的意識形態問題。

進一步，既然環境是社會文化構造中的歷史關係，換句話說，是特定歷史地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那麼，對實質環境交換價值的政治—經濟分析既是了解意識活動的物質基礎也就成爲必要的分析了。環境—行為研究事實上有助於質疑在消費領域（使用價值）的傳統建築思惟方式的形式主義設計。然而，他們很少考慮實質環境的政治經濟性質，即空間的交換價值。爲何如此？

資本主義經濟中，環境已經被當做商品生產和維持社會關係的表意系統而建造起來(Teymur, 1982: 230)。生產、居所、商品的意象都被以商品文化的方式所制約，用來強化商品是被“需要”的這種情況(Ellis, 1978)。所以，我們必須在交換領域內去考察空間。換言之，空間做爲商品的性質是什麼？這空間是如何被生產、被交換，以及實現爲貨幣的？這空間如何爲擁有者獲得了利潤？以及這空間的特殊性如何能被當做是商品的拜物教以及像是意識形態的顛倒關係加以分析呢？而嘲諷的是，環境—行為疑旨在環境—行為研究中像是拜物教一般作用著，因此，真實中的社會關係永遠不得展示出來。

此處，我們引用晚期曼威·柯司特的觀點做爲這部分的結論，也做爲空間的社會性質在理論層次上的闡述：空間並不僅僅是社會的反



映而已，空間就是社會。空間是社會的基本的物質向度之一，若空間不與社會關係一同考慮的話，即使考慮到它們的互動，事實上也還是將空間的性質與文化割裂了，而環境行為研究的理論問題正在於此。它正好違背了社會科學的第一原則：物質與意識是相互關聯的。這也是歷史與科學之本質所要結合的。所以，空間形式，就如所有其他的對象一般，為人類行動所生產。他們按照既定的生產方式與特殊的發展方式，表現與展示了支配階級的利益。空間形式在為歷史所界定的社會中之國家的權力關係所表現與執行。空間形式為國家所強化的家庭生活以及性別支配的過程所塑造與實現。同時，空間形式也留下被剝削的階級、被壓迫的主體、被支配的婦女抵抗的痕跡。這些矛盾的歷史過程在空間上之作品是在一既有的繼承下來的空間形式之上，在先前之歷史與未來的新利益、計劃、抗議與夢想的產品之上完成的。最後，社會運動將起來挑戰空間結構的意義，所以會嚐試新的功能與新的形式(Castells, 1983a;1983b:311-312)

## 2. 認識主體的建構活動

雖然環境一行為研究致力於理論建造的任務(Stokols, 1983; Moore, Tuttle and Howell, 1985: ch.5)，它們似乎未曾考慮過根本的問題可能是在於認識論之中。這已不只是實證主義的問題。有些心理學家，例如像摩爾，拒絕了環境決定論與行為主義的機械的研究角度，代之以尚·皮亞傑(Jean Piaget)之發生認識論(genetic epistemology)，將其連繫到環境認識之中。然而，至少在他們有些人的眼中，“現實是為一主動的主體所建構的”，以及試圖“部分地”採納了一種唯心主義的新康德主義的認識論立場(Moore, 1976: 139)。有趣的是，以摩爾為代表的，在環境一行為論述中的這種認識論的轉向是由一個行為主義的唯心立場逐漸改向為一康德主義的主觀、唯心論的立場。

無論如何，在將結構主義連上建構主義的皮亞傑方式與康德主觀唯心論的認識論之間其實有一細微的差異。皮亞傑肯定“客體的存在

以及客體的結構本身在被發現之前就存在著”(Piaget, 1970/1972: 84)。然而，康德主義却非如此。微妙但是關鍵之處在於：客體不是在操作性探索結束時才發現的，客體是通過建構才發現的。另一方面，皮亞傑也反對康德主義康拉德·洛倫茲(Konrad Lorenz)的對主體認識結構之天賦論觀點：沒有什麼康德主義那樣的“先行條件”(antecedent condition)的先驗因素。“在這裡，我們〔皮亞傑主義者〕看出這種解釋〔康德主義者〕和我們的解釋完全相反，按照我們的解釋，認識，認識的結構確實是贏得了必然性：但是，只是在它們發展的最後〔通過建構〕而不是一開始就有，而且也不牽涉任何先行的遺傳程序設計”(p.56)。對皮亞傑而言，他拒絕了環境主義的觀念論(p.55)。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對象的結構本身在被知道之前就存在了，同時對象僅能經由理論概念(理論的對象)(theoretical object)對真實對象(real object)的行動才能知道(即，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之“理論的實踐”(theoretical practice))；或者，經由主體對客體的實踐(praxis)，即，有意圖的人類作用者的中介斡旋(即，羅伊·巴斯卡(Roy Baskar)之“有意圖的人類勞動”)(Baskar, 1983: 254)。

非科學的論述致使主體在意識形態的架構之內感覺與反應。對象則經常涉及為意識形態所隱蔽好了的一些現實的層次。為了避免這些意識形態的偏見，科學論述的對象是具體的對象與對這些對象的概念(Teymur, 1981 a: 81)。概念，即主體對客體的理論工具，以及經由理論抽象來認識其潛藏部分。理論建造，知識的生產，是認識的主體對客體建構活動的斡旋中介過程。總而言之，若套用阿圖塞的話，第一，環境一行為研究是一意識形態的表徵，它在勞資之間社會合約之“實際的社會功能”是比其“理論的功能”重要得多。第二，由於學術與專業領域兩者的片斷零碎化，和忽略了認識論上的隔離，以及環境一行為論述的疑旨等等理由，環境一行為研究的人文主義價值僅能在其封閉的圈子內做自我調整。

## (二)環境—行為研究應用於規劃與設計的脫漏

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中支配意識形態的危機不僅僅是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已失去了其作為共同科學真理的地位，而且其技巧應用也十分狹窄。環境—行為研究正是這種情形在環境論述中的代表。整體而言，環境—行為研究其二分的理論疑旨，以環境與行為間關係的缺失為著眼點，其目的在於環境與行為之間的契合。然而，異化的空間反映的是更基本的社會關係。那麼，我們就來看看即使應用於專業實踐中，也搔不著癢處。或許，最直接以及最明白的例子是本章前路易斯·海曼(Louis Hellman)的漫畫所顯示的在環境—行為研究與專業之間的交流與隔閡(圖3—1,頁48)。它傳譯了拜倫·麥克利斯(Byron Mikellides)的批評，告訴我們由IAPC/IAPS會議的歐洲經驗(Mikellides, 1980: 13~20)。

以下，我將試圖去檢視環境行為研究應用於規劃與設計時主要的欠缺部分及扭曲

**1.除了少數作品，大部分的環境—行為研究都忽視了營造環境的形式課題，即，美學的課題。**

我們已經知道在環境—行為研究與設計實習課程間的鴻溝。前者是在分析過程中的邏輯取向。用後評估可能會在某個程度上對兩者的連接有些幫助，但是至少目前的環境—行為研究的文獻仍不足以回答是否它對設計至關重要(Sutton, 1984)。假如形式與功能能像在傳統美學論述中那樣分得清楚的話，環境—行為研究中的社會科學家對功能方面興趣是遠大於對形式的興趣。這不只是在研究中忽視了形式課題，即使在常見的計劃書製作之中、使用後評估與設計準則中也是如此。結果，不僅環境—行為研究變得難與設計者溝通，而且一些在專業實踐與環境—行為研究間的重要連結也已經失去了，像一些關乎形象思惟與形式的感覺經驗方面的課題被忽視就是例子。

**2.即使當環境—行為研究並未有意地忽視形式的課題，他們確是關心由使用的價值或認知來評價形式，即，消費者對形式的消費。**

然而，在 1973-1974 經濟危機之後的資本主義技術、經濟模型的再結構過程中，仍然有需要在文化的層次提出對形式課題的新看法與任務。在當前保守主義當道的氣氛下，在社會與空間兩極化走向之下，精英主義的後現代主義，或者說，被史戴稱為“建築的自戀症”(Stea, 1980: 113)，傾向於拒絕關心使用者，認為這種關心是形式表現的限制。質疑當前建築論述的形式主義取向，環境—行為研究相對地表現出它們在 1970 年代之前，福利國家的社會改革的價值觀。一方面，傳統建築論述基本上關心文化精英作法的象徵表現，即，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功能。實質設計預先被決定了在專業論述之中為建制的政策尋求形式上解答。另一方面，環境—行為研究的論述為消費者取向，它基本上關心消費者對商品的選擇與喜好。環境—行為研究在找出不同團體的態度，或者性別、年齡、教育、居住區等與實質之元素間的互動方面，十分行得通。環境—行為研究部分的調查是正確的。但它們並未解決真正現實的問題。這正是環境—行為研究的拜物教。現實世界的社會關係不能據此來洞悉。某個程度上，使用者取向的環境—行為研究試圖對現代專業主義的異化加上一層緩衝帶。它們都是意識形態，為了不同的功能互做補償。所以環境—行為研究並未試著找出社會空間與社會過程所潛藏的邏輯，以回應都市社會運動，挑戰改變積累的基本結構。

**3. 環境—行為研究忽視空間的政治經濟性質，結果它們難在政策規劃中應用。**

(1)除了少數例外，環境—行為研究傾向於忽視隱身在環境計劃書製作之後的隱藏的計劃書 (Silverstein and Jacobson, 1978)。

(2)環境—行為研究觀察的尺度限制，使它們幾乎不可能運用在都市與區域的尺度(Harvey, 1973: 33)。

(3)忽視了空間的政治經濟性質，環境—行為研究不能發現空間的結構。換言之，空間的問題不能僅僅就空間的層次來對待就足夠了。

假如你不能找出形式問題的來源，你就無能去改變規劃中的事

物。空間的形式關係著物質化的社會、經濟、政治過程。我們必需以經濟、政治與文化問題的意義與理由來處理解釋性的元素。簡言之，我們必需看到空間被結構的社會過程之方式，人類實踐、政治、政策，以及人們對支配結構的抵抗的社會過程的方法。相反地，操作起來像一種社會計劃(social program)的技巧，環境一行為研究的研究、計劃者、參與性的研習、公聽會等等，不僅不能跟隨過去三十年中規劃論述的範型轉移，而且被操縱得像一種消極的政治工具來規避已決定的政策的根本矛盾。

基於第三世界的經驗，環境一行為研究中的環境決定論很容易在認識的層次上認同邊緣性理論(theory of marignality)，環境決定論是他們的理論共同基礎。

一方面，許多第三世界的專家假設人們住在第三世界都會區的邊陲（空間邊緣性）會發展出特殊的貧窮文化（邊緣文化）。然後，政治上的冷漠與變異的社會行爲、缺乏專業技能等就被發展出來。它事實上提供了解釋第三世界的人們爲何如此貧窮的理論架構。所以，你有兩個政策：

(1)假如你改變一個國家的話，你最好改變它的文化。人們貧窮是因爲他們的行爲不能插入現代社會。

(2)它假設，改善邊陲生活條件，就能變更改變社會的文化模式。

另一方面，所有在過去二十年中的研究都告訴我們，以邊緣性的觀點來解釋以上的這些關係都並不相一致(Castells, 1977: 48-49; 1983b: 179-185; Perlman, 1976)。假如你提供了好的空間條件（例如，住宅與都市化的地區），然後你就改變了他們精神面貌。相反地，讓人們在經濟與政治等待中折衝，人們才能改變他們的空間與住宅條件(Castells, 1986)。

最後，在環境一行為研究的另一個側面，環境論述的轉化過程告訴了我們環境一行為研究之外其他的選擇。這就是實證論者與現象學者之間展開激烈的辯論的原因。由於範型的移轉，已長期支配環境一行

為論述的定量研究方法弱點在環境—行為研究中也已經變得很清楚了。對許多研究者與專業者而言，現象學的、心理分析的、或其他強調質化的研究已成為替代行為主義的選擇，像克里斯欽·羅伯—修茲(Christian Norberg Schulz)(1975, 1979/1980)，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85)，段義孚 (Yi-Fu Tuan)(1974, 1977)，愛德華·雷爾夫(Edward Relph)(1976)，大衛·西曼(David Seamon)(1982, 1985)，安斯農·史特勞斯(Anselm Strauss)(1976)，克蕾爾·古柏·馬庫斯(Clare Cooper Marcus)(1979)，愛文·考夫曼(Ervin Goffman, 1963)，法蘭西斯·維立克(Francis Violich)(1983)，威廉·羅素·艾利斯(William Russell Ellis, Jr.)(1971, 1974, 1978)，哥蘭·葛蕾芝(Galen Cranz)(1982)，安東尼·金(Anthony King)(1980)等等，然而現實經常是更複雜的。例如，技術理性的實證論與人道主義的現象學經常彼此相互補償為一種支配與一種替代的意識形態，所呈現的現象學是實證主義的批判論形式，它們兩者共同作用於福利國家的社會文化過程之中<sup>9</sup>，這也就是為何新馬克斯主義在環境論述中得以穿透的原因(Scott, 1982)。我們可以說，最近安東尼·金的研究已經顯示出一個新的可能；在一個新的理論架構下研究小別莊洋房類型。這就是說，在世界體系或國際分工的過程中研究空間的社會生產(King, 1984)。以及，關於在世界市場中的都市化與世界城市之研究(King, 1989a, 1989b) 這類研究在最近被瑟莎·羅(Setha M. Low)女士稱為比較歷史研究(Low, 1987)。我們同時也見到近年環境—行為論述中一連串的理论整理、檢討與反省工作的展開它一方面說明了環境—行為研究的前範型與多範型狀態，另一方面，它也是環境—行為研究論述上的再調整過程(Zube and Moore, 1987, 1989; Saegert and Winkel, 1990; Lang, 1987)。然而，歷史總是充滿了驚奇，也夠有意思的

<sup>9</sup>：關於現象學對環境論述的影響，除了造成環境—行為研究的範型轉移之外，對設計理論的影響也是相當根本的，對空間形式的基本哲學角度有重大的分歧，我們在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的轉變中會加以討論。

是：由福利國家向“戰利國家”過渡的情形中(Castells, 1985 : 32)，1980年代資本主義系統技術—經濟再結構下當今的高科技意識形態，不僅關心軍事的權力與經濟的成長，而且大幅裁減社會與都市的服務(Castells, 1984)。巨變當頭，環境—行為研究的命運為何？若是因社會兩極化趨勢而迫使國家將社會穩定性在政策中優先考量，那麼，社會規劃師與社會工程師又將站在專業之前列。若是因政治合法性危機而迫使國家的規劃過程容納市民的參與，那麼社會規劃要如何因應這歷史時勢。或許，這時環境—行為研究所首先質問的應不只是研究者、規劃師與設計師的立場，而是如何能有助於認識劇變中之歷史與社會。那麼，或許，這正是現實的世界在環境—行為研究的迷霧中開始呈現的時刻。真實的社會關係向我們迎面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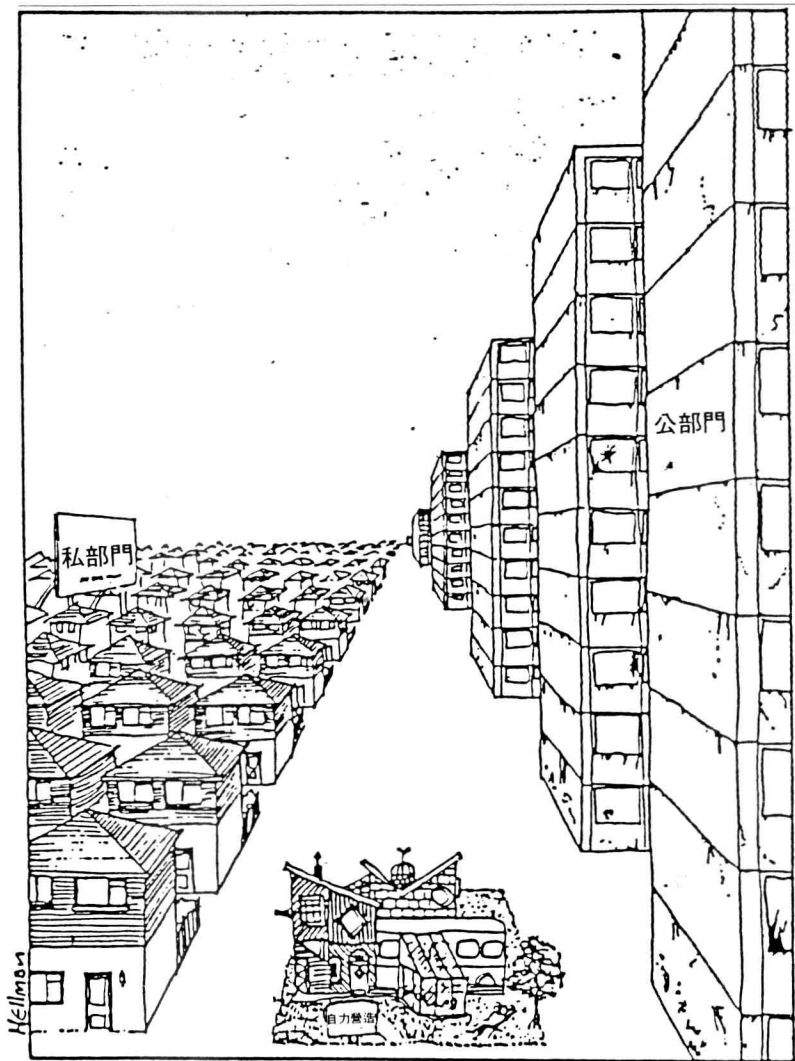


圖4-1 公部門、私部門與自力營造之非正式部門

(引自《Art and Design》，2月號，1986，p.5；繪圖：路易斯·海曼 (Louis Hellman))

## 第四章：模式語言及非正式營造系統的 認識論批判： 亞歷山大及其同志 \*

“革命正開始質疑的不僅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必需處以極刑。異化的社會必需由歷史中消失。我們正在發明一個全新的世界。想像力正在奪權。”

——巴黎，索邦，1968年5月

(引自 Dickson, 1975)

“幾乎每個人都感覺到與自然的和平相處：傾聽驚濤拍岸，在平靜的湖邊，在草地裡，在風吹過石南叢生的荒地上。到那一天，當我們再次學到了常道，我們將在城市中感覺到同樣的和平安閒，一如我們今天在海邊漫步，或是在平原之長草間舒展我們的四肢。”

——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 (Alexander, 1979 : 549)

### 一、導言

自60年代起，柏克萊加州大學建築系就一直被聯想成社會取向之建築的美國據點。在我們觀察柏克萊加大建築系的表現時，與其像《

\* 修訂前原文曾發表於《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學報》，第4卷，第1期，1989年2月，pp.49-65頁。

建築》雜誌的編輯那樣說：“在這知識戰場之中央，昂然矗立著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 (Shipsky, 1984: 54)，不如更確實地超越一個孤立的文化英雄形象的描述，來進一步度量亞歷山大的成就。亞歷山大的工作成果其實是一個特定社會、制度與歷史脈絡下的集體產物，換言之，是一個進步的建築理論家與一群同志在一起二十年努力的共同成果。亞歷山大所代表的觀點之發展可以由一系列的論戰、文章、書籍、與計劃案來了解，並可由晚期資本主義之空間理論論述之社會意義來追溯其社會根源。我們將審視社會上的一般性意識形態轉移對亞歷山大的特殊涵意：在 1964 -65 年左右思想上根本的轉移，以及在 1977-78 年左右進行的一種特殊的建築哲學上的發展。

#### (一)、1964-65 年之前的分析理性傾向

在美國，福利國家是 1930 年代社會與政治危機之後的主要回應之一。資本的積累及其正當性被整合在親成長的聯盟(pro-growth coalition)與福利國家兩種機制之中。經由對集體消費領域的干預，公部門的發展領導著積累過程。在這二十年之久的巨大資本主義成長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技術的意識形態之浮現：這種技術官僚的意識形態認為整個世界似乎已變為一種技術的問題，因而理性的答案都能夠應用上去。這趨勢也伴隨著一種方法論與理論的論述，它提供規劃師與設計者一種控制商品生產、流通、消費與管理的空間基礎。技術理性的形式與過程是支配性的。譬如說，這時經濟計劃成為國土發展的主要工具，取代了傳統實質規劃的地位。隨後，為了彌補經濟學家空間向度的忽視，導致了區域科學的誕生。區域科學根植於新古典經濟學，試圖將所有的事物數量化，以致對人文發展的課題顯得特別遲鈍(Misra, 1981: 26)。再譬如說，這時在規劃界取得國際性聲望的，與亞歷山大同屬柏克萊加大環境設計學院的城市與區域規劃系同僚，馬文·韋伯(Marvin Weber)為例，韋伯與唐·佛利(Donald Foley)、史都華·恰

賓(F. Stuart Chapin)等共同建構結構功能主義取向的規劃理論，將其應用為一種規劃上的規範性模型，而代表了將一種狹窄的、有特殊利益的觀點一般化為規劃的目標。英國的米爾頓·津(Milton Keynes)新鎮的乾枯、貧乏就是這種思想取向所造成之空間結果的例證(Cooke, 1983: 97)。同樣的氣候之下，在建築的領域中，為傳統美學所主導的、講究直覺的建築設計過程，也越發因其無能回應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性而受到嚴重的挑戰。這就是《形式綜合摘要》(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產生的歷史時勢。

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是在奧地利出生(1936年生於維也納,1938年德軍入維也納時隨父母逃往英國)，在英美受教育(在劍橋學化學、三一學院取得數學學位，却對劍橋大學的建築教育感到沮喪，然後在哈佛取得當時難見的建築學博士學位)。

他是塞奇·雪梅也夫(Serge Chermayeff)之《社區與私密性》(Community and Privacy)(1963)一書的年輕共同作者，1961年被選為哈佛學會(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之成員，完成其有名的論文《形式綜合摘要》(1964)，在馬文·曼罕(Marvin Mannheim)之麻省理工學院的土木工程系統實驗室做高速公路區位之研究(1960-63)。在印度工作了一年之後，在阿米達拜(Ahmedabad)印度國立設計學院工作，按其論文中所提之原則實際建造了一個村子，(Alexander, 1962/1963)，他在1963年接到了柏克萊加大的教職。這時，查理·摩爾(Charles Moore)掌柏克萊加大建築系，摩爾的開放態度與進步傾向自美國各地拔取了一批年輕但是有無窮潛力的教員。亞歷山大就在其中。

《摘要》一書是帶給亞歷山大世界性名聲的第一部作品。在這本書中，他試圖發展出一種類似科學的設計理論。設計過程的分析理性可以運用作業研究、線性規劃等等觀點做為工具，所以他被當做設計方法與電算機輔助設計領域的開拓者。他也被譽為是機能主義夢想的代表，這個時代的偉大頭腦，甚至是“建築界的維根斯坦”(the Witt-

genstein of architecture)(Banham, 1986a: 15)，亞歷山大可說是二次大戰後最具有影響力的建築理論家之一。在前述的歷史時勢之下，亞氏以笛卡兒方式研究設計問題的聲望可以說是建立在晚期資本主義凱恩斯策略的經濟成長歷史脈絡之中。建築風格若視為特定意識形態象徵性表現的話，對應著亞歷山大設計方法邏輯的正是現代建築運動所肯定的簡潔美學。這種支配性美學為工業資本所推動的營造生產方式所支持，其實是分析理性的感覺體現（而安東尼·高迪(Antoni Gaudi)就被英美為中心的建築史學者認為是現代建築論述之外的偏離的歧異者)。即使如此，我們仍需指出，亞歷山大的想法事實上比理性主義遠為複雜。例如，在《摘要》中，他在對“不自覺的過程”與“自覺的過程”之間的比較，已經蘊含了下一階段發展的潛能。

## (二)、在 1964-65 之後的人道主義社區設計者

在60年代，福利資本主義遭遇了麻煩。原來保證福利資本主義系統的擴展過程，居然正是使系統產生危機的相同過程。這些發展和危機的過程也同時是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一方面，所有凱恩斯模型本身的經濟活力與內部矛盾都以通貨膨脹告終。另一方面，社會政治過程則促起了新的社會矛盾與新的政治代價。所以，一些主要的社會運動粉碎了福利國家自由主義與親成長聯盟的整個社會與政治的安排，這也引起了經濟的危機(Castells, 1980; 1986)。因此，在60年代，以社區組織起來的都市動員造成整個美國烽煙四起。這些都市運動可以沿三條特殊的線索來理解：

### 1. 抵抗都市更新：

以一較理論的字眼來說，都市“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消費過程之需求為政府直接或間接地組織起來，這就是都市之公共政策。而都市更新計劃促起了鄰里的都市動員。少數民族與勞工階級的地區防衛性地動員了起來，同時擁有強大的文化認同感。

### 2. 激進的抗議運動：

沿著文化認同的線索，文化的組織發展出社區的組織，即，形成了在貧窮的少數民族之間團結的網絡。

### 3. 未預料到社區行動計劃(Community by Action Program)(CAP)的瓦解：

這是說，民眾的力量，或地方政治的自主性為聯邦政府所組織起來，原意為向地方政府施加壓力。然而，他們大部分都變得十分激進，社區行動計劃的策略變得遠遠超出聯邦政府的原意而無法控制(Castells, 1985)。

對這些新問題的處理，需要對人類關係之社會、文化與心理層面做更細緻的經理。它迫使規劃與設計活動產生一種有意義的重新調整取向，像：鼓吹式規劃、公民參與、分散式決策、社區設計等等。所以，這些是“人道主義”論述在意識形態的層次所呈現的相對體，它是與經濟精英主義以及技術理性主義對抗的意識形態與認識論(Scott, 1982: 146-147)。這些都市社會運動編織出亞歷山大觀點所孕育的歷史脈絡，使我們得以進一步在下面經由柏克萊的學院與區域性土壤來了解亞氏及其同志們所發展的觀點與行動本身。

在60年代末，柏克萊是個特殊的地方，這裡浸浴在學生運動的陽光與新鮮空氣之中，這種氛圍(milieu)被湯尼·華德(Tony Ward)稱之為“鮮花運動的虛幻幸福感”(1979: 15)。這種唯心主義的左翼對環境問題的活力表現了一種革命的烏托邦傾向(Castells, 1978: 1965)。伴隨著珍·賈可柏女士來自《偉大的美國城市之生命與死亡》(1961)，以及伯納德·魯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之《沒有建築師之建築》(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1969)，創造了一個建築學院中獨特的知識動量。在柏克萊的教授團中有一些關鍵性的同僚與亞歷山大的取向有無法明言的關係，像傑西·賴却克(Jesse Reichek)，一個馬克斯主義的畫家，他奉獻於結合所有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的課程講授，即，連繫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研究方法與環境設計；希姆·范德靈(Sim Van der Ryn)，他超越了自己早期對學生宿舍的社會

一行爲研究而致力於自足的環境生態學式的場所；蘿莎琳·林罕(Roslym Lindheim)，一位社會取向的女性建築師，及一位環境保健、醫院設計與計劃書製作等方面的研究者；山迪·何遜(Sanford Hirshen)，一個長於低技術集合住宅，曾參與於秘魯集合住宅案等的設計師。在他們之中，賴契克爲環境結構研究中心的早期董事之一<sup>①</sup>，范德靈與林罕則曾爲中心的早期夥伴，而何遜則與亞歷山大於秘魯平價住宅案中共同合作。

此外，我們也可見到一些一般性的區域影響，像：區域性的文化、反文化的設計師、以及由所有人自己爲營造者、約翰·透納(John Turner)之自助式住宅觀點等等，共同襯托出了亞式研究方法的輪廓。

(1)關於地域性的文化：美國西海岸、加州的文化混合，雜合了所有西班牙的、亞洲太平洋的、美洲原著民文化，對支配的資本主義理性提供了一種文化上的補償，褪解了東岸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嚴肅包袱。

(2)退隱的營造者：由於1967到1977年之間世界性的衰退造成青年設計師失業，也因此造成60年代末的許多反文化的退隱營造者的激增，他們在舊金山以北的鄉間建造他們自己的手工製造的住宅。這是一種非正式的營造活動，被稱爲“法外營造者”(Ward, 1978; 1979: 15)。他們關心反文化的課題尤甚於對一般性的住宅服務的追求。這種由自己營造的居所之自然的、親切的、敏感的空間，表露出一種對現存技術工業資本主義中的有敵意之環境的另類替代選擇。

(3)自助式住宅：約翰·透納由派德羅·巴斯蘭(Pedro Bethran)，1954年在秘魯利馬的構想中獲得了啓示。這是經由一種土地入侵與自建住宅來動員無家民衆的一種迷人的策略。約翰·透納認爲第三世界不需要正式的住宅，而轉身向一種無政府主義式的自助住宅再三致

<sup>①</sup>環境結構研究中心的董事有：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威廉·柯布蘭茲(William K. Coblentz)、馬丁·梅爾生(Martin Meyerson)、傑西·賴卻克(Jesse Reichel)、威廉·惠頓(William L. C. Wheaton) (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67a)。

意。透納斷言自助式住宅遠較正式部門的住宅優越，因為窮人爲他們自己營造，滿足了他們的需要，在文化上也自由地表現了他們自己 (Turner . 1972; 1976)。

在上述之基礎之上，亞歷山大及合作同志之成就可以經由實踐與理論兩條主線的互動關係——即實務案件與理論著作兩者——來加以闡述。理論著作包括了文章、書籍與其他出版——特別是與論戰有關的文字。

在 1964-65 左右，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有了一個微妙的轉變。由 1964 年一個針對灣區捷運車站的概念設計案 (Alexander, King and Ishikawa, 1965)，以及對他從前的數學式分析的告別宣言：〈城非樹〉 (A City is Not a Tree) (1965a) 共同表明了這個轉變的起點。〈城非樹〉一文，不僅成爲規劃與設計界的經典之一，而且代表了對人爲的、僞科學的、現代規劃、設計與工程實例中潛藏著的樹狀結構發動攻擊。

一個更複雜的、要求機能重疊的、半格子結構於焉開始著手。一系列的文章，像〈由一組力量到形式〉 (From a Set of Forces to a Form) (1966b)，〈環境結構的原子〉 (The Atoms of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Alexander and Poyner, 1966)，以及〈產生系統的系統〉 (Systems Generating Systems) (1966) 等，均陸續發表。超越了在《摘要》一書中的“不吻合變數” (misfit variables) 的觀點，一個新的、動態的過程與解答被提了出來。原子，或者說力量，被描述爲這個過程與解答所必要的幾何關係。這也就是說，這些關係從一組規則產生出來。

於是，所有的影響及其輸入都集中於柏克萊的小型工作團隊中。1967 年三月，亞歷山大創立環境結構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② 作爲一處匯集同志的基地 ③。這個中心是集

② 環境結構研究中心是一非營利的組織，爲了研究環境的模式語言而設立。研究中心獲得由標準局及考芙曼基金會 (the Edgar J. Kaufman Foundation) 所捐贈的創立基金。

③ 這些同志們，像莎娜·石川 (Sara Ishikawa)、墨瑞·西維斯丁 (Murray Silverstein)、



體操作的基地，它的目的就是尋求一個新的設計理論——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

然後，〈城市是維繫人類接觸之機制〉(The City as a Mechanism for Sustaining Human Contact)(1967c)以及〈社會及心理要求所需的環境形式之主要改變〉(Major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Form Required by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s)(1968)所顯示的不僅是亞氏與環境一行為研究間早期的互動關係，也是“幾何模式”的芻形，這些幾何模式支持人們對社會變遷所做的努力。按照亞歷山大的看法，城市為一種實質的系統，是文化的具體表現。城市規劃是一種文化的設計。所以，他界定模式為一種新的文化制度，由主要的空間與政治變遷來支持。至此，在《摘要》中的“圖解”(diagrams)，以及後來的“傾向”(tendencies)(Alexander, and Poyner, 1966)，已經發展為“模式”(patterns)了。

模式語言首次出現在針對一個紐約市多目標服務的社區中心計劃案的模式圖解(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68)以及祕魯利馬的平價集合住宅的示範性實驗計劃案中(Alexander, et al. 1961)。模式由一種像語言一樣的規則系統所產生。然後，對亞氏言，模式是一組複雜的實質關係，它解決了一小組系統的衝突力量，但仍然還不是一種語言(Grabow, 1983:54)。在同樣脈絡裡，在1971年的一次訪問之中，亞歷山大已經明白地拒絕設計方法，並嚐試探索“地方創造”(place making)的實體課題。他開始追求一個在異化了的現代環境中完全失去了的深層感覺(Alexander, 1971)。

自1973年起，模式語言的主要部份已經形成了。例如，在1974年

麥克斯·傑可布森(Max Jacobson)、英格麗·費克斯達金、(Ingrid Fiksdahl-King)、須拿摩·安吉爾(Shlomo Angel)、哈林·阿布德哈林(Halim Abdelhalim)、霍華·戴維斯(Howard Davis)、葛雷·布雷克(Gary Black)、漢斯何泰·尼斯(Hansjoachim Neis)、以及阿特密斯·阿尼諾(Artemis Anninou)等等，都是既懷有相同理想，又是專業上十分傑出的工作者。尤其以上列名中之前面數人，她(他)們在亞歷山大初到柏克萊時即因志同道合而參與工作，年歲接近，甚至長於少年得志的亞氏，所以形成了一種平等的工作關係，對於模式語言的發展與形成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他發表了兩篇處理建築物營建的文章(Alexander, 1974; Alexander and Jacobson, 1974)；有些理論的部份以一個過渡階段的形式發表：如〈環境〉(The Environment)(1970) (這是《營造之常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 原來的書名)，以及一個摘要——〈一九七〇年營造之常道的早期概要〉(An Early Summary of “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 1970) (Alexander, 1974)；有一些透過反技術官僚的“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之實務案件表現了他們的觀點與政治傾向，即，朝向一個更民主的環境設計過程(Alexander, et al. 1973; Alexander, 1973; Alexander, Davis, and Abdelhalim, 1974)。

最後，自 1975 年起，一系列有連續性的書籍出版了。它們比較完整地表明了這個經歷十年之久之集體努力的成果。迄今為止，它們包括了：《奧立崗實驗》(The Oregon Experiment)(Alexander, et al. 1975)，一個強調使用者參與和小規模零星成長，而由模式語言來主宰的校園規劃；《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77)，以經驗為基礎，使地方具有一種深層的、活的品質。這本書許多人譽之為“建築界最重要的書”(例如，希姆·范德靈，見卡拉哈(Gallagher)1986: 30; Ward, 1979: 17; Shipsky, 1984: 61; Callenbach and Brand, 1981: 217)。以及，《營造之常道》(Alexander, 1979)，在一系列建議——《模式語言》之後的哲學，這個論戰性的哲學處理“無名的品質”的“圓滿性”(wholeness)，它用來整合片斷的、劃分為細小單位的模式語言。

簡言之，《模式語言》代表了亞歷山大及其同志們在這階段主要的集體成就。它是一個社區設計的宣言，一個關乎人道主義美夢的皇皇巨著。

### (三)、在 1977~78 之後的玄學唯心論者

在 1970 年代世界的經濟危機之後，凱恩斯模型的舊結構已經改變

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系統正在形成。這就是在危機之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結構過程，即，一個關乎積累及管理這積累的，新的社會經濟模型。在這個過程中，至少有些元素必需被連繫上亞歷山大研究方法的脈絡組織上。例如，非正式經濟的發展意謂著國家所中介的勞資間關係的轉化。同時，技術在這個特殊的經濟模型中扮演著在執行工具方面的一個決定性角色。

然而，在這個階段，亞歷山大却遁入其個人的世界。這裡至少有兩條路線是在以模式語言研究途徑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發展。第一條多少是較社會與政治的。模式語言在一種參與的過程中來連繫空間形式與社會因素的差距，以及是一種空間形式方面的溝通語言來填補設計者與社區居民間的差距。莎娜·石川試圖在柏克萊加大形成社區設計的課程(Ward, 1979: 17)，自1978年起在奧克蘭的社區設計團隊(CDC)就是這方面實務的代表之一<sup>4</sup>。

第二條路線涉及亞歷山大自己。亞氏最近的努力集中於關乎哲學方面的研究方法，和一種替代性的營造生產系統。我在下面加以闡述：

其一，當然，亞歷山大的論戰性的、理論的陳述，混雜了老子、禪、心理學、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對深層結構的觀點、蘇馬克(E.F. Schumacher)的中間技術的觀點、十九世紀晚期藝術與手工藝的進步運動(Banham, 1986a: 15)，以及參與性的民粹主義(Tzonis, 1985: 63)等等，它自然在當前的時刻遭遇了數不清的挑戰。他被稱為建築界的卡林·吉伯侖(Kahlil Gibran)(Filler, 1983: 56)。但是他的新論戰、理論突破仍不斷產生，以及實務案件仍然持續進行。在關於價值的課題上，亞歷山大與尚皮爾·普拉生(Jean-Pierre Protzen)——一位柏克萊建築系的實證主義設計方法教授——之間曾有過激辯(Alexander, 1977; Protzen, 1977)。在感覺與和諧的課題上，他

<sup>4</sup>社區設計團隊(Community Design Collaborative)為一建築與規劃的事務所，成立於1987年秋。它的主要創始成員為坎·西蒙(Kenneth Simon)、莎娜·石川(Sara Ishikawa)、劉可強(John K.C. Liu)、哈林·阿布德哈林(Halim Abdelhalim)以及維哥斯·史崔(Virgus Streets)。

與彼德·艾思曼(Peter Eisenman)在哈佛辯論(Alexander and Eisenman, 1984)。此外,近年還有幾本新書不斷出版:《靈芝咖啡屋》(The Linz Cafe) (Alexander, 1981),爲了在奧地利的一次國際展覽而建的建築物;《住宅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Houses)(Alexander, et al. 1985),在墨西哥之墨西卡里地方的自建式的、第三世界集合住宅案;以及《都市設計的新理論》(A New Theory of Urban Design) (Alexander et al., 1987),試圖以一新的辦法來重新捕捉過去的城市所具有的有機整體的圓滿性。亞歷山大要求使用者參與營建過程之中,而不僅是一個顧問而已。他也試圖超越人道主義的知識與精神的包袱,認爲它們是“有張娃娃臉的人道主義”、“小就是美的嬉皮式人道主義”,“保護得很仔細的加州景緻”(Alexander and Davis, 1981b)。就像他過去超越分析的理性主義一般,亞歷山大也超越了人道主義。繼續將《營造之常道》往前推進,將一些新的材料陸續加入。例如,由哈林·阿布德哈林之論文所提出的“中心”的觀點(1978)。現在,“中心化的過程”,被亞氏視爲一個比模式語言更周延的秩序。一本書名稱爲《秩序的性質》(The Nature of Order)的新理論著作正在處理之中(Alexander, 1985)。簡言之,在某個程度上,一個接近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現象學路線的玄學式的研究方法(Fisher, 1986: 102)被採用來處理空間的實體。他考慮深層結構的存在,但也多多少少是經由一種對整體、圓滿性質的先驗主張的本體論研究方法。

對另一方面言,順著秘魯案與墨西卡里案等的實務經驗,一個新的營造生產系統在發展之中。由於在日本東京外緣(埼玉縣入間市)的盈進學園東野高校於1985年落成。亞歷山大這種建築師—承包商的角色激怒了大型的日本營造公司。亞歷山大挑起了非正式營造系統(即直接經營的)與正式系統(即由既得利益的現代大營造公司與建築師組成的)之間的一場戰鬥(Alexander, et al. 1985a)。

此外,即使現在他的興趣轉移至玄學的本體論,亞歷山大的寫作

可以說仍然是單刀直入的，是建築寫作中對清晰性方面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或許，部分是因為其早年的科學訓練，部分是因為英美的思考模式使然。這個寫作形式促成了亞歷山大觀點的傳播與影響力。

總之，亞歷山大的理論、論戰的宣言、以及實務是一種尋求“中心”品質的方式，即，空間的圓滿性，無名的品質。這品質可以經由使用者直接的參與過程以及經由看到建築物潛藏著的深層感覺而實現。它導致對今日營造生產組織的激進挑戰。亞歷山大已經在世界觀上挑起了革命，但是却是在建築領域之內的革命。史提芬·葛拉伯(Stephen Grabow)認為，這正是在“尋求一個建築的新範型”(Grabow, 1983)。

## 二、空間形式

形式的課題是亞歷山大早期的目標。然而，他將空間的形式與設計的過程放在一起處理。按照亞氏早期的觀點，建築的形狀是具體的與人性的，而非抽象的。“形狀的關鍵品質…在於其組織(organization)之中，當我們以這種方式思考它時，我們稱它為形式(form)…我相信我們對建築形式的感覺，假如不能首先由設計過程學得一種可供比較的感覺，我們永得不到一種可供比較的發展秩序”(Alexander, 1964: 134)。這也是了解他是如何關心空間形式之主客體關係與形式價值關係的基礎。

### (一)、主體與客體之關係

葛拉伯提及，由於自然科學的背景，亞歷山大掙扎了許多年尋求一種客觀的、普同的形式，它意謂著一個對所有幾何形式的一個一般性的數字表徵。然而，他逐漸轉移到一種同時考慮客體與主體的有本體論色彩之美學立場(Grabow, 1983: 64-65)。

按照亞歷山大的說法，一事物的美，並不純粹是它看起來的樣子與形貌，而是在其存在之中。“它必需考慮它是如何存在著”。然後，

在這兒進行的不同事件間的關係會變得更根本些(Grabow, 1983: 56)。我們可以覺察到一種未明言的海德格式的現象學影響，世界是人存在的一種本體論之決定。人存在所具有的實有特性——存有於世 (Being -in-the-world) 拒絕了空間的主客體關係的對立性考慮，而是居所 (dwelling) 的留駐，人存在的居所表示了不同人存在的聚合 (togetherness)，這就是“中心”，人存在的本質。因此，他認為模式語言不僅僅是事物的模式。

關係的模式由規則來產生。然而這個規則的系統是生產性的結構 (generative structure)，而不僅是文法的規則<sup>5</sup>(Alexander, 1979 : 181)。首先，模式語言不像是生產性的文法 (generative grammar)，而像是語意學的结构 (semantic structure)。這個結構將模式連結起來為一模式語言，像語言的結構存在於字與字之間的關係中，即語意學上的連結。他們也是語言的“真實”結構，即使它們很難描述。其次，模式語言不是一種實證主義的概念模型來解釋何種功能在進行。這些模式語言是生產性的結構與形態學上的規則，在現實世界中界定模式。雖然必須由推論來發現模式，它們却是存在現實事物之中 (Grabow, 1983: 45-50)。然而，亞歷山大永不試圖連繫一種人為環境自主性的語法學。這就是說，他的分析不是在於辨明空間的抽象與幾何結構，而是去界定人類的事件，而同時將其連上空間的形式 (Kotsiopoulos, 1982 : 69)。

環境的結構能被辨明與描述，像合適性的優點、脈絡的豐富，或形式的圓滿性等屬性。亞歷山大經由描述某種美學品質，它同時結合了主體經驗與幾何形式來陳述美的課題。亞歷山大拒絕藝術作品的自主性，因它們宣告其本身的美學品質獨立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外 (Grabow, 1983: 63-64)。

<sup>5</sup>順便一提，或許，這是為何亞歷山大拒絕了米契爾 (W.J. Mitchell) 在電算機輔助設計方面所運用的形式幾何上的分類，而把米契爾式的研究取向當作是對建築的一種法西斯主義的研究方法。米契爾的研究取向中忽略了人，以及，它提供的分類學是一種迫使人們發言的壓迫性權力論述的一部分，參考第六章。

對亞歷山大言，設計或者營造之生產情境中，重要的是生產者或使用者去感受在他們自己之中的中心。人存在的相互接近的根本趨勢是聚在一起，它不在於表面客觀距離之遠近，而是關切的中心性程度。中心化的過程追求空間的圓滿性。這個無可名狀的品質是真實的，人們能感覺到舒服。簡言之，中心化的過程與無可名狀的品質要求一種主體與客體的統一，經由審美經驗與對象間的統一，而獲致一種圓滿性。這部分我們在下節“中心化過程”要求的事實與感覺的不可割裂時還會再談到。

事實上，人存在之感覺的不可度量之深度是建築的核心所在。這也是為何亞歷山大總是談到存在之“感覺”，而拒絕了後現代主義建築的紙板風格(Alexander, 1983: 6)，以及厭惡彼德·艾思曼所提出的：作品的本質是“理念”。對亞歷山大言，以上兩者都不過是知識上的遊戲，甚至會把世界搞得一團糟(Alexander and Eisenman, 1984)。在相同的脈絡之下，亞氏認為所謂的現代建築的大師作品，基本上都是些做來“供人看”的東西。對亞歷山大言，這些建築師似乎都是自戀症患者(Grabow, 1983: 65)。

## (二)、形式與價值之關係

亞歷山大曾在一次論戰的宣言之中處理價值的問題。或許，闡明亞氏研究方法最好的方式是與其理論上的對手——新實證主義——平行觀察，來顯示亞歷山大理論上的假設，來突出其爭論的要點，來表白其規範與實體理論所潛藏的社會承諾。

一方面，亞歷山大的理論對抗的是新實證主義的學術霸權，從笛卡兒(Descartes)，萊布尼茲(Leibniz)到康德(Kant)的世界觀。這些觀點認為“價值是純粹個人的、文化的，而不是與事實以深刻的方式相連結著的”。科學事實是關於價值中立的事情，換言之，這模型將價值看做是一純粹個人的事。它們認為“每個人的價值都是有趣的、非常重要的，但却是武斷的東西，並未連結著事物的結構”。這就是被稱為

“多價值”模型的多元主義研究途徑(Alexander, 1977b)。簡言之，亞歷山大拒絕了相對主義的倫理學。

另一方面，亞歷山大似乎試圖超越與有意躲開海德格與納粹間連結的疑慮(Gerratana, 1977)。試圖避免哲學上與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神學連繫的可能，他相信能發現一種可分享的價值的共同基礎。首先，他確認文化的豐富性，然後他要求每個人都更加真實地變成自己。換言之，這有賴於深層感覺與深刻滿足的真實性(authenticity)。事實上，這是對結構與本質的根本的、理論的假設。他說：“在我們所有之中，都有這些元素，水、空體都十分相似，與我們外顯的喜好的差別無關（例如是喜好電視、漢堡、還是棒球），而是與我們的本質有關，與我們獨特的明白清晰性有關，我們所經營的與神的虛體相聯的程度” (Alexander, 1977b: 3)。

進一步，多元論的模型可能僅在理論上沒有問題，但是亞歷山大所爭論的關鍵在於理論與實踐之間對價值的一致性。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一方面，多元主義的規劃師與建築師必需面對價值判斷的兩難。價值中立的系統必需接枝到多價值的模型上。結果，這個多元論的模型的深刻程度不足使生產者確實面對它自己的感覺，而這深刻的感覺却是打動人心的偉大作品生產時所必需的元素。於是，多元論只能生產出今日的混亂。這個新實證主義的觀點為多元主義的規劃師、規劃理論家、都市設計者、以及一流的職業建築師所擁有，“他們做些他們自己都不十分相信的東西，爲了金錢、爲了名譽、或者是爲了業主要什麼而做…，簡言之，這個爲每個人所持有的觀點，並非基於其行動，這行動，全然地、全面地基於其感覺的領域” (Alexander, 1977: 3)。這正是在實踐方面實證主義理論的貧困。

另外一方面，亞歷山大提出一中心價值模型，“價值與事實是一體的，我們確認有一中心價值，可經由感覺來面對…它與事實深深地相關連，以及形成一種單一的，不能分割的世界圖象，在其中能得到有生產性的成果” (Alexander, 1977b: 6)。所以，在亞歷山大所稱的“中



心化過程”之中，在事實與感覺、事實與價值之間沒有割裂分離。

最後以及最重要的，在多價值模型的支配下，人們不願意對任何事物採取任何最後的立場。或者，你確認某些事情是不同的，然而你不會以及不能改變事情，因為對與錯的判斷是不被許可的。事實上，晚期資本主義的多元論在意識形態層次上意謂著商品交換價值所需要的多重觀點。至於對關乎生產關係的，私人資本追求利潤的基本邏輯，却完全沒有其他的選擇。多元論的著眼點考慮的是在既定社會結構中分享權力的可能性，它制度化了某些社會支配的形式，接受在這些形式中討價還價的規則。然而，在另一方面，市民社會存在著社會運動，它們不侷限於遊戲規則，不自囿於支配性的價值觀及規範的制度化，因此成為社會革新動力的原因，推動社會結構與價值的轉化。簡言之，社會運動是來自市民社會的挑戰，動搖國家制度，這個國家制度正是強化規範、造就價值及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Castells, 1983b: 294)。這關係著資本主義社會語義系統上的支配關係，霸權(領導權)(hegemony)與反霸權的戰鬥。對亞歷山大言，他在60到70年代抗議文化的土壤中拒絕了多元論支配性霸權。相反的，一元的中心價值模型提供了允許嚴肅討論、允許可分享的準則、以及造成進步的協議之共同基礎。那麼，問題是什麼是亞歷山大所堅持的中心價值呢？他追求的是鄰里中的政治過程，以他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來塑造鄰里；這是一種營造生產的過程，它提供了一種手藝人所具備的特質，能製造深深感動我們的地方(Alexander, 1977: 7)。

###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在《摘要》一書中，“形式與脈絡組織間的關係”已被當做是一基本的設計問題了。對他言，“形式是對問題的解答；而脈絡則界定了問題”(Alexander, 1964: 15)。這也就是說，當他處理設計形式的時候，真實的對象並非單單是形式，而是形式與其脈絡的關係。我將在兩個層次上來闡明他如何做到這些：文化脈絡與形式，以及社會關係與形

式。

### (一)、文化脈絡組織與形式

按照亞歷山大的說法，文化脈絡與形式間的關係，必需由設計理論的內在動力或營造的實體來考量。他提及風格的課題為幾何與技術兩者之互動所造成。

#### 1. 所有的營造都為組織空間的一組力量所塑造。

這也就是說，一系列幾何原則就是關鍵主要的關係，它將空間界定在一起，以及使地方具有無名之品質，或者，使事物圓滿。此外，空間的結構被當做像一互動的中心之場域所生產的圓滿性所創造出來(Alexander, 1983: 6)。在這過程中，你確認中心以及強化中心，當你感覺到你自已，以一事物回應另一事物時，來尋找中心(Shipsky, 1984: 57)。這個過程也是一種獲得工匠技藝品質，或者說，匠藝(craftsmanship)的技能。最後，這些幾何原則是不變的。他們獨立於年代、文化或風格之外(Alexander, 1983: 6)。對亞歷山大言，這就是營造的事實。

#### 2. 風格是種東西，使人們體驗到在不同年代、文化與區域中形成中形成的一般語言之差異。

經由在每一年代、文化與區域中，處理材料、技巧、工具與社會組織的過程，人們有一定的方法來生產“地方”，或“中心的場域”。

所以，在不同“技術”——不同的生產的方法，以及永久的“幾何”——永恆的空間結構之間的互動，創造了我們所覺知的地方之風格(Alexander, 1983: 6)。

對亞歷山大言，當然，他認識到不同的風格也是為文化所創造的。他也承認在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然而，對他而言，這是細微的因素。這些文化的差異能在不變的幾何結構中完全地解釋，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原型之中心”。任何圓滿的地方，在一個既定脈絡中擁有無名品質的地方，都對這文化適合(Alexan-

der, 1983: 6)。模式語言被期望為與生活方式相連貫一致的圖繪，為一種文化的圖繪。環境為意象的結合系統所塑造，即，一種可分享的模式語言(Alexander, 1974: 59)。

對亞氏而言，使不同的環境能夠辨認是在於其形態法則的特殊集合：在空間類別之間，空間關係無窮盡重複的系統(Alexander, 1974b: 54)。一方面，事件的模式與空間中的特定幾何模式相互扣合。它們是一個城鎮，或一種建築物被製造的原子與分子。這也是城鎮與建築物的基本結構(Alexander, 1979: 81-82,90)。另一方面，這些模式是正確的，在不同脈絡下則或是不正確的。然而，這個中心化過程的一元價值模型，使這些模式有種完全表達、討論的來源，以及一種辯論、批評的基礎。所以，營造實踐的規範性的、實體的理論是亞歷山大理論論述的核心。對亞氏而言，價值本身是絕對的，我們所界定的倫理價值容或有不清楚之處，關於價值的感受與認知等確在變化，但却不能動搖倫理價值，這是屬於質的範疇。

當邁克·格雷夫(Michael Graves)質疑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亞歷山大提出的是建築的內部語言，但是建築也是象徵的外部語言，是一種文化的發明，一種發明的語言——是我們稱之為‘藝術’的東西——我發現主題方面有所不足。我希望他能兩者兼顧”。一點也不奇怪，對這種精英文化的“象徵創造”與“語言發明”，亞歷山大的回答是：“我強烈反對這種必需發明形式—語言的說法。他幾乎使藝術與武斷的藝術相提並論。而我是試著在現實中再找出形式—語言，由事物的真正實體中將幾何找出來”(Filler, 1983: 58)。

## (二)、社會關係與形式

一般而言，考慮實體理論的人經常留心建築本身的具體本質而非社會與文化差異。例如，克里斯欽·羅伯·修茲(Christian-Norberg Schulz)拒絕了阿莫士·拉普普(Amos Rapoport)之壯麗傳統的紀念性建築與民俗傳統的地方性建築物的類別。對他而言，這不是不同種類

的建築，而是不同的情境下所要求的對人類需要的不同解決方案(Norberg-Schulz, 1979/1980: 5)。就像在前面所提過的，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是一種營造實踐的實體與規範性的理論。此處，我將其當做一種程序性理論來檢驗，即，它如何在模式語言的執行過程中去處理形式與社會關係。這是個人及社會均可共享的模式語言的演化過程。

對亞歷山大言，要使所有居民都能主動地參與至模式語言之演化過程中，環境才變得圓滿。這要求一個能為居民共享的模式語言。然後，能為公眾分享的模式才僅僅是資源而已。每一個居民都感覺到它的語言是個人的也是必要的。可分享的模式語言之演化過程事實上提供了一學習與溝通的架構。它就像我們語言的文法規則與語意結構，它既是個人的，又是可分享的(Alexander, 1974: 58)。有時候，假如必需的話，計畫案為工頭師傅所指導，他扮演統籌者的角色，提示啟發，以及提供批評資訊的來源(Baldwin, 1986: 85)。所以，前述邁克·格雷夫所擔憂的發明與模仿的問題，根本不是在社區草根文化中之模式語言執行過程的課題。因為這是紐約的文化精英，在文化中心發佈意識形態訊息時所關心的。建築的任務是藉著“藝術”回贈現實一種使現實看起來自然而恆久的想像之聯貫性。因此，文化語言的發明意謂著就不只是營造知識和設計觀點而已，它還特別涉及象徵化、神話轉換、品味、風格與流行的整個過程(Porphyrrios, 1985: 16)。亞歷山大與格雷夫間的衝突其實是草根文化對抗文化中心霸權的抗拒表現。

最後一提的是，每一個模式都不應該在一種抽象的情境中來處理。它要求重新使用，在一種更微妙複雜的過程中重新調整：“和諧不僅是你自己的產物，而且是周圍的產物…對一個地方和諧的不見得對另一地方也如此”(Alexander and Eisenman, 1984: 16)。對他自己言，在最近為日本一棟十層公寓的設計，亞氏的原始模式——“四樓高限”，在日本這個不同的行政管理與人類組織的脈絡下做了重新調整(Filler, 1983: 58)。

## 四、應用層次

評論家馬丁·菲勒(Martin Filler)在一篇介紹亞歷山大建築物設計的文章中提醒我們“亞歷山大營造之建築物可能比他那有時候顯得有些拘謹的理論還要更富有生氣”。事實上，亞歷山大自己也覺得，他自己寫作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爲了要去營造，去達到一種狀態，使建築美麗、充滿了感覺、變成它本身需要有的樣子(Filler, 1983: 58)。所有亞歷山大對理論工作的努力是爲了營造實踐中應用的目的而努力。以他自己的描述，他最根本的努力是“範型的轉移”，在建築領域內的革命。這個亞歷山大所點燃的戰火可以由兩個層次來闡述：一個新的設計理論，以及一種新的營造生產方式。

### (一)、新的設計理論

“假如你要做一朵活的花…你會種下種子。假如你要設計一朵新的花，你會設計種子，再讓它生長。環境的種子就是模式語言”。

——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Alexander, 1974: 59)

亞歷山大致力於對既有設計方法的激烈改變。模式語言不僅涵蓋了不同尺度的環境：城鎮、建築物與營建，而且易於被不同人、設計師或非設計師所分享。模式語言是環境產生的過程。假如你喜歡生產一個地方，你由你的模式語言開始。你以模式語言的方式來種植你的種子，而它還要能爲其他人共享。事實上，在亞氏所提議的新方法中，設計過程已變成爲空間生產的參與過程。

將設計理論當做設計過程處理，亞歷山大研究方法有兩個主要特

點，我們在前面已經分別提過，現在把它當做一種指導設計的“理論架構”在下面再度強調一次：

### 1. 設計的實體

亞氏強調環境的真實感覺，即，主體與客體統一的存在感覺。換言之，感覺常是模糊的，但却是主動積極的。當你感覺到你自己以一件事物來反應另一件事物，這就是你所要找的中心的所在。這是一個你能改善你覺察與強化中心的能力之過程。這個過程加強了環境的圓滿性。這種圓滿，他稱為“活的”或“無可名狀的品質”。這是地方生產過程的特殊性。

### 2. 價值與設計

不僅拒絕了實證主義價值中立設計方法，亞氏甚至不贊成多元論的洗腦：人們在如此全然不同的角落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從事。他批評這是環境混亂的哲學根源。為了使事物做的更好，他建議中心價值之模型。對設計者言，找到價值與事實為一體是很必要的。中心價值模型提供了一種處理真實感覺結合的基礎，人們做他們確實相信的事物，不是為了金錢，為了名譽，也不是因為業主要求(Alexander, 1977b: 3)。事實上，以他的價值判斷言，亞歷山大的偏見既不比我們多，也不比我們少。

他的設計理論，潛藏著一種激進的世界觀，要求一種對應的、新的營造生產方式(mode of building production)。他確實是鼓吹一種有強大解放力量的世界觀，但是，是在設計過程之中鼓吹一種新的世界觀。

### (二)、新的營造生產方式

亞氏向一種不同的技術再三致意，期望給設計帶來整體的秩序。此處，技術有一更廣的意義，它是做東西的確定方式，它適應幾何的需要。這是說，材料、技巧、以及生產過程中之人類組織必須在營造基地上發生(Alexander, 1974b: 58)。它不僅是一種世界觀的改變，它

是兩種不同世界，不同社會的研究方法的衝突(Alexander, 1985b: 35)。簡言之，這是社會革命而不僅是建築的革命。在一次最近的訪問中，亞歷山大不認為他的建議提出了社會革命或一種營造基礎結構的變革。他僅僅斷言“改變營造所潛藏的現實。”然而，目前他所提出的說辭似乎並沒有給自己太多的選擇餘地(Viladas, 1986: 92)，因為，一個新的營造生產方式的改變其實要求的是一種更廣泛深遠的改變，而無法僅僅限於是建築論述的革命。

一個革命的哲學經常會兩難地太原始，又太烏托邦。當然，對一個社會中的專業者，如建築師，亞歷山大的研究方式肯定是相當地不切實際。然而，假如一經妥協，亞氏的作品就會失去了其大部分的力量與魅力，因為他的視野指引了吾人之空間與社會方面深長的變革(Buchanan, 1981: 331)。或許，我們無需將社會革命與建築革命極端對立。一個認識論的批判可能有助於釐清這個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在當前保守的年代中，在言詞上自我退縮於建築專業分工所限制的論述之中。這就是我在下節所要討論的。

## 五、認識論的批判

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不僅僅批評了現代建築抽象語言的空泛，以及後現代的歷史意象缺乏內在力量(Alexander, 1983: 6)，而且，對它們所依仗之建築理論的貧困深惡痛絕，因為它們未能挑戰建築與社會潛藏的結構。亞氏察看形式的深層問題，專業，以及生產系統。亞氏研究方法的陳述是流利的，論戰性的，特別針對建築實體，但却非一種社會理論。為了達到理論深度，一個周延的空間理論需要將其實體的、規範性的枝條，接連上政治經濟分析的巨幹。換言之，在一個更廣的社會與歷史的理論架構中來進一步重組是必要的。所以，一個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批判就是首先要去做的事了：

### (一)、神祕的結構與空間的意識

按照亞歷山大的說法，他試圖去看到一個地方中所潛藏的圓滿性，即空間潛在的實體本質。在其對結構的定義下，有四條主要的線索：

**1. 結構是一種有生產潛力的過程。**

這就是說，生產的結構(generative structure)是一種過程的潛藏的機制，而空間形態之規則深埋於其中。空間的美在其存在之中。

**2. 空間的潛藏結構經由互動的中心來感覺到。**

地方創造了圓滿性，使用者在他們自身之中感覺到中心。這就是說，真實的品質能經由美感經驗與幾何形式而被辨明。換言之，空間的實質本質能經由尋求一個地方無名品質的中心化過程而描述。

**3. 潛藏的結構支持了一組不變的幾何原則。**

我們看到某種實質元素無窮盡地重複著，以一種有無窮變化的方式結合著。然後，空間的結構由關係的模式所組成。進一步，有一組界定得相當完全的規則，結構著空間，創造圓滿性與地方的品質，以及生產互動著的中心場域。最後，最有爭論性的，這些幾何原則不因年代、文化、以及社會而改變。既然每一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原型的中心，任何地方都在其脈絡中有其圓滿性與品質，以及深層滿足的真實性。

**4. 潛藏的結構提供了單一中心價值模型的共同基礎。**

在同樣的脈絡中，在我們所有人之間，存在著十分相似的本質。價值是深深地與事實相連，價值與事實結為一體。再強調一次，可分享價值的共同基礎是必需的，但是它植基於一種深層的感覺之中。

現在，對我們言，在分析空間形式時，人們無法由常規的自然科學的工具方面得到幫助，像顯微鏡與化學試紙，而是藉助於抽象力。了解空間的實體經常是最困難之所在。我們必需超越經驗主義的認識論障礙來處理潛藏結構像幽靈一般的對象性(objectivity)，而不是將實體神秘化，淪為一種澈底的內在哲學，將一切意義都依靠人的存在。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確是有一些神秘難解之處和一些意識形態的盲



點：

### 1. 人類能力的天賦論(Innatism)：

按照亞氏對結構的定義，其意識形態的盲點為：什麼是原型的(archetypal)？(Ward, 1979: 17)雖然亞歷山大已經試圖超越諾姆·杭士基的生產的文法(generative grammar)，代之以文法規則與語意的網絡(Grabow, 1983: 50)，然而在亞歷山大的“原型中心”之不變的“幾何原則”，在某種特定的指引方式之下會有種生產圓滿性的能力，看起來仍然像是杭士基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天賦觀點。按照杭士基的結構主義，語言能力是一種固定的天賦的圖式⑥，它有種生產句子的能力，保留了一種精神上的玄學傾向。西伯斯提雅諾·丁潘拿諾(Sebastiano Timpanaro)曾給予杭士基之語言理論與其政治信念之間一個透澈但是充滿了同情的批判。對杭士基而言，基本的人類能力不僅僅是為了創造力表現的需要，而且是解脫國家權威與行為主義技術官僚的控制。他在第一線上抗爭，以及將自己連上一個馬克斯主義一無政府主義的信念。自發的語言的創造力是杭士基賴以在50與60年的歷史時勢中，孤立的美國福利社會之政治選擇中，對抗福利國家對人類意識操縱之唯一方式。

對亞歷山大言，雖然他並未直接地在其著作中以文字將其自己連上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信念(Alexander, et al. 1985b: 35)，一個或多或少潛藏在其哲學的建築陳述與其計畫案之中的進步傾向仍然不是偶然存在的。例如，一個清楚的社會與政治傾向與模式是結合在一起顯現出來的，像“分散的工作”、“城市的神奇”、“獨立的區域”、“七千人的社區”、“工作社區”、“自治工作室和辦公室”、“社區共同進餐”、“小工作團隊”、“社區性共宿”等等(Alexander, Ishikawa and Silverstein, 1977)。這個傾向是模式語言吸引青年建築師與學生的魅力所在，也是昂希·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受訪時提及阿

⑥關於杭士基之天賦論所混雜的遺傳主義與笛卡兒主義的特性，見尚·皮雅傑(Jean Piaget)，《Structuralism》，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0, pp. 87-92。

歷山大的社區取向，而訪問者立即聯想到馬克斯主義的小生產單位的原因 (Lefebvre, 1983/1987:3536) (參考圖4-2) ⑦。然後，我們轉譯了潘拿諾所提的問題：假如我們試圖超越，不止於一種烏托邦的唯心主義者自限的話，亞歷山大在其玄學與其政治立場之間的連結是不能被接受的(Timpanaro, 1965: 199~200)。

## 2. 意識形態的知覺經驗：

亞歷山大拒絕了開文·林區(Kevin Lynch)式的可意象性觀點而代之以對模式的追求(Alexander, et al. 1967: 126-128)，它們是環境的結構，能經由深層感覺而辨明。“感覺”確實是建築的核心，它對經濟基礎言有其相對自主性。亞歷山大研究方法的理論核心為圓滿的深層感覺。按照亞歷山大的說法，“一統性”(oneness)這個字，或者“圓滿性”，被稱為“無可名狀的品質”，它為互動的中心所生產。同時，每個人能在自己身體中感覺到中心。所以，圓滿感是一種深刻滿足感覺的狀態，即，美感的經驗。換言之，有某種特殊的感覺與價值，它僅能在空間經驗中被吾人所體驗。這種深層的感覺(feeling)就是建築的核心，這就是為何亞歷山大正式地退出設計方法的圈子，反對艾思曼之知識分子的“理念”(idea)的原因。這種特殊的感覺與價值是觀察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一種宇宙觀。這些感覺，世界觀，以更精確的話來說，是社會的意識形態。這也就是說，這些感覺不是以一種抽象類別存在著，而是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生存的人們之具體社會關係的產物。簡言之，意識形態是階級關係被經驗到、合法化、以及被維持的一種方式(Eagleton, 1977a: 6)。進一步，一個地方不只是一個時代意識形態的表現。地方在意識形態之中被生產，但是是以一特殊的美學形式來生產的。然而，亞歷山大對空間形式實體的研究方法終究是不能和針對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之意識形態性質的論述分析(discursive analysis)脫離的。

⑦ 莎娜·石川曾提及她在國外演講時的經驗，她曾不只一次被聽眾詢及模式語言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

## 80 SELF-GOVERNING WORKSHOPS AND OFFICES\*\*



自治的工作室和辦公室

圖4-2 模式圖例

### 3. 空間本體論的邏輯：

順著前面的討論，所有周延的理論不應只是在實體的層次上處理空間，而且需要在一個政治、經濟的分析性角度中來處理空間。存在與意識是相互關聯的。若空間不與社會關係一同處理的話，即使是日後考慮到它們間的互動，也仍然是將空間性質與文化割裂了。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的脈絡之中，建築設計實僅關乎環境象徵的風格追求。形式的分析與形式之綜合似乎並不必然需要整合為一整體。然而如此一來，感性的知覺在認知過程中與概念性的知識就脫了節。亞氏對營造實踐方面所要求的深層感覺和信念，遂與理論知識之間失去了認識論層次上的連結。而這正是我們實踐所需要，在特定情境與理論知識之上的具體知識。建築現在往往變得與社會歷史的變動扯不上什麼關係，這不是因為是建築師們的選擇，而是建築論述根本忽略了創造歷史特殊的過程。對當前建築論述中的知識領袖言，像亞歷山大與艾思曼，他們都似乎有一種特權，給予一種近乎是彌賽亞氏的宣告，以一末世論的腔調透露，在實體之後，神的偉大面目所隱藏的身體(Teyssot, 1983: 69)，或者，一種宗教動力的神秘經驗(Broadbent, 1979: 59)。當然，一種恰當的理論並不必然要以一種啓示錄式的腔調以及以一種神示的本體論邏輯來表達對建築實體的觀點。亞歷山大本本人並未提及海德格的影響，他似乎有意地躲開了海德格的保守、德意志種族中心與社區性的居所(dwelling)，來肯定空間性質的深層感受。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確是給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無論如何，《模式語言》不應被當做是一本聖經(Ward, 1979: 17)⑧。華德的洞見在於指出了亞歷山大理論上潛存的傾向——它仍然竭力尋求那種能賦與所有其他符號以意義的符號，泰雷·伊格頓(Ferry Eagleton)稱為“超級符徵”(transcendental signifier)(Eagleton, 1983: 131)。亞歷山大的營造之常道要求的是“吾道一以貫之”，這種對永恒的本質的渴求，期望建構起能掌握社會空間的一整套思想和語言體系，這是一種超驗意義的虛構。

#### 4. 唯心主義的烏托邦價值：

亞歷山大對結構的觀點以及對空間意識的觀點都是非歷史的，唯心的以及非辯證的。即使我們同意亞歷山大對建築的感覺以及其中心價值，在討論“感覺”與“價值”的實體的課題時，至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就是，這樣的地方使誰感覺深刻？你只有假設人是不同的。而亞歷山大認為人的內在深處是相同的。亞歷山大曾批評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Alexander and Davis, 1981)，然而，不論亞歷山大拒絕了人道主義與否，在以曼都西諾(Mendocino)為中心的北加州與奧立崗一帶，由現實的鬥爭中隱退的，“有意的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ies)人士的心目中，亞歷山大仍然是他們公認最好的建築師。他們的意識形態被亞歷山大傳譯為空間的形式，然而，他們在社會中的物質生活與既定的地域(locality)的權力關係却從未被挑戰過。對他們言，亞歷山大的“激進”只是美好的感覺(Baldwin, 1986: 85)。換言之，雖然感覺、世界觀與宇宙觀在空間生產中有強大的力量，而世界卻不會由於世界觀的改變而做根本的改變。在其社會、歷史脈絡中處理一個地方並不意謂著一個一對一的對稱關係存在於歷史中的基礎與上層結構之間。我們必需處理意識形態如何中介斡旋於空間生產中的特殊性，以及去知道世界觀是由何而來。對於亞歷山大言，“一個恰當的建築理論，一個了解營造生產為深層秩序生產之方式只能在世界觀的轉移之中被創造出來”。這是對的。可是更進一步，營造的不同世界觀，事實上代表的不同的營造生產的方式，以及營造生產中不同的社會關係。社會不會因世界觀的改變，文化的改變與空間的改變而被改變。對亞歷山大言，他的理論的研究方法是用頭站立著，即，頭腳顛倒。為了在其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內核，它必需倒換過來。感覺與價值在亞歷山大手中神秘化了，但這並不會妨礙他第一個以一種論戰的

⑧ 湯尼·華德是亞歷山大、石川等模式語言工作團隊的好友，他在其有洞見的書評中表明：《模式語言》是《全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ue)與聖經的一種交會，見〈Review of 〈A Pattern Language〉〉，《Architectural Design》，vol. 49, No. 1, 1979, pp.15-17.

與有意義的態度敘述了它們在營造實踐中的意識。所以，一個認識論的干預是必要的。或許，我們能夠說，艾思曼與亞歷山大之間的對比，代表了，以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話來說，一個“錯亂的狂言囈語的紐約”與一個反文化的加尼福里亞的並存——這正是當前商品拜物教之精神分裂意象之文化生產中最精彩的畫面。

### 5. 空間實體的執行實施過程：

幾何原則的效果，或模式語言的再調整，只能在歷史時刻的政治過程中做完全地解釋。所以，模式語言必需將實質空間與社會、政治結構進一步結合，而非被盎格魯·薩克遜的環境——行爲論述所隱然限制。例如，處理當前的美國低收入住宅，單親家庭應考慮為特殊社會脈絡下的元素。目前，有相當數量的美國黑人缺乏醫療健康照顧，大量的核心家庭解組，65%到70%的黑人與拉丁裔孩童為處在貧窮線下之單親家庭子女。若不化約社會政治的脈絡為行爲因素，不化約住宅類型為核心家庭的典型公寓（例如，三臥房式單位，兩臥房式單位等等），而代之為結合空間的形式與社會脈絡的話，某種新的住宅類型，舉例來說，在兩個生活單位間分享可共用的廚房，可以發展成日常生活的支持性模式語言。事實上，假如我們不能超越模式語言，為了單親家庭的社會政治特殊性來重新調整的話，不論具備了什麼樣的價值或感覺，我們都不能超越意識形態的盲點。在巴黎公寓的個案中，法蘭絲娃·蕭伊(Francoise Choay)女士在1973年要求亞歷山大建議當前公寓建築應該要如何興建。於是，為了改善法國的大量生產的標準化的、高層公共住宅惡劣的品質，一個包括了十七點假設的“新公寓住宅”模型之實質設計被提了出來(Alexander, King and Wendler, 1975; Clavan, 1979: 97)。一再，假如這些構想要在一大尺度的應用，實質的解決辦法就必需整合在將法國住宅政策當做社會與政治的過程來了解。進一步，住宅政策必需在有關的諸社會趨勢的脈絡中來處理。這也就是說，實質設計的執行與實施(implementation)，應該在一個更廣的都市政策的架構中去分析國家的都市政策。掌握了為

國家制度所代表的社會與經濟利益之後，才有應用知識與資訊來經理關乎空間形式勝算的機會。所以，對空間實體的認識，得要求一種經由社會、制度與歷史的架構的角度，對不同的論述加以了解。計劃之執行，就如同亞歷山大所提過的，並非意謂著加上一項或兩項經濟或政治的“因素”而已(Alexander, 1973/1976)。

模式語言最大的貢獻是對專業者的衝擊，是對建築論述的重要性。對“地方創造”的居民言，空間塑造的過程才是關鍵，它可能需要模式語言，也可能不需要模式語言。營造的形式與對營造形式的意識俱無永恆不變之本質，它是物質存在的對象，然而它却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作用，在社會過程中建構，為人的主動意識所感知。歷史不是朝著一定的目標終極發展，這種歷史的目的論要求的空間語言是一種簡單的直線發展，忽略了符號的複雜性與塑造空間過程的政治社會變動性，忽視了現實的執行過程中的複雜可能性——進退折衝、顯隱並舉、正偏互用之運動。用戴希達—福寇—伊格頓式的口氣來說，模式語言現在已變成了形上學 (Eagleton, 1983:132)。模式語言所涉及的感覺經驗是不見得容易度量與明言，亦應要求其深度，然而這並不必然是神秘的，更不至於是帶有“唯一”性格的，有神的旨意的模式語言(“the” pattern language)。這種唯一的符號本身就是獨斷的和意識形態的。空間則經由對象與客體而存在，它有賴以客體存在與展現的特殊類型，有賴於建構空間的建構物(營造形式)的性質(Sayer, 1985:52)。營造形式為社會歷史之建構物，或許，社會的作用者展現其結構性角色的力量，塑造空間的動態社會政治過程，才是了解空間結構與空間意識的關鍵。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討論亞歷山大最近的宣言性的陳述與計畫案作為分析的個案。

## (二)在技術—經濟再結構過程中的非正式營造系統

建築物被異化了的特性是其生產系統深層結構的直接結果(Alex-

ander, et al. 1985b: 29)。對亞歷山大而言，非正式系統是其理論的實現，它是既存的營造生產系統的替代性選擇。因此，它顯示出來的思考深度遠超過理查·羅傑(Richard Roger)與諾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所流露出形式主義意象之“高科技大教堂”(例如，羅傑在巴黎的龐畢度中心，在倫敦之羅伊公司；佛斯特在香港的匯豐銀行，見 Banham, 1986b: 75-77; Davis and Eads, 1986: 77, 79)，以及法蘭克·葛雷(Frank O. Gehry)在南加州的“違章小屋”般的建築物(例如，葛雷在洛杉磯威尼斯海灘的諾頓宅，在洛杉磯的華格勒宅，見 Gehry, 1980, 1985; Marder, 1985)。對亞歷山大而言，世界系統 A 是種由使用者直接參與，直接控制造價，由建築師／營造者結合為一體的營建方式所經理。最後，最重要的，非正式系統創造了營造的深層感覺(Alexander et al., 1985b: 35)。

當前的歷史時勢是：我們已經經驗了凱恩斯經濟模型的轉變，它在 1970 年遭遇了主要的危機。這系統經由傳統的規則已行不通了，即，福利國家的結構已窒礙難行。所以這系統在現在正在再結構，或者說，已經完成了再結構。新的規則進入系統來再調節，使資本主義能運作。在整個再結構的過程中，非正式部門是國家所中介的資本與勞動關係轉化中最不同的新過程。簡言之，在雷根經濟學中非正式經濟隨處可見。

同時，這也是亞歷山大提出其世界系統 A 的歷史時勢：“營建生產”的“非正式系統”。他宣布：將非正式系統平行於正式系統，分別代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是分別連上普林斯·克魯泡特金(Prince Kropotkin)的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與現實政治的世界，都是太簡單的做法。這差別存在於更深層。對亞歷山大言，最關鍵的差別是非正式系統是由試著籌劃事物中潛藏著的圓滿性所統治著(Alexander, et al. 1985b: 35)。

事實上，圍繞著非正式系統的主題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它過分簡化社會的衝突，將歷史化約為一種人與技術間的衝突。現實是更複



雜的，所以分析是必需的。第一，非正式系統與正式系統間的差別不是單純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一對一的連結。第二，非正式系統在經驗層次上確是比正式系統有更多的能力來為使用者生產更好的地方，它更低價，也更有效率與具備更有彈性的網絡。這方面例子很多，例如，在大部份第三世界的國民住宅與自建住宅在品質上的比較，以及先進工業社會中異化了的現代建築物給予人們的敵意，在墨西卡利案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等等(Alexander, et al. 1985a; Alexander, 1984; Fromm and Bosselmann, 1984; Fromm, 1985; Bosselmann, 1986)。然而，非正式系統必需在一更廣的社會與歷史脈絡中來考量。尤其，在此時此刻，非正式部門是隨處可見的時刻（參考圖4—1所表達的情境）。例如，查理士·康維特(Charles Knevt)所提到的，在今天的英國，有些建築師在他們家的前面房間中工作，提供直接的、地方性的與個人的服務，而不是在大型私人與公部門的事務所中工作。大約 50% 的專業者，目前受雇於小的，有彈性的，少於三個人的事務所。現在，求生存的策略才是最重要的(Knevt, 1986: 5)。所以，一個有品質的地方之生產的實體——營造部門中非正式勞動的特殊性——必需在政治經濟分析中審視國家如何中介於非正式勞動相關的社會關係。這也就是說，在70年危機之後的再結構過程的勞資關係中，來考慮非正式部門。

一般而言，中心國家非正式部門的擴張是經濟再結構的一部分，它旨在替代在福利社會中70年代的結構性危機。進一步，我們需要知道這個再結構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什麼是非正式系統的特殊角色，其機制如何？國家如何干預與縱容等等。在第三世界中，非正式系統之機制，甚至遠在 1970 年代之前就存在著。它關乎國家在第三世界之社會、經濟的特殊性格。

**1. 非正式系統不是在國家的邏輯及其潛在的控制權力之外的部門。**

在營造生產過程中的非正式系統是一種生產活動，一種為特定社

會關係與政治權力所限制的經濟活動。所以，國家的規定——政治過程——是非正式部門存在的關鍵。換言之，它是由正式部門界定非正式部門的過程。非正式部門有賴於國家因政治上的利益，而對非制度化的經濟活動容忍，從而獲致其對社會控制的新方式。結果，私人資本得到新的利潤。它對資本的生產力提供了更多正面的效果，例如對抗組織化的勞動權力、降低失業率、在勞動過程中得到更大的生產與僱傭彈性、在國際市場中為國家經濟增加新的競爭力等等。在第三世界中非正式部門甚至影響都市發展的模式，像違建、入侵土地、自助式住宅、社區動員等等。經由打通政治所決定的非正式住宅市場的特殊制度的機制，獲得住宅與服務的管道。這也就是說，政府甚至藉著刺激非正式部門的活動當做一種推動父權式的政治支持，和緩潛在的社會衝突的方式(Castells, 1983b; Castells and Portes, 1986)。

## 2. 大部分非正式的勞動傾向接受更低的薪資與更壞的工作條件。

尤其是勞動地位特殊的婦女、少數民族與青少年等等，告訴我們下一個結構性社會兩極化的圖畫。在第三世界中，非正式部門提供了一種便宜而輕易的解決使貧窮的家庭必須忍受更多，以及以一種自我剝削的方式被剝削更多的能量。違建社區團結的歷史模型並不是像約翰·透納(John Turner)所說的那般均質(Ward, 1982)。近年來對非正式部門的研究也多改向，轉用“小商品生產”(特別指家計生產部份)或“小資本主義生產”來更精確地反映原先被界定為非正式部門活動的從屬性的與被控制的性質。然而，由於用熟了與方便的原因，老的“非正式部門”的術語仍然被廣泛使用著(Drakakis-Smith, 1985: 72)。更重要的原因是，小商品生產這個概念無法涵蓋“國家”的作用，僅涉及經濟領域的活動。無論如何，使用非正式部門，非正式系統的觀念，本身一定要經過認識論上的處理，必需看到國家的中介過程。換句話說，正式部門是制度的(institutional)，而非正式部門却是非制度之內的(non-institutional)，兩者相互矛盾却是互相結合而存在的。

針對亞歷山大的情形言，假如非正式系統要在一更大的尺度上應用，它就需要在社會與歷史的脈絡中重新檢驗。當非正式系統被國家在政治過程中制度化之後，對亞歷山大的意圖言，造成了一難局。經濟方面的影響成效與他的努力正好相反。我會說可能這是在歷史過程中階段性的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只是單純地有因素一——非正式或正式的營造生產的技術，因素二——社會，而是必須清楚了解社會政治過程如何吻合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換言之，非正式或正式的技術是有其特定的效果。然而，特定的成效是在生產過程之中，是在我們所分析的正式與非正式技術所存在的社會組織的過程之中。正式與非正式的技術本身可能誇大既定政策的社會與經濟效果。然而，空間是否被異化了，或是為了一般的人們而人性化了，這視情形而定。

總之，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是一個迷人的實驗理論，模式語言不僅是一個在設計過程中處理空間的有力工具，而且能在分析的研究中看到空間的個性。所有的模式語言、中心、圓滿的感覺都有助於我們掌握空間結構的能力，即，空間的文化是一個參與性的過程，以及一個軟性的生產系統來生產美麗的地方。它意謂著對空間的權力結構完全的轉換。然而，在當前新的積累之再結構過程之中，亞歷山大的研究在本質上就吻合私人生活領域中個體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創造了新的資本主義模型在穩定社會關係時所需要的一種文化的條件。假如你不能改變社會，社會就會退回到其再生產的機制所需的價值與制度。在60年代的主要社會運動之後，人們表現他們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價值的烏托邦期望已經由市場的機制加以處理了。市場是吸收個體以及片斷的社會鬥爭模式最好的制度。

所有的這些，在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與既存的當權研究方法之間，在非正式系統與正系統之間，假如深層的戰鬥要變成為真正的戰鬥的話，亞歷山大的研究方法與非正式系統做為一社會實踐就需要與進一步的政治經濟分析結合。這其實暗示了我們對理論的要求。秘魯案的評估(Fromm, 1985)，以及墨西卡里案(Fromm and Bossel-

mann, 1984), 以及奧立崗的評估(Leu, 1985), 在在都告訴了我們沒有有意義的經驗研究, 我們就不能豐富我們的理論。簡言之, 對模式語言的檢驗, 存在於其社會實踐之中。畢竟, 我們不是追求一種形式的科學以處理空間與社會的理論發展。事實上, 這是發展亞歷山大理論的一種方式。僅僅基於善意與建築論述之中的實踐(practice in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非正式部門就將僅是一種小資產者的意識形態替代品而已。亞歷山大已經領導了我們去對抗既得利益的建築範型, 然而, 他却沒有留給我們任何武器來面對當前的權力結構與社會衝突。亞歷山大將他自己束縛在建築論述的專業糾結之中(Ward, 1979: 17)。事實上, 這條唯心主義的烏托邦傳統可以追溯到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與威廉·摩里斯(William Morris)的藝術與工藝運動(Art and Craft Movement)。我們已經看到了羅斯金與摩里斯的貢獻與矛盾: 他們是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最早的意識形態家。一方面, 他們的立場是政治的。藝術的品質是對應著藝術作品的生產過程。假如生產過程是機械的, 不流利的, 瑣屑的, 藝術也就相對應地腐敗了。另一方面, 將文化的氣候, 與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經濟結構與工會和勞工運動所發展出來的抗爭相連結, 就可以發現在繪畫與文學中的逃避主義氣氛, 與羅斯金與摩里斯的鄉愁之間有一種連繫。無論如何, 對他們言, 他們的社會主義被化約為人人有權利享受藝術與自然的藉口了(Tafuri, 1963)。現在, 在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氣候之下, 這個晚期資本主義再結構過程中變遷的文化邏輯, 至少, 在空間的文化形式方面, 非正式系統與現象學並不是我們的避難所。

《模式語言》所散發出來的價值觀誠然有凝聚社區與城市居民共同意志之潛力, 它超過了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s)所繼承的, 現代建築運動中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對未來城市的展望(例如《Comunitas》所描繪的世界)。《模式語言》的反省價值應超過對傳統社區之鄉愁, 雖然我們難免立基於歷史遺產之上展望未來。至少, 《模式語言》已經是北加州土壤中的一部分了, 是他們對生態城市憧憬時的想

像元素了（例如，《Ecocity Berkeley: 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參考圖4—3，4—4）。

亞歷山大看到了工業化過程的轉化，以及這些勞動過程是如何重組，由勞動者身上剝奪了傳統技藝之“常道”，或許，在這個共同點上，我們可以用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話做為結論：

“我希望沒有人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我的觀點是對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代之鄉愁而形成的。恰恰相反，我關於工作的觀點都是由於嚮往一個尚未誕生的時代而形成的。在那個時代裡，對工人言，由於自覺地有目的地掌握勞動過程而產生出來的技藝滿足，將與科學上的奇蹟和工程上的獨創性結合起來；在那個時代裡，每一個人都在某個程度上受惠於這種結合”（Braverman, 1974: 6 - 7）。

這種圓滿性，或許，也正是文化經驗上之“營造的歡愉”。



圖4-3 柏克萊臨水岸的威尼斯村想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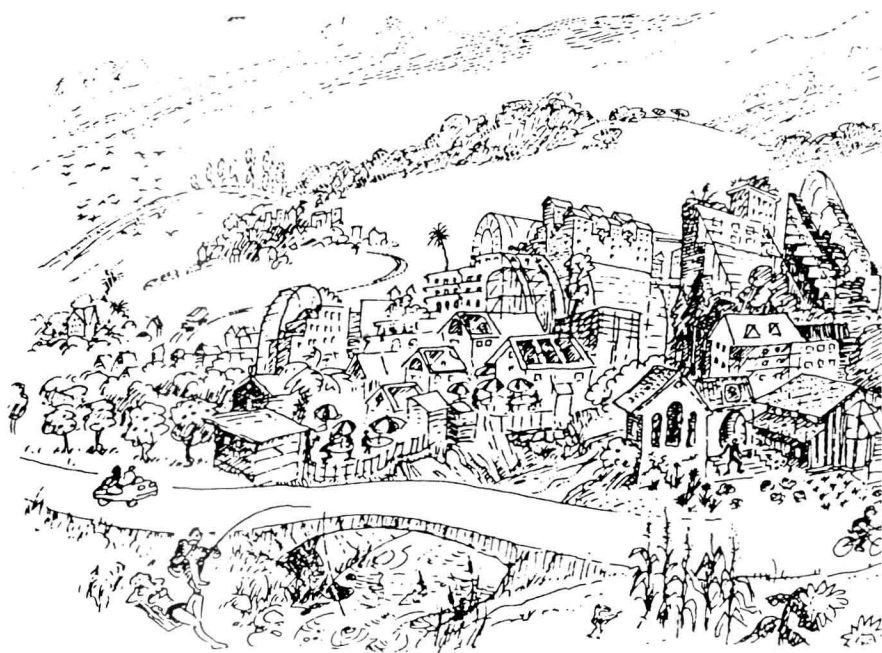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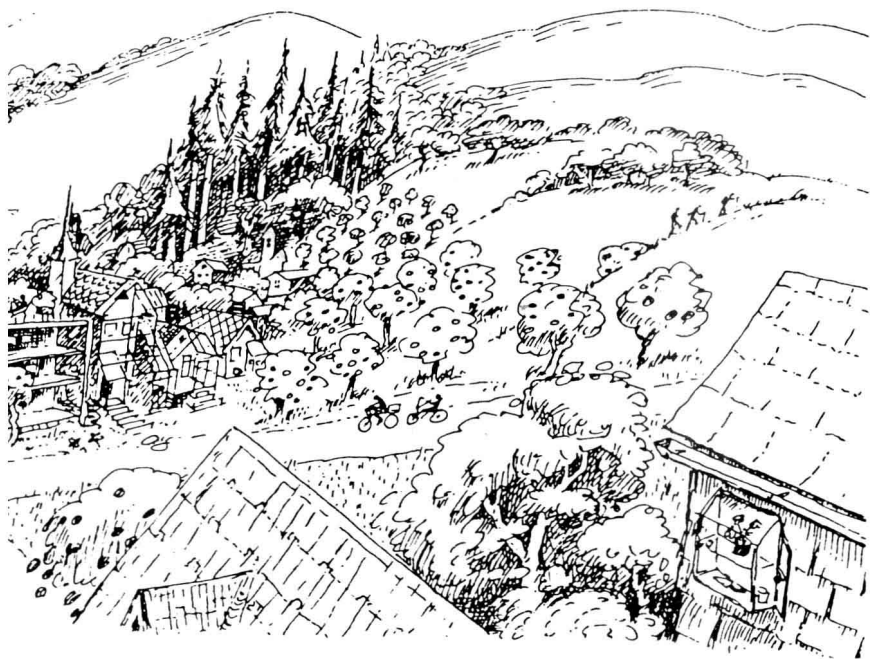


圖4-4 像柏克萊般環境中的生態城市

圖4-3、4-4均引自 Register, 1987: 72-73, 134-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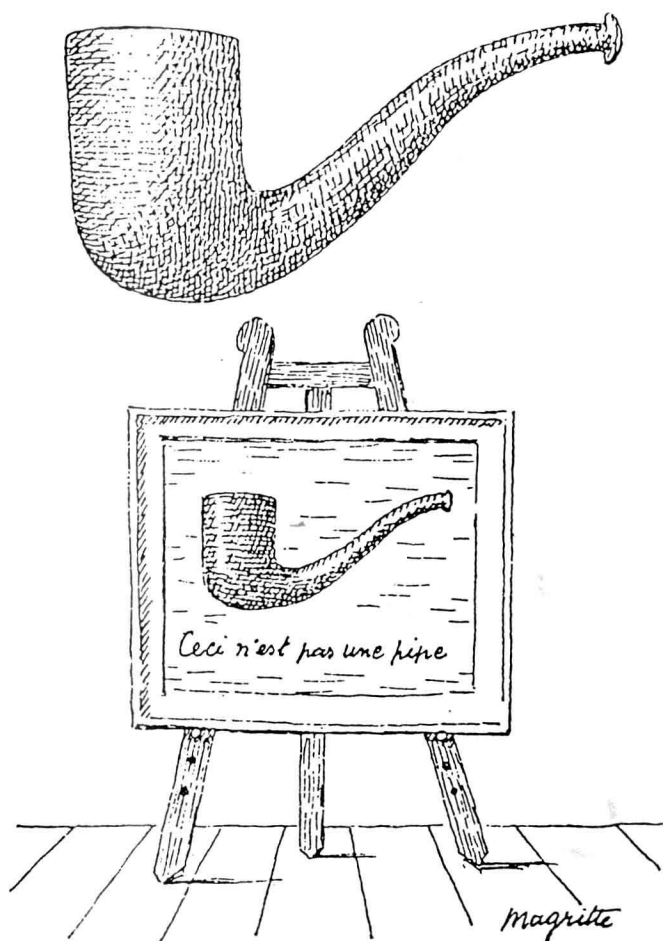


圖5—1：雷奈·馬格瑞提 (Rene Magritte) 的“這不是煙斗”：真實、圖象與文字之間表徵（再現）的差異  
（引自 Tafuri, 1976 : 10）

## 第五章 批判的歷史計劃： 曼菲德·塔夫利及威尼斯學派\*

“建築師的構造為社會的意識形態者，對城市規劃進行個人化干預，對公眾則扮演形式方面的說服角色，就其自身之問題與發展則是自我批評角色；這種相互關係對抗——在形式研究的層次——在建築“對象”與都市組織之間：這些是建築上‘啓蒙運動辯證’恆常周期性出現的主題。”<sup>①</sup>

——曼菲德·塔夫利（Tafuri, 1973/1976：3）

在過去十年之中，若依照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轉變，分析義大利版本的後現代主義建築就必需連繫上威尼斯學派的貢獻，特別是其類型學的研究途徑與批判的歷史分析。在觀察義大利的具體情境之時，除了一群引人注目的建築師<sup>①</sup>的文獻與作品之外，在他們左近，還有一群建築批評家與歷史學家，提供了有創見的、較有理論建構能力的歷史詮釋，包括了馬西洛·卡西阿尼(Massimo Cacciari)、喬吉奧·西歐奇(Giorgio Ciucci)、法蘭西斯科·達哥(Francesco Dal Co)、安東尼奧·佛斯卡利(Antonio Fos-

\* 修訂前原文曾發表於《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學報》，第5卷，第1期，1990年2月，pp.107-122。

① 像吉瑟普·沙莫那(Giuseppe Samona)、卡諾·安莫尼諾(Carlo Aynionino)、維多里奧·葛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阿多·羅西(Aldo Rossi)等等都是傑出的建築師。

cari)、馬里奧·馬里瑞—伊里亞 (Mario Manieri-Elia)、保羅·摩拉奇洛(Paolo Morachiello)、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喬治·提蘇(Georges Teyssott)等等。在他們之中，曼菲德·塔夫利，一個義大利馬克斯主義的建築史家，是其中最主要、最具領導作用的角色。而且，塔夫利式的“歷史的計劃”(historical project)可以當成是他們在一般理論方向上最具有深度的突破。

## 一、導言

曼菲德·塔夫利於1935年生於羅馬，1960年於羅馬大學獲得建築學位。他曾在羅馬、米蘭、波勒瑪大學教授建築史，也曾在蘇聯和美國等地講學。自1968年起，塔夫利成為威尼斯大學建築學院(the I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IUAV)的教授，主持建築史研究室(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此外，他也是安德瑞亞·派拉底歐(Andrea Palladio)研究的國際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塔夫利是一個有生產力的批評家與歷史學者，他研究的範圍極為廣泛，至少涵蓋了下述相關題材：

**1. 一般性的現代建築史與近代批評(with Dal Co, 1976/1979)，以及特殊性的進步的、前衛的烏托邦歷史(1969, 1973/1976)：**

威廉·摩里斯(William Morris)思想與建築中的社會主義(1963)；丹下健三的作品(日本的現代建築)(1965/1982)與勒·柯必意(1984)；美國的建築與城市歷史(與 Ciucci, Dal Co, Manieri-Elia 合著，1973/1979)，如紐約五人團(1976)、摩天大樓的興亡(1978)、菲立普·強生(Philip Johnson)與約翰·伯吉(John Burgee)水晶大教堂(1980)；蘇聯的城鎮規劃史(1973)以及俄羅斯的形式主義；威瑪共和的社會民主與城市(1974)；奧圖·華格(Otto Wagner)(1981)維也納社會主義的住宅計劃案(1982)等。

## 2. 義大利建築

由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建築（例如，菲利普·布魯涅內斯基 (Filippo Brunelleschi)）(Tafuri, 1969a)，建築的風範主義（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建築）(1966a)，到義大利建築師，像里昂·巴提斯塔·阿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 (1979c)，法蘭西斯科·伯洛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965a, 1966b, 1972a, 1979d)，喬凡尼·巴提斯塔·普內尼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1976a, 1977b, 1979d, 1987b)，吉瑟普·特蘭尼(Giuseppe Terragni) (1977a)，魯多維哥·郭若尼(Ludovico Quaroni) (1964)，法朗哥·普瑞尼(Framco Purini)與勞拉·特米斯(Laura Thermes) (1980b)，維多里奧·葛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1980c)，馬里奧·費奧蘭提諾(Mario Fiorentino)在考味爾(Corviale)之 IACP 集合住宅(1981d)以及一完整的，由戰後1944年到1985年之義大利建築史(1986/1989)。

### 3. 威尼斯歷史

涵蓋政治、科學、城市、建築物等相互編織起來的層次，以及建築師之間的競爭(1969b, 1981/1982; 1983; with Oscari, 1983; 1984, 1986/1988)。

### 4. 建築的表徵與其形式(1980d, 1982b)。

5. 理論的論辯與方法論上的擬議(1968/1970/1976/1980, 1976, 1977, 1979/1980, 1986)。

事實上，有個關於塔夫利的理論論述(Tafurian theoretical discourse)的特徵必須在此先提：塔夫利可說是經由其專業實踐——在每一件陸續發表的主要著作中——來發展其理論架構(Croset, 1984: 52)。他持續地精煉其歷史方法，界定批評家—史家的角色與任務。這種塔夫利式的論述可以經由威尼斯學派形成的國際脈絡，經由戰後歐洲氣候中的社會與政治土壤著手了解。回溯塔夫利“歷史的計劃”之精煉過程，其立場與見解的轉變說明了塔夫利知識之旅程：1969年前後的轉移(Llorens, 1981: 85)劃分了60年代青年塔夫利的研究途徑與其後期的意識形態分析，以及，其最近對史學方法上的嚴謹要求。

### (一)六〇年代整合在卡薩貝拉(Casabella)團體中的青年塔夫利

由於歐洲強悍的左翼勞工之階級運動曾共同面對反法西斯的鬥爭，因此，在第二次大戰甫一結束，主要的歐洲工業國的資本主義是以福利國家的新面貌粉墨登場的。一般而言，戰後歐洲的脈絡由社會民主制的福利經濟，伴隨著美國支配的馬歇爾重建計劃(1948—53)，以及擴張的世界經濟等元素所組成，這是歐洲被美國的經濟所恢復活力的方式。義大利半島特殊的情境是，自從1948年義大利大選之後，基督教民主黨就成為支配性的國家權力，其合法性之基業未受到挑戰幾達二十年之久。

在義大利的建築論述建構過程中，存在於古典前衛主義、老學院派與官方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對抗、妥協與有爭議性的關係，以理性主義運動(Rationalist Movement)與“米蘭900”的失敗而告終(Gregotti, 1968: 33, 36; Tafuri and Dal Co, 1979: 294; Portoghesi, 1980/1982: 34-35, Zevi, 1981: 41-43)。這些事情徹底暴露了前衛主義的政治弱點。面對義大利戰後資本主義的脈絡，前衛主義已無能反應社會現實，於是也被要求重新界定其專業角色、任務與設計方法(Llorrens, 1981: 84)。在老的學院派之外，在對歷史與現代性方面有兩種不同的新研究途徑。其一為有機建築學會(APAO)，以布魯諾·柴菲(Bruno Zevi)為代表<sup>②</sup>。另一條路線則為郭若尼(MSA 團體)<sup>③</sup>以及恩奈斯托·羅格斯(Ernesto N. Rogers) (BBPR 團體)<sup>④</sup>所領導。他們都同樣地向歷史尋求支援，然而却訴諸不同的研究途徑。前者之有機

② APAAO 所打著萊特式旗幟的現代建築很容易被認為是美國傾向的有機主義者。但是對柴菲言，它在戰後義大利的建築論述建構之中，扮演了一個“第三勢力”的角色。柴菲的主要出版物為 Metron 期刊。

③ MSA(Movimento studi per l'Architettura) 1955年6月在米蘭組成。

④ BBPR——在米蘭的一建築事務所，由奇安魯奇·班費(Gianluigi Bamfi)，魯道維柯·貝吉歐喬叟(Lodovico Belgiojoso)、恩里哥·柏雷蘇提(Enrico Peressutti)與恩內斯多·羅格斯(Ernest M. Rogers)所組成。在班費死後，則以 BPR 為名(Gregotti, 1968: 6)。

建築取向將歷史視為一種自然的力量，也未經由對過去的一種細緻纖巧之意識來經營設計，以求在形式創新上有所助益，而後者則要求經由對建築形式的精煉來對過去再做檢查(Llorens, 1981: 84)。

我們必需對第二條趨勢進一步追溯。由1954年到1964年，在羅格斯的指導之下，一個新的世代與卡薩貝拉一同成長了起來，在義大利文化中扮演了一個知識領袖角色。他們至少包括了貴都·堪尼拉(Guido Canella)、維多里奧·葛雷高蒂、阿多·羅西、吉瑟普·沙莫那，以及曼菲德·塔夫利等等(Gregotti, 1968: 56; Portoghesi, 1980/1982: 40)。由於學院往往是社會資源分派有限的場所，因此卡薩貝拉所鼓吹的方向也就容易涉及教育制度與機構中的權力鬥爭。義大利建築學院的教師在老的學院派領袖與新的世代之間的對抗是嚴酷無情的。在1948年以後，除了在威尼斯大學的建築學院中的進步教學嘗試之外，老學院派可以說是完全控制了整個義大利的建築機構(Gregotti, 1968: 46; Tafuri and Dal Co, 1979: 417)。

在1936年，沙莫那到了威尼斯。與義大利其他的建築學校大異其趣，威尼斯變成一個被魯西阿諾·西默蘭尼(Luciano Semerani)稱為“放逐的學校”(1986: 4)。布魯諾·柴菲、伊格蘭濟奧·卡迪那(Ignazio Gardella)、法朗哥·阿比尼(Franco Albini)、卡洛·史卡帕(Carlo Scarpa)、喬凡尼·阿斯丁哥(Giovanni Astengo)、路多維哥·貝吉歐胡索(Lodovico Belgiojoso)、魯西阿諾·西默蘭尼、吉安卡洛·狄卡洛(Giamcalo de Carlo)、卡洛·莫安尼洛、以及曼菲德·塔夫利等等，都先後加入了威尼斯建築學院的教授團。

在這個時期中，塔夫利的歷史寫作與沙莫那的作品(1971/1986, 1929/1986; Semerani, 1986)，葛里高蒂的作品(1968, 1986, Tafuri, 1982)，羅西的作品(1966/1982, 1983)等等，高度整合在一起，甚至可以連繫上丘里歐·卡洛·阿岡(Giulio Carlo Argan)(1963)論建築類型的文章。雖然每個人在不同的層次上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他們的作品基本上互相平行。所以塔夫利的歷史寫作可以當做是一種在更大的理

論模型中把他們放到一起，以及是在一個歷史架構中來評估與定位這種趨勢的一種嘗試。我將試著經由其作品、疑旨與哲學基礎來闡述在這段時間中的塔夫利式的理論論述如下：

塔夫利的第一本書是關於魯克維哥·郭若尼(Tafuri, 1964)——這個運動的開拓者，以及羅馬學派(the Roman School)最令人矚目的建築師之一<sup>5</sup>(Tafuri and Dal Co, 1969: 395; Gregotti 1968: 49)。對這種歷史取向的運動，塔夫利寫道：“驕傲地宣稱自主性的語言為傳統的元素所組成，它與布爾喬亞文化無關，像似歷史的光采般出聲，這歷史不是一個下層階級，也不是一個向上運動階級的歷史，而是一個被壓迫的、卑微階級的歷史：它更類型化、一種民間傳統、在所有健康寫實的考慮之外。”<sup>6</sup>

這個歷史的主題，即使在塔夫利第二部作品中仍繼續著——日本的現代建築(1965/1982)。它在三條線索上展開：

1. 設計過程與其方法；
2. 城市為提供建築意義的脈絡組織；
3. 建築語言為象徵溝通的工具。

在他們之間，設計方法似乎成為主要線索(Llorens, 1981: 84)。對塔夫利言，這似乎成為歷史學者的任務了，以致於能連繫歷史的分析與建築教學，貢獻於理論與實踐間的連結。這也就是說，歷史分析需針對設計過程中的原創性操作與方法論層次上的發展潛力全力以赴，做出貢獻。正如湯瑪斯·勞林(Thomas Llorens)精闢的分析，這種歷史傾向貫穿了青年塔夫利那段年代中的所有作品。由卡薩貝拉上對修正的理性主義的辯論開始(Aymonino et al., 1964)，塔夫利的第三本書是關於風範主義(1966)兩篇關乎伯諾米尼的文章(1965, 1966b)，一本

<sup>5</sup> 魯多維哥·郭若尼(Ludovico Quaruni)，馬里奧·瑞多費(Mario Ridolfi)，以及戰後年輕的一代如安莫尼洛是有名的INA計劃的建築師——羅馬的提柏提洛區(Tiburtino district)的卡薩街廓(Casa block)計劃，這是義大利戰後文化中建築界的“新寫實主義”典範。

<sup>6</sup> 葛里高蒂曾引用此段文字(Gregotti, 1968: 49)。

關乎人文主義的書(1969a)，一直到另一本關乎威尼斯建築師傑可伯·沙那維諾(Jacopo Sanaovino)(Tafari, 1969b)，這個在設計理論中的歷史研究之類型方法(typological method)像理論論述一般潛藏在塔夫利作品下面。甚至塔夫利在1969年之後轉移了他的研究途徑，這個主題仍然在其1972年發行的另一本有關伯諾米尼的書上可以找到(Llorens, 1981: 85)。

勞林論塔夫利文章中最精彩處的其中之一為：勞林指出了類型學的疑旨(typological problematic)與唯心論藝術史的黑格爾假設之間的哲學關連。塔夫利針對“現代運動與過去的方法論之間的決裂，源於對建築師作品所產生的一種非直接控制的新方法引入後所造成的決裂。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在歷史上第一次謹慎地假設一種有美學創造力的內在元素，而非一無所有”。(Aymonino, et al., 1964)。塔夫利的主要觀點是“控制參數”(control parameters)，即，在設計過程中的一般規律。在設計的操作過程中，塔夫利假設：某些規律建構了“象徵的形式”，它在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展現以及控制形式。雖然塔夫利的興趣並不在於這些“象徵形式”與社會整體之間的交流，而是在於設計過程本身中所形成之行動，他對形式的早期觀點仍然關乎恩斯特·卡西爾(Ernest Cassirer)與歐文·潘諾夫斯基的“象徵形式”之“角度”，關乎路奇·伯里昂(Luigi Pareyon)之“構成”(formation)——這是種可里歐斯·里哥(Alois Riegl)的“風格”與康拉德·費德爾(Konrad Fiedler)的“純粹視覺性”之結合。這些觀點的康德主義根源說明了塔夫利還未曾完全拒絕其青年時期之傳統黑格爾式的意識形態。這些唯心主義的觀點也提供他一個經由設計理論的類型學方法來連繫歷史分析與設計方法的幻覺。這是卡薩貝拉團體、威尼斯學派、或“設計方法”團體<sup>⑦</sup>們，在不同的立場上却共同特有的普同的哲學

<sup>⑦</sup>60年代末，在義大利脈絡裡所發展的設計方法與英美實證主義傳統完全不同。義大利經驗強調類型(typology)與歷史（對義大利經驗言，這意謂——社會、政治的理論）(Llorens, 1981: 93)。



基礎(Llorens, 1981: 85, 93)。換言之，他們嘗試經由專業實踐來連繫社會、歷史的團體。

## (二)1969年之後的意識形態批評

在60年代的美國以及歐洲，一系列重要的社會運動粉碎了福利國家自由主義與親成長聯盟(progrowth coalition)對整個政治、社會的安排。精確地說，這是政治、社會的危機影響了經濟機制，它最終激起了經濟危機(Castells, 1980)。在60年代末，所有社會的、政治的壓力聚集於一點：包括強悍的勞工運動、針對集體消費的都市社會運動、反文化運動，以及國際關係的轉化。

### 1. 勞資間的鬥爭：

一般而言，1968年五月運動之後，社會運動的烽火點燃，廣播各地。特別是，1960與1974之間，義大利勞工對資本家提出了種種實在的要求，造成利潤率急劇下降（例如，1969年義大利工廠中的奧托諾·卡多(Autunno Caldo)事件）。

### 2. 針對集體消費的都市運動：

都市運動包括了：住宅運動（例如，義大利的房客聯盟(tenant union)，自由主義的工會 SUNA 與激進工會 UI；為爭取國宅而動員等等），對抗都市更新的運動，爭取交通運輸之運動（例如，1970年代的威尼斯），為了公共服務的價格與品質的運動（例如，1973年石油危機中的義大利情況）。

### 3. 反文化運動：

婦女運動、違建運動等等。

### 4. 新國際關係：

第三世界的崛起、越戰等等。此外，都市社會運動始於1968年革命之後。1968年五月的運動，並不是都市運動，而是個一般性的社會運動。然而在這之後，運動是以空間領域為基地，集中於都市之課題。人們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動員起來。即使馬克斯主義也一時失去

理論的容量來指導社會運動(Castells, 1983b: 299)。這不僅僅是歐洲文化的危機，也是馬克斯主義的危機。在義大利，義共(PCI)試圖處理在1968之後來自學生與知識分子的批評。所以官方的馬克斯主義與來自左翼知識分子的批評能夠在 PCI 中共存(Llorens, 1981: 94)。然後，特別是在義大利，在70年代，圍繞著工人階級，一個新的社會集團(social bloc)形成了。一個高度豐富多變的義大利都市改革按照不同的社會、政治脈絡被執行實施了。在這個脈絡中，塔夫利在1969年左右轉變了他的理論研究方向<sup>⑧</sup>。

一方面，《建築之理論與歷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Tafuri, 1968/ 1970/ 1976/ 1980)之中，塔夫利前階段的、支持建築實踐的歷史方法仍夾雜在結論的理論架構裡，例如，類型批評的史學工具主義與卡西爾、潘諾夫斯基、韋伯等觀點間的夾纏。另一方面，在此書中，塔夫利不但提出以意象做為批判的後設語言之建築之角色與價值上的錯亂，而且指出操作性批評(operative criticism)的理論問題——操作性批評不可避免地加諸近代的標準於古代之上<sup>⑨</sup>。簡言之，操作性批評從事的是意識形態的再生產，而不是創造歷史，提出歷史之診斷(historical diagnosis)。建築批評必須由對建築形式的分析改變到對形式外貌形成限制之所有脈絡組織的批判。所以，歷史研究變成“建築意識形態的批評”，以找出建築是什麼，以及建築如何神秘化了形式真正的歷史意義。這與早期之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神話學》的意識形態批判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事實上，將建築視為一種被歷史地限制了，以及制度上功能運作的學科，就是一種政治的批評，即使是種間接的政治的批評(Tafuri, 1968/ 1970/ 1976/ 1980: 236; 1978)。

勞林曾經指出塔夫利式的論述之整個發展過程的特性，可以在《建築之理論與歷史》一書再版修訂的過程(1968/ 1970/ 1976/ 1980)中發

<sup>⑧</sup>塔夫利在1968年接受了 IUAV 的建築史講座。

<sup>⑨</sup>例如，安莫尼洛、羅西與卡拉迪等的類型批評(Tafuri, 1968/ 1970/ 1976/ 1980: 158)。

現。在1970年義大利文第二版說明中，塔夫利拒絕了官方馬克斯主義、馬庫色學派、庸俗社會學、進步的建築師等等。就像沒有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只有一種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批判那樣，吾人不能“預期”一種階級的建築（一個解放的社會之建築），而可能的只有引入一個對建築之階級批判。他拒絕了前衛建築師與操作性批評的史家在知識上的取向，剩下的是歷史批評的解密任務。這個立場在一篇“*Per van critica dell 'ideologia architettonica'*”(1969)發展出來，它是塔夫利主要的著作《建築與烏托邦：設計與資本主義之發展》(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73/ 1976)的基礎。雖然檢驗現代運動的歷史遺產是塔夫利早期的研究方向（另一個是類型學分析）(Tafuri; 1963)，這個主題對現代建築的個案做建築的意識形態分析，以解密前衛與革命的關係，在十年之後的《建築與烏托邦》中才得以實現。簡言之，建築被視為建構一種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它為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所支配。這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建築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或多或少假設著：意識形態的連結被化約為錯誤的意識(Bois, 1977: 122; Dunster, 1977: 210; Llorens, 1981: 86; McLeod, 1985: 10)。

這種建築的意識形態分析在塔夫利兩本與他人合作的著作中獲得了完全的發展：《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with Dal Co, 1979)以及《美國的城市：由內戰到新政》(The America City: From the Civil War to New Deal)(With Ciucci Dal Co and Manier—Elia, 1973/1979)，以及散見許多發行量廣大的文章中。

最後，一個嚴格的歷史方法在70年代末終於形成了(Tafuri, 1977; 1980)。追溯由普內尼西到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建築本身像制度一般被貫穿，成為一個既定時期的意識形態障礙物，關乎在既定時間中之知覺與心象結構。塔夫利試圖去了解“建築的語言”，然而却不經由一種純粹的語言學的分析去打算重鑄作品的知識脈絡。歷史被塔夫利視為一種生產、一種意義的生產，一種解構的工具。在這樣的歷史論述之

中，“歷史既是被決定的，又是決定性的：它被自己的傳統，被其分析的對象，被其採納的方法所決定，以及決定它自己的轉化，一如它所解構的現實。” (Tafuri, 1979/ 1980: 56)。

此外，他在威尼斯之建築與城市中，在贊助者、專業競爭、政治、科學辯論的張力之間應用其方法(Tafuri and Foscari, 1983; Tafuri, 1983, 1984)。迄今為止，在其皇皇巨著：《領域與迷宮：由普內尼西到1970年代的前衛與建築》(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 (1980/1987)的導言之中，塔夫利的史學方法呈現了一種理論的重編組與理論的嚴謹。所以，以下的分析，大部分的材料都將以這部較能代表塔氏理論架構的著作為基礎。

按照勞林的分析，在塔夫利持續不輟的每一本著作中，其精煉歷史寫作過程被刻劃為“順流而去，挾泥帶沙，將其流經區域的養分一一保有” (Llorens, 1981: 93)。例如，如我前面所提，現代建築歷史遺產的主題是在其後繼之工作中才逐步完成的。甚至，在歷史寫作的風格上，在其議論之中存在的不是英美德傳統的線性思維邏輯，而是“朝向一遙遠但不是經常能識別的目標射擊” (p.94)。如同賀龍·巴赫德之寫作方法，塔夫利在歷史、社會學、哲學與新聞報導中抽取原料，收集在其寶匣之中，以備特定情況而用(p.93)。它的敘述是“加諸於其上”(superimposed)而非“融合”。事實上，對應著1968年以後馬克斯實踐的多中心理論。這些組成元素也意謂著所謂的“馬克斯主義危機”的哲學與方法論(Tafuri and Dance, 1981: 7)。塔夫利式的歷史計劃，不僅僅受惠於阿圖塞所提供的一般基礎，義大利史學家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與安德瑞阿諾·伯里斯培利(Adriano Prosperi)的微觀歷史，賀龍·巴赫德式零度寫作與神話學所開展出來的意識形態批判，米謝·福寇(Micheal Foucault)的系譜學／考古學，賈可斯·戴希達(Jacques Derrida)之解構，而且奠基於亨利·羅伯·齊默(Heinrich Robert Zimmer)、華德·班哲明(Walter Benjamin)、佛

洛伊德、尼采甚至海德格<sup>10</sup>的早期傳統之上，不容易限定塔夫利式方法論混合的邊界：馬克斯主義、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以及尼采與佛洛伊德之思想。這就是所謂在後葛蘭西的義大利土壤上之“後馬克斯主義”的塔夫利立場。

二十年前的義大利，現代建築與近代城市的歷史研究完全仰賴於二手與三手的資料與文件。現在，這種難以忍受的情境已經改變了，全世界沒有任何地方的建築史學術成果在理論創新的建樹上能超過義大利(Hancock, 1980: 469)。曼菲德·塔夫利與其同僚的貢獻是造就了這個成果的主要力量。威尼斯學派在對於陳腐的、保守的，在社會運動中所催動的反省風潮下動搖的主流建築史論述而言，提供了一條不同的替代性選擇。尤其是對有理想的第三世界留學生言，若有志於建築歷史與理論，今天的威尼斯大學建築學院已成為他們心目中新的經地了。

## 二、空間形式

由於在1969年的政變，塔夫利放棄了卡薩貝拉團體這種將類型當作分析工具的研究方法。不論是郭翠米爾·狄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對原型(archetype)的觀念，還是尚·尼可拉斯·路易·杜蘭(Jean-Nicholas-Louis Durand)的建築物類型(building type)的觀點，在1969年之後都不再煩惱塔夫利了。事實上，在羅西、安莫尼洛、羅伯·柯爾(Rob Krier)與阿岡的類型學觀點中，在靜態的、固定的結構與社會的、歷史的變動之間的矛盾，在在顯示了他們不自覺的新柏拉圖主義之形式主義“永恆不變”(constant)與“先驗”(a priori)，而非論述中的辯證地建構(Mead, 1983; McLeod, 1984; Dickens, 1981)。這是在60年代末與70年代歐洲進步的知識份子共同的形式主義特色之一。他們堅持上層建築的相對自主性，拒絕了史大林主義與其

<sup>10</sup>塔夫利本人是拒絕海德格的終極性提法，然而在達哥的著作中卻可見到比較大的海德格影響。

他的經濟主義、歷史主義、經驗主義、現象學與人文主義。他們陷入了阿圖塞主義的陷阱之中，即，一種類似新康德主義的認識論之中<sup>①</sup>。

對塔夫利而言，對營造物(building artifacts)的分析關乎所有的脈絡組織，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分析。在我們了解塔夫利如何組織他的概念來處理空間形式與脈絡組織的關係之前，在本節我先看看塔夫利如何在其著作中處理空間形式本身。

### (一)主體與客體的關係

對塔夫利式的論述而言，建築本身被當做為一種制度，“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障礙物”(Tafuri, 1979/ 1980: 59)。塔夫利式的意識形態分析有一個精煉的過程：

在《建築之理論與歷史》一書中，塔夫利式批評的範域要求由建築對象(客體)的分析改變到對限制對象(客體)形狀的所有脈絡進行全面的分析。他注意到建築師之意識形態計劃書的脈絡分析，而非對他們的作品做計劃書方式的分析。這也就是為何葉夫·阿蘭·波伊斯(Yves-Alain Bois)認為塔夫利式的史學失去了建築對象(客體)本身，在意識形態詮釋的剩餘之下，正文就看不到了。波伊斯認為一種將建築視為後設語言之深思熟慮之實踐才是適當的(Bois, 1977: 118, 120)。

然後，在《領域與迷宮》一書中，一個更細緻的分析被塔夫利發展出來了。意識形態並不以一種線性的過程運作，僅將歷史調查的重點由正文轉移到脈絡是不夠的。塔夫利寫道：“脈絡組織擠壓藝術的語言、實質現實、行為、都市與領域的向度、政治經濟變動在一起，但是它被‘技術的插曲’繼續不斷地改變：被戰術上的巧計——它和大的戰略含糊不明地相交織；被隱藏的意識形態——它在主體之間的

<sup>①</sup>我將在第七、八、九章中討論阿圖塞主義者之理論的得與失。

層次上操作；以及不同的支配技巧的反應，等等繼續不斷地改變，這每一個都具有一特殊的，但却是不能翻譯的語言” (Tafuri, 1979/ 80: 59—60)。

對塔夫利言，史家／批評家必需由關乎作品結構之內的參數與意圖之限制條件來度量作品。塔夫利式的特殊的語言分析試圖避免庸俗馬克斯主義的研究途徑。建築的對象為一種閱讀所強調，這閱讀處於可檢驗的參數基礎之上，處於在生產關係變動之內部的真實決策之上 (Tafuri 1979/ 80: 69)。用詹明信的話來說，最好是去審視在意圖與實踐已經獲致的效果之間的關係，而非以一教條態度將形式化約為先驗 (Jameson, 1985: 60)。

更進一步，既然建築本身被界定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障礙物，在其論述的形式之中，主客體的關係（以及形式與價值的關係）就可經由意識形態之空間課題來了解。至少，在這點上，對建築作品的巴赫德式的閱讀，似乎比海德格式的閱讀更為塔夫利所接受。在詹明信論塔夫利文章的一開頭，意識形態空間的課題就已經清楚地闡明了。詹明信由以下的角度提出議論：自然主義式的，或人類學式的角度，特別是在現象學中，傾向於經由感覺的身體來度量異化了的空間。然而，“以一人體做為論爭的基礎，基本上是非歷史的，這涉及一些關乎永恆的‘人的本質（人性）’的前題…在現實中，身體是一社會性的身體，這裡沒有預先設定了的人體，而是身體之社會經驗的整個歷史之範圍。這就是說，身體的不同規範為不同的歷史的‘生產方式’或社會構造所投射。所以，現象學之論述中的，空間中的身體所要求‘回到’更‘自然’的觀點，不是一種鄉愁也還是意識形態的” (Jameson, 1985: 51)。這正是塔夫利式的意識形態分析所想要處理的。

作為結論，處理主客體關係，塔夫利似乎是拒絕了結構主義與詮釋學。他處理豐富與複雜的主體，但是超越現象學的曖昧，即，對接收過程提供了一個批判性分析。他也針對形式與正文提出嚴格的分析，但是却反對巴赫德式純粹正文性的“語言的神奇範圍” (Ockman,

1985: 183, 184; Jameson, 1985: 62, 65; Tafuri, 1980/1987: 301-303)。換言之，針對建築語構與文法的理論所造成的問題也被塔夫利有意地避免了(Tafuri, 1968/ 1970/ 1976/ 1980: 227)。

### (三)價值與形式的關係

順著前面討論的邏輯，形式的意象，對塔夫利言，不是一種修辭學上的形象。所以，價值與形式的關係應被安頓在社會歷史的脈絡中來追溯價值的功能，來揭露歷史的面具。

既然建築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障礙物，對既定歷史時期之心象結構的意識形態分析就是了解建築所必需的事。對塔夫利言，也必然會拒絕“操作性批評”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像虛幻的歷史分析般投射了對一個新風格的規範性價值(Jameson, 1985: 65)。例如，在羅伯·范求利(Robert Venturi)的批評之中，對模糊、曖昧與矛盾的價值(Tafuri, 1968/ 1970/ 1972/ 1980: 213)，或者像保衛現代主義的史家的道德性投射，如基提恩與派夫斯勒(Ingersoll, 1986: 14)。<sup>12</sup>

塔夫利寫道：“嚴厲斥責‘操作性批評’之方法是沒有用的——更正確的是先用‘規範性的’標籤區分他們，避免把我們真正的意圖弄模糊了——讓其基本原則不受影響”。然而，意識形態絕不會像機械的力量般作用著。“意識形態絕不像一種‘純粹’力量般作用。它不僅是‘土壤’，和被實踐所‘孕育’，而且它與其他的，經常是正好互相對立的意識形態，相互糾纏”(Tafuri, 1979/ 1980: 65)。涉及弗洛依德之觀察，塔夫利認識到找出隱藏性質的必要性：“在正文的變形扭曲之中，有一類似謀殺的東西。困難不在於惡行，而在於除去了蹤跡”(Tafuri, 1979/ 1980: 62)。我們看到塔夫利避開了形式主義的陷阱，看到空間正文變形之中的意識形態潛藏著的自然化過程。

<sup>12</sup> 此處可以一提塔夫利在1968年之著作中即指出基提恩的操作式批評不能認識到其自身之意識形態根源，是一種推動現代建築的計劃(project)(Tafuri, 1968/1970/1976/1980: 151)，這觀點竟為大衛·威金(David Wakin)所偷取，做為新保守派清除自由派以重建新保守主義霸權的攻擊發起線(Wakin, 1977)。



所以，意識形態的批評就是尋求歷史分析的能力來移開附著在作品觀念上的人為的神話(Tafuri, 1979/ 1980: 71)。他採納了班哲明的貢獻，古典形式的“氣息與韻味”(aura)，以及獨特的風味，都為藝術的機械再生產所永遠地摧毀了。此處，瑟德·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話是對的：“這些作品的‘說明的價值，應及時取代其風格所感應的‘崇拜價值’，這是一交換過程的階段”(p.72)。語言的豐滿性，形式的絕對連貫性已經歷史地被摧毀了。去尋求一鄉愁的“中心性”的永恆的結構，是去蒙蔽歷史的現實。“當前，除了追溯歷史之外，真正是沒有其他的可能性了，而這樣做却導致了符徵與符旨之間的分離，導致再一次行經不穩定之結合的危機之旅程，以及導致具體化其本質的結構…”(p.61)。所以，追溯“價值”在脈絡中的作用，揭露“歷史的面具”就成為塔夫利式批判史家的任務了。對塔夫利言，史家的任務在於指出問題的多重性，而非對現有設計操作問題提供形式上的答案，或是用對設計行動之期望來推動歷史。

###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的關係

我已經提過在塔夫利式的歷史計劃之中逐漸出現一種較複雜的理論架構來處理形式與脈絡組織的關係：將歷史調查僅僅由正文轉移到脈絡組織去，成為脈絡批評(contextual criticism)是不夠的。一切“技術插曲”經常在正文與脈絡組織之間中介，就像戰術上的折衝、隱藏的意識形態，對不同支配技術的反應…等等。他們每一個都有一種特殊的，但不能傳譯的語言。以下，我試圖檢視在塔夫利式的理論論述中如何處理在文化脈絡與正文、社會脈絡與正文之間的非直接關係。

#### (一)形式與文化脈絡

對塔夫利言，在正文與脈絡間的非直接傳遞關係之不能傳譯語言，是基於認識到“對形式其邊界的本質這個主題、語言的限制這個主題，是歷史地決定了的危機的整合部分…”(Tafuri, 1979/ 1980:

60)。他由喬治·西默爾(Georg Simmel)處引用尼采式對形式與邊界的看法：“形式的秘密在於它是一邊界；它是事物本身，以及同時，事物中止於此，畫了界線的領域，此處存在與事物的不存在僅是一件事。”這已關係著空間論的基本概念了。然後，塔夫利試圖反應記號學的失敗，原型象徵的無知，形式分析的絕對連貫性，即，康德主義超驗的統一性。事實上，它正是當前社會本質結構的具體化。然後，像我們前面所提的，意識形態“藏身於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的外表，表意實踐狡詐地藏匿在爲了轉化現實的技巧摺縫之中…”。換言之，它是濃縮爲一個名字、一個符號、一種語言、一種意識形態的偶像”(p.61)。進一步，經由套用馬克斯對拜物教秘密的觀點，可以加幾個字以擴充塔夫利的觀點：語言、正文、或形式是一種平凡的感覺的物件。但是現在，它變爲一個超感覺的物件。它不僅是用腳踩在地上，而且還是用頭倒立著。形式將我們自己勞動的社會特性反映爲勞動產品本身的特性，反映爲這些物的社會的天然屬性。經由這轉換，形式變成是感覺的物件，它同時又是超感覺的或社會的物件。它不過是人們自己之間一定的社會關係，但它在人們面前採取了物與物關係的虛幻形式。

一再，塔夫利回到尼采，語言之使用變成支配的技巧。最後，“歷史系譜學體現爲勞動，一種解構與重建的勞動所有的特性”，它解除了意識形態與符號拜物教的秘密。此外，在語言、價值與科學構造中，尼采式的“發現大量遺漏”，以及弗洛伊德式“釋明”(deciphering)的工作，兩者都在塔夫利的論述中連繫爲一基本的分析(Tafuri, 1979/1980: 62)。歷史分析的解秘行動，暴露了符徵(signifier)與符旨(signified)的分離性，說明了它呈現的正是正文中的虛空，一意識形態幻覺的空白，檢視了被“正文”地位之“完成的品質”所掩蓋起來的問題(p.67)。

## (二)形式與社會脈絡

順著形式邊界與語言的限制本質的邏輯，塔夫利提到“多重邊界”的問題。生活的現象呈現了生存的每一時刻中力量的多數性。這也就是說，喬治·西默爾的話可以進一步認識為：“社會生活似乎成爲寸土必爭的戰場，以及社會制度似乎像那些連續作用的主要對手間短暫之調停後所假設的一種外顯的合作形式” (Tafuri, 1979/ 1981: 60)。

在同樣的脈絡下，塔夫利“談到多種的辯證”來分析建築的神話，處理社會脈絡與正文間的關係。對他言，歷史的對象是分析權力／制度的對抗。“實質空間的營造肯定是‘爭戰’之場地：正確的都市分析充分地表明了這點。這種爭鬥不是極權主義的，它留下邊緣、餘數、剩餘，也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Tafuri, 1979/ 1980: 62)。這是歷史調查的廣大領域。此處，塔夫利式之批判歷史很明顯地接受了後結構主義與尼采的理論。

最後，由於主體的複雜性(Tafuri, 1979/ 1980: 56)以及脈絡的多數性，史家對特殊歷史事實的意義生產，意謂著多重的、脈絡化的詮釋性知識，理論語言的多元性意謂著主體、科學、制度、與語言的多數性是組織現實的唯一方式。然而，歷史不能化約爲一種詮釋學，而需接受福寇與尼采的系譜學(genealogy)。不僅是辨明制度的障礙，我們必需認明我們處身在權力系統之內。現在，有別於其早期觀點，尼采與福寇的基本主旨已經清楚地表明了：“權力本身是多數的：它超越社會階級、意識形態與制度” (p.159)。

#### 四、應用的層次

對塔夫利言，只有歷史，而並沒有批評。事實上，在“批評”中所造成的混淆是由於附屬於專業的雜誌，以及盎格魯——薩克遜的思想習慣傳統造成的混淆<sup>13</sup>。塔夫利繼承的不是英美文學與藝術領域中

<sup>13</sup>：以塔夫利的觀察，史家的工作，不是去提供批評的體系。經由批評來給予一種規範性的價值是中世紀的態度。這是建築設計課教學的評圖制度的中世紀根源，然而塔夫利與盎格魯——薩克遜傳統的“思想家之對抗”不同，這也就是說，批評暗涵了一種神的裁判與父權的裁判。塔夫利說：“我們沒有神，我們只有語言，許多種語言” (Tafuri, 1985:

的批評，而是歐陸哲學領域中的批判，是發現事物之性質與限制的一種思考活動的特殊形式。在最近一次的訪問中，塔夫利說：“建築師做建築，而史家應寫歷史…歷史研究有影響行動的間接方式” (Tafuri, 1986: 11)。建築師與建築批評在建築實踐中應如此劃分清楚嗎？塔夫利的用意與其限制何在？我們最後會再提到這一點。在塔夫利式的論述中，建築被視為單一的意識形態障礙，即，為支配階級利益的表現。建築生產除了在其最小的角色，像好的手藝人對實質元素完美的要求之外，建築事實上，特別是前衛建築師，像維繫資本主義的角色般地作用著。所以，下面的論點將強調在應用層次上的兩條主線：(一)建築師與政治投身間的衝突，(二)批判的歷史。

### (一)建築與政治投身間的衝突

按照塔夫利的說法，即使“批判的”建築亦不過是支配權力的一種制度的工具。

“連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被識為類比的知識不再有效了” (Tafuri, 1986: 11)。至於建築，已不再有做為知識整體的基礎，或連繫的角色了。建築不再像在十六世紀歐洲那樣，是知識與科學的宇宙觀的綜合。同時，建築的神韻與風味也失去了，建築為營造的再生產所取代。它不再是“宇宙”的隱喻，而是“多重世界”的反映。建築扮演的角色，“在十八、十九世紀中所扮演的，是策略的主角，是了解權力對生存世界控制，對行為控制，對社會階級控制的主角” (Tafuri, 1981: 8)。如今，建築美學的形式已失去了它慰藉人性的焦慮與不安全感的力量。對塔夫利言，不再有革命的建築。“投身的建築，試圖政治地與社會地吸引我們的建築，已經結束了，剩下來所追求的只是一個空洞的建築…” (Tafuri, 1986: 11)，即，前衛取向的終結。批判的建築師僅有的選擇是，在傳統專業邊界之外去找到革命實踐的方向。

12)。這裡追求的是無支配關係的平等。

(McLeod, 1985: 11)。批判的史家成爲唯一的出發。

塔夫利肯定看到了建築師與政治投身間的衝突，在建築師所生產的與他所思考的與所寫的（即，論述）之間的矛盾。在政治的進步傾向與作品的效果之間有一種矛盾存在。進一步，這意謂著要在下一節中所談的兩個課題：

第一，它說明了在作品的空間語言、寫作的口語語言、以及社會現實之間不能轉譯的問題，第二，度量一個案子需要多進步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一個建築師政治上的進步並不必然是產生一好作品的必要條件。它有賴於社會歷史的脈絡。然而，對建築言，套用泰雷·伊格頓（Terry Eagleton）的話來說，下述之情境却是事實：假如建築與時代中有意義的運動絕緣，與歷史之中心脫離，它就必然會淪爲瑣細無足輕重的地位（Eagleton, 1976: 57）。這就是塔夫利所要表明的，那麼，一個對“建築”極端寬廣的意義、一個建築技術人員的新角色，以及一個批評家、史家任務的浮現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在理論建構的層次上，我們在關於政治投身與建築之間的矛盾應還可做更進一步的釐清。目前，建築與時代中有意義的運動絕緣，與社會變遷逐漸失去了密切連繫。要突破建築的困境之關鍵並不只在於建築師個人的選擇而已，而是在於建築論述如何能不昧於現實，如何能認識到吾人創造歷史的特殊過程（the specific process of making history）。因此，在認識論層次上，規範性理論與分析性理論又如何能分離存在呢？實踐與認識又如何能分離呢？

順著批評家／史家與建築師之間分離的議論邏輯，塔夫利式史家的任務就是要去解除專業實踐的意識形態之神祕。

## （二）批判的歷史

不僅僅建築失去了空間形式的力量——它具有絕對的連貫性與中心的象徵力量，而且，敘事歷史與寫實主義小說也一樣，以詹明信的話來說，自十九世紀末就有了危機（Jameson, 1986: 56）。對塔夫利言，

這就是批判史家的角色與時勢。因此，塔夫利式史學分析的有效性最能有所發揮之處也正是在於現代與近代時期——由封建主義的危機到今天。塔夫利式的論述正是附屬於這個多重與變動意義的不確實脈絡組織——這是營造生產的轉化結果，不能被化約為任何單一可分享的準則(Tafuri,1979/1980:71)。現在，我們將批判的歷史當做塔夫利論述形式的摘要，說明於下，它也可視我們所說的塔夫利式歷史“迷宮”的結論<sup>14</sup>。

### 1. 對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歷史而言，沒有單一的方法論。

對塔夫利而言，批判的歷史不應將自己封閉在一凍結僵硬學派的單一方法論中。對不同的學域都有話要說。他拒絕方法論上關乎折衷主義的控訴，因為建築學域其片斷化了的與多重刻面的特性，因為這是對建築提出極端廣闊意義後的特性(Tafuri,1971/1980:68,71)。批判的歷史是一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塔夫利關心的是戰鬥的策略。對他言，歷史是“在線索之上所完成的建構，當戰爭已結束，在戰場上遺留下來的一系列軌跡之上所建構情境的過程。”在這意義下，歷史的重建也是相同的。“在這意義下，歷史是按照表現它們自己的各種機會，使用不同方法的策略”(Tafuri,1980:9)。

### 2. 批判的歷史並非針對客體。

所以客體的選擇並非塔夫利論述的問題，而是代之以“問題”。客體只有脈絡之中才有意義，在它們與問題的發生的關係之方式下才顯示出意義。塔夫利宣稱：“為了處理作品背後的問題，史家必需放棄他對作品品質的偏見。”(Tafuri,1986:10)。這意謂著建築論述的意識形態分析。

<sup>14</sup>由金斯堡與伯里斯培利那兒借用歷史研究之方法，對塔夫利言，歷史學的迷宮關乎歷史研究的神秘空間之錯綜複雜的網絡之意象，歷史分析的迷宮之路似乎可以連上福寇的論述實踐的想法。它表明了歷史研究困難的道路、疑旨、哲學架構的複雜過程。或許，某個程度上，迷宮可以在建築史中有更多的涵意——這是對作品偉大信心的象徵。以極大的自信，哥德大教堂的師傅們在西向的神龕之地板中心簽署他們的作品。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偉大的傳說中之營造者——戴德拉斯(Daedalus)——米羅迷宮的營造者之後裔(見 Hofstatter, 1970:57)。

### 3. 批判史家創造一種距離來解除表現意識形態的自然化之修辭(措辭) (rhetoric)。

替代簡單地將調查轉移到脈絡，批判的史家處理建築之意識形態自然化(naturalization)，即，一個自然化了的修(措)辭(a naturalized rhetoric)。批判的歷史是一個解秘的計劃(a project of demythification)，它致力於審視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建築語言中的自然化過程(Prophyrios,1985:19)。然後，創造一種對作品的距離，表現作品的一種人為距離，對歷史言是基本的。這可以經由與其他時代的比較而獲致。對其他時代的深刻知識，使我們對現在有一更好的了解(Tafuri,1986:10;1979/1980:70)。簡言之，塔夫利的研究的中心主旨就是意識形態的歷史角色(1979/1980:69)。

### 4. 批判的歷史對循環(cycles)有興趣。對塔夫利的論述言，批判史家對說明循環更感興趣—一系列事物—而非建築師個人作品風格的分類法(Tafuri,1986:11)。

批判史家必需去檢查重建歷史時期的準則，在有最完滿意義之詞語中建構結構性的循環(structural cycles) (Tafuri,1979/1980:73)。批判史家知道歷史分析本身自主性的限制，對解秘力量並不存有幻想 (p. 67)。

### 5. 對於批判史家言，歷史僅僅是在現實戰鬥中的許多聲音的一種，這聲音不能也不會自己就獨立宣告戰鬥的勝利。

歷史寫作參與在眾多力量的整體計劃之中，在知識的勞動上扮演它自己的角色 (Tafuri,1981:7)。塔夫利說：做為史家，我們的任務是經由現代歷史重建知識勞動清明透徹的過程，在如此行事下，歷史工作者重新確認這個有條件的任務，這要求勞動力的新組織”(Tafuri,1979/1980:73)。批判史家知道歷史分析本身自主性的限制，對解秘力量並不存有幻想 (p. 67)。

### 6. 歷史作品被迫不斷反叛自己。

歷史不僅僅是治療，歷史質疑它自己的材料，重建它們，而且不

斷重建自己。歷史學家是在多數狀態中的勞動者。建構本身是一種有待再詮釋、分析與超越的東西 (Tafuri, 1979/1980: 66)。

## 五、認識論的批判

在檢視塔夫利的歷史計劃的過程中，有兩個潛藏著的問題：“什麼是營造之造物？”以及“什麼是空間與經濟、政治實踐間的關係？”他們關乎塔夫利論述的形式 (descursive form) 決定了塔夫利的政治“悲觀主義” (Jameson, 1985: 65)。

基於尼采與福寇的系譜學與考古學，塔夫利之歷史論述與目前在建築史中的任何範型都不相符合。對他而言，歷史非關乎客體、風格或是正文與形式，而是關心對學域間脈絡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 的問題。在形式的分析中，塔夫利注意潛在的意義而非正文的直接溝通。

順著班哲明的研究方法，對建築永恆風味與神韻的破壞，塔夫利對符號的分析是中肯的——符旨隨著符徵所涉及的不同脈絡而改變。這是像福寇、戴希達這樣的後結構主義的觀點——語言遠比結構主義所認為的要是不確定。如我們所知，塔夫利拒絕了康德主義的先驗正文，因為他接受了將建築視為一種制度的說法而非一種本體論的說法。雖然他與早期巴赫德的零度寫作與神話學有志一同，他仍然拒絕了結構主義與記號學對形式的非歷史分析。塔夫利也拒絕了一種預設的人類主體，一種詮釋學的歷史的身體。此外，他的政治立場與心中的價值也拒絕了操作性批評與語意分析也是可了解的：這就是說，他尋求一種“歷史的系譜學” (historical genealogy) 而非一種正文的科學 (textual science)。

然而，第一，為了完全地反應來自波伊斯——一個賀龍·巴赫德的學生的批評，即“客體 (對象) 的危機” (the crisis of the object)，僅僅是針對專業提出意識形態計劃書的意識形態分析 (塔夫利拒絕了對營造物之計劃書式的閱讀) 仍是不夠的 (Bois, 1977; 1981: 60)。進一



步，代之以簡單地由正文轉移到脈絡，對塔夫利言，脈絡擠壓社會、政治與實質的元素在一起，以及為特殊的，與不能傳譯的政治、經濟、專業、與意識形態的技巧所中介與斡旋。

第二、即使他連續地精煉其歷史方法，迄今，有幾個針對“專業的意識形態計劃書”（以波伊斯的話來說）的問題，在歷史脈絡、社會內容與空間形式之間，還不能提供有說服力的答案。這就是說，假如塔夫利的論述不是仍存留了70年代結構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的餘緒於其後結構主義取向之中，就是在理論的層次上，塔夫利還未能提供一個清楚的，社會、歷史診斷的分析架構。以下就兩項問題做進一步的闡述：

### （一）空間的特殊性

塔夫利對美國的精英建築師間的“灰”與“白”派之爭的批判是銳利的。塔夫利說：這僅是一種文化消費的建築生產——為經選擇過之大眾所提供的一種文化享受。他也批評羅伯·范求利與路易士·康，認為他們倆都將建築轉向其自身之內，不論他們的新的想像領域是來自表徵了全球性商業價值的圖象（如羅伯·范求利），或是來自不存在的（制度）的夢境（如路易士·康）(Tafuri,1976:53-58)。然而，塔夫利要如何回答丹妮斯·史考特·布朗(Dennis Scott Brown)在其標題為“建築形式主義與社會關懷：社會規劃師與激進時新的建築師之論述”(On Architecture Formalism and Social Concern :A Discourse for Social Planners and Radical Chic Architects)(Scott Brown,1976)中所提出的質疑呢？對塔夫利言，為史考特·布朗所攻擊的社會規劃師與激進時新的建築師正是前衛主義者。他們的角色在塔夫利之《建築與烏托邦》中已被全面地揭露了。這些問題可能是紐約的評論家如甘尼斯·佛明頓(Kenneth Frampton)的弱點，而不是塔夫利的痛處。對塔夫利式的批判歷史的論述言，回應史考特·布朗之挑戰的真正弱點是塔夫利式論述中形式的特殊性課題。塔夫利的方法將

對藝術語言分析的注意力由“直接的溝通”轉移至對“潛在意義”的領域，追詢資本主義分工的歷史正當性，即分析意識形態的歷史角色 (Tafuri, 1979/1980: 69)。

前述波伊斯的問題主要針對實體的空間形式本身。由於歷史的空間形式不是一種單純的靜態心象表徵，而是一種意識形態鬥爭的衝突模式。我們必須能處理在歷史脈絡、社會內容與空間形式之間社會的、政治的、專業的意識形態的中介(mediation)。

讓我們處理在美學論述中空間的形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知道在特殊脈絡中的空間形式，其物質性的特殊性，以及社會地與歷史地建構的經驗方式。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闡明主體與客體兩者間的意識形態連結。

一方面，拒絕了索緒爾之“表現主義”的語言學，空間元素提供在特定論述中，衝突的社會團體鬥爭的地方。意識形態深深地連結在空間元素的模式之中。這就是說，既定的空間是特定之歷史地與意識形態地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然而，這還不夠。

另一方面，空間形式是感覺的形式。設若拒絕了現象學的自由飄浮的地方感，空間形式則是一種觀察世界的特殊方式，是在特定時期社會變動的衝突過程中，社會意識的結構。設若拒絕內容主義者單純地化約內容為意識形態，化約形式為裝載意識形態的容器的話，空間的意識形態實在地說是種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Hadjinicolaou, 1978: 15-16)。所以，空間形式語言的特殊性對使用者產生效果，它關乎營造物在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中的運轉展現，這就是美學中的營造修(措)辭(building rhetoric)之所做所為。

然而，並沒有什麼傳統美學中的“無利害關係性”(disinterestedness)，美學是社會地制度化了論述與權力。審美的經驗是社會地與意識形態地安置與設定好了的，以及，同樣不可化約為社會的或意識形態的(Wolff, 1983: 84)。審美的敏感性是與階級和性有關連的，同時，對美學形式本身的辨識必須被視為正文中之愉悅的主要來

源(Lovell,1983:95)。“建築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被中性化了、自然化了的修(措)辭。然而,在討論政治、社會、經濟之外,一個批判的史家也必須能處理形式本身。

即使如此,塔夫利的“客體的危機”也不應被責難太多,它論述地與塔夫利的宣告有關:建築師被悲觀地、命中注定束縛在其論述之中。當然,在目前的脈絡中,建築師確實已不是社會與歷史轉化的中心,而是在其專業論述中對應的社會分工角色。塔夫利遣責建築的實踐,認為它已被建構為一種不涉及論述的批判的工作(non-discursive critical work)。這種改良主義的神話確實應被摧毀。我們需要一種對專業角色與其功能的社會政治批判,即,我們需明白:權力的論述與空間形式的意識形態表現。在意義界定的戰場上,社會變遷的衝突過程是經由社會與歷史角色的表現限制了空間的象徵的條件——這正是設計師的角色,而都市功能的政治協商者——則是規劃師的角色了(Castells,1983:503)。

然而,假如營造形式的特殊性被忽略了,被化約為一般的意識形態而非衝突的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就在權力與論述間簡化了問題。在特定的時刻,空間作為社會的積極組成要素,總有某些來自真實戰鬥的信息,它不應該被忽略。空間的計劃在特定脈絡所造就形勢之下會有可能成為變遷的隙縫(enclaves of changes)(Jameson,1985),因為,在系統中的早期缺口與隙縫往往是帶動其他部分改變的必要過程。星星之火有可能成為燎原烈焰的熊熊之火。當建築不再成為人類知識、技術與科學的宇宙觀綜合表徵時,建築的神韻與風味也失去了宇宙的隱喻,成為變動意義的多種世界中文化消費對象。當新科技的變革重新架構了社會活動中空間與時間的新經驗時,都市象徵文之化消費成為一般人日常生活環境中充斥的元素。新休閒關係也取代了神聖的空間關係。這時,塔夫利成功地破解了常規性的風格觀點中鄉愁中心性,或許,在釋明了現實的社會關係之後,日常生活的權力與符碼在新休閒關係所伴隨的嘉年華式身體的狂歡中,其實孕育了顛覆支

配性美學規範關係的種籽。這正是女性主義批評、文化批評等等得以致力之所在，也關乎我們要在下面進一步談的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的集體的主體的理論問題。

## (二) 論述，空間形式與衝突的社會經濟變動

雖然，塔夫利的歷史方法並非一種秘術——其精練了的理論架構是與眾不同的，然而在歷史脈絡、社會內容與空間形式間的關係的課題上它表現得仍有些曖昧。缺乏清晰性並不全然由於塔夫利歷史寫作的翻譯問題<sup>15</sup>。部分的理由是由於福寇有意的語言所造成的問題。對福寇與塔夫利言，由權力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涉及對他們自己語言的一恆常質疑(Lemert and Gillan,1982:95)。這部分的理由或許關乎其歷史方法的認識論：

塔夫利在其歷史方法中拒絕社會理論。對他言“理論”這個字意謂著知識的綜合整體，它意謂著將空間形式帶回到整體性上去。這個中心性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就失去了，甚至或許在十七世紀就已經存有危機了(Tafuri,1981:9)。他拒絕了馬克斯·韋伯與歐文·潘諾夫斯基的工具抽象之後的隱藏的網絡，而寧取一固定的抽象來給予一個理論的方向，譬如，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分析上的抽象(Tafuri,1979/1980:57,6)。他也拒絕了像阿諾·豪塞(Anold Hauser)的庸俗社會學，庸俗馬克斯主義的反映論模型，以及馬庫色學派等等。所有這些塔夫利式的方法論上的傾向都可以被了解與接受。然而，一個社會的，分析性的理論難道不可避免地與詮釋性知識的歷史方法相對立嗎？

事實上，塔夫利知道馬克斯的歷史方法是由歷史的前題出發——這前題是人，但是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上觀察到的發展中的人。“只要這能動的生活過程被描述出來了，

<sup>15</sup>賓尼吉里諾·阿西里諾(Pellegrino d'Acierno)在因塔夫利反對而未能隨《領域與迷宮》之英文版刊出的介紹性前言中一再強調塔夫利寫作的翻譯困難，這個困難可比喻為塔夫利式的義大利飛拉利(Ferrari)跑車轉換為英語的福特汽車一般(d'Acierno,1987)。

歷史就不再像是在經驗主義者那兒，是一僵化事實的集合，或者像是在觀念論者那兒，是一想像主體的想像的活動(imaged activity)”。知識將經由抽象而取代意識，它由對人的歷史發展的觀察中獲得。這些抽象不能與觀察歷史的觀察脫離。他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以指出分離的歷史資料各層次間的連貫性，但却非給予各歷史時代一種通用的公式(Marx,1945-46/1970:42)。批判歷史對結構性的循環再三致意。對結構性的循環言，歷史不外是各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行事；由於這個緣故，每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條件下繼續從事先輩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改變舊的條件(p.57)。但是不是后一時期成爲先一時期的歷史的目的(目的論)(使命)。換句話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Marx,1951-52/1969:398,1842:603)。總之，兩條認識論的主旨呈現於此：

1. 客體性(對象性)(objectivity),在本體論向度的,社會形成的相對獨立的現實性。

2. 認識過程中,勞動,在認識論向度中的人類實踐(Bhasker , 1983:25)。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知識是在經驗論與觀念論間,社會科學與歷史哲學間、科學的與批判的性質間的張力之中,經由主體在物質現實中的勞動,知識勞動的過程,而建構起來的。

處理社會生活的物質性與人類主體的實踐,這兩主旨間的關係,塔夫利的歷史方法中對意識形態與權力的概念可以再度加以審視:

塔夫利經由其脈絡式的詮釋以及對關乎空間形式的意識形態機器之理論角度來評估前衛建築師們的寫作與實踐的象徵空間、經濟與政治實踐等等之間的非直接關連,必需加以區別出來,以及在其影響的每一層次上連結貫穿起來。在塔夫利的早期寫作中(Tafuri,1968/

1970/1976/1980/1973/1976)，塔夫利界定意識形態為錯誤意識的結構，為支配系統的知識份子所給予，建築為意識形態，所以為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所支配，它建構一種不可避免會導向失敗的烏托邦幻覺。這個悲觀主義是由其對意識形態一般化的觀點所造成的，這個一般化的意識形態變成一個先驗地存在於其論述之外的東西。意識形態似乎變成結構主義的，半康德主義的前題，而非一衝突階段中的“諸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與科學間的差異，不能單純地區分為錯誤與真理間一般性的差別。在社會實踐中，有一種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的層次<sup>16</sup>。事實上，科學是一種社會分工，是生產關係與社會分工的結果。意識形態的扭曲不能由批判來克服，而只有當支持意識形態的現實中的矛盾，在現實社會關係中的矛盾，實踐地被轉化了，意識形態的扭曲才能被清除。理論的鬥爭僅是整個認識論實踐的一個階段而已。這個意思是，意識形態顛倒的根源是現實本身的顛倒。意識形態的顛倒超過了哲學所謂的異化或是幻覺。它表現了現實世界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現實的矛盾，即，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建築師所需要的歷史知識正是需要能掌握意識形態分析，釋明形式之作用、專業者做為特定行動作用者的位置與社會關係。

超過假設建築為一種封閉的、支配意識形態機器，同樣的傾向性也可以在塔夫利對權力與語言的精練模型中發現。對塔夫利而言，歷史是當戰爭過後，遺留在戰場上的線索的建構。在這個意思上，歷史重建的這側面，也是彼此之間張力的對抗力量的戰場。歷史是戰場，而不只是一個發表宣告的地方(Tafuri,1981:9)。然而，在這個戰場之中，一般化了的權力低估了集體的主體之實踐，像，社會運動、階級與性別的鬥爭。專業的論述，像規劃與設計，並不是一種封閉的意識形態機器，而是一種意識形態與專業的戰場。它不僅關乎制度機構——國家機器，與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現實的矛盾，而且反應了集體的主體的鬥爭的衝突。進一步，在歷史戰場中的對抗的力

<sup>16</sup> 很意外，塔夫利在1981年的訪問中仍宣稱：他沒有意識形態。(Tafuri,1981:11)

量肯定不只是發生在語言之中。對塔夫利言，歷史再生產了戰鬥，但僅僅是重建語言本身的戰鬥。塔夫利接受了“解構”(deconstruction)的遺產。同時，它是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重建。簡言之，權力與論述變成半康德主義式的非社會與非歷史的先驗。

此外，戰鬥中的對抗力量是歷史中的具象。歷史經由抽象再生產了在另一領域中的戰鬥。一個分析的架構將有助於掌握複雜的現實，因為本質，內在的連繫與複雜的變化規律往往集中在概念之中。然後，抽象將在進一步具象中被再度表現為社會實踐。這是實踐認識論的整個過程(具象——抽象——具象)。這意謂一種對歷史哲學與社會分析理論之間張力的理論調整。

空間形式與社會經濟利益關係間清楚的抽象會幫助我們超越了在社會與歷史變遷中單純的空間觀點。譬如說，塔夫利曾經類比美國的中心商業區的摩天大樓為升起的公司資本主義的天主堂——空間形式，經由技術與其意識形態，表徵(再現)了資本。假如不嫌過分挑剔的話，在社會經濟利益與空間形式之間的傳遞過程需要更細緻的理論範疇來處理它們之間更複雜的關係，來有效回答空間的多重意義，摧毀在符號、語言與意識形態周緣的拜物教神祇。這不正是晚期塔夫利式歷史計劃所要求自己必需仔細處理的事嗎？語言形式表徵的複雜變化，形式象徵與功能內容之間的相對自主性需要清楚的理論抽象。空間的文化意涵並非僅靜態地關乎思想觀點、關乎心理表現，而是關乎衝突的歷史社會動力對空間意義賦與的結構性展現過程。

有別於經濟利益決定空間形式的提法，曼威·柯司特(Mannel Castells)所建構的歷史意義、社會功能與空間形式之間的關係與層級的理論角度可以做為參改。此處，所有的空間意義與功能都不是一種中性的經驗對象，而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這也就是說，空間(每一種類型的空間)是歷史的社會來決定空間的意義是什麼。空間的文化形式是空間意義的象徵表現，它總是為歷史主體之間的衝突過程所決定。順著這個邏輯，空間的社會變遷被稱為空間

意義的再界定。所以，規劃被稱為為分享空間意義的空間功能協商的調適。設計則被稱為象徵的（意識形態的）表現，在特定的空間形式中表現已被接受的空間意義(Castells,1983b:302-304)。

事實上，這個分析架構可以總結為兩個研究的問題：空間如何被塑造或生產，以及，有意圖的人類作用者在特定歷史脈絡中如何推動結構性的空間變遷之過程。塔夫利受惠於班哲明對藝術生產過程的分析。他們都教導我們，當空間在特定歷史脈絡之中像商品來生產時，傳統建築的獨特性的風味，永久性與整體性的神韻（事實上，建築是社會地與歷史地建造起來的某一類型的空間）為營造工業所清除，為房地產開發所清除，為生活空間的分配所清除了。空間誠然為社會衝突和矛盾性的期望所塑造的結果，結構性的支配性利益確實經常塑造了空間，但是，抗爭的線索和展望未來的不同預期也必可在空間的形式與意義中被辨認認出來，我們必可找到這些爭議和衝突的痕跡，它有助於釋明社會關係，釋明社會行動者之角色與專業角色的潛力與限制，釋明意識形態之作用等等。這些爭論的主題正是解釋歷史的關鍵所在，不止於此，歷史的時勢不正是要求我們社會地與歷史地分析空間的形式，為推動結構性的空間變遷做出必需的貢獻嗎？

史畢羅·考斯多夫 (Spiro Kostof) 說的話有意思，對一位歷史學者言，除了研究與教學外實別無他務，他的工作就是：去說話。然而，塔夫利却提醒了我們，批判的歷史正是要挑戰歷史寫作自身，因為權力隱藏在一切論述之中，即使當論述產生於權力之外的學院亦然。這論點正是賀龍·巴赫德在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說中質疑在權力之外的法蘭西學院之學術事業時，所提出開設文學符號學講座最深刻的教學構想——釋明在我們所說的與所寫的語言中的權力 (Barthes, 1977/1982)。讓我們開始下一章的題材。





圖6-1 結構主義時尚——結構主義在那兒？米謝·福寇、雅克·拉崗、李維司陀、賀龍·巴赫德（引自 Barthes, 1975/1977：146）

## 第六章 由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 賀龍·巴赫德

“…於是文學終於實現了俄耳菲(Orphean)的夢想：沒有文學的作家…這表徵了寫作熱情的最終殘餘，它一步步地追隨著資產階級意識的解體。”

——賀龍·巴赫德 (Barthes, 1953/1967: 7)

“這雙向運動是深刻的：建築總是夢想與功能，總是某種烏托邦的表現，又是一種求便的工具。…事業的單純功利主義與無限強大的夢幻功能是分不開的，實際上鼓動其誕生的卻是後者：用處除了掩飾意義之外別無作用。”

——賀龍·巴赫德 (Barthes, 1964/1973/1979: 6-7)

“最最甘美、芳香、醉人的酒…頹喪的靈魂沒喝就醉了，自由的、酩酊的靈魂！這健忘的、同時也是被遺忘的靈魂，竟然爲了它從未飲過，並且永遠不會飲用的東西而薰醉！”

——賀龍·巴赫德轉引自拉保爾特 (R.Laporte)  
(Barthes, 1977/1978: 23) (修改及摘自汪耀進中譯)

### 一、導言

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或由英語發音譯爲羅蘭·巴特)，

一個法國評論家及一個偉大的作家，與克勞岱·李維司陀(Claude Levi-Strauss)、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雅克·拉崗(Jacques Lacan)以及米謝·福寇(Michel Foucault)一同，被視為是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之後，法國知識界的領袖之一。終其一生，語言是巴赫德的主題。然而，遠超過語言的正文，巴赫德探索思想與社會的關係。1976年，巴赫德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的文學符號學的教授，然而，他總是試著結合社會學與文學批評，進一步地說，社會學與文化批評。賀龍·巴赫德以其多重面目的矛盾著稱。他曾是存在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結構主義者、語言學者，以及正文的評論家(Kurzweil, 1980: 165)。他的矛盾性格可以由兩條線索來考量：

第一，巴赫德拒絕了任何學科的範疇——即使是他經常涉及社會學分析。巴赫德有意躲避傳統的社會學方法帶來的限制，特別是在英美傳統中所了解的社會學。巴赫德在理論上變動的特性甚至在其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講中也表現了出來，他竟然談的是快感而不是榮譽，因為快感比較表裡一致，因為他傾心的是“權力之外”的某處，因為他要談的是隱藏在一切論述(discourse)之中的權力。巴赫德強調“忘記”知識(knowledge)，他提起一個字“薩皮安提亞”(Sapientia)：“沒有權力，一點知識，多一點智慧(wisdom)，僅可能多一點口味(flavour)”(Barthes, 1977/1982: 478)。

第二，通過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在大約三十年之中，巴赫德的知識旅程與作品表現的特點不僅在於豐富性，而是其知識成就所形成超學科性質的、矛盾的、認識論張力：這就是在“文學的科學”對“閱讀的愉悅(快感)”、“前衛主義的鬥士”對“古典法文作家”、“作者之死”對“有特癖的風格”(Culler, 1983: 9-11)等一般說法背後所具備的特殊理論特質。下面，我試圖先就巴赫德一生，以及在法國戰後的社會歷史脈絡組織中初步交待巴氏立場變化的社會與理論根源。

### (一)由存在主義到結構主義：一九六〇年代的法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部份的歐洲國家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的不同政治路線下，發展它們的福利國家模型。在法國，親成長聯盟以戴高樂主義為中心建立起來。在國營化的浪潮下，國家取得了不同的工業。在1959年戴高樂主政之後，確實造成了經濟成長。戴高樂主義的基本策略是高度集權化的國家與技術官僚間的聯盟，即，圍繞著親成長聯盟的，由國家所領導的成長過程。然而法國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最大的工會却未加入這行列，這也就是說，法國的勞工未納入親成長聯盟之中，它仍然是福利國家外部存在的壓力(Castells, 1986)。

至於政治與歷史的條件，大戰中法國反法西斯的鬥爭之性質是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而非階級間之衝突(而在義大利，勞工運動則是反法西斯鬥爭的基石)。所以，在理論的整合上，小布亞喬亞的知識分子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同時，在冷戰的政治氣候中，政治選擇上的孤立造就了戰後法蘭西國內的情境：沒有左/右兩極化，而是一種中間/左翼的構造。有一些人期盼法國變成一偉大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另一些人却尋求一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一般而言，他們留連於個人主義的思想，但帶有社會主義之色彩。存在主義在這樣的年代中提供了他們一個理論上的出路(Holtz, 1975: 26-27)。事實上，經由黑格爾、胡塞爾、以及海德格，這種沙特式的存在主義研究途徑，不僅與赫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分享共同的基礎，反應了戰後精神危機的經驗，而且扮演了一種對戴高樂主義技術官僚意識形態(即，意識形態的終結)的意識形態相對體。這個黑格爾主義的存在主義分支，像沙特·摩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以及圍繞在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周圍的一群人，代表了戰後布爾喬亞哲學最進步的形式，換言之，繼承了啟蒙主義之傳統，法國的進步知識份子擁有一種獨特的理論品質。在“正統”馬克斯主義的史大林主義之變質之後，法共就被迫接納了存在主義。

然後，由60年代起(甚至是50年代中葉)，當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浮現之時，法國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就開始轉向。一些存在主義的角度都已被吸收進入哲學的主流之中，也遠離了在巴黎知識份子領域中仍舊佔有理論霸權的馬克斯主義。這時，又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填補進來。結構主義，像一種新的知識流行、方法、或意識形態，變成了顯學(Sturrock, 1979: 2) (圖6-1)。客體的“結構”取代了沙特式的，歷史中之人類作用者的有意圖的行動，結構主義對馬克斯主義的影響一如過去存在主義對馬克斯主義的影響。泰雷·伊格頓(Terry Eagleton)曾經質疑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在論述已退化到僅淪為科學、商業、廣告與官僚的工具的工業社會裏，一個人該如何去寫呢？”事實上，當語言變成知識份子的一極度過分的、令人著魔全神貫注的事物時，結構主義就出現了，它身處於現代社會的深層危機之中(Eagleton, 1983: 139—140)。語言終成為知識界關注的問題。這就是早期賀龍·巴赫德的作品生產出來的社會與歷史脈絡。

賀龍·巴赫德，在1915年生於瑟堡(Cherbourg)的中產階級清教徒家庭，在巴黎大學讀法國文學與古典文學。巴赫德可說是大器晚成。巴赫德之知識發展較晚，部分是由於他青年時期為肺疾所苦<sup>①</sup>。到了1941年，肺病復發，迫使他在療養院中待了五年，在這裡，大量的閱讀使他成為一個沙特式的馬克斯主義者。然後，1948到1949年，他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教法文，在1949到1950年，則在亞歷山大，在此，法國結構語言學家葛雷馬斯(A. J. Greimas)，他的同事，向巴赫德推荐了現代語言學(Culler, 1983: 18-19)。1952年之後，他加入國立科學研究中心(CNRS)，自行致力於辭彙與社會的研究。這些成果表現在巴赫德早期對文學批評與社會神話的作品中：《寫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1953/1967)，《米什萊自畫象》(Michelet par lui-meme)(1954)與《神話學》(Mythologies)(1957/1972)。在這個相當早的階段中，巴赫德的作品是立足於沙特、梅洛·龐蒂、馬克思、

① 巴赫德有個安靜快樂的童年。1934年，肺病打消了巴赫德原先的計劃——到高等師範就讀的計劃。

布萊希特、李維史陀的基礎之上，以及與法國的懷疑主義傳統——由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到紀德(André Gide)——也遙遙一線相牽(Sontag, 1982 : xiv)。

一方面，巴赫德早期的政治方式寫作(political modes of writing)之疑旨是回答沙特的理論問題：“什麼是文學？”：巴赫德剝除了文學的修辭想法，他質疑“風格”，提出一種“零度”的語言限制來連繫作者與社會，以期使所有的階級信號都得以免除 (Jameson, 1980: 166)。透過剝除所有被接受的既定觀點，巴赫德著手保證所謂的“客觀的”文學的主體性。他相信作者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可以使社會革命化。作者與社會的連結，新文學形式的種子要表現革命性的變化 (Kurzweil, 1980 : 166)。這是在冷戰年代中的“白色寫作”(Jameson, 1983 : 66)。

另一方面，《寫作的零度》被視為開現代結構主義美學理論的先河。第一部份中，他的興趣是寫作方式，人類主體的意圖與意識的選擇被視為一種分類系統的競技場。意識是折衝轉圜的巧計，處理“歷史”與“神話”的觀點(例如，在《米歇來自畫像》之中)，以弗洛伊德式與梅洛·龐蒂式的存在主義的心理分析的觀點(例如，在《論萊辛》之中)，以及結構主義的分析的觀點，得到進一步的闡述。

簡言之，寫作方式(a mode of writing)的觀點在巴赫德後來的作品中被進一步發展了。例如，在《神話學》一書中，神話被視為一種符號系統來進行符號學分析 (semiological analysis)。雅可布森式(Jacobsonian)、李維司陀式與索緒爾式的分析方式被採用了(Laing, 1978 : 95 ; Eagleton, 1983 : 135)。

費迪南·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懷疑語言起源的研究，認為語言為記號的系統，其“共時性的”(synchronical)特點比其“歷時性的”(diachronical)研究有意義得多。每一符號，由符徵(意符)(能指詞)(signifier)與符旨(意旨)(所指詞)(signified)所組成，其符徵與符旨間的內在關係是武斷的，世代相襲的。語言是自我界定的系統，

語言僅僅由於其本身與其他系統不同而具有意義，例如，書寫的字母或是口語語言中的音素(phonemes)範圍，主張研究音素不能脫離音韻系統，所以只有把這個系統的結構通盤加以考慮之後才有意義。經由結構主義的語言學應用，例如，文學的規律系統(語言系統、自然語言、語言結構)(langue)必需調查，以及其頒行制定的言語、言辭或說話(parole 或 speech)。這是文學可以辨認的結構。於是在文學與語言學研究的範疇裡，“文學性”(literariness)——其本身特殊的結構與規律應受到研究，而不是化約為其他的東西，即，符號應在其自身的自主性中被研究。進一步，正文僅能經由在正文之間(intertext)來創造，而不是主體的原創性。

在巴赫德符號學的早期面目中，他試圖將符號的符號學概念政治化。巴赫德檢視法國資產階級及文化的對象，以揭露潛藏在符號指意(denotations)之下的延意(connotations)(Laing, 1978: 96)。這也就是說，意識形態試圖將資產階級文化顛倒為自然，自然的符號是意識形態的武器之一(Eagleton, 1983: 135; Larrain, 1979: 132-135)，記號系統作為集體表徵，其神話化過程轉化了文化，使其自然化而似乎具備了普同的本性。在《神話學》之後，巴赫德的符號學分析就不再是那樣直截了當地政治性了，然而，是一高度結構主義的事業。在巴赫德1970年版的序言之中他要求更複雜的分析，而非一簡化的意識形態批判 (Barthes, 1957/72: 9)。

此外，巴赫德在這個早期符號學的說法之中的“雙重”記號，意謂了“記號它擺出其自身物質存在的姿態，同時也傳遞了意義”。這可以追溯到貝爾脫·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疏離效果”(estrangement effects)以及雅可布森式的語言學的“去自然化”功能(Eagleton, 1983: 136)。

賀龍·巴赫德的“職業的不穩定”在基本上應歸咎於法國具排斥性的學術論述與國家權力兩者結合的保守制度。諷刺的是巴赫德在學院中有了安定的職位時已幾乎五十歲了。他生存於法國保守的大學系

統的邊緣。賀龍·巴赫德在1960年被任命為高等實踐學院(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EPHE)<sup>②</sup>和社會與經濟科學的第六部門主任<sup>③</sup>。在1962年，他成為EPHE的符號、象徵與表徵(再現)的社會學研究主持人。同時，巴赫德在《新小說》(nouveau roman)上發表了許多文章，收集在《批評文集》(Critical Essays)(1964/1972)書中，與一系列的書，像《論萊辛》(On Racine)(1963/1964)，《符號學元素》(Elements of Semiology)(1967/1983)。最近，一些高度結構主義的巴赫德的經典文章，在《記號學挑戰》(The Semiotic Challenge)(1985/1988)一書中重印出版了。1965年，巴赫德在《論萊辛》一書中的心理分析，被一個傳統心態的索邦的巴黎大學教授雷蒙·比卡(Raymond Picard)撰文“新批評或者是新的江湖術士”(New Criticism or New Charlatanism?)攻擊。比卡是文學學術界既得利益傳統中的萊辛專家。他主張常規式的、藍松式(Lansonism)批評<sup>④</sup>、大學式批評(university criticism)。比卡是以傳記為本位的實證主義學者，重視事實與細節，然而缺少理論的系統。在《批評與真實》(Criticism and Truth)(1966/1987)一文中，巴赫德回答了比卡，同時也提出了結構主

② 高等實踐學院(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在1886年為了拒絕索邦(Sorbonne)的傳統心靈，由維克多·杜雷(Victor Duruy)所建立，包括了一些革命性的課程，如社會科學等。在法國，國家有權在任何層級頒發正式的證書。一直到1974年，EPHE的學位才在官方高等教育的系統內受到認可。在1975年，EPHE的第六部門獨立為高等社會科學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③ 1948年，魯辛·費伯夫瑞(Lucien Febvre)建立了第六部門，使馬克斯主義有了能應用於歷史，文學與哲學研究的可能性。

④ 對賀龍·巴赫德德言，他責備藍松式批評的並非是它們的成見，而是藍松式批評保有了它們的秘密—使這些成見穿上客觀及道德的輕紗：像一件走私貨物，讓意識形態偷運在科學主義的行李箱之內(Barthes, 1963/1964/1972)。卡勒爾也指出學院派以表面的作品與作者的生平、時代等事實之因果說明，拒絕了以理論語言對作品結構解釋的能力。所以，對巴赫德言，像比卡的論文《萊辛生平》，就根本遮掩了真正需要的歷史回答。在當時法國學院派保守的升等制度下，理論上的革新根本失去可能，這情形一直要等到1968年之後才見改善(Culler, 1983)。



義之文學的科學。巴赫德/比卡論戰可以視做是左右翼間的一次衝突、研究生間的一次爭論、以及機構之間與階級衝突間的插曲(Thody, 1977: 55)。巴赫德對文學的社會科學與符號學的研究方法的推動，不僅使他成爲進步知識份子的代表，而且使他獲得了國際性的名聲。這次論戰甚至到今天已被描述爲 1968 年學生運動的先兆了(p.60)。然後，三本關於結構主義的正文性的書繼續地出版了：《薩德/傅利葉/羅耀拉》(Sade/Fourier/Loyola)(1971/1976)，《S/Z》(1970/1974)，《符號的帝國》(Empire of Signs)(1970/1982)。然而，在《薩德/傅利葉/羅耀拉》中，巴赫德研究壞作家、空想社會主義者、與耶穌會的聖者等論述系統的三位奠基人，巴赫德已創造了一種新語言，已有一種“情色位置的無盡的有系統的排列”存在了，可以視爲是早期的結構主義與後來的後結構主義的混合(Eagleton, 1983: 135)。在《S/Z》之中，分析巴爾札克的《薩拉西納》(Sarrasine)，是其最深入的文學分析，以及一個突破性的作品。文學作品不再被當成是不穩定的對象或是一劃定了界線的結構來對待了。結構主義的科學的對象性已經放棄了。現在，批評已經由閱讀轉移到“可寫的”(writable)。這也就是說，正文鼓勵評論者去改寫，在不同的論述之中去重寫。批評家/讀者變成一個生產者，而非僅是一個消費者了(Eagleton, 1983: 137)。喬納森·卡勒爾 (Jonathan Culler) 甚至懷疑巴赫德贊揚前衛派而公然貶低早期文學是一種高明的策略，因爲它創造了一種日後由新的方式去閱讀那些早期作品的氣氛 (Culler, 1983:14,21)。與巴赫德作品有“正文間的相互關係”、“互爲正文”(intertextual)的是非立普·蘇勒(Phillipe Sollers)、茱利亞·克麗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原樣(Tel Quel)雜誌、雅克·戴希達、與雅克·拉崗。事實上，即使在《批評與真實》(1966/1987)之中，批評的論述已被視爲是一種後設的語言。伊格頓指出有些現被稱爲是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已經出現了：一些像“無底洞的語言”、“由空洞意義所支持的純粹曖昧性”。對古典結構主義的懷疑已經存在了(Eagleton, 1983: 137)。由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

的運動已被巴赫德描述過了，它是由一種封閉實體的確定作品轉向到符徵的無限的遊戲(Eagleton, 1983: 138; Barthes, 1971/1977)。

## (二)、法國七〇年代的後結構主義

自 1968 年，這年的學生運動——暴露了許多基本的課題——造成了法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動搖了權威主義之下社會的“異化了的秩序”(alienated order)。經由一種無異化的節慶之短暫時刻，法國嚐到了超越異化的生活滋味。然而，左翼政黨、共產黨與社會黨都官僚化了，而且不能反應現實。傳統的左翼沒有策略，因為它在結構中已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了。然後，戴高樂在靜思的退休之後，重回巴黎，經由法蘭西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重組國家的權力。五月革命時，結構主義的反應是懷疑的。李維史陀提及，自從五月之後，所有的客體都被棄絕了。結構主義再也不能站在流行的潮頭上了(Poster, 1975)。

後結構主義對結構主義早期的假設進行質疑，同時有意地標明它與結構主義的差別。後期的巴赫德、戴希達、福寇、與拉崗已經質疑了科學的地位、以及任何語言描述客體性的可能性(Young, 1981: vi)。結構主義先行者的共通結構失去了，結構主義失敗的本身已經為不同的後結構主義打了基礎。它們全部都發生在特定的脈絡組織中，一個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再結構的過程之中，在 1970 年危機之後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深刻的轉化之中。

賀龍·巴赫德在其結構主義聲望達最高峰時刻轉變了方向。他早期解密的策略，似乎是預示了敏感的身體的來源，如我在前面提到的，《S/Z》似乎是其作品的過渡。正文變成愉悅(快感)的純粹對象。正文能劃分為片斷的偶然連續，它能經由批評而重寫。他分開愉悅(快感)(pleasure)與狂喜(或是享受)(jouissance)。前者，正文的愉悅關乎知識性的符碼，溫和的，後者則是不可講述的快感的方式，狂暴的，它意謂著私密、滿足，與性的實踐(性高潮)。然後，巴赫德試著連繫主體(觀)的美感經驗與結構的語言學層次，客體(觀)的形式。他試圖藉由

符號學的幫助，引入一種新的語言，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情色閱讀(Kurzweil, 1980 : 180)，它是身體與記號的連結，意義與物質性的結合。這種巴赫德式的正文的研究方法，在其後繼諸書中獲得完全的發展：《正文的愉悅》(The Pleasure of the Text)(1973/1975)，《賀龍·巴赫德論賀龍·巴赫德》(1975/1977)，以及其暢銷作：《戀人絮語》(A Lover's Discourse)(1977/1978)等等。巴赫德藉由情人間的綿綿情話與熱情絮語，提供了一種沒有中心意義的快節奏語言活動，一種令人神往的語言烏托邦境界。這種無窮無際的喜劇提供一種對終極意義的否定，反而轉身肯定一直是極度孤立，素受學院冷漠對待的情話，形成論述上的顛覆性(Barthes, 1977/1978)。伊格頓描述巴赫德後期作品的特性為：“實驗性的、難解的以及豐富曖昧的”。伊氏認為，事實上，不論巴赫德的立場由純粹主義改變到享樂主義，他的作品本身就是現代主義正文，充滿了實驗性，在批評與創作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分。(Eagleton, 1983 : 143)。

在1976年，巴赫德獲得法蘭西學院(或譯為法蘭西公學)之講座，這是法國學術系統中最高的地位。最後，1980年二月二十五日，巴赫德與一些社會主義的政治家及知識分子午餐之後，在法蘭西學院的前面被一輛洗衣店的卡車撞倒，三月二十六日不治逝世。夠諷刺的是，在他死時，巴赫德對法國資本主義社會與神話的批評已經被政客們歡呼擁戴為法國文化的有建設性的代表了(Culler, 1983 : 14, 21)。誠如伊格頓的評議，後結構主義是1968年的虛幻幸福感與醒悟的混合產物。後結構主義顛覆了語言的結構而非社會的結構。它是逃避政治現實的一種方便的方式。現在，後結構主義的懷疑主義肯定是左翼學術圈子內一種新的知識流行了(Eagleton, 1983, 142—145)。畢竟，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這次經濟再結構過程中，在法國，文化上的後結構主義的道路導向一種最悲哀的政治上的反動。

## 二、空間形式

對賀龍·巴赫德而言，與其關心文學，不如投注眼光於更廣的文化對象；與其專注作品的形式，他寧可集中於正文。所以，空間形式可以由更廣闊的文化造物的空間正文之角度來看待它，即，文化的/空間的正文本身的物質現象。以下，試著將主客體關係以及形式與價值的關係置身在賀龍·巴赫德的理論論述中的位置做一闡述。

### (一)主體與客體之關係

一般而言，索緒爾與雅克遜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疑旨之一為符旨與符徵關係以及記號的語言系統規則與言語差別。他們意謂了符號的自明性是給予的，非關乎它涉及的對象，也與使用者的意圖無關，而僅關乎系統的差別。進一步，任何特殊的發言方式只有在滿足了符號結合規則的複合體之條件下，才能溝通訊息。這也就是說，主體的份量為符號的系統所取代了(Benton, 1984: 11)。

就特殊的層次上，巴赫德的批評中具里程碑式的宣言就是宣告“作者之死”(Barthes, 1968/1977)。他推翻了創造性主體的神話，給予批評一種未來的方向：“讀者之誕生必須建立在作者之死的代價之上”(p.148)。換言之，支配空間創造的是語言而不是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設計師或建築師。

巴赫德拒絕了傳統的著作業(作者身份)(authorship)這個觀念——將作者當做是創作者的研究經常留心人格、傳記、訪問以及主體的意圖。事實上，作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產物，創造者的原創性是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的神話(Barthes, 1968/1977: 142—143)。這是對文化造物分析的主要障礙之一(Wolff, 1981: 118; Hadjnicolaou, 1973/1978: 17)。對巴赫德言，將正文(text)交給作者，是限制了正文，是用最終的、確定的符旨埋葬了正文。正文其實是由眾多文化中擷取的引用文句所組織起來的。作者/創作者/主體單單只是在正文所連續

的諸軌跡之論述中，把東西集在一起的“某人”罷了(Barthes, 1968/1977: 148)。巴赫德也拒絕了法國學院派主流的藍松式類比性的決定論——藍松式批評假設在作品的細節與生活的細節之間，在人物的心靈與作者之心靈之間，具備了一種比擬的關係(Barthes, 1963/1964/1972: 257)。在結構主義的符號學角度下，唯心主義將作者/設計者視做創造者一般的神話，被巴赫德所宣告的“作者之死”、“正文相互之間”(intertext)的觀點與“多重閱讀”(multiple reading)動搖了。作者是社會地與意識形態地被束縛著的。避免了“人”的拜物教——近代認識的基本形貌——之後，主體作用者結構間的關係必須重新評估(Wolff, 1981: 129)。對巴赫德言，正文是愉悅(快感)的對象，但是愉悅(快感)却必須加以選擇。藝術之挑戰正在於正文對主體的感動(Culler, 1983)

古典批評絕不會注意讀者，而是作者。一旦創造性的作者的神話被解散之後，巴赫德仍然拒絕了對正文詮釋的無限自由。後結構主義的巴赫德不再將作品當做一穩定的對象，而是由非固定的符旨的角度來考慮可寫的正文。符徵是曖昧的，符旨的數目常比符徵多，否則便沒有藝術與歷史了。符徵的力量非在於其明確，而在於它被主體認知為符徵。符徵與符旨之間的連結不及符徵彼此之間的組織重要(Barthes, 1981/1985: 16)。對他而言，所有的文化造物都是互為正文的。由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的運動，其部份是由作品到正文的運動(Eagleton, 1983: 138; Barthes, 1971/1977: 156)。這導致他提出對正文愉悅的研究方法。就這個角度，建築就不宜看做是一種封閉的實體，具有確定的意義，建築批評家的任務就是要去破譯這意義。現在，建築若看成具有多元意義之建構，它就是符徵之間無窮盡的變換，反而不會固定在如亞歷山大的中心性過程所強調的一個中心，一種本質或意義之上(參考第四章)。

最後，巴赫德試圖經由符號學分析的，個人化的“正文相互之間”，來處理主體的審美經驗以及文化造物的客體結構，即，一場精緻

的情色遊戲。

這時，原本在巴赫德式寫作方式中被解散與顛覆了傳統主客體對立關係，被更徹底地摧毀，正文遊戲中主客體的二元對立結構被巴赫德有意地與無盡地把弄著。

## (二)形式與價值之關係

對巴赫德式的批評言，“可寫的正文”被認為是將符徵在不同論述之中變換的無窮盡遊戲。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論述，例如，政治的或美學的論述，這視批評者/讀者的立場與目的而定。此處最複雜的課題在於政治價值與審美價值是不能分割的。它並不必然意謂著審美價值與政治價值為相同的事——藝術僅僅是以象徵形式表現出來的政治而已。現在我們必需澄清的是關乎對正文的享受(Wolff, 1983: 65)。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需處理愉悅感(快感)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審美經驗的性質，另一方面，是正文的特殊性、客體(對象)的性質。賀龍·巴赫德如何處理政治的/美學的價值複合體(value complex)來連繫正文與愉悅感呢？

對巴赫德而言，一方面，正文的愉悅感能由閱讀的時間與地點來界定。愉悅能被說——它是批評的來源。另一方面，正文的愉悅感意謂著閱讀愉悅感的類型學，為片斷的愉悅感、片斷的語言、片斷的文化。他區別愉悅(快感)的正文(the text of pleasure)與狂喜(狂喜入迷，或譯為極樂)的正文(the text of bliss)(ecstasy)。前者是一種正文，它滿載著巨大的幸福感，正文來自文化，不與文化脫離，連結著一種閱讀實踐的舒服(comfortable)；後者是一種正文，加上一種失去的狀態，正文使人不舒服(discomfortable)(或許是某種厭煩)，使讀者的歷史、文化、心理的一致性動搖，使其與語言的關係形成一危機(Barthes : 1973/ 1975 : 14)。

然後，“正文的愉悅却是不確定的：我們不能確定相同的正文在第二次就又能取悅我們；愉悅感是易碎的，為心情、習慣、情境所分

裂，愉悅感是靠不住的；由實證科學的觀點是不可能討論正文的……”。然而，“正文的狂喜却是確定的，但它却往往會變得更糟：反而顯得不安，它不會開始生產它自己的美好時光，它不依靠任何的成熟或圓通。”(Barthes, 1973/1975: 52)。

進一步，在笛卡兒的“心靈”思維傳統土壤中，賀龍·巴赫德尋求建立一種唯物主義身體的理論。主體由“幻覺”(illusion)中區分“虛構”(fiction)。愉悅是“個體的”(individual)但却不是“個人的”(personal)。“特定的愉悅，是由想像自己為一個體的方式而提出的要求……”(Barthes, 1973/1975: 62)。

巴赫德不僅僅由“身體”取代“心靈”，而且也強調正文歡愉的物質性而非神秘的玄學，強調符徵的物質性為愉悅感之源(Barthes, 1973/1975: 58-59, 62)。“正文愉悅的美學似乎是措詞、修辭學，一群格式，它們設計來使論述之物質(具體有形的)外顯化”。它關乎“溝通的正規符碼”，“對身體的連貫統一”(p.66)。對巴赫德言，身體比語言更真實。“我用語言掩蓋的東西却由我身體流露了出來……我說了謊(因為我閃爍其辭)，但我不是在演戲。我的肉身是個倔強的孩子，我的語言是一個十分文明化了的成人……”(Barthes, 1977/1978: 44)。譬如說，在《意象／音樂／正文》(Image/Music/Text)中，他描述一位俄羅斯低音歌手歌唱，“在那兒有某種東西，明顯而堅定，超越了字句的意義……某種簡直就是領唱者身體的東西，它從腹腔、肌肉、隔膜、軟骨之深處，而且是從斯拉夫語言的深處傳至你的耳際……”(Barthes, 1977: 181)。筆者曾不只一次在我們的少數民族，排灣族原住民的歌聲中獲致巴赫德所強調的身體共鳴。

再譬如說，巴赫德總是為日本人用畫簡圖的方式來說明地址的過程感動——由轉動鉛筆、橡皮的動作，巴赫德由之捕捉到某種溫文、帶著關切和確定的感覺，由這些細小的動作中，身體比心靈更多所保留。地址的告之過程不是抽象的。地址的編造過程遠比地址迷人。因此，城市僅能夠由一種民族誌般的活動來認識，而不是靠書或地址來

導引，而只能夠用走的、用看的，靠你的習慣和經驗，靠記憶中的印象 (Barthes, 1970/1982: 33-37)。這真是城市之規劃、設計、管理相關專業者的專業技能傳授時最基本的提示。

事實上，正文的美學處理了美感經驗的特殊性，政治的價值與藝術的價值有不同的性質。在70年代法國的政治氣候中，巴赫德面對的是久為國家技術官僚之需求與五月革命後浮現的學生的願望，革命的願望，兩者所交織而疲憊不堪的美學領域 (Barthes, 1977/1982: 459)。對巴赫德而言，有一種神話使我們相信正文的愉悅是一種屬於右派的觀點。他要退回到被壓制了數世紀之久的一種受到貶斥的享樂哲學。在右派這邊，所有抽象的、無聊的、政治的事都推往左派，而愉悅感是留下來給自己的。愉悅感對抗著知識的理智 (intellectuality)：心 (heart) 對抗著頭腦 (head)，感情 (sensation) 對抗著理性 (reasoning)、溫暖的生活對抗著冰冷的抽象。在左派這邊，因為道德，往往傾向於懷疑與鄙視所有的“享樂主義的殘渣”。知識、方法、投身、戰鬥都是為用來對抗“僅僅是愉快”。左右雙方，愉悅感都被考量得太簡單。“無論如何，愉悅感不僅是一種正文的元素而已，它不是天真的殘渣；它不是仰賴了解的邏輯與感情；它是一種趨向與觀望，既是革命的又是非社會的事，它不能為任何集體性、心態以及個人用語所接收” (Barthes, 1973/1975: 22-23)。

###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我們前面已提及巴赫德自己宣告，由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的運動，可以視為是由“作品”到“正文”的運動。對新巴赫德式的分析言，“正文”替代了“作品”。“正文”源自克麗斯提娃等人對這個詞的精神分析學與記號學的界定。“正文”是一種新的對象，關心“方法、類型、符號、多數性、系統由來、閱讀、以及愉悅感” (Barthes, 1971/1977: 156)。下面將先提及巴赫德早期的《神話學》中的去神話觀點，然後，由新巴赫德式的論述中文化脈絡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闡



明正文一脈絡的關係。

### (一)形式與文化脈絡組織

前面已經提過，巴赫德以《神話學》為代表的早期符號學取向致力於去自然化的解秘工作。這種分析角度可以做為巴氏早期對待形式與文化脈絡組織關係的代表，簡言之，是一種意識形態分析。早期的巴赫德痛恨法蘭西神話所自然化的習慣性說辭，他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擁有的人和世界關係的再現與表徵，我們却被迫去擁有它。這種資產階級的規範被經驗為自然秩序的規律(Barthes, 1957/1972: 140)。巴赫德以銳利的語言切入要害，以精簡的語錄型警語做為評論之結尾，點出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法蘭西民族國家的神話被一再地挑戰，由身著法國軍服的年輕黑人士兵對三色旗行軍禮的照片，到做為法蘭西民族圖騰飲料的美酒神話、今日新雪鐵龍汽車成為哥德大教堂的對等物……等等，巴氏的評論確實剝除了法蘭西戰後福利國家支配性霸權的面具，解放了市民社會之意識上的自由，誠然造成了國家技術官僚的困窘。然而，這種知識分子所採取的政治行動之實際成效仍不免令人懷疑。卡勒爾也指出這種尷尬的現實伴隨著巴赫德如日中天的名聲，為法國國家所接受，成為法蘭西文化的一部分(Culler, 1983)。至於巴赫德本人，則轉向一種更為複雜的後結構主義取向的言語之中。

對後期的巴赫德而言，作品與正文間的差別是在實體上的不同。作品是實體的片斷、佔領空間的一部分。然而，正文是活動的、是包含在語言之內的，強調的是方法論的層次。作品能經由其展示而看到。正文則是按照(或者是違背)一定規則的表現與流露過程。作品是由手來掌握，正文是以語言來掌握，僅存在於論述的運動之中。作品是完成了的生產，然而“正文僅能在一生產活動中被經驗到”(Barthes, 1971/1977: 156-157)。然後，正文的正文相互之間的概念取代了作品自明性的神話。對他言，正文是不可化約的多數，它有賴於“符徵所

編織成的多面體構成的多數”，而不在於其內容與符旨的曖昧。語源學方面，正文是一組織，一肌理結構。每一正文是由正文相互之間的關係而掌握，正文是在與其他的正文間關係的正文。並沒有什麼“自明性”、作品的“來源”與“影響”。在作品中，正文完全與文化語言編織在一起(Barthes, 1971/1977: 159-160)。

最後，作品是消費的對象，它關乎作品的“品質”。即“品味”的欣賞。在“高”與“低”的文化之間，在“文化的”閱讀與“偶然的”閱讀之間，並沒有什麼結構性的差異。換句話說，“建築”與“營造”之間，沒有結構上的差異。正文傾向於放棄字與讀之間的距離，以及以一單一表意實踐結合了字與讀(Barthes, 1971/1977: 161-162)。閱讀與寫作之間的分離是歷史的。其間的距離則可於下述社會關係層次上來了解。

## (二)形式與社會關係

巴赫德澈底質疑了作品、作者之社會關係。首先，在作者與“他的作品”之間有一種法律上的社會關係。作者的版權(copyright)是在法國大革命時合法化的。至於巴赫德所使用的正文，則沒有什麼“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關係，它強調的是一種保證其作者關係的閱讀，以及一種正文間(intertextual)關係的情境。此處，作品意謂著一種“有機體”的意象，它以一有生命力的擴張方式曖昧地成長。然而，正文的隱喻却是網絡。正文以一有系統的符徵結合的結果在擴展(Barthes, 1971/1977: 160-161)。

其次，巴赫德區別對作品的消費式閱讀與對正文的遊戲式閱讀。一個人玩正文就像玩遊戲一般，即，一種再生產正文的實踐。正文要求讀者一種實踐性的團隊合作。對巴赫德而言，將閱讀化約為消費就是許多前衛作品的正文無法被解讀，而造成“無趣的”經驗的原因。即無趣就是意謂著不能生產正文(Barthes, 1971/1977: 161-163)。

作品的愉悅感，無論如何解除所有的偏見，仍舊是消費愉悅的一

部分——關乎趣味與品味的品質——它是有階級做基礎的美感經驗。然而，對正文而言，愉悅是一種享樂主義的美學，一種沒有社會孤立的愉悅。這也就是說，“符徵的秩序，正文以其自己的方式參與在社會的烏托邦之內…正文覺知到，假如不是清楚可見的社會關係，也至少是語言的關係：正文是沒有語言能左右另一語言的空間，此處語言通行無阻…” (Barthes, 1971/1977: 163-164)。

賀龍·巴赫德不僅僅根植於布萊希特的批判傳統之內，他顛覆了獨特性的“韻味”、特權、距離、傳統作品的品質，而且試圖超過布萊希特研究的途徑：美感經驗本身的實體。他試圖處理正文的實體理論，即享樂主義的美學。它不能由後設語言的揭露而滿足，而這種後設語言的揭露造就了巴赫德早期結構主義批評的研究途徑(Barthes, 1963/1964/1972: 258)。對後結構主義的巴赫德而言，正文的愉悅感並不會喜歡一種意識形態而拒絕另一種。然而，他並非尋求一種沒有“支配意識形態”的消毒無菌的正文。相反地，他宣告“社會鬥爭不能化約為兩個敵對意識形態間的鬥爭”(Barthes, 1973/1975: 23—32)。正文的論述所處理的應是正文、研究、正文的活動。對他言，正文是“社會的”空間，“它沒有使語言能安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讓任何主體站在裁判者、指揮者、分析者、告解者、解釋者的立場發言。正文的理論僅能與寫作的實踐符合一致”。(Barthes, 1971/1977: 164)。

最後，就形式與社會關係方面，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巴氏之見解。巴赫德由情人間的佔有慾，細緻地處理了異化的課題，可以做為一個影響大眾的高明的寫作策略，以及精彩的案例來略加闡述。異化，對巴赫德言，其實是正文的快感（愉悅感）與社會關係中最結構性的部分。

巴赫德以“有節制的醉”（拉丁文 *Sobria Ebrietas*）做為標題，展現情人間之快感，以“酒飲微醉”點明正文之愉悅感所要求的主體特殊情境與所需突破的困境。巴赫德論及佔有慾：

“由於戀人意識到戀愛關係的種種麻煩都是因為自己不停地想通

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佔有對方所致，他便決定從今以後放棄一切的‘佔有慾’。”(Barthes, 1977/1978: 232)

巴赫德首先藉華格納歌劇“人世應給我需要的東西。我要美、色彩、光明等等”，表白戀人要求對方應該給自己所要的東西。然而，巴赫德經由老子那兒搬來無欲 (the non-will-to-possess, N.W.P.) 與佔用慾形成辯證關係。他以少年維特的自殺，說明無慾是自身之死亡。

接著，巴赫德否定了西方傳統中的奉獻式、宗教式的清心寡欲。他藉尼采的觀點表明，勞苦、乾枯與貧乏的生活無法替代活生生的在聲色世界中周身竄動的慾望，捨此，就如同軍隊放棄了包圍 (Barthes, 1977/1978: 232-233)。

再來，巴赫德的寫作方式再度呈現其迷人之處——他說，“那麼，若無欲是權宜之計呢？”一方面，巴赫德引用里爾克 (Rilke) 的詩“我的力量就在我的軟弱中”，說明以退為進，實為佔有的狡詐。另一方面，巴赫德借斯湯達 (Stendhal) 釋明征服者所佈下的陷阱：“以一種哲人的偽裝，拋棄了一切佔有慾後，我為自塑的‘美好意象’感到激動、興奮” (Barthes, 1977/1978: 23)。

於是，巴赫德聽任自己飄落在語言之外，以使無欲能突破想象的戲目。他以禪宗式日常生活的簡單動作：“坐下”，回到道家的老子：

“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不居不有，是以弗去。”

最後，巴赫德指出：無欲由此而仍然充滿了希望。“我在心裡對不再是，或還未成為我的人說：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愛你。”巴氏引用尼采的調子與魯斯布魯克 (Ruysbroeck) 的話點出全書的關鍵：不是努力克制佔有欲，而是不飲亦醉。自由的靈魂沒有喝就醉了，而還是他從未飲用、並且永遠也不會飲用的酒。(Barthes, 1977/1978: 234)。這也就是說，有節制的醉，才得以享用正文之歡愉 (快感)。巴赫德藉酒飲微醉，花看半開，點出美感經驗與社會關係之間的微妙連結，這就是說，佔有欲造成的異化，正是形式與社會關係間的潛藏障礙。所以，《戀人絮語》(A Lovever's Discourse) 由這個角度言，真

是最政治性的美學宣言。

巴赫德的政治性美學關心的焦點可以說是權力，尤其是權力的論述。他指出：

“我們發現權力出現於社會交換的各種精巧的機制中，不只是在國家、階級、集團裡，而且也在時裝、輿論、遊樂、運動、新聞、家庭和私人關係中，甚至在那些企圖對抗權力的解放衝動中…如果說權力在社會空間內是多重的，那麼，在歷史時間中，它對稱著就是永存的。”(Barthes, 1977/1982: 459-460)

巴赫德指出各種反抗權力的戰鬥是艱難的，在人類長存的歷史中，權力寄身於語言之中，在我們所說的與所寫的語言之中。

“語言(language)是一種立法，言語(言辭、說話)(speech)則是它的法規(符碼)。我們見不到存在於言語中的權力，因為我們忘記了整個言語是一種分類，而所有的分類都是壓迫性的：秩序既意味著分配，又意味著天譴的威脅…言語，或更嚴格些說，發出論述，並非像人們經常強調的那樣是去交流溝通(communication)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語言是一種普遍化的支配力量。”(Barthes, 1977/1982: 460)

巴赫德直截了當地指出，語言在政治上既不是反動的，也不是進步的，語言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因為法西斯主義並不阻止人說話，而是強迫人說話(Barthes, 1977/1982: 461)。對巴赫德言，言語與說話總是為權力服務的。

#### 四、應用層次

“艾菲爾鐵塔是一個舒適的對象，此外，它因此要就是一個很古老(例如類似古代圓形競技場)或就是很現代(類似某些美國玩意，像汽車電影院，在那裡人們可同時享用電影、汽車、食物、與夜晚新鮮空氣)。進一步，經由向訪者提供一整套綜合性的

快感，從技術性的奇蹟到高級烹調，包括俯瞰全景，鐵塔最終同一切重覆的人類場所所具有的基本功能重新統一起來了：獨裁；鐵塔可以自存：你可以在那兒夢想、吃喝、觀賞、理解、驚嘆、購物；就像在一條大郵輪之上（這是令孩子們夢想的另一個神話對象），你會感到完全與世隔絕，但卻仍然是世界的主人。”

——賀龍·巴赫德 (Barthes, 1964/1979: 16-17)

巴赫德並未忽視建築與城市。自其早期作品始，它的語意化使用的構想就應用在空間的分析上了。1967年，巴赫德在拿不勒斯(Naples)給了一個演講，標題為“符號學與都市規劃”(Semiology and Urbanism)(Barthes, 1967/1970/1971/1973)。艾菲爾鐵塔與東京的中心也在他對日常生活神話的精彩作品中處理過了(Barthes, 1964/1979; 1970/1982)。用巴赫德的話來說，批判是論述之上的論述。批評是第二語言，或後設語言，它在第一種語言，像空間、或城市之上操作。所以，在巴赫德論述中由空間角度的應用層次，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空間的文化批評”。他由結構主義轉向後結構主義，我們可以在巴赫德論述中處理對空間方面的應用於下：空間的符號學分析與閱讀空間的情色遊戲。

### (一)空間的符號學分析

早期巴赫德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分析深植於索緒爾式語言學的角度中，以之為武器來了解現代社會先進的技術與大眾集體的廣告傳播。符徵與符旨為記號的組成分子。語言涉及規則系統(語言規則)，以及其言語、言辭及說話(parole or speech)之制定。一方面，符旨為一事物的心智表徵，但不是“一個事物”。索緒爾宣稱符旨的心智意象與心智性質被稱作一概念(Barthes, 1964/1967: 42—43)。另一方面，符徵是一中介者。符徵的物質性是音、事物、意象的實體(p.47)。所以，意義能被視為結合符旨與符徵的過程，行動的產品就是符號(p.48)。巴赫德

的記號學基于一假說：只要有社會，每一種使用都可轉變記號本身。使用層次的普遍語意化是關鍵所在(p.41—42)。

順著使用的普遍語意化一般的主旨，巴赫德鼓勵一種對空間符號學的語言學類比的應用。這也就是說，一般的人類空間(不只是都市空間)總是有意義。“城市建構一種論述，這真正是一種言語、言辭、說話(parole or speech)” (Barthes, 1967/1970/1971 /1973)。他認為城市是一種由關係與對抗元素所組成的正文。城市的“意義”像一正文，在“讀者”的知覺中被生產出來(Barthes, 1967/1970/1970/ 1973 ; Krampen , 1979 : 32)。

由於城市建構為一種論述，它的言語也要為權力服務。由巴赫德的符號學分析角度來看城市之言語之中必然包含了兩個範疇的聯手行動，就是語言的斷定之權威性與重複之群體性(Barthes, 1977/1982: 461)。這也是語言的個人表現與社會交流作用的兩元對立關係，而後者，則是我們在各章中所一直關心的，種種相對穩定的，在言語中間蕩的空間原型。由巴赫德的角度來看，這兩者在城市論述中必然混合，於是我既是主人，又是奴僕。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假如我們不全然相信神秘的個別性，也拒絕尼采式的超人，唯一的選擇就是用言語來故弄玄虛，或是對言語故弄玄虛。巴赫德認為，這種有益的詭計、規避、這種輝煌的欺騙，反而使我們得以在“權力之外”來理解言語，在語言永久革命的光輝燦爛中來理解言語。套用巴赫德的話，這種空間上的言語把戲稱做“建築”(architecture)。至少，巴赫德的空間符號學理論角度提供了一種洞見，讓我們得以著手釋明目前建築最核心的部分——設計。

在我們前面的說明中，已經可以了解巴赫德不由作品來理解建築，在這裡，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說明，由巴赫德的角度可以理解建築為一種實踐軌跡的複雜空間正文記錄，指的是設計的實踐(有如寫作的實踐)。空間的符號學分析閱關心的是正文，這是建構作品的符徵之織體與紋理。所以，建築中自由的力量不在於設計者之文明程度，也不

在於其政治承諾，甚至也不取決於其思想內容，而是取決於他對語言所做的勞動改變，這就是巴氏的“形式的負擔”(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與所謂的“正文的論述運動”，而開文·林區的經驗主義則視之為“形式展現的向度”(見第二章)，或者說，形式的特殊性，這是需要用感覺與身體來掌握的，也往往在遊戲中才得以呈顯。

對巴赫德而言，城市建構一種論述，它與其市民交流溝通。他鼓勵不用引隱喻來談論城市的語言。符號學可以幫助我們發展出對象徵的確定技巧來轉化資料，經由分解都市正文為單位的方式，跨過隱喻而對意義能加以描述，將這些單位在形式上分出等級，同時，找到結合與轉化這些單位與模型的規則(Barthes, 1967/1970/1971/1973: 156)。

這個索緒爾—巴赫德式的城市符號學方面先驅性概念，平行於其早期對象徵與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角色——它將小布爾喬亞文化轉化為一共通性質的神話(Barthes, 1957/1972)。這個研究途徑像後設語言一樣操作，可以連繫上其早期對批評的後設語言觀點。批評的對象不是“世界”而是一種論述，一種論述的論述(Barthes, 1964/1972: 258)。巴赫德式符號學分析已經應用來分析城市的意象，即其象徵、意義與空間的神話。例如，他不同於亞歷山大·克里斯多夫，而指出西方城市中心化實源於西方之玄學(Barthes, 1970/1982)。他自己將艾菲爾鐵塔這個最大的法蘭西神話去自然化(Barthes, 1964/1973/1979)，以及將東京城空洞的中心去熟悉化，看出日本城市中地址的編造如何迷人，以及，都市休閒中柏青哥(Pachinko)“銀球逸樂式的崩潰，瞬間填滿玩者的手，來對抗便秘般的吝於付出之薪資，以及資本主義財富的壓迫”(Barthes, 1970/1982)。包括阿西拉·克雷姆爾(Alcira Kreimer)用來對舊金山高層建築發展的經驗分析(Kreimer, 1980: 195-214)。在巴赫德貢獻的基礎上，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則進行符號的政治經濟學向度之分析，提出消費資本主義的符號消費(Baudrillard, 1968, 1972/1981)，以及雷蒙·李拉(Ray-



mond Ledrut) (1970/1986, 1973/1986)已經進一步發展到涵蓋對都市正文生活層次的解釋。

巴赫德的符號學分析，將對空間文化形式之知覺的分析，細緻地連結上歷史與社會的知識。他對艾菲爾鐵塔的釋明 (decipherment)，是以一種具體的抽象掌握事物之結構，巴赫德運用心智活動將艾菲爾鐵塔構造出來 (Barthes, 1964/1973/1979: 10)。因此，符號學的分析才顯得既複雜又深刻，既又有說服力，又不是那麼的沈溺在個人的世界之中。巴赫德的敏銳，使其符號學分析的方法與架構消失在對空間與時間同時掌握的寫作之中，消失在內部與外部、其對看與被看、主體與客體對象間的二元對立關係的突破之中，呈顯出豐富的層次，而使我們得以盡情享受巴氏文字展現的愉悅。

即使在法國為基地的結構主義符號學，馬丁·克雷彭(Martin Krampen)指出有兩個不同理論角度間的對比：賀龍·巴赫德的“語意化”(semantization)與法蘭斯娃·蕭伊(Françoise Choay)的去語意化(desemantization)<sup>5</sup>。蕭伊的符號學分析指向顯示現代城市的空間為階級社會的產物，失去了它的意義，而只剩下支配階級與其僅有的功能上的利益(Krampen, 1979: 32)。克雷彭也提及雷蒙·李拉(Raymond Ledrut)對蕭伊的去語意化的批評，以及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對都市象徵與都市運動的批評 (Castells, 1972)。事實上，城市是一種“偽正文”，透露了社會不同階級間的矛盾。城市不僅是一種異化的靜態狀態，而是主體作用者採取歷史行動的地方。進一步，語意化與去語意化似乎是特定社會中互補的機制(Krampen, 1979: 23)。這點我們會在最後一節再仔細一點地討論它。

<sup>5</sup>蕭伊的“漸增的語意化”告訴我們在都市史中三個系統：中世紀城市為“全球符號的系統”(global semiological system)，空間的意義會促進人類的接觸。文藝復興的城市為“圖象符號的系統”(iconic semiological system)，空間意義是基於知覺的品質。工業城市為“單性的系統”(monosemic system)，城市空間失去了其意義，而僅僅成為流通的功能的工具(Krampen, 1979: 32)。

## (二)空間情色遊戲的閱讀

同時，在“符號學與都市規劃”的這一篇文章中，有些想法開始將空間語言的個性表現出我們現在稱爲是後結構主義的術語了：

### 1. 沒有什麼一對一的象徵。

在符號學的地景之中，字彙的觀點，符旨與符徵之間規劃的對應關係被放棄了。有時，符旨本身像是神祕的事物，作爲其他事物的符徵。符旨失去了，而符徵却留下來了，例如，現代東京城市中心的御城(皇城)像是空間的中心作用著。(Barthes, 1967/1970/1971/1973：156)。

**2. 象徵必需界定爲符徵的世界，相互關係的世界，永不會在完全的意義中結束。**

符徵的區別似乎像是經由對城市的語意學分析的模型中論述的句子。例如，在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直覺中，城市是寫作，城市的居民是讀者，按照我們的想像，選擇陳述的片斷(Barthes, 1967/1970/1971/1973：156—157)。

### 3. 符號學永不假定一種確定的，最終的符旨的存在。

這意謂著符徵經常是其他符徵的符旨；反之亦然。這種城市的情色，巴赫德稱之爲我們能由都市論述的無盡的隱喻性中抽取的“資訊”。城市是我們來接觸其他人的地方，是我們“交換社會活動”的地方，即，在巴赫德對這個“情色外露”世界的廣義“情色遊戲”(Barthes, 1967/1970/1971/1973：157)。

對巴赫德而言，空間、城市的符號學開始最好的方式是，對空間與城市的多重“閱讀”，即，語言的重建，或城市的符碼的重建。一如情人間的綿綿情話(如《戀人絮語》(A Lover's Discourse), Barthes, 1977/1978)，情人身體的所經驗的地方，由於情人之思緒波瀾起伏，因此地方也呈現出生動的面貌。這種無窮無際的空間符徵遊戲之喜劇，值得我們細究其自由與愉悅，這裡潛藏了顛覆支配性的終極意義。我們必需了解記號的遊戲，了解任何城市都是一結構；但是吾人永不

會填滿這結構(Barthes, 1967/1970/1971/1973: 157)。然後，空間的正文對批評言，不是這些能讀的，而是能寫的，這就是去重寫，在不同的論述，不同的後設語言之中變換空間的正文。對後結構主義的巴赫德而言，空間的正文已較多些“結構化歷程”(structuration)的無窮盡的過程，較少些“結構”的意思(Eagleton, 1983: 139)。就這個意義言，建築或城市，它的空間正文，毋寧更類似一個無窮無盡，有各種可能性的建構過程。批評的讀與寫是最後的未被殖民的領地，此外，知識能扮演語言的自由遊戲，界定符徵之世界，而不管在現實法國的艾麗榭宮(法國總統府)或雷諾汽車廠要進行些什麼(p.141)。

空間之情色遊戲可以由巴赫德著作中得到諸多資料佐證，它甚至值得在理論層次上做進一步闡明<sup>⑥</sup>：

### 1. 由科學與建築的關係進一步厘清研究與設計、理論與實踐間的連結：設計是將知識做象徵性表現。

建築與知識的特殊關係可以由巴赫德的情色遊戲得到突破性的啓發。建築其實需要包含眾多的知識，而建築與現實密切連結，可說是現實的火花，是主體在現實中表演的光采。建築與都市計劃(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做為一門學科，一直有一種巴赫德所稱的百科全書式的關心，它們需要運用不同的知識在設計過程中加以移形换位，可是，它們却不專注於，也未偶像化某一門知識。這就是建築從未有研究之傳統，而現在即使逐漸建立了研究的訓練學程仍不見得能解決自身問題的原因之一即，我們還未能掌握設計理論的核心問題。建築其實賦與知識一種間接的地位。巴赫德提醒我們，科學是生硬的，而生活却是微妙的，建築的重要性正在於調整兩者間的差距。知識的排列是永遠不會完成與終結的，而建築並不會像科學那樣說它知道什麼(knows something)，而是說它聽說過什麼(knows of something)，或是它知道些有關的什麼(knows about something)——這也就是

<sup>⑥</sup> 以下由巴赫德論文學符號學之觀點中借取，參考 Barthea, 1977/1982: 463-477。

說，建築懂得許多有關人的事。巴赫德稱之為關於人的語言的混沌。因為建築提供語言表演，而不單是利用語言，這樣，建築就使知識編入了具有無窮反省性的機器中。通過設計，知識得以不停地由實踐而反映著知識。它是戲劇性的。巴赫德所要指出的是：這裡強調的是言語領域的差異，不見得必然涉及了真實與幻想、客觀與主觀、真與美的範疇。科學與建築的對立也有可能是在特定的理論模型或方法中結合，消除二者之邊界<sup>7</sup>。

巴赫德指出的是言語、用辭與說話領域的差異對比：按所謂科學的論述（或是科學的某一種論述），知識是一種“陳述”，而設計却是一種“陳述的行動”，一種象徵實踐。前者是主體缺席的產品，而後者則在於展示主體的位置與能量，甚至是主體之不足（它不是不在）之同時，又專注於語言的現實本身，認識到語言是由意涵、效果、回嚮、轉折、返回、程度等組成的巨大光暈。陳述行動令人不安之熟悉性是使主體被認識又不被認識，而這裡，空間的熟悉性是使主體被認識又不被認識，而這裡，空間的符號元素並不是一種簡單化的工具，而是被做為投射、爆發、震動、裝置、口味而演出的。設計使知識成爲一種節慶的歡樂，空間的符號元素做為象徵元素而將主體之價值進行表現。

## 2. 再現與表徵方式 (mode of representation) 之可能性

前述知識與建築間言語的兩元對立關係，涉及主體的目的，以及，語言與媒介的再現（表徵）方式之限制。巴赫德指出，建築與現實之再現有關。現實却是無法再現的，這涉及論述的限制。我們不可能使一種多向度的現實與單一向度的語言相互對應。正是這種現實與語言之間的不相符性，我們反而看到了人們不願意屈從於現實的努力，人們在混亂的現實生活中經由意識與語言建構空間，這樣的建築史與城

<sup>7</sup> 巴赫德的論點並非將科學、研究與建築、設計之間提出功能性劃分。相反地，他認為這種對立可能變為歷史的神話。他舉出法文中“口味”與“知識”兩個字其實有相同的拉丁文根源。

市史，用巴赫德式的準確用詞就是空間正文生產的歷史，它的核心就是設計史與規劃史。所以，建築與都市計劃不等於現實，由論述的角度視之，這是一種象徵的實踐 (symbolic practice)。這也就是建築與都市計劃的烏托邦功能。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資本主義城市危機中形成的前衛建築師們與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分別找到了建築與城市最確切的心中意象：現代建築運動與烏托邦的城市改革之路。這是專業者反應資本主義城市的軌跡，是改變空間的宣言與行動，也是曼菲德·塔夫利（見第五章）與彼德·霍爾（Peter Hall）等人分別再三致意之題材（Hall, 1988）。順著巴赫德的邏輯來說，這也是現代文學上法國的史提芬·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所致力於的“改變語言”，以及，馬克斯所主張的“改變世界”（Barthes, 1977/1982: 466）。

基於對論述實踐主體的期待，巴赫德式情色城市的建構便重新界定了有自覺的建築師的實踐主體性，這時，建築師的稱呼已不再是指功能上分工的角色，或是語言上的被動奴僕。有自覺的設計師有能力發揮建築再現（表徵）的力量，故弄玄虛，玩弄符號，而不是消除符號。這時，設計師將符號置於一種語言機器之中，而機器的制動器和安全閥都已經拔除了。巴赫德稱爲這就是在語言內部所建立的各種各樣的真正的同形異質體（heteronymy）<sup>⑧</sup>，也就是巴赫德式符號學實踐的可能性，一種對權力論述與理性的顛覆之道——令人愉悅的偏離作用（excursion）——展現一種像孩童般的，欲望中的來來去去遊戲，一種無權力的論述實踐（Barthes, 1977/1982: 476-477）。

## 五、認識論的批判

如我在前面所說的，巴赫德式的結構主義的符號學分析貢獻於對

<sup>⑧</sup> 同形異質體不是“異形”，而是符號學與語言學中所具有相同拼法而爲異音異義之字（Barthes, 1977/1982: 468-469）。這裡暗示的是空間論述中對特定原型與模式語言建構與符號實踐能力。

抗傳統布爾喬亞的藝術家為創造者的意識形態：他宣稱作者之死，後來發展出正文之間(intertext)的觀點。巴赫德也認識到意義與另一個現象秩序之間的矛盾。結果，意義有種不可化約的特殊性。這就是說，在意義與功能之間、意義與理性、意義與現實之間的衝突(Barthes, 1967/1970/1971/1973: 155)。這個了解提供了一個後來新巴赫德式的後結構主義轉移的基礎。他已經覺察到在(1)符旨與符徵之間區別的疑旨，(2)無限限制的符徵的研究對象，以及(3)最終的符旨存在的方法論上的假設(p.156—157)。這個角度就是在他令人矚目的作品《S/Z》中所發展的主要疑旨(Barthes, 1970/1971)：沒有什麼穩定的對象與批評的科學的對象性這回事。以下，我們處理一些結構主義符號學論述與後結構主義論述中的一些認識論的預設。他們也暴露了新巴赫德式的批判語言的社會與政治限制。

### (一) 巴赫德式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論述——語言與現實的關係

“〔柏青哥〕利用這些銀球逸樂式的崩潰，瞬間填滿了玩者的手，以對抗便秘般的吝於付出的薪資，以及資本主義的財富和壓迫。”  
——賀龍·巴赫德 (Barthes, 1970/1982)

雖然，巴赫德知道象徵主義是關乎符旨與符徵的論述的對象(一組概念)。符旨—符徵與語言規則做為言辭的疑旨(概念)的架構仍舊像一種範型基礎支配他的結構主義記號學論述。

巴赫德認為城市建構了論述，城市真正是“言語”。研究的對象是“不由隱喻而言及城市的語言”。一個真實的科學跳躍是期望跨過隱喻而就意義的描述。其操作過程能組成為：

1. 將都市正文切成單位，
2. 分析這些單位為形式的等級，

3. 找到這些單位與模型結合與轉化的規律 (Barthes, 1967/1970/1971/1973 : 156)。

對巴赫德而言，空間符號學開始的最佳方式為對讀者的態度，即，多重化空間的閱讀。假設由不同類型讀者的所有閱讀(即空間讀者的整個類型學分析)會產生空間的語言(Barthes, 1967/1970/1971/1973 : 157)。

在巴赫德式論述中，對索緒爾式語言學疑旨的重要批評來自俄國巴赫定學界(Bakhtin Circle)(Bakhtin and Medvedev, 1928/1978 ; Stewart, 1986 : 43 ; Eagleton, 1982/1986 : 116—117)。米凱·巴赫定(Mikhail Bakhtin)，一位文學理論家，拒絕索緒爾式抽象“語言”的論述對象。對巴赫定言，語言只能在特殊的社會脈絡中來了解。符號不能視為一固定的單位，而是在一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中的言辭的主動組成份子。簡言之，符號相對而言不是在既定結構中的中性的抽象的元素，而比較是特定社會中，標明衝突利益的矛盾與鬥爭力量。然後，語言是意識形態的物質中介，即，語言的相對自主性。進一步，語言是生產的物質資料，以及符號的物質身體經由社會衝突與對話的過程轉化成為意義(Eagleton, 1983 : 117—118)。

然後，符旨—符徵區別的疑旨傾向於預設一種他們之間的分離。空間是作為符旨的社會結構之符徵。所以，研究化約為這些空間符號的組合規律，社會關係也就化約為溝通的系統了。換言之，社會組織是符碼，空間結構就成為一組神話了。然而，象徵結構却並非一種由社會行動的形式結晶所組織起來的都市正文的相等物(Castells, 1972/1976 /1977 : 216)。階級鬥爭、物化、異化…等，豈能僅僅當做是符旨來對待？它們不能與意義的形成過程絕緣(Rojek, 1985 : 148)。(圖6—2)

巴赫德覺察到意義與現實間的衝突(Barthes, 1976/1970/1971/1973 : 155)。然而安伯托·艾柯 (Emberito Eco) 曾提及，空間的正文若僅止於一種相對較個人的閱讀，而未解釋都市正文的社會生產，這

是巴赫德晚期滑向唯心論的理論原因(Eco, 1968/1986; Ledrut, 1970/1986, 1973/1986; Gottdiener and Lagopoulos, 1986: 88)。即使我們如此享用巴赫德之寫作，然而，在認識論層次上，巴赫德並未給予符號的措詞(修辭學)(rhetoric of the sign)是如何“歷史性地建構起來”的一種適切的解釋，而當做是社會系統自動的屬性。晚期的巴赫德已似乎不再需要一種能擴大其洞見的科學來支持其見識，便能暢言無權力論述的偏離之快感了(Culler, 1983)。因此，激進的符號學終究容易成爲一種精英的休閒形式，一種知識的運動(Rojek, 1985: 148)。雷蒙·李拉更進了一步。他認爲空間是“僞正文”，透露了目前社會不同的社會階級的建構，今天，其訊息的內容是階級社會的異化與矛盾(Krampen, 1979: 33)。然而，對曼威·柯斯特言，城市不僅是異化的靜止狀態的反映，而是歷史行動發生的地方，即，社會歷史的行動能改變城市的意義(Castells, 1972; Krampen, 1979: 33)。“這意謂著沒有一種表現中介的符號學閱讀，這中介是由在既定時勢中的社會關係所實現的意識形態過程所表現”(Castells, 1972/1976/1977: 219)。空間不單是一寫就的正文。空間是在社會實踐中經由意識形態中介，歷史地與社會地結構起來的，即，以巴赫定的話來說，“意識形態的最小單位”(ideologeme)，是特定社會團體社會意義中的社會意識反映(Bakhtin, 1928/1978: 21)。所以，我們必須超越結構主義的符號學來處理完全不同的理論角度中的空間意義。例如，空間形式的心象表徵能被以特殊形式再結構起來，這是整個意識形態的“意象化的意識形態”(imaged ideology)。進一步，空間意義可以由在既定社會中歷史和主體之間，衝突過程中結構性的過程表現來加以界定(Castells, 1983b: 303)。

## (二) 巴赫德式享樂主義與政治——愉悅感與政治

後期的巴赫德試圖超過早期他自己的意識形態分析。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1973年起的國際經濟危機的脈絡中檢驗這個後結構



主義，以及在“理論化的愉悅”的局勢之歷史發展中安置巴赫德。他將法蘭克福學派與法國的後結構主義，像吉利斯·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費列克斯·關塔內(Felix Guattari)和後期的賀龍·巴赫德做了區別。前者的清教徒包袱無法處理美感經驗的課題，在歷史的焦慮中理論化為文化的墮落和心靈的拜物教化，而後者，像“慾望的真正英雄”般，為“閒暇”的“商品化”，像“虛幻的精神分裂的意識”。這是對愉悅(快感)的最重要的法國反對派立場(Jameson, 1983: 4)。巴赫德的享樂主義強調以我們本能的身體來閱讀，它不得不成為是自我放縱的。詹明信建議，這個晚期的巴赫德式的本能的身體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它或許要求一個超過布爾喬亞意義的“愉悅”(快感)的範圍，而成為一種像自由感覺的領域(p.9)。這可以說是後期巴赫德式正文的愉悅對美感經驗的特殊性與政治的關係這個困境所做的最大貢獻。這就是詹明信所謂的後現代文化的政治要求與雙重目的論的愉悅感(快感)策略(對身體的快感探求與改造整個的社會關係連結起來)彼此的相互連結。然而，這種愉悅感(快感)仍然無法與愉悅感以外的成分之束縛分離開來，快感甚至無法真正解放出來。這或許就是快感的注定了的命運(梁濃剛，1989: 68)。

後結構主義試圖超過正文的結構主義觀點——由符碼化約為訊息——它由作品移往正文，由記號學移向語言的自由聯想。經由一純粹遊戲的過程，歷史的向度被排除了。巴赫德寄望個人的無盡的符徵遊戲而低估了改變歷史的集體力量。這些集體抗爭的力量不能化約為符徵的遊戲。不然，主體神話去中心之後難道隱藏了賀龍·巴赫德自己，難道隱藏了的是一種知識論上的唯我論嗎?(Rojek, 1985: 149-150)。泰雷·伊格頓(Terry Eagleton)指出後期巴赫德反對置愉悅為意識形態的無批判雙元主義，以及形式意義的慾望身體的疏漏(Eagleton, 1986: 477)。他批評巴赫德：語言是僅有的答案，後結構主義不能在現實中打破國家權力的結構，所以它充其量只能顛覆語言的結構。在某個程度上，後結構主義質疑古典真理觀點的確定性像是基於

一個天真的語言的表徵理論。這也就是說，假如現實為一個人的論述所建構，那麼，認識論的問題是：一個人要如何了解現實本身，而不是僅僅了解一個人自己的論述而已呢？最後，伊格頓教導我們，後結構主義不承諾任何事物，“它就像空包彈一樣沒有殺傷力” (Eagleton, 1983 : 141-145)。



圖6-2 符號學的歷史 (引自 Barthes, 1975/1977 :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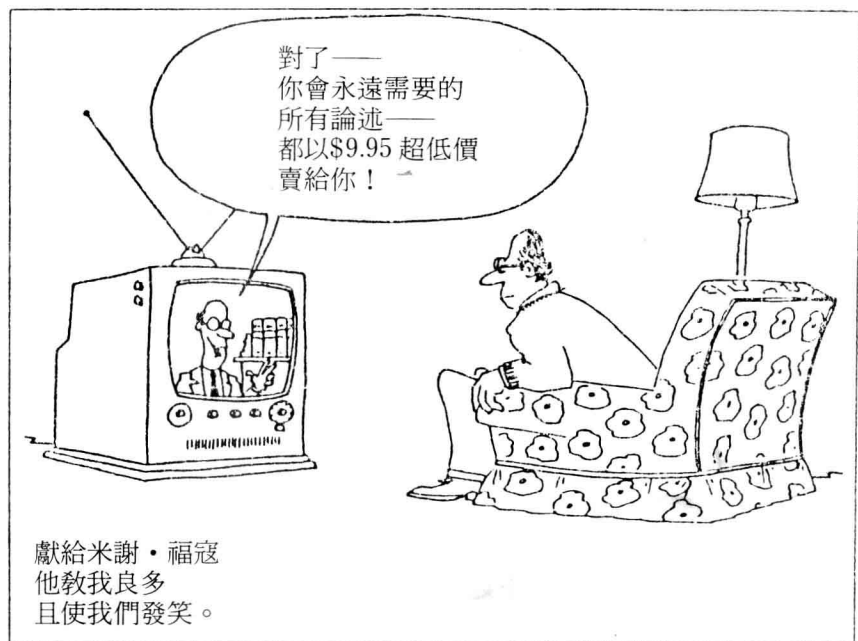


圖7-1：論述分析與福寇的貢獻（圖引自《History of the Present》，  
No. 1，February, 1985.）

## 第七章 由經修飾的阿圖塞主義 到政治批評： 泰雷·伊格頓及其他

“在文學與藝術、社會科學、和我們對世界的描述中，應該傾聽和等候沈默的、不在場的、無名的、未被談論過的、被符碼化了的知識——那就是女性主義之真正知識所在，而這是最困難的事。只有藉著打破沈默、自我命名、揭露隱密、使我們自己出現，我們開始界定了真實……”

——安菊恩·瑞琪 (Adrienne Rich) (Rich, 1979: 245)

“我們知道獅子比馴獅人強壯，馴獅人知道這點。問題是獅子不知道。文學的死亡可能有助於獅子的覺醒，這不是不可能的事。”

——泰雷·伊格頓 (Eagleton, 1983: 217)

法國的進步知識份子有一種不尋常的理論品質，因為他們繼承了布爾喬亞啓蒙主義的知識傳統。法國的馬克斯主義被迫去接受的，不僅有戰後的存在主義，像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以及摩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uleau-Ponty)，而且包括1960年之後的結構主義，像所謂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斯主義”，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阿圖塞主義(Althusserianism)。在戰後史大林主義的危機——1959年蘇共二十大之後全世界左翼運動的危機——以及中蘇論戰的脈絡之下，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策略上地”拒絕了

道德的人道主義馬克斯主義，試圖重鑄馬克斯主義思想的最基本概念，在法蘭西的知識土壤中重新建構理論的霸權(領導權)。這也就是說，阿圖塞由法國知識論的傳統之內與之外借取火種，像加士東·巴奇拉(Gaston Bachelard)與雅克·馬丁(Jacques Martin)，以及，用結構主義批評的面目重估馬克斯主義思想最基本的範疇(Benton, 1984: 14)。我在這裡用“策略上地”這幾個字，意謂著不僅在前述的知識與政治脈絡中處理阿圖塞，而且強調在戰後法國的歷史時勢中，阿圖塞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轉圜施計的策略。阿圖塞並未認為自己為結構主義者。然而，他使用他們的概念將馬克斯主義整修一新。由於對方法論之嚴謹要求，阿圖塞致力於一種人道主義與歷史哲學所未達到的科學分析高度。這個嚴謹的認識論的重建，提供了阿圖塞式馬克斯主義分析在許多不同領域中作為整個傳統的共同方法論基礎，這些領域包括了政治經濟學、政治理論、都市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史、文學批評、文化研究、媒體研究、以及女性主義等等。事實上，路易·阿塞圖已變成了一個在戰後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最有影響力、最重要的、以及最富爭議性的批判理論家之一。

阿圖塞的意識形態理論提供了一個文化與美學分析的基礎，它不僅有別於喬治·魯卡奇(Georg Luckacs)以及赫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唯心主義的美學(Lichtteim, 1970; Eagleton, 1976a、b、c、d: 53—54; Lovell, 1980: 74; Wolff, 1983: 42, 44)，而且不同於阿諾·豪塞(Arnold Hauser)之折衷(Hauser, 1982; Ludz, 1979; Hajinicolaou, 1973/1978: 60)，皮爾·伯度(Pierre Bourdieu)受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影響的部份所呈現之功能主義觀念(Donald et al., 1978: 2; Poulantzas, 1973: 61, 65)。在阿圖塞貢獻的基礎之上，在文化實踐方面更細緻的社會理論可以在藝術史中的尼可斯·哈齊尼可拉(Nicos Hadjinicolaou)、文學批評中的皮爾·馬歇雷(Pierre Macherey)、媒體研究中的《銀幕》(Screen)雜誌、文化研究中的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及其在伯明

罕大學的同僚——近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等等。在馬克斯主義美學的傳統中，阿圖塞主義可視為反現實主義(realism)傾向者之一。有別於現實主義的觀點，現代主義的正文能夠抓住矛盾，能經由正文的片斷之技巧使隱藏的空白的地方發言(Wolff, 1983: 7-8)。以下，泰雷·伊格頓的文學理論及其發展過程將被當做一個阿圖塞主義的美學及文化分析方面，發展得比較完整的個案來詳加闡述。當然，阿圖塞的意識形態理論以及阿圖塞自己本人對藝術的幾篇文字會包含在內，當做是我們的基本理論來源。此外，皮爾·馬歇雷與尼可斯·哈齊尼可拉的成果會被加入。最後，經由對伊格頓理論的認識論批判，一些對空間的文化形式做更細緻分析的社會理論需要被補充進來。我們回到尼可斯·哈齊尼可拉的觀點，甚至，提及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看法，在這之後，我們連繫上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對空間象徵，甚至是，都市意義的看法。它們似乎可以提供一個對社會變遷與空間變遷的分析與實踐工作之有力量的起點。

## 一、導言

路易·阿圖塞在1918年生於靠近阿爾及爾的比爾曼垂(Birmendreis)，在阿爾及爾及馬賽受教育。1937年他在這兒也加入了天主教青年運動。二次大戰中，阿圖塞的大部分時光在德國集中營渡過，之後，阿圖塞回到巴黎的高等師範讀書。他的論文，“黑格爾哲學中的內容觀點”(The Notion of Content in Hegel's Philosophy)是在加斯來·巴奇拉的指導下完成。1948年，他取得學位，之後，即一直任教於高等師範(Callinicos, 1976: 126)。雖然，阿圖塞經常強調政治與理論時勢中的干預，阿圖塞則是由他的妻子海倫·阿圖塞(Helene Althusser)引介上共產主義的道路。海倫與阿圖塞自己的知識與天主教背景的出身不同，她是一個“在群眾中”的社會學家。1948年，阿圖塞加入法共，一直到1980年11月的悲劇發生時為止，他們在不同

的想法與政治鬥爭的領域上分享彼此的工作(Karol, 1980)。

路易·阿圖塞最有影響力的作品產生於 1960 年代。這些文章彙集成冊，英譯為《保衛馬克斯》(For Marx)(Althusser, 1965/1969)，《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Althusser and Balibar, 1968/1970)，和《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Althusser, 1969/1971)。在其意識形態的理論一如《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y State Apparatuses)(Althusser, 1969/1971)之外，阿圖塞寫了三篇關於藝術的文章，〈答安德瑞·達斯普爾論藝術信〉(A Letter on Art in Reply to Andre Daspre)(Althusser, 1966/1971)，〈“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與布萊希特〉(The “Piccolo Teatro”：Brettolazzi and Brecht)(Althusser, 1965/1969)，〈抽象畫家克里墨尼尼〉(Cremonini, Painter of the Abstract)(Althusser, 1966/1971)。在藝術史與文學批評方面，尼可斯·哈齊尼可拉、皮爾·馬歇雷、以及泰雷·伊格頓已經提出來更進一步發展的理論。

尼可斯·哈齊尼可拉 1938 年生於希臘薩洛尼卡 (Salonica)。曾在西柏林、弗頓堡與慕尼黑各大學讀藝術史，之後，在巴黎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隨皮爾·弗朗克斯提爾(Pierre Francastel)、魯辛·戈德曼(Lucien Goldmann)與皮爾·維拉(Pierre Vilar)讀書。在《藝術史與階級鬥爭》(Art History and Class Struggle)(Hadjinicolaou, 1973/1978)中，他由阿圖塞及尼可斯·柏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借用意識形態的理論，進一步發展出意象意識形態(imaged ideology)<sup>①</sup>這個原創性的概念，來替代傳統唯心藝術史對“風格的感覺”(the sense of style)的提法。所以，阿圖塞的意識形態理論不僅被用於處理意識如何適用於社會關係的再生產，

<sup>①</sup>因為本文討論以空間為主，因此將英譯本之視覺意識形態(visual ideology)改回為法文原文之意象意識形態(imaged ideology)之用詞(Hadjinicolaou, 1973/1978: 95, 附註 1)。

而且處理藝術形式的特殊性，有潛力來探求藝術如何能在日常生活中改變接收者的意識。

皮爾·馬歇雷，巴黎第一大學的哲學講師，在《解讀資本論》第一版編寫之時，與路易·阿圖塞與埃提納·巴里巴(Etienne Balibar)一同工作。作為第一代的阿圖塞式的文學批評家，皮爾·馬歇雷的《文學生產的理論》(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Macherey, 1966/1978)標明了與“人文主義”批評漫長傳統的決裂，以及對華特·班哲明(Walter Benjamin)的“作者就是生產者”的觀點之繼承。一方面，他拒絕了法國結構主義的批評，認為它是一種新柏拉圖主義。順著阿圖塞的邏輯，一個意識形態與美學的產物也是應用勞動資料對原料加工轉化的結果。藝術的生產全然在意識形態之中進行，雖然藝術本身並不單純地等於意識形態。以對文學的生產過程的考量來取代孤立完成的產品，阿圖塞式的分析重點之一(即在《解讀資本論》中所學出的“徵候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在於關心疑旨的構造(潛在的概念的架構)，它形成作品，而且，其空白處與其發言的地方一樣重要。然後，與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看法不同，雅克·拉岡對人類主體的概念提供了一個意識形態的理論來逃避意識形態的操縱。這關係著拉岡的觀點：人們除了在一種對“自我”想像之誤解之中，在一意識形態的構造中“認識”它自己。阿圖塞提及“人類主體是分散的(decentred)，為一種無‘中心’、分散的結構所建構”(Althusser, 1969/1971：218-219)。所以，對馬歇雷言，藝術作品經常是分散的，而非像魯卡奇的論述中，偉大的十九世紀傳統般成為一整合的整體，因為它的意識形態關係不僅僅是在呈現處表現，而且也在其保持沈默之處表現出來。此外，意識形態不是一錯誤的意識，而是一種未自覺的經驗(Laing, 1978：89-90)。

在法國1968年的五月事件之後，阿圖塞與馬歇雷都在他們的作品中顯示出一系列的改變。阿圖塞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是在理論的層次上反應這些事件。超越基礎/上層結構模型，阿圖塞宣



稱意識形態不僅僅是在心中的事物，而且是社會實踐的物質體系。意識形態的主動功能解釋為社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研究意識形態機器的物質操作——它們對應著相當數量的特殊的實踐，由此，主體變得是在意識形態中被建構起來——而非僅僅去分析觀念、思想與表徵的系統(Macherey, 1977 : 5)。

1968 年的事件也迫使馬歇雷放棄他早期著作中所有的馬克斯主義形式主義與文化主義。這就是所謂的“後阿圖塞主義”轉移至對社會功能的分析：我們若要研究藝術的生產却不能不研究其再生產。在〈反映的問題〉(Problems of Reflection)(1977 a)以及〈論文學為意識形態的形式〉(On Literature as an Ideology Form)(with Balibar, 1974/1978/1981)之中，馬歇雷試圖考量文學為被安置在論述之內的意識形態實踐，這個論述使文學安於在布爾喬亞教育制度之內的功能。所以“語言變成某種——完全的意識形態的——語言的形式與語言使用的操作與保證人”(Barker, 1981 : 107)。然而，巴里巴與馬歇雷拒絕了阿圖塞早期的觀點——視藝術存在於意識形態與科學之間，期待藝術內部距離的特殊性(即，“審美效果”)使我們“看到”、“知覺到”或“感覺到”現實(Althusser, 1966/1971 : 221-227)。他們拒絕了文學的“範疇”，爭論文學的現象不存在於其歷史與社會的條件之外。任何經由美學的藝術研究必然束縛於意識形態支配的過程之中。所以，正文的意識形態的意義是物質地被決定在社會實踐之中(Balibar and Macherey, 1974/1978)，為書本與實踐它的脈絡間的關係來決定(即，制度的意識形態結構——正文是在學校、閒暇之中來閱讀的)(Laing, 1978 : 92)。事實上，這已連繫上正文支配性論述權力進行質疑的福寇式解構觀點(Barker, 1981 : 107 ; Young, 1981 : 80)。現在，我要將敘述暫時轉向，要對泰雷·伊格頓將阿圖塞主義的研究途徑傳送到英語世界的貢獻做一簡要敘述。

### (一)、七〇年代前半的一個經過修飾的馬歇雷式的阿圖塞主義

泰雷·伊格頓為當今左右兩翼公認的最著名的與多產的馬克斯主義文學理論家(Aczel, 1986: 113), 1943年生於靠近曼徹斯特之沙福德(Salford), 一個愛爾蘭天主教背景的工人階級家庭中。伊格頓在這兒就讀地方上的天主教中學, 然後, 像一個“憤怒的青年人”<sup>②</sup>, 他在1960年初到了劍橋, 在這裡, 他像一李文斯派<sup>③</sup>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耶穌學院做英文研究員。在1969年, 他成為牛津大學華翰(Wadham)學院的英文研究員與教師(Eagleton, 1985a)。在70年代前半, 年輕的泰雷·伊格頓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者<sup>④</sup>, 在1966到1970之間已出版了四本文學著作<sup>⑤</sup>, 面對了在英國的馬克斯主義文化理論的重建時刻。“60年末與70年初的越南、民權與學生運動, 1970年代早期英國婦女運動的成長, 北愛爾蘭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工運的一些主要攻勢: 所有的這些事情創造了不列顛一個一般的政治氣候, 特別有助於左翼理論的辯論”(Eagleton, 1986a: 1)。社會運動推動了理論的發展。這時, 主要的阿圖塞的著作已經譯成了英文。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 阿圖塞理論品質的吸引力, 像理論的嚴謹、意識形態的理論、反人文主義、反黑格爾主義等等, 經常提供進步的知識份子們另一種選擇。此外, 許多出色的阿圖塞的學生在這段時間來到英國教書、演講。即使我們隨後見到了既得利益的英國人文主義馬克斯主義與經驗主義回應這支來自歐陸的新壓力, 自從

②伊格頓的父親雖然不是一個積極分子, 但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伊格頓提起, 在十五歲時, 他就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Eagleton, 1985: 130)。

③指李文斯(F. R. Leavis), 本世紀前半在劍橋之英文文學批評開拓者, 相對於保守派的艾略特與龐德等的政治傾向, 李文思為自由主義的人文主義者。

④事實上, 在1966年到1970年之間, 伊格頓被李察·艾克茲(Richard Aczel)描寫為一個“試圖調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與羅馬天主教”的人(Aczel, 1985: 113)。

⑤例如: 在《新左教堂》(The New Left Church), 《身體即語言》(Body As Language), 《莎士比亞與社會》(Shakespeare and Society)(1967), 以及《放逐者及亡命者》(Exiles and Emigres)(1970)。

70 年代的前半葉之後，阿圖塞學派事實上已經對英國進步的知識份子們造成值得注意的影響了。

在伊格頓的書中，《批評與意識形態》(Criticism and Ideology) (1976c)是一個突破，試圖以一種馬歇雷—阿圖塞式的研究途徑系統化文學理論；《馬克斯主義與文學批評》(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1976 b)則是一本導論性的教學課本；以及，《權力的神話：對布龍提的馬克斯主義研究》(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e's)(1976 a)是一本皮爾·馬歇雷與魯辛·戈德曼的混合物。他的文章〈批評與政治：雷蒙·威廉斯的作品〉(Criticism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Eagleton, 1976 d)是對威廉斯類型的社會主義人文主義，或者，威廉斯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法的文化主義的批評。所有這些，以及〈馬歇雷與馬克斯主義文學理論〉(Macherey an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Eagleton, 1975a)都標示了伊格頓採納與修飾阿圖塞主義的理論的嚐試。

在 1970 年代中葉，伊格頓有意修飾阿圖塞式的意識形態概念，致力於唯物主義批評的理論。魯卡奇由列寧的認識論中採納的反映主義理論，到了馬歇雷手中成爲一個“破”鏡，它以破碎的形式呈現意象。對馬歇雷言，作品經常是“分散的”(decentred)，並沒有像戈德曼在作品中找到的中心本質。對伊格頓言，回應結構主義記號學的正文的科學，正文被當作是“意識形態的生產”。他區別特定的作者的意識形態，這是由一般生產方式所造就的支配的意識形態構造。支配的意識形態構造爲相對連貫一致的價值的“論述”所建構；然而，它不是“意識形態一般”的“理想類型”，而是在任何社會構造中所發現的意識形態特殊的被支配的整體效果(Eagleton, 1976 c : 54)。進一步，對伊格頓言，正文的內部衝突不是歷史矛盾的反映，也不是意識形態矛盾的反應，也不僅是壓縮一特殊的意識形態到某一點，它無意中暴露了它有意義的空白與沈默。正文置意識形態於矛盾之中。正文生產一種有融解(dissolution)特性的意識形態構造的矛盾。這種“融解”

爲屬於特殊階級的階級鬥爭之敵對的意識形態的衝突所產生(p.97-98)。所以，科學的批評尋求意識形態構造的科學，即，一種意識形態的知識，我們能宣稱一種文學正文的知識。

伊格頓近年曾經給阿圖塞馬克斯主義一個有用的歷史回溯。他自己指出其理論的得與失：

1. 阿圖塞避免了經驗主義，但是付出陷入新康德主義的代價——現實變成一種在論述之外的先驗。

2. 阿圖塞拒絕了歷史主義的神學觀點，但是導向一種理論的超越主義(transcendentalism)。

3. 阿圖塞經由發現馬克斯思想中結構的特色，適時地攻擊了人文主義與存在主義、現象學與貼了基督教標籤的馬克斯主義的拜物教化了的客體，但是卻落入結構主義的意識形態，忽視了主體與階級鬥爭，將意識形態一般化爲悲觀主義與精英主義(Eagelton, 1986 a : 3)。

即使所有的這些阿圖塞主義理論上的瑕疵缺點有其政治上的曖昧，阿圖塞理論的論述確實對馬克斯主義的認識論有所貢獻。不同於德意志傳統中的浪漫的馬克斯主義——它訴諸對價值系統的文化批評，像赫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阿圖塞確是提供了伊格頓進一步對文化造物之政治分析的歷史之理論洗禮。

## (二)、自七〇年末與八〇年初改變了的文化政治學

70年代初的政治經濟危機是60年代在歐洲與英國的主要的社會運動的結果。柴契爾主義標幟著不列顛的政治權力轉移，以及危機之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結構過程，即，一個關乎積累與管理的新的社會經濟模型。所以，在這種氣候之下，由當前的意識形態及其相對體的關係來看，支配的精英主義、實用主義與個人主義是後結構主義與後馬克斯主義思想的萌芽的副文化——即，一種意識形態的相對體。伊格頓描述目前法國政治上的反動：“北大西洋公約的防禦與阿圖塞從前的學生米謝·福寇(Micheal Foucault)的‘自由世界’，過去是毛主

義者的《原樣》雜誌(Tel Quel)昏亂糊塗的神秘主義，風靡流行的享樂主義政治上的絕望與形式主義拜物教化的‘多元’(Eagleton, 1986 a : 4)。對伊格頓言，在這個政治上的保守年代，像阿圖塞過去所做的——對抗人道主義與改良主義的詮釋者，由非馬克斯主義發展中最有建設性的層次的亮光裡再度重建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是必需的(p.5)。伊格頓自 70 年來的努力，都可以由這個角度來檢視。它們包括了一系列的文章(部分收集在《反潮流》(Against the Grain)(Eagleton, 1986 a)之中)，以及他的書：《華特·班哲明，或朝向革命的批評》(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Eagleton, 1981)、《克萊蕾莎之姦污》(The Rape of Clarissa)(Eagleton, 1982a)、《文學理論：導論》(Literary Theory : An Introduction)(Eagleton, 1983 a)《批評的功能：由旁觀者到後結構主義》(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 Structuralism)(Eagleton, 1984)、《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s Shakespeare)(Eagleton, 1986 b)。在《華特·班哲明》一書中，轉而考慮女性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回應布萊希特與巴赫定以及引證班哲明，一種文化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出現了，一種革命的批評的可能性被提出來了。這種文化分析伴隨一種一致的政治—文化的干預，它關心革命與政治，超過了解構，超過了情色遊戲的個人實踐(Eagleton, 1986 a : 6)。在《克萊蕾莎之姦污》一書中，伊格頓試圖告訴我們，在他的政治批評中，他如何能將不同的方法拿來運用。其他的種種論述，像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與心理分析等等都能提供伊格頓有價值的見識，以及整合在一種一致的以目標為導向的活動之下(Aczel, 1985 : 119)。然後，在《文學理論》一書中，一個福寇式的論述理論(discourse theory)被採用了，同時賦與它政治的目的(Eagleton, 1986 a : 7)。事實上，《文學理論》不僅提供吾人一個大學部學生程度的大眾化的導論性課本，而且，這個由阿圖塞與馬歇雷出發的長征，通過了班哲明與福寇，而到達的文化政治學，終於使伊格頓的理論論述獲致一種成熟。在最後一

章稱為“政治批評”中，伊格頓表現出在他的理論論述中一種最為連貫的一致的結構。伊格頓的文化政治學之概念架構使人感受清晰而有力量，並不在於其理論的精確嚴謹。但是其早期著作却流於複雜而多於其清晰。《批評的功能》告訴我們批評的歷史制度與其政治的可能性。此處，在《文學理論》中的《英文的崛起》的綱要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最近，在馬克斯主義的女性主義與記號學論述中，對莎士比亞的主要戲劇已經在《威廉·莎士比亞》一書中提供了有說服力的閱讀。莎士比亞劇中的字與事物、身體與語言間的一系列矛盾，已經由在封建主義傳統與浮現的布爾喬亞個人主義間，意識形態鬥爭的脈絡中，對法律、性、價值觀與自主的角度來加以揭露了。

對伊格頓而言，方法上的拜物教危險應有意地避免(Eagleton, 1985: 139)。政治批評處理理論論述的制度與關乎論述的制度有其不可避免的政治立場。簡言之，伊格頓在一更寬的廣的脈絡中重新安置理論的論述。對於伊格頓的政治批評方向言，文化政治學特別與四大領域有關：第三世界對抗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之鬥爭、婦女運動、對抗文化工業的防禦性鬥爭、工人階級的寫作(Eagleton, 1986 a: 214-216)。

由《馬克斯主義與文學批評》(Eagleton, 1976 b)起到現在，伊格頓追求一種馬克斯主義的文學理論。經由正文的科學到文化的政治學，批評是一個政治的計劃(political project)：“現代批評誕生於對抗絕對國家的鬥爭之中，除非現在能像對抗布爾喬亞國家一般將未來防衛起來，現代批評根本沒有未來”(Eagleton, 1984: 124)。

最後，關乎伊格頓生動有力的寫作風格本身還有一句話要說，在伊格頓早期的著作，像《批評與意識形態》(1976 c)，阿圖塞的科學主義要求其概念的嚴謹精確。相反地，在最近的作品中，像文學理論(1983)，日常語言與常識的使用標示了他轉身嚐試了一更大眾化取向的人道主義。李察·阿克茲(Richard Aczel)提出質疑：他認為很難看出來“日常”經驗為什麼會在今天比在1976年少了些“意識形態”

的經驗？( Aczel, 1985 : 118)。

## 二、空間形式

阿圖塞對美學理論的貢獻之一在於表明它對藝術與知識之間的關係之看法甚於對意識形態與藝術間關係的看法(Barker, 1977 : 7)。阿圖塞超越了康德主義對詩學(美學)、倫理學(政治學)和科學(邏輯)範疇的古典疑旨。他經由闡述知識上的意識形態/科學之間的區別來研究美學，即，主體與其對象間的對抗，換言之，認知與形式間的辨證法也。

### (一)主體與客體之關係

阿圖塞以一種認識論層次上的意識形態/科學的區別來闡述主體與客體間的對抗。對他言，人與其世界間關係的表現，主體與客體間關係的表現，是他們與其生存現實條件之間，現實關係與想像關係的整體。在意識形態中，這關係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於想像的關係之中。它與科學的不同不在於其謬誤，因為它可能是一致的與邏輯的，而在於其在實踐與社會的層次上壓制了理論與知識(Althusser, 1965/1969 : 252)。這個對現實的雙元關係——一者為現實以及一者為想像——意謂著人們以其意識形態來表現，以他們所看到的這種關係的方式，而非以它們生活情境的事實關係。所以，意識形態表達了主體與客體間的關係的意義。進一步，即使意識形態包含了知識的元素，它仍舊只是部分地等於現實(Hadjinicolaou, 1973/1978 : 10)。這個阿圖塞主義在科學與意識形態間的對立表明了他們的美學分析之特性。

在“答安德瑞·達斯普爾論藝術信”(Althusser, 1966/1971)，阿圖塞提及他不會將真正的藝術置於諸意識形態之間，雖然藝術確實與意識形態有一種十分特殊的關係。對他言，真正的藝術(authentic art)不會給予我們嚴格定義下的知識，但是它與知識保持一特定的特殊關係。藝術的特殊性是“使我們看到”，“使我們覺知到”、“使我們感覺到”某種暗指現實的東西。藝術以“看”、“知覺”與“感覺”的形式

(不是知道(knowing)的形式)所給我們的，是由其所生的意識形態，是它浸浴中的意識形態，是它像藝術一般脫開它自己與意識形態，以及它們所暗指的意識形態。藝術使我們由一內在的距離，由正是它們所有的意識形態，來使我們知覺到。藝術與科學間的真實差異存在於其特殊的形式中，它們以十分不同的方式使我們接近同樣的對象：藝術是以“看”與“覺知”或“感覺”的形式，而科學則是以知識的形式(嚴格地說，以概念)。

雖然人造物，像巴爾扎克(Honoré Balzac)與列夫·尼可拉也夫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永遠沒有放棄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與立場(這在他們作品的內容生產上扮演了決定性的部分)，他們的作品，事實上，脫離了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僅僅由於在其意識形態之中的一內部效果對我們產生了批判性的觀點(不因爲藝術有其自己的邏輯)，使我們覺知到它們。所以，阿圖塞要求去生產對藝術作品生產“審美效果”過程的科學知識，即，藝術知識。對他言，產生對藝術的真實知識的唯一方式是深入藝術作品的特殊性，去知道生產“審美效果”的機制，也就是注意“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原則”，而非太快地轉移到其它的東西上去。目標是一藝術的知識，而非藝術的隱藏著的人文主義意識形態(Althusser, 1971: 221-227)。

這裡，阿圖塞所未完成的，文化與美學層次上的工作——審美效果的藝術知識的建構，或許，要等到他的同志與朋友——雅克·拉崗的知識、意識形態之間的象徵範疇的實踐——來加以厘清，是較有積極意義的做法。

此外，在阿圖塞意識形態的理論之上，哈齊尼可拉也進一步試圖在科學知識中去處理“審美效果”。嚐試去避免庸俗馬克思主義之內容主義——它們考慮作品的形式會承載了做爲內容的意識形態——形式是傳送意識形態的媒介(Hadjinicolaou, 1973/1978: 15-16)，套用哈齊尼可拉的話說，我們需處理作品意識形態之空間化了的特殊的形貌。“意象意識形態”被界定爲“經由人們表現他們連繫其生活與生



存條件的方式的作品形式與內容元素之特殊組合，而這個組合是建構社會階級整體意識形態的特殊形式” (pp. 95-96)。用阿圖塞的話來說，意象意識形態被建構為理論對象，來使我們掌握住文化造物之生產及其歷史的特殊性(p.98)。這個阿圖塞所稱的“審美效果”的特殊性關乎“看”、“知覺”與“感覺”(而非知道的形式)的美感經驗。對哈齊尼可拉言，文化造物的分析“必需考慮兩套東西：生產的條件與消費的條件，它們為另一方所決定，但是却不是完全一致”(Hadjini-claou, 1978b: 12)。所以，主體的美感經驗必需在一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中來考慮，而非在一普同的幻覺/暗示層次。

如我在前面所提過的，後阿圖塞主義的馬歇雷與巴里巴拒絕了“文學”與“藝術”的範疇，因為它們僅僅存在於其歷史的與社會的脈絡之中。美感經驗是不可避免地束縛在意識形態之中。這個研究方法也平行於伊格頓的政治批評。

伊格頓質疑批評的對象。對他言，文學是幻覺，文學理論也是幻覺——它們不會比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分枝還多些什麼(Eagleton, 1983: 204)。他們最好是在福寇式的“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之中，做為一個名字來看待它(p.205)。現在，阿圖塞所要求的“審美效果”能被像一論述所生產的效果一般來處理——以傳統術語來說，即，修辭學(措辭)(rhetoric)。

對伊格頓而言，修辭學不是一種“人文主義”，關心以主體經驗的感覺方式，也非一種“形式主義”，單純地為形式化了的類型(typologies)盤據。它由具體的動作表現的角度來注視這些設計，以及經由正文的結構與作用著的物質的情境的角度來注視主體對論述的反應。論述的實踐不僅僅是像正文的對象，成為美學上的沈思對象或無窮盡的解構對象，而是一活動的形式，它與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更寬廣的社會關係不可分離的活動的形式(Eagleton, 1983: 206)。

總之，主體與客體需要在一特殊的社會歷史中來處理。這也就是說，美感經驗是社會地與意識形態地被安置的。現在，在下一節，我

將以審美價值的問題來檢視伊格頓的政治批評。

## (二)形式與價值之關係

在伊格頓的文化政治學中，無需將美學理論約束在政治學中，因為政治由一開始就有了。這並非強調政治的選擇，而是說，任何理論只要關心的是意義、價值、語言、感覺與經驗，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入更深層的關乎人與社會、權力與性、對歷史的詮釋、對現時的策略與對未來的希望之價值。所以，美學理論不可避免地是政治的(Eagleton, 1983:194-195)。它是制度的一部分，首先建構標準以及確定何者為有價值的偉大作品。其實根本沒有什麼真正偉大的作品(p.202)。沒有什麼“內在的”價值，審美的價值在為意識形態所盤據的正文中產生出來，在作品的“消費性的生產”中生產出來，它們正是閱讀的行動(Eagleton, 1976:166)。審美的價值僅存在於論述之中，這論述是由“非藝術”中區別“藝術”，由“非文學”中區別“文學”的語言的權力。進一步，審美品質的特殊性僅僅存在於經由效果的度量角度所表現的“修辭學”(措詞)之中，這正是表意的實踐所產生的，即，“論述的理論”(discourse theory)(Eagleton, 1983:205-206)。事實上，伊格頓論述理論的修辭學(措辭)處理的是審美評價的特殊性這可以視為伊格頓對珍妮·鄔爾芙(Janet Wolff)對他早期不適當的化約主義——將審美準則化約為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一種反應(Wolff, 1983:33)。

對伊格頓而言，有一些東西是在美學上不可化約的——一些在經驗上不可化約的東西(Eagleton and Fuller, 1985 :89)。伊格頓經由論述(discourse)來處理審美價值，經由不可化約的美感經驗來處理審美中的特殊性與審美的性質。這正是阿圖塞在其論藝術之書信中所指出的：“看”、“知覺”與“感覺”的形式(但不是“知道”的形式)(Althusser, 1966/1971:222)。

伊格頓，事實上在文化研究的更寬的脈絡中重新建構他的文學論述。以下，我將在形式與脈絡的關係層次上來闡述它。

###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之關係

#### (一)形式與文化脈絡組織

“但是，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與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一方面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

“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地復活著嗎？爲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爲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階段並不矛盾。它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並且是它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一點不開的。”

——卡爾·馬克斯(Marx, 1857/1939/1973: 111)(中譯引自，《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114)。

在伊格頓的早期著作中，他將這段有名的文章放回其脈絡之中——將總導言，1857年的手稿——伊格頓指出馬克斯的意思：未來社會無限的資源將服務無限發展中的人。同時，馬克斯闡述基礎與上層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現在的與過去的藝術間的關係(Eagleton, 1976b:12-13)。

在其後來之作品中，伊格頓針對爲何希臘藝術保持了一“永恆的魅力”的問題，他質問：“既然歷史是沒有終結的，我們又如何地知

道它仍將是“永恆地”有吸引力呢？(Eagleton,1983:12)。在其他的地方，伊格頓質疑彼得·福勒(Peter Fuller)美學的生物結構的觀點。他提及自己並不拒絕“超歷史”的事實。但是他問“我們所說的超歷史的是什麼意思？”，“我們能說一人造物已經有規律地與恆常地被給予了價值，或許因為某種結構與身體是遺傳的。但是，事實上，我們經過不同的年代是在談論相同的人造物嗎？”事實上，所有的人造物是被重建或是重新詮釋著。因為重建在文化上總是特殊的，我們對相同的作品在做不同的評價(Eagleton and Fuller,1985 :81)。對伊格頓而言，人們的審美價值總是在一特殊情境中“轉移的”，總是在文化上與歷史上特殊的(p.77)。

伊格頓指出“意識形態與我們經驗的整體並存”。他試圖綜合意識形態的圈子與無意識形態的圈子（或者是伊格頓所稱的本能的）來處理審美反應，因為無意識已經由意識形態價值的問題來掌握了。美學的形式總是包含了意識的直接知覺。意識形態經常給予一種關乎支配的知覺的形式與結構。這就是說，意識形態本身能關係著這兩種分析因素——事實上，我們是在單一過程中知覺著(Eagleton and Fuller,1985 :84-85)。

## (二)形式與社會關係

對伊格頓而，他經常問的問題是“誰的價值”？美學這個字本身涵蓋了價值的多重性。他有意去審視批評的形式，它們承擔價值的衝突。審美評價之“品味”僅僅是一個起點。然後，他調查什麼真正涉及審美價值的構成。記號學，心理分析與知覺的真實過程中的意識形態研究，審美評價的研究等的結合——使我們能發現為何人們喜歡某些作品而不喜歡某些作品(Eagleton and Fuller,1985 :77,82)。

然後，轉向採納福寇的論述過程，伊格頓的政治批評處理論述與權力之間聯繫的意識形態鬥爭(Eagleton,1983:210)。進一步，伊格頓告訴我們，經由政治批評，他要做些什麼。他由在制度內的文化衝突移

向發現其制度外的向度。所以，文化政治學試圖掌握住形式與社會衝突競技場，即，社會運動(Roberts,1985 :62)。這就是我們在前面提的四個領域：第三世界的鬥爭、婦女運動的鬥爭，對抗文化工業的鬥爭·工人階級的寫作。現在，我們假設其應用於空間專業實踐的層次來檢視它們<sup>⑥</sup>。

## 四、應用層次

### (一)政治的計劃：對建築的政治文化的干預

順著伊格頓的文化政治學的邏輯，“建築的”意識形態解構是首先要做的事。我們必須辨明“建築”是一幻覺，建築理論也是一幻覺。套用伊格頓的話來說，“建築”，是生動地涉及男男女女的生活情境：它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以其豐盛之變化展示生活，拒絕以貧瘠的概念來調查什麼是成爲活的之感覺與品味”(Eagleton,1983:176)；以及“建築是一名稱，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理由，在一整個‘論述實踐’的領域內，用來稱呼某種的空間營造物”(p.204)。事實上，建築是變遷中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以及關乎更廣的社會、政治情況之變遷之實踐條件的產物。“建築”的觀點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浮現，僅僅在十八世紀的西歐，以一美術的分枝區別於“營造”之後才得到完全發展。然而，在營造與建築之間，並沒有什麼根本上的差異。建築應在其歷史地特殊論述與實踐之中被界定。

這種對建築的社會批評也同樣試圖攻擊傳統的建築審美價值，而變換以社會與政治的價值。建築的理論不過只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分枝，它必須安置在一更廣的脈絡中來檢視其“表意實踐”(signifying

<sup>⑥</sup>泰雷·伊格頓曾經是講員之一（與雷·藍道(Ray Landau)、米恰·班迪尼(Micha Bandini)與保羅·赫斯特(Paul Hirst))，參加1983年倫敦建築協會之建築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一門稱爲“歷史與理論研討：建築史的理論與分析”(History and Theory Seminar:Theory and Analysis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的課程講授。

practice)之功能。它們擔任著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功能，對應著它們的物質基礎，建築為支配階級的權力結構合法化而服務。進一步，建築論述之中，所有的文化造物都是實踐領域研究的對象，而非僅止於模糊的稱為“建築”(architecture)。論述理論不擔心它的研究對象是人造環境，是規劃還是設計，是歷史還是批評，是理論還是實踐，是寫作還是繪畫，是營造過程還是政治過程等等。它的眼界與範圍涵蓋了整個社會中論述實踐的領域(Eagleton,1983:205)。

## (二)對空間特殊性的理論的再定位

對泰雷·伊格頓言，建築理論與其說是一種知識探索的對象，不如說是觀察歷史的一種特殊看法。一方面，伊格頓的政治批評基於對正文的科學知識，能夠闡明文化造物的意識形態性質。我們必須拒絕傳統的建築美學，因為我們無法再接受未經批判的、共同的、自我不朽的建築審美價值的論述(Wolff,1983)。對伊格頓言，這其實是一種形上學，它是一種特定語義系統的產物。論述的最高原則往往是被它們的對應面——它們本身所排斥的對象——來確定其論述的支配體系。這也就是在兩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原則中的封閉系統所造就的形上學思想。所以，常規性建築史對空間文化形式的“風格”定義，以及“風格的演化”，我們可以看到理性／感性、肉體／精神、分析／直覺、中心／邊緣、真／假、實／虛…等兩元對立所確立的明確界線，它的對立面却還是體制所要壓制的，從自身所要驅逐的。

另一方面，論述理論的修辭學(措辭)也處理空間的特殊性，因為論述的“效果”也被考慮在內了。我們略加闡述於下：

“論述”，不僅僅關乎形式，且也關乎意義的社會生產。一方面，意義、意識，甚至思想的對象，都被覺察到是論述內的建構；所以我們是以論述的功能在覺知世界(Wolff,1983:91-92)。論述理論尋求了解論述是如何被產生著。像是意識形態再生產的一部分，論述實踐支持意識形態現存的方式，強化支配的生產方式，關係著社會權力的結構。

對伊格頓言，福寇的論述分析檢視在特殊的，歷史地被安置的論述之內動態的操作，是能在實踐本身中確定權力關係的位置。

另一方面，論述理論處理形式的課題，它嘗試營造形式的動作展現的向度。它檢視論述如何被結構與被組織，以及對在具體情況中的特殊使用者身上，形式所生產的效果。我們可以說，論述理論，事實上，像是古代所說的“營造”這個字，或是一種“空間的修辭（空間措辭）”，它一般被當做是傳統營造師傅的一種技巧以及一種實踐(Eagleton,1983:205)。它留心論述實踐經由自然與人造的元素所產生的技巧與效果，因為空間的具體效果是使人們感到舒適，並支持人們的活動、為使用者提供自明性以及為空間添加意義。

## 五、認識論的批判

簡言之，過去的歲月中，泰雷·伊格頓的理論的研究方法是試圖修飾阿圖塞的角度。首先，如同馬歇雷與巴里巴，他也拒絕了文學與藝術對象的範疇。對他而言，審美評價真正的／平凡的區別僅在論述之中作用。然後，如同雅克·蘭西爾(Jacques Ranciere)(Ranciere, 1969/1985)，伊格頓避免了意識形態／科學之間的對立，以及意識形態的一般化與共通化。很明顯的，他要求在一特定的論述之中來處理審美效果，這論述決定了美感經驗與正文生產和消費間的社會關係。基於阿圖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經由班哲明與福寇，自70年晚期起，伊格頓的理論研究方法已漸強調其政治批判的產品。在題為“意識形態、虛構、敘事”(Ideology,Fiction,Narrative)的文章中出現(Eagleton, 1979)，以及在文學理論中完全發展了(Eagleton,1983)，福寇式的論述分析已被採納為伊格頓文化政治學的理論核心。現在，我將檢視伊格頓理論論述的疑旨，來察看什麼是在變動了的後現代文化氣候中，其認識論上所做的省略。

首先，伊格頓論述所提出的基本問題，表明了其後現代主義所覺察到的特點。對伊格頓而言，任何試圖經由“方法”或其“對象”的

角度來界定文化造物的研究都註定了失敗(Eagleton,1983:210)。這些批評形式的特殊性並不存在於所給予的不同方法的理論之中。“這些批評的形式與其他不同，因為他們不同地去界定分析的對象，有不同的價值、信念與目標，所以爲了實現這些目標而有不同的策略產生”(Eagleton,1983:212)。所以，區別一個論述與另一個論述，不是本體論的，也不是方法論的，而是在策略上的。對理論與方法的選擇與發展是仰賴於由我們要去做什麼開始，即，我們的目標。方法與理論將幫助我們去達成它們。

然後，政治批評的理論架構是論述理論加上激進評論家的政治策略。所有概念都會要放在這個架構之中，它決定了概念的意義。

一方面，伊格頓—福寇式的論述理論的中心前題之一就是權力與語言的論述分析，它涵蓋了記號學系統與所有的表意實踐。意識形態在論述與權力之間連結(Eagleton,1983:210)。它的理論類比就是傳統的修辭學，它涵蓋有效果的論述之實踐以及關於它的科學(p. 207)。另一方面，激進評論家的政治價值：“現代批評誕生於對抗絕對國家的鬥爭”(Eagleton,1984:124)。對一個像伊格頓這樣的批評家而言，“這是一政治的問題，而不僅僅是‘道德的’議論：這也就是說，這必須是真正的道德議論，它見到在個人的品質與價值和吾人整個生存的物質條件之間的關係”(Eagleton:1983:208)。伊格頓知道政治批評必須由制度／機構的邊緣移向其制度未涵蓋到的向度。所以，他期望文化的研究能涵蓋社會運動的四個主要領域：第三世界的鬥爭、婦女運動、對抗文化工業的鬥爭、工人階級的寫作。此處，理論的類比是自由的人文主義。對伊格頓而言差別之處在於，人文主義僅關心抽象的投票箱的民主而沒沒關注像標準石油公司這類跨國公司的運作(p. 207)

最後，論述理論與政治策略之間相互關聯的主旨是一個激進多元主義的政治學。這也就是說，它在政治價值上激進，但是在實際上却是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麼，什麼是其認識上的忽略呢：



### (一)在論述的權力與社會運動之間理論上的空白

對伊格頓而言，在理論的論述與政治的策略性宣告之間沒有必然的方法論上的連結。換言之，分析理論與規範“理論”之間，在真理與道德，在事實與價值之間沒有方法論上的連結。然而，前者的結果將是後者行動的基礎。否則，什麼能指導我們社會實踐的方向呢？即，認識與實踐的關係。在伊格頓的理論論述中，他並未在方法論上解決理論與實踐之間所需的連結。這樣，實踐變成了一個實際的策略，但不是一種歷史的行動。這是方法與行動的分裂，理論與實踐間的割裂。

首先，在福寇式的論述權力與伊格頓的激進策略之間理論上的空白有一些問題存在：

**1. 伊格頓—福寇的論述理論關心論述的權力與權力的論述，但未解釋論述是由衝突而來，而且帶有它們矛盾的記號。**

在歷史行動與社會實踐中的集體的作者，以及認識論中的有意圖的主體被忽略了，例如，社會運動像在社會變遷中被動員的集體主體一般作用著，來再界定論述的社會意義(Castells, 1985b: 95)。事實上，福寇的論述悲觀的特性表明在其孤立地考量論述中制度之實踐。它完全忽視了有意圖的主體與被動員的集體主體在實踐的認知過程中辯證的角色。論述理論像是一半康德式的觀點在全然不及物的向度中作用著，結果十分容易變成一種唯心論(Bhaskar, 1983: 261)。

**2. 雖然伊格頓知道米謝·福寇的保守本質(Eagleton, 1986a: 4)，在伊格頓的論述中，他卻未提及如何經由伊格頓—福寇式的論述理論的制度實踐來達到他對社會運動方面的激進的政治價值。**

所以，大衛·羅伯(David Roberts)懷疑是否伊格頓的意識形態“廢除”(unmaking)方式的計劃，僅關心論述的效果，是否能夠回答這些社會與政治運動的問題(Roberts, 1985: 63)。事實上，這個弱點也與我們的下一個問題有關。

### (二)資本主義再結構中的道德批判

以他自己的話來回應英文研究中的危機，伊格頓似乎只是對當前政治上防禦的自由主義批評提出一道德的批判——這個自由主義批評出現於1983年危機之後的資本主義再結構過程，是處於後現代邏輯中的——而不是提出一個分析性理論的架構。由於他個人的敏銳與政治的立場，一些銳利的見解可以在伊格頓的政治批評中發現到。然而，伊格頓的論述理論沒有提供更多的解釋，針對晚期資本主義再結構過程，在結構化了的，不同的歷史角色衝突的社會過程，其中有意圖的主體如何賦與空間意義的具體情境的分析。雖然我們分享伊格頓的政治目標，也贊同他的議論後結構的重建是“沒有人文的自由主義”，然而，我們尋求的理論却不是規範性的，而是歷史的。這就是為何李察·艾克塞對伊格頓以強而有力的修辭學（措辭）道德地宣告了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加以質疑的原因所在(Aczel,1985:115)。這個問題也關乎阿圖塞對人文主義的批判所做的貢獻，即，認識論的干預。其他的理論，由自由主義的人文主義到現象學，問題並不僅在於他們的動機、價值與立場，而是在於論述的疑旨，在於其意識形態的空白。最後，以致於他們不能指導我們的實踐，以及，他們在我們的實踐中不能發生作用。

### (三)結語：朝向針對文化形式的政治理論

在本章的最後，我們必須再一次重申：歷史不能化約為正文；空間也不是已寫就了的正文。那麼，讓我們進一步由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尼可斯·哈齊尼可拉·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等人對文化形式的觀點加以檢視。檢視他們如何處理空間與社會的關係，空間形式與社經利益之間的非直接關係，或者更細緻地說，不同的論述中空間意義與社會過程中衝突的歷史主體之間的關係，做為本章之總結。

歐文·潘諾夫斯基為華堡學派的藝術史家。潘諾夫斯基在哲學上

接受了來自黑格爾、康德、狄爾泰與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等人的影響，在藝術史上則主要承襲了海涅克·鄔福林(Heinrich Wölfflin)、阿里歐斯·里哥(Alois Riegl)與阿畢·華堡(Aby Warburg)的傳統。而其中，華堡的影響尤為直接。阿畢·華堡的思想可追溯自——但超越了——希波里特·泰勒(Hippolyte Taine)的實證主義式的氛圍(milieu)理論(視社會是一單一的整體)，以及賈可柏·布哈德(Jacob Burckhardt)的德意志文化社會學的傳統(視藝術為文化史的一部分)。而潘諾夫斯基則一方面拒絕了鄔福林由作品形式中所表現的時代精神(Zeitgeist)提法，另一方面又摒棄了里哥對作品的意志的結構觀點。他將恩斯特·凱西爾的象徵價值加以發展，建立了圖象學的研究途徑(iconological approach)(Panofsky,1924/1968;1939/1962;1951;1955)，追求象徵的系譜學(the genealogy of symbol)，試圖由其“文學來源”(literary resource)中去發現隱藏的意義，而連繫起藝術與思想、意念與概念、感覺的表現與思想的傳達(Hadjinicolaou,1973/1978:46;Holly,1984)。

哈齊尼可拉提及潘諾夫斯基以其對藝術與其他知識的熟悉與博學，告訴我們空間象徵的意義必須由其內容來了解。譬如說，潘諾夫斯基連繫起哥德式建築的發展與經院哲學成長間的關係，說明了建築風格與結構如何表現了經院哲學對秩序的定義與思想形式(Panofsky, 1951)。

此處，我們不但須提及哈齊尼可拉對潘諾夫斯基的圖象學研究方法作為一種藝術史技巧的肯定，也須提及哈齊尼可拉對潘諾夫斯基的研究方法在哲學疑旨上的懷疑。套用他的話可以指出兩點潘諾夫斯基主要的認識論上的疏漏與意識形態上的空白。

第一，在潘諾夫斯基的研究途徑中，空間是另外其他事物的一種“徵候”(symptom)，或者說，文化的徵候與象徵(Panofsky,1955 :38-4)。然而，“空間是一產物，它本身就形成為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Hadjinicolaou,1973/1978:48)，而不只是另外其他事物的靜態表徵，

因為它有其現實(reality)存在，也能由其自身站立起來。

第二，對潘諾夫斯基的文化概念言，文化是連續而均質的存在。他未能見到“每一個文化都是在一特殊生產方式的持續時間中，代表其社會之剝削的混合物”(Hadjinicolaou,1973/1978:48-49)。

因此，哈齊尼可拉提出了一個我們已在前面過提過的精巧的理論模型以取代傳統對空間之文化形式的觀點，以及處理政經利益、一般意識形態與空間形式的關係：“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imaged ideology)是在每一個特殊的時機，空間的形式與內容的元素共同結合的方式。這個結合是一個社會階級整體意識形態的一種特殊的形式”(Hadjinicolaou,1973/1978:95)。所以，空間本身就是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不是什麼其他東西。然而，空間又不能就其本身來了解，必須與它所發生的結構一起來。所以，哈齊尼可拉已經理論地掌握了形式結構與爭鬥中的階級意識形態的關係了。這個結合是社會階級整體意識形態的特殊形式。哈齊尼可拉在文化造物的脈絡組織中來談論階級鬥爭。他強調階級鬥爭經由風格存在而出現，甚至有時經由不同風格間的鬥爭來表現。按照哈齊尼可拉的說法，在相同階級之間，或是統治階級之間不同層次、不同部門的意象意識形態間所發生的鬥爭，比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意象意識形態間的鬥爭還要多。結果，“繪畫”經常是統治階級映照它們自己的產物(p.102)。

那麼，在營造物（或者說，空間）領域的事實又如何呢？這又一再地關係到“封閉”的“建築”(architecture)與“城市”(city)的課題。這不是歷史的問題仍然在那兒：來自底層的鬥爭著的角色在哪兒呢？換言之，在結構之中，歷史與社會的角色是如何在實踐著呢？

這時候，爲了避免了早期做爲阿圖塞主義忽略主體能性的詬病，最近曼威·柯司特對“空間意義”的提法，就值得一提了。

曼威·柯司特於1942生於西班牙，獲巴黎大學法學碩士，社會學碩士與博士(1976)，他的論文爲：巴黎都會區工業區位之社會學模式(Sociological Patterns of Industrial Location in the Paris Metro-

politan Area)。曾任教於高等社會科學院，自1979年起，任教於柏克萊加州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學系。此外，他曾客座世界各地，尤其是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這對他的研究有重要的影響：例如曾客座於滿地可大學(Montreal)(1969)，拉丁美洲社會科學教師(Latin Americ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法拉索(Flacso)、智利(Chile)(1970)、智利天主教大學(1971, 1972)、默地生—威斯康辛(1975-77)、波士頓(1976)、墨西哥(1976)、哥本哈根(1976)、委內瑞拉(1979)、墨西哥—UNAM(1982)、香港(1983)、馬德里(1984)。同時，他也是1982年古根翰獎助學者，在墨西哥、西班牙、巴西、法國、香港、與義大利工作。1978年到1982年，他也是國際社會學學會都市研究委員會主席。柯司特的著作甚多，主要包括：《都市問題》(The Urban Question)(1972/1977) (已有七種不同語言譯本)、《城市、階級與權力》(City, Class and Power)(1979)、《經濟危機與美國社會》(The Economic Crisis and American Society)(1980)、《城市與民眾》(The City and Grass-roots)(1983b)<sup>⑦</sup>、《高科技、空間與社會》(High Technology, Space, and Society)(1985)、《全球再結構與領域發展》(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1987)、以及《資訊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1989)等等。

如同哈齊尼可拉，柯司特尤有過之，他對主流之都市理論直接地提出了批判，認為它們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實踐(Pickvance, 1976)：它以環境決定論的形式掩蔽了社會關係。而在本章之結論中，我們所要著重的是：在空間的文化形式方面，柯司特的理論貢獻和其認識論上的深化與轉變<sup>⑧</sup>。

<sup>⑦</sup>1983年萊特·密爾斯(Wright Mills)獎得主。

<sup>⑧</sup>由《都市問題》到《城市與民眾》，柯司特曾提及他所經歷的至少五點認識上的改變：1、過度的功能論所強調的無主動者的結構，2、過度的經濟主義觀點，3、都市社會運動中的政黨角色，4、國家理論，5、考慮文化為主要的變數等等(Castells, 1985)。事實上，這些改變社會地與歷史地標明了一個由60年代到80年代，一個由大陸法國到英國的知識旅程。在今日的資本主義再結構過程中，柯司特目前的研究與興趣放在：1、高科技與經濟再結構對都市一區域的影響，2、開發中國家的都市化：新階段，3、新科技的

早期，柯司特做爲一個阿圖塞結構主義者，對都市政治與社會變遷的研究提出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庸俗馬克斯主義的馬克斯主義理論架構。以其激進的《都市問題》(The Urban Question, Castells, 1972/1977)一書爲代表，他試圖重新界定都市(Urban)之觀點，重建一新的研究領域。對柯司特而言，空間的社會構造可以由不同的生產方式之歷史連結(historical articulation of several modes of production)來了解，經由社會結構實踐之基本系統結合起來的特殊矩陣來了解“經濟、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系統諸元素對空間的塑造”(Castells, 1972/1977:125-126)。在這個針對的都市空間之精巧的阿圖塞—柯司特模型中，包括了經濟系統的結合(它界定爲生產與空間、空間的消費、交換元素等)、制度的組織、以及都市象徵。按照柯司特的話來說，社會空間其形成的特殊性是經由社會結構元素間之關係來考量的(即EPI的步驟)(p.235)。進一步，他認爲都市系統總是在國家對都市服務進行干預之基礎上的政治衝突的焦點，即“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理論性概念。這是早期柯司特的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關乎他對“都市社會運動”(urban social movements)(USMs)的研究方法。在這早期階段中，這個都市社會運動又從而連繫上創造社會結構性改變的工運，所以，都市社會學就不再是一學術界的孤立之知識遊戲，而是在社會歷史轉化階段的中央舞台上，意識形態鬥爭與都市實踐的新學派之理論基礎了(Lowe, 1986:2)。

都市空間的文化形式則經由都市結構的架構，以及經由文化時勢來處理爲都市之象徵(urban symbolic)，即，意識形態的表現。然後，意識形態非由其自身來界定，而須由其社會效果(social effects)來界定，同時，意識形態的論述可以總括爲正當化、合法化(legitimation)與溝通(communication)的效果。在都市結構中象徵過程的系統(如散發、轉播、與接收)不是一形式解碼的事(都市空間並非一已寫就之

---

社會與經濟效果。簡言之，高科技，經濟再結構與都市與區域發展間的關係是其目前研究的對象。

正文)，而是在一特定時勢中經由意識形態的再生產的表現中介(Castells,1972/1977:218-219)。用哈齊尼可拉的話來說，這些都市所中介與斡旋的意識形態實踐可以用“意象意識形態”的概念來分析。然而，社會、知識、與政治的事件改變了柯司特的研究方法。

到了城市與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Castells,1983b)這階段中，我們却看到了一種理論上的努力，致力將都市變遷研究當做一種城市理論的一部分。基於歷史分析，一個對都市社會運動(USMs)的理論已經提了出來。他認為社會變遷為結構改變——它關乎社會中其制度化了的規則(institutionalized rules)的改變。在變遷中所涉及的日常生活之價值、意象、與感覺為社會與歷史的角色在一特定的結構性架構中被提來，即，為支配性邏輯所制約的有意圖之人類作用者的計劃(project)。所以，城市是深深地關係著都市遊戲規則的生產。這個論述的實踐，也是要由都市社會運動來了解的關鍵所在。現在，柯司特對都市社會運動的研究方法已經回到他自己早期的理論根源，也就是阿蘭·圖南(Alain Touraine)，對英語世界所熟悉的理論用詞而言，他甚至接近了其對手昂希·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Gottdiener,1985:156)。同時，他對國家(state)的概念則由列寧主義的理論修正到安東尼·葛蘭西(Antoni Gramsci)的立場。國家被視為是階級與其他社會鬥爭的結晶。這不僅是某些階級、社會團體與性別支配的過程，它並且是抵抗階級、社會團體與性別支配的表現過程。他的研究方法也平行於愛德華·湯姆遜(E. P. Thompson)的努力方向：經由生產文化的條件來編組工人階級。對這時的柯司特言，由文化（即關乎都市社會運動的論述之實踐）所產生的自由活動空間，並不是鬥爭的工具，而是工人階級運動能浮現，能在國家與資本的壓迫之下發展出一自主性的元素(Castells,1985:13)。

按早期柯司特的研究方法，空間是一連結在特殊的社會關係中的物質產物，特殊的社會關係賦與空間形式、功能以及社會意義(Castells,1972/1977:115)。現在，他將社會關係放在一社會動態過程中來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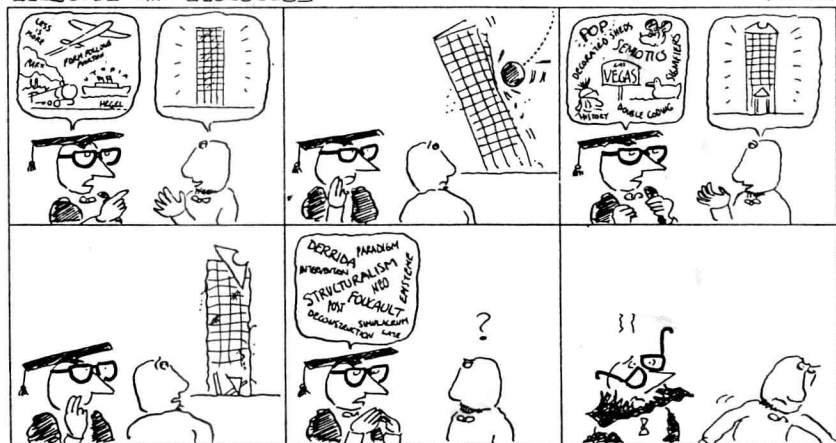
理。柯司特在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區別都市意義，都市功能與都市形式，都市意義被認為在一既定社會中歷史角色之間所發生的衝突過程所指派給城市目標，而做為其結構之展現論述的實踐（即，意義的生產，遊戲規則的生產）則是關乎支配與反支配過程與不同角色的利益與價值。其次，界定都市意義的歷史過程決定了都市功能的特性。都市的功能被界定為按都市意義所指派的目標來展現的組織工具(organizational means)的連結系統。再來，都市意義與都市功能共同地決定都市形式，即，一歷史角色間的衝突過程的空間象徵表現，都市形式是它們物質化的結果。所以，柯司特稱都市變遷為都市意義的再界定，稱都市設計為以某種都市形式來表現一可接受的意義之象徵嘗試(Catells,1983b:303-304)。

空間的歷史意義不是空間形式的精神表徵，而是符合意義歷史之矛盾衝突的社會變動對形式的結構性任務的分派(Castells,1983b:302)。結構與角色間的關係，政治、經濟利益、論述實踐中空間的意義，社會過程中衝突的歷史角色間的關係必須一起處理。論述實踐身上懷有在衝突的社會過程中的種種痕跡記號。在改變空間形式的戰場之上的種種聲響與力量不僅僅是來自上方，也有來自底層的吶喊。



## THEORY and PRACTICE

HELLMAN



© Louis Hellman/October 25, 1990

圖8-1 理論與實踐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No. 12, 1990 ;  
繪圖：路易斯·海曼 (Louis Hellman))

## 第八章 結論： 空間文化形式之解釋性提綱

“女性主義科學與認識論有意識地對女性與男性的處境做更深入的了解，以便推動及指導女性與男性抗爭，以清除女性在所有種族、階級與文化形式中的附屬地位…不局限在白人、西方的、男人的、資產階級的認識論…也不需要強調絕對的、完全的、普同性的女性主義分析。”

——以上文字取材自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關於仙杜拉·哈定 (Sandra Harding) (Harding, 1990) 的討論。

本書中所提及之理論傳統可以依序粗略分為兩組。第一組包含三部分：

首先，開文·林區之研究途徑被當做是一種針對規劃專業實踐的，相對而言發展較為完全的行動與思考角度。其次，林區之研究途徑與環境—行為研究有關連，環境—行為研究是社會科學取向的環境設計研究，但身上帶有實證主義之特徵。隨後討論的第三枝傾向是克里利多夫·亞歷山大的理論著作，它可以視為是實證主義環境—行為研究的認識論相對體。他的理論研究途徑多少較接近在設計專業實踐中的現象學角度。同時，社會性建築仍然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跡。林區

與亞歷山大兩者都不盡能符合常規性之主流的規劃與設計專業論述，他們尋求新的替代性出路。他們挑戰主流專業論述的理性模型，搖撼常規性的審美價值。林區與亞歷山大貢獻他們具原創性的角度以對抗異化，但僅止於在專業實踐中戰鬥。他們從未嚐試與進一步的政治實踐整合。在某個程度上，林區 (Lynch, 1960)、環境一行為研究的主體、以及亞歷山大 (Alexander, 1964a) 俱屬經驗論傾向。

第二組則需由第四個理論傳統算起。第四部分，曼菲德·塔夫利的歷史計劃提供了對圓滿性與和諧的一種政治與意識形態批判，視其為現實之遮蔽。然而，他拒絕了空間之特殊性，也拒絕了社會理論。第五部分，賀龍·巴赫德則針對形式本身提供了結構主義的符號學分析。然而，身體對空間正文的審美經驗也被進一步加以處理了。第六部分，在經歷了阿圖塞主義對理論所要求的嚴謹之後，泰雷·伊格頓却以激進的多元論以回應享樂主義與晚期資本主義再結構過程中之後結構主義。塔夫利、巴赫德與伊格頓都分別以不同方式的批判取向試圖處理文化造物，這意謂去掌握政治與藝術、意識形態與文化形式之間的微妙關係。他們試圖翻轉常規性美學的認識論基礎。結果，他們志不在於發現答案，反而轉身向空間的文化形式之認識論模型的重構再三致意。

所有的學派都是制度地與歷史地建構的論述。我們已經歷了一種批判性閱讀，而過程中的議論就是我們的結果。認識論批判迄今並未提供任何理論的最終結果。然而，我們却能在每個論述中洞悉潛藏疑旨之徵候。爲了檢討它們對社會與空間之關係、社會歷史脈絡與空間之文化形式間之關係的理論貢獻，我們檢視它們的理論架構所隱藏之發問方式。換言之，解釋性批判涉及對科學與美學、事實與價值、結構與作用者、理論與實踐、社會與個體、實體理論與程序理論、分析性社會理論與規範“理論”間之不能分割性的社會歷史探索。這種工作提供我們日後處理空間相關之實踐與政治實踐之適當關係所需的一個初步理論角度。

因此，有臨床醫學性質的設計理論與有基礎醫學傾向的建築理論不能夠分離。前者，設計理論是有政治性的，實踐取向的，提供了在特定情境中認識與處理象徵力量的作用與限制，以改變現實的空間與社會。它經常伴有規範性之價值，常是追求社會與空間解放的政治計劃(political project)的組成部分。它當然也會關心本身的設計方法，這種程序性理論却不宜與建築理論與社會理論脫離而成為科學的、自主性的“知識廢墟”，因為它終究是權力論述的一部分。設計理論宜為後者，建築理論的一部分（就像規劃理論之於都市理論）。建築理論本身宜避免過分實踐之工具性傾向，重視深化理論知識，提供新知識之生產。然而，需重視實踐對理論之轉化，如此，理論方得以指導實踐。建築理論本身，對於實體理論的建築語言自主性，象徵結構本身，需對表徵和再現方式在不同社會中社會關係的再生產與轉化提供分析性的理論，解除建築隱喻的權威，拆散在傳達溝通與正當性方面的神話。建築理論因此是社會理論的一部分。這些理論間的強幹弱枝現象或是彼此之間的片斷化現象，正是教條主義滋生的知識土壤。

我們尋求一種角度，而非在於保衛馬克思主義和重建一個空間文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由於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某些元素對實踐以及社會變遷、論述實踐與其相關之空間文化形式的分析有關鍵性的作用，我們才使用它們。它們在建造新的概念性工具與以有生產性的方式發展研究並加以應用。因此，這是一種開放性的解釋角度，而非唯心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理論成果，或生硬拘謹的抽象架構。它們以“論綱”或“提綱”的形式呈現，以澄清我們的觀點（Castells, 1972/1976/1977：429）。

進一步，我們必需避免以經驗為代價去交換理論，以實踐與人類解放的可能性為代價去購買結構與論述（Bhaskar, 1983:261）。空間文化形式之知識生產植基於對諸論述之認識論批判，即，認識論實踐，或認識過程中的勞動，或有意圖的主體作用者之中介。這也是歷史的作用者所必要的知識勞動。最後，這個認識論模型需要加以發展，加

以檢驗，或者是被放棄；這個模型僅僅提供為日後之社會實踐一個暫時性的理論場地而已。因為畢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為了提供空間的文化形式之知識生產一個初步的架構，我們先將前述所有的理論傳統整理一要略表，然後才說明解釋性之論綱與提綱。

表8—1 不同理論傳統要略表

理論傳統 理論主題	一、開文·林區及其知識上之同道
一、主體與客體關係	1. 視聚落形式為人類實踐之空間安排，人、財貨、與資訊之空間流動結果，以及，關係著這些實踐，以有意義的方式修飾空間的實質容貌。 2. 需包括空間的分配、空間控制、空間使用與空間知覺。 3. 視空間形式為空間意象與感覺形式之展現。
二、形式與價值關係	1. 視空間形式為由使用者感覺經驗而賦與了價值的形式。 2. 以環境象徵研究連結社會結構與空間意象，即，實質環境中介於主客體間象徵互動之過程。
三、文化脈絡與形式之關係	1. 經由（感覺的）外部地景之空間行為分析與（心靈的）內部地景之意象調查相結合的角度看待形式與脈絡。 2. 經由普同性的展現角度與不同文化的特殊解決方案的角度看待形式與脈絡。
四、社會關係與形式	1. 由使用者傾向的研究取向（與使用群體對話）看待形式與脈絡組織。

五、應用層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城市設計。</li> <li>2. 城市模型與原型：一種目標——形式關係是組織環境元素，以獲致具體效果與實質展現。</li> </ol>
六、認識論批判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環境”、“形式”、與“價值”等觀點的方法論預設：意象範疇被視為在所有地方經驗分析過程中“先驗的”度量。</li> <li>2. 處於一定情境中之環境意象：環境意象僅能由關乎歷史既定情境之社會實踐來理解。空間文化形式之界定不僅為空間形式之心象表徵，而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特殊社會結構的體驗。</li> <li>3. 人文主義價值：忽略了充滿衝突的意象與社會衝突的社會政治分析。</li> </ol>
理論 傳統 理論 主題	二、環境—行為研究
一、主體與客體關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視空間形式為基於一種知覺單位之知覺形式。處理行為與環境間的關係時，在主客體間有一種動態的過程存在。</li> <li>2. 實證主義：刺激—反應理論與認知行為主義理論——視知識為全然經由經驗，環境被視為獨立於接收者存在之真實對象。</li> <li>3. 新康德主義：知識被當做是行為與環境互動間主動的人類作用者經由“有意圖之行動”對對象（客體）的積極建構。</li> </ol>
二、形式與價值關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價值為人們經由社會群集而尋求獲致的抽象目標。</li> <li>2. 經由環境知覺的角度，視空間形式為價值與環境形式間的心象和相互關係，真實世界與知覺世界間認知表徵之過濾器。拉普普之理論架構：營造環境經由四個互動元素而結構：空間組織、時間、意義與溝通。</li> </ol>

三、文化脈絡與形式之關係	1. 奧圖曼與齊默爾模型：由心理過程連繫文化與實質環境，它由心象活動（內在的）與行為活動（外在的）所組成。
四、社會關係與形式	1. 摩爾，都鐸與豪威爾模型：由地方、使用者、社會一行為為現象與時間四個向度建構人與地之連繫。
五、應用層次	1. 環境計劃書 2. 使用後評估 3. 設計準則
六、認識論批判	1. 環境論述意識形態架構中的環境一行為疑旨。 (1)空間的政治經濟性質。 (2)認識主體的建構活動：由客觀唯心之行為主義轉向主觀唯心的康德主義。 2. 在規劃與設計中環境一行為應用之疏漏 (1)忽視空間形式 (2)環境一行為論述之消費者導向 (3)政策規劃應用上的失敗
理論傳統 理論主題	三、亞歷山大及其同志
一、主體與客體關係	1. 經由結合幾何形式與主體經驗的角度面對空間形式（美學品質）。由生產性的結構（如語意結構）之規則產生關係的模式。 2. 由中心化過程尋求空間的圓滿性。生產者體驗客體（對象），在自己身心之中感受中心，是最基本的。
二、形式與價值關係	1. “單一中心價值”模型：理論與實踐間價值的一致性。

三、文化脈絡與形式之關係	1. 風格的課題為兩個範疇之互動所造成：永久的幾何與不同的技術。幾何原則將空間結合在一起，使地方感受到無名之品質，以及使事物圓滿。幾何原則是營造的本質，隨文化與年代而改變。
四、社會關係與形式	1. 人與社會可分享的模式語言的演變過程：營造實踐的實體與規範性的取向，像程序性理論那樣作用，在模式語言的執行過程中處理社會關係與形式。
五、應用層次	1. 是一種新的設計理論。 2. 是一種新的營造生產方式。
六、認識論的批判	1. 神秘化的結構與空間的意識： (1)人類能力的天賦論， (2)意識形態的知覺經驗， (3)空間的本體論邏輯， (4)唯心主義烏托邦價值， (5)執行過程與空間實體。 2. 技術—經濟再結構過程中的非正式營造系統。
理論傳統 理論主題	四、曼菲德·塔夫利與威尼斯學派
一、主體與客體關係	1. 塔夫利早期著作致力於建築師的意識形態計劃書之脈絡分析，而非建築師作品之計劃書閱讀（《建築之理論與歷史》）。 2. 塔夫利宣稱歷史調查由正文轉移至脈絡是不夠的。脈絡為技巧上的插曲連續不斷地改變。每一個技巧插曲擁有一特殊但不可轉譯的語言（《領域與迷宮》）。 3. 拒絕結構主義之純粹正文性與現象學模糊的主體。



二、價值與形式關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價值與形式關係要求於社會歷史脈絡中追溯價值之動能以揭露歷史的面具。</li> <li>2. 拒絕“操作式批評”。</li> <li>3. 拒絕古典形式的風味與鄉愁中心性的永恆結構。</li> </ol>
三、文化脈絡與形式之關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正文與脈絡間間接傳遞之不可轉譯，語言基於對語言限制的後結構主義主題之認識。</li> <li>2. 尼采式與弗洛伊德式釋明：語言之使用變成支配的技巧。</li> </ol>
四、社會關係與形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歷史的對象是對權力／制度對抗之分析，它非全盤性而留有邊緣與隙縫。</li> </ol>
五、應用層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建築與政治承諾間之衝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批判性建築是支配權力的制度性工具。建築為營造生產所替代。</li> <li>(2) 批判建築師的僅有出路為在問題之傳統邊界之外的革命性實踐。</li> <li>(3) 廣義的“建築”言，評論者／史家的新角色是歷史地必然。</li> </ol> </li> <li>2. 批判歷史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塔夫利關心的是戰鬥的策略。</li> <li>(2) 建築論述的意識形態分析：批判歷史不針對客體，而是針對問題。客體（對象）僅在脈絡中有意義。對作品品質的偏見必需放棄。</li> <li>(3) 批判歷史是在專業實踐中的對意識形態性質之解秘之意識形態鬥爭，意識形態自然化，即在社會地建構的建築語言中之自然化的措詞。</li> <li>(4) 批判歷史致力於表明循環（事物之系列）以建構結構的循環，而非建築師個人作品之風格分類。</li> <li>(5) 批判史家對歷史分析自身的解秘力量不存有幻想。</li> <li>(6) 歷史作品被迫不斷反叛它自己。</li> </ol> </li> </ol>

六、認識論批判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在早期塔夫利論述中空間之特殊性曾被忽視，以及化約為一般性的意識形態而非衝突的意象意識形態。</li> <li>2. 論述、空間形式與衝突的社會經濟動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專業論述非一封閉的支配意識形態機器，而為一意識形態戰場。</li> <li>(2) 歷史再生產戰鬥，但非僅為語言本身重建之戰鬥。</li> <li>(3) 社會經濟利益之過程不是透明地傳遞至空間形式的。</li> </ol> </li> </ol>
理論 傳統 理論 主題	五、賀龍·巴赫德
一、主體與客體關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作者之死。</li> <li>2. 精緻的情色遊戲。</li> </ol>
二、形式與價值關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尋求建立一唯物主義的主體之理論：正文之愉悅。</li> </ol>
三、文化脈絡與形式之關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去自然化的解秘工作。</li> <li>2. 將正文與作品區分：正文存在於論述的運動之中。</li> </ol>
四、社會關係與形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沒有什麼正文的“作者業”關係。</li> <li>2. 由正文之遊戲式閱讀與區分作品之消費式閱讀。</li> <li>3. 沒有階級隔離之享樂主義美學：不以後設語言之揭露劃地自限。</li> <li>4. 指出佔有欲造成的異化。</li> <li>5. 權力的論述</li> </ol>

五、應用 層次	<p>1. 空間的記號學分析</p> <p>(1) 城市是由元素的對抗與關係所組成之正文。城市的意義，做為一正文，它是讀者之知覺所生產的建築是空間上的言語把戲。</p> <p>(2) 城市建構了一種論述與市民溝通。符號學發展出一種轉化資料的象徵技巧，經由將都市正文分解為各個單位，將這些單位配入形式的等級之中，找到這個單位與模型的結合與轉化的規則等等，隱喻即可變化為意義的描述。</p> <p>(3) 批評的後設語言：批評的對象不是“世界”，而是論述，所以批評是論述的論述。</p> <p>2. 空間情色遊戲的閱讀：後結構主義對空間之多重閱讀。</p> <p>(1) 沒有什麼一對一對應的象徵主義。</p> <p>(2) 象徵需界定為相互關聯的符徵的世界，絕不會因意義完全了而封閉。</p> <p>(3) 城市之情色：都市論述——隱喻性質上之無窮無盡。</p> <p>(4) 沒有明顯限制的結構化過程。</p> <p>(5) 設計理論——設計是將知識做象徵性表現。</p> <p>(6) 設計理論——象徵實踐中再現與表徵方式之可能潛力。</p>
六、認識 論批判	<p>1. 索緒爾——巴赫德式結構主義符號學之論述：</p> <p>(1) 巴赫定的批評：語言是意識形態抗爭的競技場，符號是生產之物質資料，符號的物質體，經由社會衝突的過程與對話，轉化為意義。</p> <p>(2) 符徵—符旨區分的疑旨。</p> <p>(3) 城市是一種“偽正文”，透漏了社會不同階級間的矛盾。城市不僅為異化的穩定狀態之反映，而且是主體作用者產生歷史行動的地方。</p> <p>2. 巴赫德式享樂主義與政治學：</p> <p>(1) 雖然擬議了一個超越資產階級意義的愉悅（快感）之自由感覺方法，後結構主義無能突破在現實中國</p>

	家權力的結構，以致於代之以顛覆語言的結構。
理論 傳統 理論 主題	六、泰雷·伊格頓及其他
一、主體 與客體關 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藝術的知識（深入藝術的特殊性）才是目標，而不在於急於獲致一種藝術方面的潛藏著之人文主義意識形態（阿圖塞）。</li> <li>2. 審美效果為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哈齊尼可拉）。</li> <li>3. 文藝對象的範疇僅存在於其歷史與社會之脈絡中（馬歇雷與巴里巴）。</li> <li>4. 審美效果為論述實踐，即，措詞（伊格頓）。</li> </ol>
二、形式 與價值關 係	1. 論述理論：美學品質僅存在於措詞之中。
三、文化 脈絡與形 式之關係	1. 美學形式總是包涵了意識形態的。
四、社會 關係與形 式	1. 論述理論：伊格頓的政治批評處理論述與權力之間所連結的意識形態抗爭。
五、應用 層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政治的計劃：對建築的政治—文化干預。</li> <li>2. 空間特殊性的理論再定位。</li> </ol>
六、認識 論批判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在論述的權力與社會運動之間理論上的空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從未解釋論述是由衝突而來，而且帶有其矛盾的記號。</li> <li>(2)忽略了在歷史行動與社會實踐中的集體作用者。</li> </ol> </li> </ol>

(3)伊格頓對社會運動的激進政治價值如何連結其理論的架構？

2. 資本主義再結構過程中的道德批判

3. 結語：朝向針對文化形式之政治理論

(1)潘諾夫斯基的圖象學研究途徑——象徵的系譜學。

(2)哈齊尼可拉之意象意識形態：文化造物之特殊性。

(3)柯司特之都市結構 (EPI 系統) 與都市社會運動。

(4)柯司特之都市結構中的都市象徵。

(5)柯司特之都市意義：在歷史意義、都市功能與空間形式之間建立一種等級與關係。

在前述所有的美學論述之理論傳統要略表明之後，針對空間的文化形式的一系列暫時性的，解釋性的，批判性論綱可以略做討論於下：

## 一、空間形式

1. 空間形式本身可以經由空間的生產、消費與交換、空間的控制與制度性組織、空間的知覺與象徵的角度，加以界定，即，辨明社會結構元素間的關係。

2. 文化造物知識建構之目標可以深入處理空間文化形式的特殊性，而非城市或建築的隱藏的人文主義價值。

3. 建築與城市對象的範疇僅存在於其歷史與社會脈絡之內，僅存在於社會與歷史的建構過程中，也存在於社會與歷史地建構起來的論述之中。

### (一)主體客體關係

1. 拒絕結構主義純粹的正文性與現象學模糊的主體：

最好能由意圖與實踐所獲致的效果間的關係加以審視，而非以某些教條態度化約為先驗之形式。

## 2. 吾人之知識之生產根植於兩條知識論提綱之中：

首先，像幽靈一般的實體之對象性 (objectivity) 與對象之物質的決定性，然後，主體性的勞動 (the labour of subjectivity)。勞動以“對象化的關係” (objectifying relationship) 中介於主體與客體之間。這意謂著：

(1)客體如何變成主體的客體的方式視客體 (對象) 之性質而定。例如，我們身體的對象 (如，空間) 不同於我們眼睛的對象 (如繪畫) 與耳朵的對象 (如，音樂)。

(2)客體如何變成主體的客體基於主體的感覺。例如，空間的意義有賴於主體對地方的感覺。所以，在實踐中，主體本身在客體 (對象) 被改變的過程中改變了它自己。

### (二)形式與價值關係

1. 空間，做為一種社會產物，做為資本主義系統中的社會構造，做為生產、消費、交換過程中的商品，做為制度化的遊戲規則，在論述實踐之中包涵了社會價值與文化的偏見。

2. 空間是一種主體化了的物質對象，一種對象化了的人類勞動。

在人類作用者實踐的基礎上，在主體與客體之間有矛盾、對立、與分工。這些矛盾、對立與分工不是在真空之不確定的歷史行動者間之社會戰鬥，而是歷史行動者，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價值，結構社會的基本過程之一。這種歷史行動的結構性展現，也是空間生產中社會行動者實踐時主體與客體之連結。

3. 空間的生產可以界定為經由人類作用者的勞動，將原料轉化為產品。

這個過程包括了有意圖的人類作用者在充滿了衝突的社會動態過程中意識形態的中介作用，這也意謂了與社會、物質的存在之對應關係。

4. 然而，空間與文化造物不等於意識形態。

一方面，人類作用者空間的意識是意識形態地與歷史地被安置的。而另一方面，它不能化約為一般性的意識形態。這是空間的特殊性。

5. 空間轉化過程中，審美效果可以經由論述實踐中衝突的意象意識形態的角度加以考量。

價值是人們經由在社會結構中之社會群體，努力以赴的歷史的與結構性的任務之目標。

6. “建築”的範疇視美學論述的審美價值而定。

“都市意象”不能回答人們如何在頭腦中嵌入空間意象的想像或幻覺。“品味”的審美價值涵蓋了經由神秘化階級特性之文化支配所表現的社會關係。美學論述潛藏的疑旨遮蔽了社會關係。因此要求能在社會歷史脈絡中安置它們，追溯價值的作用，以及揭露歷史的面目。

## 二、形式與脈絡關係

1. 要覺察語言的限制，即，在正文與脈絡間間接傳遞的關係造成不能轉譯的語言。社會經濟利益未明白地傳遞到空間形式上。

2. 語言之使用變成支配的技巧。

### (一)文化脈絡與形式

1. 美學形式總是包涵了意識形態的。

2. 空間的文化形式必需經由空間結構來對待，以及，經由像空間象徵的時勢來對待，即，正當性與溝通之效果的意識形態表現。

空間結構中象徵過程的系統（如發出者、轉播者與接收者）並非形式的解碼（空間並非一種已寫就的正文），而是在既定時勢中經由意識形態再生產之表現性中介。

### (二)社會關係與形式

1. 經由結構性變遷的角度考量社會變遷，它關乎社會之制度化價

值的改變。

日常生活中價值、意象、與感覺所涉及之改變，為在特定結構性架構之中的社會歷史行動者所擬議，即，為支配性邏輯所限制的有意圖的人類作用者的計劃（project）。所以，空間深深地關乎空間遊戲規則的生產。充滿衝突的新空間意義之生產（論述實踐）不僅關乎特定階級社會群體、性別支配的動態過程，而且關乎階級、社會群體、性別之抵制支配過程之表現。

**2. 在歷史意義、空間功能、與文化形式間關係與層級的理論角度可以借用。**

如此，我們得以區分空間變遷過程的三個層次：歷史意義可以理解為，在既定社會中，歷史行動者之間發生的衝突性過程，所賦與的結構性展現任務之空間目標。然後，空間意義的歷史性生產過程決定了空間功能的特性，它為朝向歷史意義所賦與任務的目標展現，所需的組織方式之連結系統所界定。結果，歷史意義與空間功能再聯合起來決定了空間的文化形式，即，物質化結局的過程之象徵性表現。

### 三、應用層次

#### 1. 空間語言：

空間原型（諸如模式語言、設計準則、符號學單位的形式範疇、操作性批評的類型學分析…等）是在專業實踐中強有力，而且必要的元素，必需安置在空間的生產與消費之中，即，空間的展現向度與空間論述的符號運動。然而，它們應該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最小單位，表現了一種目標與形式間的關係。物質造物的對象性與實踐的感覺經驗能一併分析，這是專業實踐之知識基礎之一。語言是意識形態抗爭的戰場，以及，符號是生產的物質資料。符號的物質體經由社會衝突的過轉化以及與意義對話。所以，拒絕古典形式之風味，以及在空間結構中重新安置鄉愁中心性的永恆結構，在方法論上是必要的這也是拔除安全閥後語言機器的顛覆權力之道，可以進一步連結與發展為新



的空間—社會記號學分析。

## 2. 空間的新社會—記號學分析：

(1)城市是由元素的關係與對抗所組成的正文。城市的意義是由讀者之知覺所生產的正文。

(2)城市建構了一種論述與其市民溝通。都市正文必需與都市正文的社會生產相連結。

(3)城市是一種“偽正文”，透漏了社會不同階級間的矛盾。城市不僅為異化之靜態狀態反映，而且是主體作用者之歷史行動發生的地方。

(4)空間的多重閱讀；結構化的沒有明顯限制之過程。

## 3. 批判的專業者之新角色（如建築師、規劃師與地景建築師等）：

以空間結構來考量有意圖的主體之實踐，專業論述不是一封閉的，支配性意識形態機器，而是意識形態戰場。我們關心的是戰鬥的策略。

不以後設語言之揭露劃地自限，解放設計者在論述戰場中的偏離作用。

## 4. 評論家與史家的新角色：

(1)對建築的政治—文化干預並非針對物（客體）（對象），而是代之以問題。物（客體）及其品質僅在脈絡中才有意義。所以，批判歷史是：對專業實踐中意識形態性質之解除神話的意識形態抗爭。

(2)批判的歷史更有志於表明循環（東西之序列），建構結構性的循環，更甚於對個別建築師作品的風格分類。

(3)批評的後設語言：批評的對象不在於“世界”而是論述，批評是論述的論述。

(4)歷史再生產了戰鬥，但不僅僅是重建語言本身的戰鬥而已。

**5. 在歷史意義、空間功能、與文化形式間關係與層級的理論架構，可以在進一步的實踐過程中深化與發展。**

空間結構中的空間文化形式的整體動態過程，可以將其簡化為一

要略圖，（請參見圖8-2）。

我們無由理解空間形式，除非我們將其置於對社會歷史脈絡與決定了其轉化過程之社會實踐的更寬廣分析之中。那麼，一方面，在1980年代，我們已經經歷了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再結構，它塑造了空間結構。另一方面，社會並非單純地為資本主義、國際資本與國家之結構。社會為人的構成，人們在其自身的政治經濟需要上抗爭、抵制、以及發展，以致它們也轉變歷史，所以，它們經由改變意義而改變空間與社會。

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社會運動的澎湃浪潮過去了。在當前的後現代主義意識形態邏輯與對應的1980年代資本主義之技術—經濟再結構過程之中，封閉的理論已無法為我們照單全收。這不是要求理論重構的工作，而是為了我們的實踐建構無明顯限制的、暫時性之理論角度。當前，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孕育著矛盾。受惠於高科技令人難以置信之力量，像資訊技術、微電子、雷射…等，我們注視在美國與西歐的兩極化過程。東歐與蘇聯也為世界市場的力量所穿透，與市民社會的特質所改變面貌。而我們在第三世界變化的新階段中，都市社會運動有了重大進展，特別是在迅速工業化的地區，像巴西、智利、秘魯、墨西哥，以及在亞洲的泰國、菲律賓、香港、南韓與台灣…。

我們因為研究與實踐目的而選擇日後的發問方式、分析架構與指導實踐之綱要。為了實踐之成效，本文需提醒：前述之理論論綱（或提綱）並非在於尋求一種全盤性的理論以解釋所有的空間形式。與其將前述之議論視為形式化理論之形式，實不如視其為論述戰鬥過程中之理論爭論與概念重構。認識論批判為的是建構一種診斷所必需之特殊人為距離與論述空間。尤其，對於本書所運用的認識論批判的分析性結構無疑是深受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邏輯左右的，然而，意識形態却正好是存身在拘謹的二元對立關係之間以確立其分明的界線。因

爲，塔夫利、巴赫德與伊格頓都已經警告了我們：一個特定的語義系統經常是被它所排斥的對立面來確立其自身的意義，來對比其存在。最終，則造就了一種等級嚴格的思想體系，一種形上學。假如我有可能重新撰寫論文（而不是出版書籍，因爲書籍出版的目的不同，而使正文本身另外具備一種自主性），我將刪除前述各章大部分的篇幅，僅保留每章的結論與小部分的論辯，這體驗說明了論文撰寫之初不成熟的摸索狀態與理論的形式主義包袱，甚至在現實的壓力下拒絕了有益的建議。因爲，對一般的研究與實踐之情境言，往往最亟需的僅是前述論綱的一小部分，或是小規模的簡單架構，做爲經驗研究前避免經驗主義之瑣細而重組既定觀點的假設性論綱。理論架構的龐大、繁複、以及對細節過度精確的要求反而經常限制了研究與實踐對具體現實之連結。知識形成中的理論優越地位被過度強調，知識被視爲在觀念上邏輯一致的單一體系。最終，則淪爲一種極度拘謹、僵硬的理性主義教條。因此，前文是一種實踐所需的理論熱身與頭腦體操過程罷了。爲了避免將認識論陷入再生產知識與權力間的支配性連結，被剝削的階級、被壓迫的少數族群、被支配的婦女需要理論與實踐的指南——詹明信稱爲認知地圖式的初步原則——因爲我們需要能辨認自身之立場，以及向那些對我們的目標深表同情的人確認立場。認識論不能抽離了主體、身體與立場來抽象談論，因爲此時此地，我們已無法再接受大寫的理论 (Theory) 與知識 (Knowledge)。本書旨在建構關乎空間文化形式研究與實踐所需之暫時性之鬆散架構。期望假以時日，能引發發現與洞見，以求逐漸建構知識核心所需的疑旨、方法與論綱。最後，基於對實踐取向理論建構之強調，本書以一種總結性的後記形式做爲一個初期的理論研究工作之結束，以及，做爲未來干預研究與實踐之起點。

圖8-2：空間結構中之空間文化形式動態過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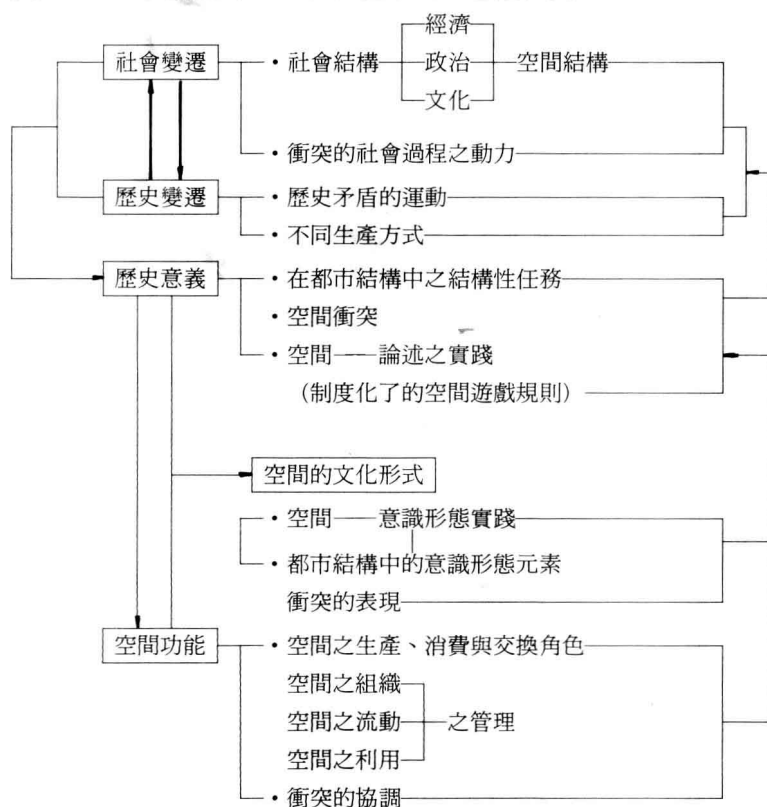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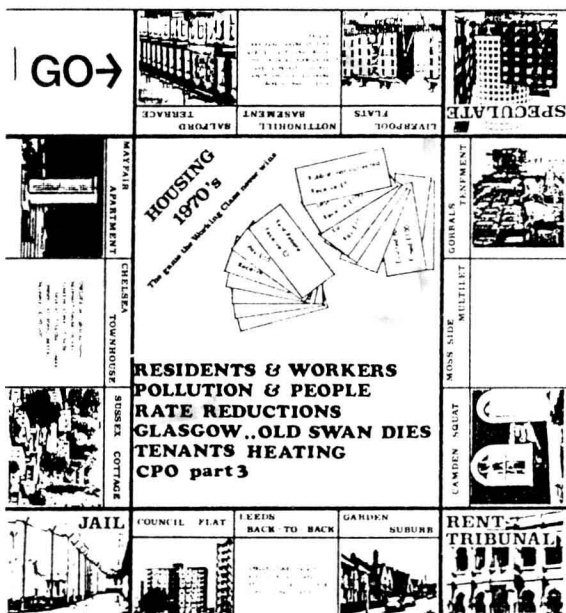


圖9-1：美國亞里桑納州塔克森 (Tucson) 社區設計中心標記 (Gibbs, 1984: 339)

圖9-2：英國刊物《社區行動》(Community Action) 之封面 (McKean, 1979: 269)

# COMMUNITY ACTION

No.11 Nov. - Dec. 1973 15p



## 第九章 後記

### 建築論述中空間概念之變遷： 一個空間實踐的理論建構\*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老子

“爲而不有，功成而不居，不居不有，是以弗去。”

——老子

“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

——孫子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孫子

“人爲其行動所界定，而非記憶。”

——台譯：魔鬼總動員(Total Recall)對白，1990

“寫作使知識成爲一種節慶的歡樂”

——賀龍·巴赫德 (Barthes, 1977/1982: 464)

\*初稿曾以“什麼是空間？——建築論述中的空間概念”，發表於中國民族學會第十五屆年會，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演講廳，2月15日，1990；修改前原文曾發表於《建築學報》第5期，1991年12月，pp. 1-20。

## 一、導言

什麼是空間？假如我們把這個問題當做是一種歷史性的理論性詢問的話，在空間相關的專業論述經歷過所謂的“多範型抗爭”（multi-paradigmatic rivalry）的情境之後，要回答這種問題，已經無法就現代專業辭典之工具性定義做立即應付了，因為空間的觀點與概念是由論述所界定的。我們必需處理建築專業對空間觀點的變遷，而建築專業對空間觀點的變遷過程則需進一步考察在特定社會與歷史情境下所建構的建築論述（architectural discourse）的變化。

本書檢視建築論述變化下之不同空間觀點其實不在於評介。經由質疑的過程，作者試圖建構一個政治經濟學取向的理論架構，以期能有助於空間之實踐——特別是有關空間文化形式之建築實踐。

常規性的建築論述曾經一再受到社會變動力量的挑戰，以及，它被迫，也必需面對社會科學反省之後在理論層次的質疑。本文所持之分析角度，並非聲稱與空間有關的科學中，知識生產的動力為有決定性的社會力量所左右，而是著重闡明將知識論視為空間論述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這也就是說，知識論層次的論述實踐的戰鬥往往中介於社會動力與空間論述的變化之間。這時，知識論層次的論述戰鬥，往往密切關乎制度的再生產（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過程中之整合、爭議與衝突。前述立場基本上認為，就整個科學言，科學是在人類社會整體發展中的歷史決定現象。這立場也不必然否定在任何特定的科學研究方式中，理論與認識論的自主形式與自主程度（Scott, 1982:142）。

## 二、空間專業分化的趨勢與空間理論的貧困

建築專業關乎所有與空間有關的營造活動，廣義的說，它關乎所有與空間塑造有關的直接與間接活動。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與專業分化趨勢，造成在空間的營建、設計、規劃、管理工作中，至少可以細

分爲圖繪與室內設計、建築、地景建築、都市設計、都市與區域規劃、都市與區域政策等不同重點，以及再細分出環境規劃、社區規劃與設計等等，此處無需細列。一般來說，建築師、地景建築師與都市設計師係將已接受的空間意義做象徵性的表現，因此，他們直接從事關乎意識形態效果的整個過程中之散發與轉播工作，致力於達成其傳播與正當性及合法性效果，其依賴之知識支援多爲美學。至於建築史家與評論家也是做爲意識形態的作用者，透過制度的再生產作用，對空間的文化形式從事評價，因此，以意識形態的再生產過程與既定權力結合。至於都市與區域規劃師則往往關心空間功能運作之管理，因此重視程序之理性。所以規劃師的作用必需與近代國家的角色在空間向度的支配、管理與直接引領資本積累之作用做分析。

由於分工造成的專業差異，分工後之專業對空間觀點也有所不同，衍生不同的研究領域，也逐漸與不同的知識傳統結合，益發鞏固了原先空間觀點的差異。譬如說，建築史與建築批評主要是與建築、地景建築與都市設計的專業者與作品互動；而環境一行為研究則是由社會與行爲科學（主要是心理學、人類學、地理學、社會學，其中心理學家最爲積極，參見第三章。）與設計專業互動，扮演制度中的社會工程師角色；以及，近年因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論進展與對空間的社會文化因素之研究，關於營造形式與文化的研究（Built Form and Culture Research）以及設計研究（Design Research）（Margolin, 1989）等也都陸續受到重視。此外，再譬如說，區域科學（Regional Science）與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則分別與都市與區域規劃有密切關係；由於都市與區域規劃的執行實施，以及政策的形成密切，關乎地方政府的角色與國家的作用，以致於都市與區域研究也就與社會學、政治學，以至於晚近的地理學發展無法分割。社會分工與專業的分化趨勢，在學院與研究單位中發展，逐漸形成了空間論述的片斷性，它造成了資本主義基本結構之間的一些連結與不連結的特殊形式（Scott, 1982:53）。論述之片斷性使得規劃與設計部分的專業者更加



深陷於工具性之操作，而拙於思考與分析的困境，於是，當社會改變，社會科學被迫反省之後（譬如說，社會學、地理學與史學的巨大改變），空間專業（設計與規劃專業）也共同因其無學術研究傳統，顯現出語言的空泛、思考的片斷性與空間理論的貧困，無由主動突破結構性分工，因應與推動社會之轉化，指導實踐。因此，本文與其以靜態的學科範疇將空間有關之專業加以分類，對各自空間觀點之細節做繁瑣討論，不如將前述專業分工所形成的，對空間觀點之不同取向，由知識論層次審視論述變化之社會根源。在這個基礎上，空間概念如何在一種充滿衝突的動態過程中，以一種關乎語義系統上的支配關係，論述性地被建構起來，也才得以闡明，而本文認為這正是空間實踐的理論建構所需首要面對的課題。

### 三、空間論述的變遷過程

馬歇爾·伯曼 (Marshall Berman) 曾論及所謂的現代化過程發展動力，生動地點出將古典專業者神聖的榮光褪去成為世俗色彩的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 (Berman, 1982: 90-95)。這確實是專業論述中戰鬥形成的歷史根源。

#### (一) 實證主義主流範型的支配性霸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空間專業在設計領域的最明顯改變就是：傳統美學範疇支配的建築形式主義範型已經不能負荷福利國家社會在國家大規模干預政策下的空間營造與管理任務了。建築論述一方面在社會分工的趨勢下，一方面則在認識論範型轉移下，進行了現代化改造。技術官僚的理性意識形態，經由實證主義科學方法，對傳統建築範型改造，我們看到了在英美學院中對設計方法 (Design Method) 的要求<sup>①</sup>，以及，隨著資本國際化的趨勢，在文化表現上將現代主義的風

<sup>①</sup>這是指英美實證主義取向的設計方法對設計思維過程理性要求，相反的，在義大利戰後的傳統中則全然不同，所謂設計方法著重的是設計過程中對空間的歷史類型之掌握（

格進一步由國際風格而擴及全球。現代建築成爲經濟發展與社會現代化的象徵。

在建築史與建築批評領域中，黑格爾右翼唯心論建築史知識傳統，由布哈德、里哥、烏福林、法蘭克、威克維爾、派夫斯勒與基提恩以至近代學者，是以“理念之表徵”(representation of idea)對建築進行再詮釋工作。理念則是由均質化的“時代精神”(Zeitgeist)(spirit of times)，表現爲自主存在的理念的單一歷史(Porphyrrios, 1981:96; Hadjinicolaou, 1973/1978:50,56)。因此建築形式由“風格”(style)來做歷史分類，成爲斷代與編年的理論範疇。在這種美學的形式主義取向中，風格成爲建築形式的一種特殊組織(如烏福林)，或是風格由建築形式轉化底層更深刻的力量——“藝術的意志”(Kunstwollen)(artistic will)——所推動(如里哥)，或是風格直接由社會所生產(如魏茲巴哈)(Werner Weisbach)等等(Hadjinicolaou, 1973/1978:89-91)。於是，美學的形式主義經由風格的分類，建構了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如亨利—羅素·希區考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Hitchcock and Johnson, 1932)；或者，以“時代精神”藏匿其價值取向，以超然中立的評論爲現代建築開闢道路，或是爲建構民族國家建築，提供詮釋所需的學院論述支持，如尼古拉斯·派夫斯勒(Nikolaus Pevsner)(1936)與西格菲·基提恩(Sigfred Giedion)(1954)等。(參考第五章)

平行於建築領域中的範型轉移，戰後福利國家社會之正統規劃理論是伴隨著凱恩斯模型的發展理論成長的(Cooke, 1983)。國家調節經濟的循環，提供大量的基礎設施，引導資本的積累。因此，在空間功能的經理層次上，爲了追求效率與科技理性的結果，都市與區域規劃爲大量適合於技術官僚的方法論(如系統分析、益本分析、土地使用與運輸模型)，和空間過程的實證主義理論(如新古典土地使用理論、

---

Llorens, 1981:93)，參見第五章。

中地分析與重力模型)所左右。技術官僚也開始在社會中取代舊的階級而成爲社會權威與控制的化身 (Scott,1982:144-146)。空間,對實證主義爲核心,在大學與研究機構中展現其面貌時,由分析、科學和政策各層面的論述合成的體系言,是一個中性的、既定的客觀存在 (space as a neutral physical given)。

在知識論層次上,當空間的規劃與設計專業被迫參考外來學科的時候,不論是社會學、經濟學、生態學、心理學亦或是系統理論與工程,這些學科並不能保證它們真能幫助解決建築、地景建築與城市規劃所困擾之問題。更重要的是,當知識借取時,空間專業本身並未有能力指出這些外來的學科及科學是否已經解決了它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借用而來的方法被假定爲是來自“較先進”的科學,會對比較“末流的”設計及規劃實踐有用。簡言之,這種借用缺乏一種批判而轉用的能力,這種批判能力的欠缺是歷史性的,它只能出現在主流社會科學因社會變動的衝擊而崩解,而全面反省的社會與理論時勢之下,這也就是論述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 的一種特殊的分析方式 (a specific mode of analysis),一種批判性分析的能力 (參考第七章)。因此,所謂“科際整合”的方法,也只是將幾個方法不做批判地結合 (Teymur,1982),結果,設計及規劃的傳統思維方式,在實證主義範型的霸權(領導權)(hegemony)支配之下,也並未得到自身理論建構的能力與機會。

## (二)人文主義與現象學取向的質疑角度與補償效果

當資本主義社會過程與矛盾日益複雜時,新的問題終究要求更細緻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層次之經理。當技術官僚的大規模行動破壞了市中心既存的鄰里網絡,造就了充滿敵意的空間,催動了1960年代的都市社會運動時,社會運動迫使許多規劃與設計的活動轉向。像辯護式參與、市民參與、分權式決策過程與環境一行為研究對實質環境的檢討與再評估,明顯地對異化的城市進行補救工作。人文主義與現象

學分別由不同的知識傳統，以一種替代的論述形式，提供了關於價值、主觀意義、空間之感覺經驗方面的意識形態相對體 (Scott, 1981: 146)。

這種與實證主義主流論述對立的空間論述，在新的歷史脈絡中作用，軟化生冷無情的現代空間，抵制與質疑忽略人類主體經驗的空間論述。德意志傳統美學中以“神入” (empathy) (Einfühlung) 角度建構出來的空間觀點 (如李普斯)，經由吉歐菲·史考特 (Geoffrey Scott) (1924/1974)、布魯諾·柴菲 (Bruno Zevi) (1957) 等的發展，為部分建築史與建築師的作品所運用，一方面成為現代建築的有機建築之核心觀點，另一方面也成為英美人文主義的傳統元素。有機建築之流動空間觀點，由老子以及東方建築，尤其是日本建築中尋求靈感與參考點不足為奇。有意思的是，這種強調主體體驗空間之取向，在一些後來被稱為是後現代主義建築的建築師觀點中作用，向現代建築宣戰，提出替代性的方向，例如 1970 年代的查理·摩爾 (Charles Moore) (Moore and Bloomer, 1977)、羅伯·范裘利 (Robert Venturi) 等。在都市設計與實質規劃領域中，開文·林區 (Kevin Lynch) 由空間的知覺角度要求空間的感覺品質 (sensuous quality)，建構出一完整的、針對專業實踐的規範性取向 (Lynch, 1960, 1976c, 1981a) (參考第二章)。這種拒絕實證主義的空間論述戲劇性地表現在個人研究取向轉變的就是亞歷山大·克里斯多夫 (Christopher Alexander)。亞歷山大強調分析理性，以笛卡兒的方式研究設計問題，曾被譽為建築界的維根斯坦 (Alexander, 1964a)。然而，在 1964 到 1965 年之後，轉向人道主義的社區設計 (Alexander, 1965a)，最後，滑向接近海德格的玄學研究方法來處理空間實體，考量空間的整體性與圓滿性先驗的性質。(參考第四章)

有別於林區所根源的英美經驗主義的人文主義知識傳統，克里斯欽·羅伯一修茲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71) 以歐陸哲學為出發點，重新編組存在空間 (existential space) 的陣營，對抗實證主義的空間論——被名之為歐基里德空間陣營。最後，他的研究取向導

向海德格的居所 (dwelling) 與地方精神 (genius loci) (1979/1980, 1984)。空間,是以人類生存其上的世界來界定為“地方”(place),以及賦與意義的。同樣的,來自新人文地理學方面的現象學影響,也直接衝擊規劃與設計理論本身,造成廣泛的影響,如段義孚 (Yi-Fu Tuan) (1974,1977) 與愛德華·雷爾夫 (Edward Relph) (1976) 的重要著作。這種新人文地理學取向,後來由安·巴提默 (Anne Buttimer) 與大衛·西蒙 (David Seamon) 等針對空間與地方的觀點做了較完整的整理。(例如, Seamon and Mugerauer,1985; Seamon,1982,1987)。一般而言,在設計理論、環境一行為研究方面,現象學取向以一種描述性的語言,要求一種有別於實證主義式分析的直覺、整體性的洞見,表明地方、日常事物、建築、地景等中某些被認為是恆常的普同元素。

在知識論的層次上,現象學者曾一再地因受批評而對理論反省,提出在1.主體性與交互主體性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2.特殊性與一般性, 3.經驗與語言, 4.個體與社會四個課題的檢討,以擴展現象學理論取向在研究與實務方面的能力 (Livingston and Harrison, 1983 295-296; Seamon, 1987), 這有必要做進一步的闡述。

### 1. 主體性與交互主體性

第一,由於對主體性之高度要求,現象學知識傳統較諸其他的理論傳統,尤其要求研究者與實踐者對利益、敏感度與嚴肅性之高度自覺,所以主體性與交互主體性的課題關係著現象學的效度與客觀性。現象學對主體之強調是它質疑實證主義工具性之利器,然而,現象學做為具研究與實務能力的理論取向,必需克服效度的質疑。所以,自我評估過程,以及,持續性的由其他現象學者、同僚團體、與其他利益團體間的加強確認、問難、批評與澄清等工作,就成為必需的過程 (Seamon,1987 :16)。這種“論述之外”的制度機制是現象學論述保持其敏銳而不失其偏執的必要反省,這又關係到第二點特殊性與一般

性的課題。

## 2. 特殊性與一般性

第二，假如空間之專業者，如建築師，它社會性地與藝術家需有所區別的話，現象學的知識傳統對建築論述言，就需能區分偏執經驗之描述與描述一般性之科學。現象學長於處理經驗之獨特性，但它同時得面對描述經驗與心靈中更廣泛的潛藏結構。大衛·西蒙清楚地指出實證主義爲了控制而尋求解釋之道，而現象學者則爲了體驗而尋求對事物與人類存在之一般性描述。尤其對建築實踐言，由於它關心空間的文化形式，現象學所重視的“清晰地保留於記憶中之意象”（eidetic），是一種以本質直觀爲目的的本質學，誠然關乎空間經驗課題之特殊性，這種形象思惟是建築理論掌握空間象徵的關鍵（Seamon, 1987:16）。這是實證主義空間理論的弱點，也是過去建築專業向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做理論借取，以及，實踐對理論要求的盲點。（參考第三章）

## 3. 經驗與語言

第三，所以，在經驗與理論的關係上，對空間體驗之描述，若做爲現象學關心的核心，需要開發其他的表現方式，以避免目前學術界僅僅依賴書寫言辭語言的限制（Seamon, 1987:17-18）。本文不但肯定了開文·林區在實證主義支配的年代下對圖解思惟與語言的貢獻與其潛力（例如, Lynch, 1960, 1976c）（圖 9-3）（參考第二章），而且更寄望於如何能在理論的層次上，對空間結構與空間經驗之了解與表現方式更做突破（圖 9-4）。此處，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的敏銳性開啓了空間理論建構的新機會，值得略做引申。

巴赫德曾經把對空間的注視（gaze）連結上理性——這在今日已被我們習慣地對立與割裂爲一種知識形式（intelligent form）。他經由艾菲爾鐵塔與全景視野（panoramic vision）連結起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巴黎聖母院》、米歇萊（Jules Michelet）的《編年紀事》之詩意寫作的知覺模式與啓蒙主義以降結構主義的心智活動特徵。他認爲艾菲爾鐵塔物質化了全景視野的想像，提供了一種解讀，



圖9-3 林區式之空間感覺圖解例——澎湖馬公市街及海岸景觀分析圖 (台大土木研究所都市計劃室, 197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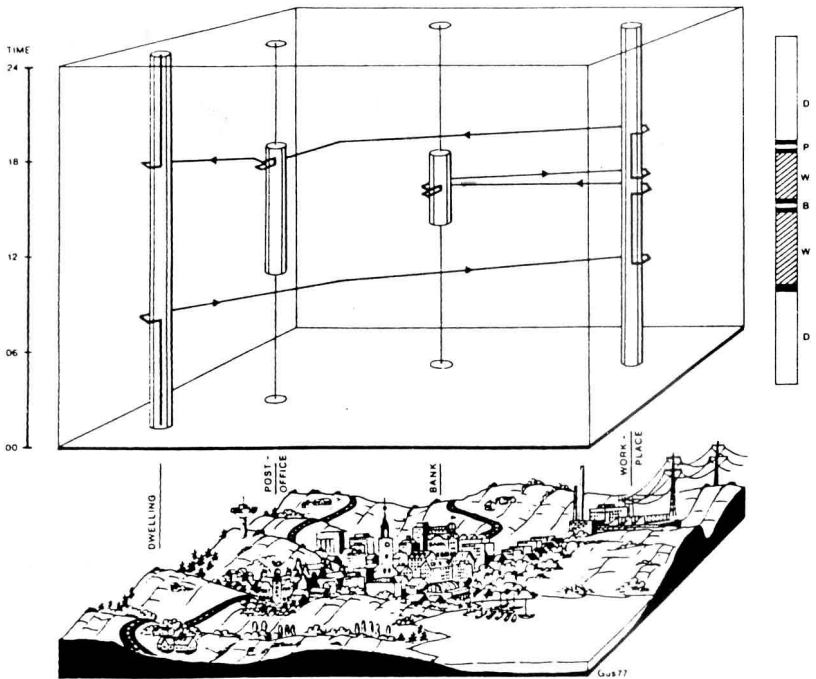


圖9-4 空間與時間圖解例——在時空座標系統內之個人路徑例 (Lenntorp, 1978:164)



使我們能超越感覺並看透事物的結構。這是一種新感覺與一種唯智主義方式的新範疇 (Barthes, 1964/1979: 8-14)。賀龍·巴赫德所說明的這種“具體的抽象”範疇,也正是桃樂·瑪西 (Doreen Massey) 日後在經驗主義氣候下的英國,反潮流地提出的“地質學的隱喻”(geological metaphor) 的核心 (Massey, 1978)。巴赫德用全景視野的身體經驗表現對結構的“釋明”(decipherment),這是結構主義研究途徑對空間經驗之形象思惟者與空間結構之抽象理解者之間共同的感覺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這種目光注視中潛藏的邏輯幾乎將理論抽象連結與轉化為空間一意識形態實踐所需的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值得在空間文化形式的理論建構中做進一步的發展。簡言之,在日常生活的生存的身體經驗與科學知識之抽象間,我們需組織處理象徵實踐的符碼、語言與媒介的能力,本文還會再提到此點。至於結構主義,這也是我們隨後要處理的重要知識傳統。

#### 4. 個體與社會

最後,現象學在個體與社會關係中的意志論 (voluntarism) 立場是所有爭論的根源 (Seamon, 1987: 18-19)。對現象學者言,歷史全然為個體之作用者之手所寫就,而對社會結構的限制沒有足夠的處理。無視於社會再生產的機制,個人的行動與空間的經驗則淪為自由漂浮的地方感,身體則成為非歷史與非社會的普同人體 (Jameson, 1985: 51-53),這時,現象學的疑旨對“個體之經驗與語言”的預設所建構的空間論正需要結構主義對空間的正文分析與符號學的互補,這也就是我們下面所要交待的主題。畢竟,“語言,就像人類的理解力,絕非純粹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公有的,絕非純粹是知識的而是經驗的,絕非純粹是理論的而是實踐的”(Livingstone and Harrison, 1983: 296)。

#### (三)七〇年代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取向

在 1930 年代危機中浮現的,資本主義之特殊的凱恩斯模型,在 1970 年代中受到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與新的國際關係的挑戰,不但直

接導致通貨膨脹的經濟效果，在國際與國內的競技場上均削弱了系統的權威，在論述層次也面臨了危機。1970 年代初的資本主義危機，挑戰了長期的、持續性的經濟成長，由於這危機事實上是社會政治的危機，而其中，都市社會運動爭取都市之集體消費，在這過程中，空間被視為社會的權利而非商品，都市服務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機制，它們轉化了人們對都市之視野，改變了對空間的價值觀。這些社會的力量根本地挑戰了常規性的主流範型，要求新的理論工具。此時，前面已經提過的，主流的，關乎空間的專業論述的片斷性，不但擴大了專業分工間彼此的鴻溝，而且與資本主義基本結構之間形成日增之脫落，在新浮現的範型挑戰下，逐漸失去了其意識形態上的支配與政治上的操縱作用。於是，對主流範型質疑的力量造就了空間理論多範型抗爭之時勢，批判性的新韋伯主義、新馬克斯主義、新李嘉圖主義…等，朝向一種更有力量及更廣闊的分析方向前進，它們致力於能同時把握科學與人文來注意空間的問題 (Scott, 1981: 154; Rojek, 1985: 5; Peet and Thrift, 1989: 4-14)。

政治經濟學研究取向的空間論述形成過程中，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法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斯主義知識之洗禮了。受到結構主義間接影響的例子如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早期的操作性結構主義 (1973)；奈希·提默 (Necdet Teymur) 的論述分析 (1982)，及其對環境一行為研究的批判 (1984)；以及，如建築師丘里歐·卡洛·阿岡 (Giulio Carlo Argan) (1963)、阿道·羅西 (Aldo Rossi) (1966/1982)、羅伯·克里爾 (Rob Krier) (1979) ②；以至於晚近都市設計的理論建構嘗試 (King, 1988) 等等。直接的結構主義影響，運用阿圖塞的概念分析空間的典型代表可以舉出尼可斯·哈齊尼可拉 (Nicos

② 這裡可以一提關於空間的類型觀點 (參考第五章)。類型學觀點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的法國建築理論，杜蘭·昆西與范勒杜 (Viollet le Duc) 等 (Markus, 1982 :4; Vidler, 1977b)。而現在的理論家則以“類型” (typology) 的觀點，處理靜態的、固定的、結構與社會歷史變遷間的矛盾，結果獲得的卻是一種新柏拉圖主義的“恆常”與先驗的形式主義。

Hadjinicolaou) (1973/1978) 以及早期的曼威·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 這種經過修飾了的阿圖塞主義。在上述70年代結構主義論述上的共同傾向中，僅僅爲了寫作效果的考慮，本文以哈齊尼可拉及柯司特的理論概念做爲一代表，指出其特點與限制所在。哈齊尼可拉針對主流的學院唯心論的藝術史建築史傳統，提出一個精巧的理論模型，處理政經利益、一般意識形態與空間形式的關係。“意象意識形態” (imaged ideology) 的概念是一種阿圖塞式的“理論對象” (theoretical object)，以取代“風格”的模糊觀點。它是在每一個特殊的時機，空間的形式與內容元素共同結合的方式。這個結合是一個社會階級整體意識形態的一種特殊形式 (Hadjinicolaou, 1973/1978:95)。所以，空間本身就是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不是什麼其它的東西。空間又不能就其本身來了解，必需它與它所發生的結構一起來審視，必需理論地掌握形式結構與鬥爭中的階級意識形態的關係的結合。所以，空間形式經由意象意識形態可以掌握社會階級整體意識形態的空間之特殊形式。

如同哈齊尼可拉，柯司特尤有過之，他針對主流之都市理論直接提出了批判，認爲它們以環境決定論的形式掩蔽了社會關係。柯司特認爲城市爲社會在空間上之投射，就像自然全由文化做出各式形狀，人類在生活的鬥爭與對勞動產品不同的取用鬥爭中轉化它自己，以及轉化其環境。然後，爲了掌握社會空間形式的特殊性 (the specificity of the forms of social space)，柯司特以阿圖塞式的理論角度闡釋空間：

“空間是一種物質產物，關係著其他的物質元素—在其它之間，人，它自己具有特殊的社會關係，給予空間（以及其他所組合的元素）一種形式，一種功能，一種社會意涵。所以，它並非僅是社會結構佈署之場合，而是所指定的社會中每個歷史整體之具體表現。然後，就像對待其他真實對象 (real object) 的相同方式一般，建構問題，以掌握其存在與轉化，以及，與歷史現實之其他

元素相連結的特殊性。這意謂著即使是一個不清楚的理論，空間的理論也得是一個一般性社會理論的整合部分。”

(Castells,1972/1976/1977:115)

在 1970 年代初，做為一個經過修飾了的阿圖塞主義者，柯司特雖然未忽略社會實踐的重要性，可是，實踐的主體確是深陷於重重機械性結構網羅中淪為失去了主體意圖的被動作用者。柯司特試圖以空間結構重新界定“都市”的概念。結構中不同系統與元素的組合，與轉化是社會實踐之中介所造成的，這也就是說，是結構中之特殊位置所決定的人的行動所造成的。然後，為了分析社會結構所表現的空間，得研究經濟系統、政治系統、與意識形態系統之元素，以及其組合，與形成它們的社會實踐對空間的塑造。換句話來說，他認為，空間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形式，可以由不同生產方式的歷史連結的角度加以掌握，可以由社會實踐的基本系統結合的特殊矩陣角度加以認識。這基本上就是經濟、政治與制度、和意識形態（即 EPI 系統）的層次。所以，要分析空間為社會結構的表現得研究空間為經濟系統、政治系統與意識形態系統諸元素塑造的情形（Castells, 1972/1976/1977 :125-126; 參考第七章）。這個精緻的阿圖塞—柯司特模型對都市及區域研究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另一方面，它將理論視為一種先驗的抽象，脫離了經驗研究之外而獨立存在，其實是割裂了理論與實踐，滑向新康德主義的形式主義而受到批評（包括柯司特在內的自我批判）

(Castells,1972/1976/1977:後記;Saunders,1981: 177;Sayer,1979a, 1979b,1985:57-58)。當理論與經驗調查對立，以及低估了社會關係中作用者的作用，就落入了原來被他們批判的對手——功能論的窠臼了（Duncan and Lay,1982:42; Cooke,1983:142-144;Saunders,1981: 189,210;Logan and Molotch,1987:10）。所以，彼德·桑德士（Peter Saunders）認為，這時柯司特發展的空間社會學其實是對在特定時空中的社會實踐之分析。對柯司特言，空間不過是社會關係的網絡，空間的理論為發生在空間脈絡中的過程理論所替代，為國家對都市過程

之干預——集體消費 (collective consumption) 所替代，而都市服務與空間之間的理論上的化約其實是不必要的 (Saunders,1981:211)。集體消費對勞動力再生產的作用的概念孕育在戰後的福利國家社會的矛盾之中，與其認為它是一種普同的理論，不如視其為一種歷史的理論。換言之，集體消費之界定與其做形式化之定義，其實是落入了他的對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公共財的形式性界定的同樣陷阱之中，不如轉而由國家與社會間關係的歷史情境來界定的資本之活動。

同樣的，一如集體消費概念的形，以哈維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取向則以資本積累過程化約了空間與社會 (Peet and Thrift,1989:12-13)，雖然他自己日後宣稱應考量空間為人類活動之基本物質屬性，在資本之邏輯與空間拜物教之幾何邏輯之間尋求中間的道路 (Harvey, 1982:374)。

為了避免經驗主義之表面直觀，空間，理解之關鍵並不在於其做為一種真實對象的實質幾何實體，我們需要理論的干預。用柯司特自己的話來說，空間與時間為歷史所界定，空間為社會關係所建構、加工與實踐…空間像時間一般，是一種時勢 (或形勢)，它為具體之歷史實踐所連結 (Castells,1972/1976/1977:442-3)。以下，試就對 1970 年代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批判的基礎，針對空間觀點的理論建構所需面對的兩項課題：(一)空間與社會，(二)空間實踐與理論，做進一步之闡述。

#### 四、對 1970 年代批判之批判

##### (一)空間與社會

早期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取向，往往為了質疑和挑戰與空間有關的專業領域中的美學形式主義、技術決定論與短視的經驗主義等在學院中建構的霸權，提出空間是社會的表現的觀點。這在當時的歷史與理論時勢之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種模糊的空間觀點之急切化約，將空間的特殊性沒收了。

首先，我們可以審視早期柯司特的空間觀點：“空間是一種既定的，關乎歷史地所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a certain historically-constituted social relation）（Castells,1972/1976/1977:vii）。由於空間不只是先於以及在社會之外存在的某物，而且是為社會所生產的某物，所以，空間就是社會的。這裡不是指空間是社會的邏輯等同，而是指空間是社會的具體化，是其形式上的構成（Gregory,1986:453）。

其次，即使我們不同意在英國經驗論土壤中形成的實在論觀點——它們對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劃分欠缺理論處理而常有經驗論之武斷與眾多偶然因素雜陳的危險，既不見得適於經驗研究之實踐，亦不良於應用於規劃與設計實踐中——本文仍然可以引用實在論者之批判。實在論者認為，“由對空間的構成分子之認識滑向將空間化約為這些構成分子”（Sayer,1985:58-59）。安德魯·賽耶（Andrew Sayer）認為空間僅經由客體（對象）而存在於客體之間，空間獨立於客體呈現的特殊類型。空間會造成差異，但僅經由特殊的因果力量與負擔、潛力與限制來建構差異。反過來說，為因果機制所造成的影響，則有賴於它們所處身條件的其它事物之形式（Sayer,1985:52）。進一步，賽耶認為空間確是部分地為社會所構成，但是，空間不能化約為自然的，也不能化約為社會的構成分子。

有意思的是，前述的這種空間的化約傾向不僅僅出現在結構主義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中，也同時發生在為結構主義所拒絕的，法國人文主義馬克斯主義昂希·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1970年代的都市論中（1976）。列伏斐爾所強調的具象的空間形式中日常的用語欠缺理論的對象，他著重的是面對資本主義之都市矛盾時解放日常生活的鬥爭，充滿無政府主義的色彩（Castells,1972/1976/1977:89;Saunders,1981:151-159）。所以，列伏斐爾認為空間並非一種排除意識形態與政治的科學對象，空間總是政治的，策略性的，與意識形態性的。空間是一種充滿了意識形態的產品（Lefebvre,1976,1977）。即使我們接受

了列氏對空間政治學的策略性要求，看到了人類解放的巨大潛能，賽耶就列式之觀點提出的空間與社會的理論批判仍然是值得參考的。賽耶指出列伏斐爾的空間其實是日常生活中的領域，它化約為政治與意識形態，而忘記了空間形式 (Sayer,1985:60)。至少，列氏並未能在理論上細緻區分一般性的政治意識形態與空間化的意識形態，忽視了空間的特殊性。

80年代，在結構主義與詮釋學互補結合的基礎上，將社會理論與實踐置於時間與空間相互組構的形勢之中，安東尼·吉亭 (Anthony Giddens)、艾倫·普瑞德 (Allan Pred)、愛德華·蘇雅 (Edward W. Soja) (1989:72)、以及皮爾·伯度 (Pierre Bourdieu) 所稱的建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者等等，都逐漸由不同的源頭與領域，同樣地提出了空間—時間結構化的理論角度。他們克服了過去社會理論對空間的化約，重新建構社會與空間之辯證關係，要求實質空間 (physical space) 與社會空間 (social space) 之緊密連結。所以，我們可以接受對 1970 年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批判，提出對空間與社會關係更細緻的分析。空間確實是社會的建構，但是，社會關係也在空間上建構，它造成了差異 (Massey,1984:4-5;1985:12)。蘇雅試圖建構“空間性” (spatiality) 的概念來處理為社會生產出來的空間，以突破獨立空間理論建構所需的理論對象。他認為所有的空間 (space) 並非均是由社會所生產的，但是，空間性則是。空間性必需與物質性的實質空間區分，也需與認知與表徵的心象空間區分。兩者彼此均與空間性的社會建構結合，但是不能將其概念化約為相同 (Soja,1985:92-93)。用桃樂·瑪西的話來說，空間不是生產關係繪佈於其上的消極區位表面，也不單純是一種限制條件 (像距離)。空間性事實上是一種整合性的與主動的條件 (Massey,1979:234, 1984:68)，不只是空間是社會地建構，社會也是空間地建構。空間不只是社會地反映，而是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一種建構元素 (a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what the social is) (Peet and Thrift,1989:18)。社會其實是存在於時間與空間的建構之

中 (Giddens,1981:44-48)。用艾倫·普瑞德的話來說，就是：“社會變成了空間，空間也變成了社會” (Pred,1985)。這裡潛藏的疑旨也是結構—作用者 (structure and agency) 辯論中所關心的焦點。這時，我們可以引用後期的柯司特對空間的論點，對比出政治經濟學之批判取向中對空間與社會關係的轉變，以及其中就結構與行動者關係所發展出來的空間實踐 (spatial praxis) 概念。他離開了阿圖塞主義，然而却仍然由尼可斯·柏蘭札斯 (Nicos Poulantzas,1978) 與安東尼·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遺產與成果中汲取：

“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 (reflection)，而是社會的基本物質向度之一。獨立地考量空間與社會關係，即使是有意研究它們的互動，也還是將自然與文化分割了，所以破壞了所有社會科學的第一原則：物質與意識的相互關聯，這個融合是歷史與科學的本質。所以，空間形式…為人類所生產，就像所有其它對象，按照既定的生產方式與特殊的發展方式，表現與展露了支配階級的利益。空間形式會表現與執行在一個為歷史所界定的社會中，國家的權力關係。空間形式會為性別支配與為國家所強化的家庭生活所實現與塑造。同時，空間形式也會留下被剝削的階級，被壓迫的主體，以及被侮辱的婦女們抵制的痕跡。這種矛盾的歷史過程在空間上的材料將在已繼承下來空間形式之上，在歷史產品，在對新的利益、計劃、抗議、與夢想的支持之上實現。最後，社會運動將又一再的崛起，挑戰空間結構的意義，也因此嘗試著新的功能與新的形式。這就是都市社會運動，都市—空間轉化的行動者，也就是都市社會變遷的最高水平。”

(Castells,1983b:311-312)

上文提供的是一種空間與社會之間的新歷史關係的理論角度。或許，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取向之作用是著眼於針對當前的歷史時勢，提出有現實感的問題，適切地解釋，為的是經由主體在物質現實中的勞動，知識勞動的過程，建構知識，而論述的實踐為的是能廓清問題並



轉化社會。經由空間的實踐，人類得以認識空間與改變空間。對空間、歷史與社會所交織成的研究領域言，其實空間必需包含在歷史之中，我們也無法想像沒有空間向度的歷史。而歷史，是由人類行動所建構的空間與時間之間的連續性互動，這互動是一個充滿了衝突的，由行動者展現結構性任務，所產生動力的過程。這是一種社會—空間動力 (socio-spatial dynamics) 所展現的社會政治過程。簡言之，這種空間與社會之間的新歷史關係要求的是空間實踐與理論的結合，我們需在下面討論。

## (二)空間實踐與理論

前述之空間與社會課題要求的實踐與理論的結合，這也是社會學的古典課題。大衛·哈維說的也很直截了當，空間的概念需經由人的實踐來解決，而不在於哲學上的解答 (Harvey,1973)。1980年代後，政治經濟學取向關係著實在論強調的經驗研究，理論和具體與特殊情境連結，以及，詮釋學對理論詮釋觀點與政治經濟學的互動 (Peet and Thrift,1989 :17-18)，以下試由空間實踐的角度對理論之要求略做闡述：

早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取向在 1960 年代末與 1970 年代初的社會運動所推動的歷史與時勢之下，空間實踐的特殊性為政治實踐之急迫性所化約了，造成了理論上的形式主義結局。舉例言，我們可以審視早期柯司特的實踐與理論關係。做為一個經過修飾的阿圖塞主義者，柯司特雖然拒絕了阿圖塞主義的實踐(theoretical practice)中認識論干預 (epistemological intervention) 所主張的一種外在的、永恆的、得以區分科學與意識形態的認識論準則，而主張實踐之認識論——要求以實踐的社會效果來區分科學與意識形態。他認為：

“假如沒有什麼方法論的正確普遍規範（此規範用來保證科學性），但是卻可能有超越主觀掌握歷史情境的知識生產，那麼什麼得以界定知識生產的過程？…一個唯物認識論干預不能被化約為

依一種理論系統而應用預先建立的規則。它的適切性必需依照它的效果來評價，而不是依據它是否能符合什麼‘原則’”

(Castells and Ipola,1972/1976:138-139)。

然而，柯氏以政治實踐替代了其它層次的社會實踐，空間的實踐為社會變遷的急迫壓力所忽略，他說：“理論的正當化生產之主要條件乃是採取一種政治立場”，因而將認識論直接連接上階級鬥爭的實踐 (p.139)，結果，造成了理論上的形式主義。

為了避免理論上對空間的忽略，有必要針對社會—空間的情境，就社會—空間的實踐做進一步之分析。立足於馬克斯主義之實踐觀點，蘇雅借用葛蘭西—列伏斐爾的知識論架構以界定空間的疑旨。蘇雅認為葛蘭西所強調的“關係整體”所包括的特殊構造——具體化了在時間與空間、在特殊化的組構時勢之架構中之生產方式——是行動策略形成時所必需掌握的脈絡。這種行動取向的理論分析，要求對形勢之分析，因此重視近代資本主義之壓迫／正當化與物質／意識形態再生產的矛盾性功能對日常生活之作用，因為這密切關乎地方對集體消費之抗爭及城鄉之動員。這樣，在資本主義危機的特殊條件之形勢下，葛蘭西方得以致力於推動運動之聯盟。他看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日增之複雜性，因此需提高政治與文化的抗爭，以面對國家所仰賴的正當性霸權（領導權）。對葛氏言，反霸權（反領導權）的意識根植於日常生活之現象中 (Soja,1989:89-90)。

然後，蘇雅將葛蘭西之形勢分析連結上述列伏斐爾空間化時勢 (spatialize the conjuncture)，將空間之疑旨插入革命意識與抗爭的中心。列伏斐爾指出資本主義藉佔領空間與生產空間以緩合其內部矛盾，這種先進之資本主義之空間直接關乎社會關係之再生產。關於再生產，除了生物再生產、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再生產之外，列氏格外突出資本主義生產之社會關係再生產。空間組織也變得關乎社會關係的支配系統之再生產，這是資本主義賴以殘存的主要基礎。這種社會地佔領、生產與建構的空間就是生產的支配關係之再生產。經由國家

權力對日常生活的穿透，資本主義結構了空間，所以資本主義之最終危機只有在生產關係不能再生產時才會發生，而不僅僅單純地在生產本身的終止 (Soja,1989:91-92)。因此，關乎日常生活空間之解放與重建之空間實踐就可以做進一步之區分，而不僅僅限於生產領域而已。

那麼，就前節所交待之空間與社會的新歷史關係所要求的空間實踐與理論結合而言，空間實踐的各個層次，需分別就其社會行動的特性，以其面對時空形勢之結構，提供能指引行動之適切理論。於是，傳統的空間相關專業之分工，可以由新的角度，在新的歷史時勢下，就其專業實踐提出批判性觀點。

首先，設計與規劃，做為一種制度的再生產 (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 之社會實踐，確實需要解秘 (demythification)，解除其做為意識形態再生產的自然化作用形成的神話。因此，曼菲德·塔夫利 (Manfredo Tafuri) 解除前衛派建築師與規劃師的烏托邦神話確有必要 (Tafuri,1976a)。進一步，塔夫利直接明言：“沒有批評，只有歷史” (Tafuri,1986a)，揭露建築評論者以潛藏之立場扮演風格的鼓吹手作用。

然而，這種塔夫利式的歷史寫作在實踐上的消極態度認為空間專業之實踐終究是悲觀地命定於論述網羅的限制中。所以，詹明信建議以列伏斐爾的空間政治學與葛蘭西式建築所擬議的“隙縫理論”

(enclave theory)，站在反霸權的戰鬥位置，投身於積極推動變革的計劃 (Jameson,1985)。(參考第五章)

前節曾提及列伏斐爾之空間論未能細緻區分一般性的政治意識形態與空間化了的意識形態，忽略了空間之特殊性，那麼，在空間的實踐層次，我們需要在列氏的成果上做進一步之發展。列伏斐爾區分自然與第二自然，空間因此是充滿了意識形態的產物。空間，做為一種社會地建構起來的空間，為有目的的人類勞動所轉化 (Lefebvre,1977:341)，蘇雅據此建構空間本身之理論，認為這種社會地具體化之空間，是唯物主義詮釋之空間對象 (Soja,1989:80)。然而，做為一種社會實

踐，空間實踐需進一步處理。

### 1. 規劃與設計做為空間實踐之專業實踐

(1)專業的象徵實踐是一種論述實踐，需與經濟與政治實踐細緻區分，再分別連結這些不同層次的實踐效果。

這樣，做為社會行動者，才得以建立能力，同時明瞭論述實踐做為一種象徵實踐的限制，却又能充分運用論述實踐之特殊社會活動的效果。套用拉崗一詹明信式的說法是，現實並非不可知，困難的是不能再現 (unrepresentable) (參見第二章與第六章之討論)，這關係著掌握象徵實踐有關的符碼、語言與媒介的能力。這裡存在了後現代文化戰場中巨大而複雜的再現與表徵活動由之獲得行動的能力與新可能性 (Jameson, 1984: 91-92)。

巴赫德曾經提醒過我們，建築不僅是政治的象徵形式表現，它們並不必然是相同的價值觀 (參考第六章)。一方面，若不以後設語言的揭露自滿，設計，做為建築的語言表演，經由言語領域的差異，可以將知識經由實踐做象徵性表現。這種陳述行動是一種象徵表現，設計使知識成為一種節慶的歡樂。設計者不再是被動的社會分工者與語言的奴僕，必然只得轉播已接受了的意思。設計者有機會由故弄玄虛的符號遊戲中，在已拔除了安全閥的語言機器中，提出空間措詞方面的同形異質體，顛覆權力論述與理性。快感偏離作用具有解放表徵與再現活動的潛能。

(2)規劃師與設計師們自我表現所需的書寫與圖繪，需與現實中的規劃與設計專業執行加以區分。

簡言之，專業者所說的與現實中執行的差距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正是空間的社會生產所需細緻分析的。現實不是不可為，困難的是實現過程中的扭曲、變形，在社會、政治動態過程中的變化。這不但關係著分析的能力，更關係著在現實動態過程中折衝的行動能力。

(3)空間形式與社會經濟利益之間的關係是建構關係，這種動態社會政治過程有無窮的可能性，這正是空間實踐致力的關鍵。換句話說，

規劃與設計過程不是封閉的論述。

規劃與設計過程不是鐵板一塊，全然為國家與資本的權力所支配的論述。動態的社會政治過程使社會的行動者不得低估社會運動的角色、階級與性別的抗爭、專業體制與意識形態的戰鬥。論述充滿了衝突，承載著矛盾。因此，即使是空間的社會生產也涵括了空間的消費過程。空間形式之解讀是多重的。規劃、設計、評論與研究，其實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的支配性意識形態機器。規劃、設計、評論與研究是一個意識形態與專業的戰場，它的形式與主題不只是因應支配群體而變化，同時也需反應來自底層的聲響。

(4)最後，空間實踐的如此挑戰正是要求我們具備理論診斷的能力。

爲了避免意識形態的排他性與封閉性結果，實踐取向之理論建構仍需再度提醒理論診斷能力的作用與限制，這也就是說，由現實的社會回答我們空間實踐所需採取的做法。而越是社會弱小團體，反而更需要能分析時空形勢的善戰者。善戰者之智慧在於能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形)，在於能求之於勢。

## 2. 專業者角色：有機知識分子之空間實踐

我們已經分節處理了空間與社會的新歷史關係，以及空間實踐對時空形勢分析的要求之後，專業者若自許爲有機的知識分子，他（她）們的理論與實踐連結要求還可以就空間實踐與社會變遷、空間實踐過程之組織、替代性空間計劃之形成三個層次略做闡明：

### (1)空間實踐與社會變遷

在理論的層次上，前述之空間實踐架構暗示了行動取向理論之迫切性。形式化的理論與巨型理論由於過多之抽象化、超歷史的整全性、邏輯上之連貫要求，使得它（尤其以結構主義爲代表）包容力雖廣却無法處理研究對象內部以及地域社會與文化之動態豐富特殊性。另一方面，長期影響空間相關專業的經驗主義取向，却由於經驗主義資料本身之繁瑣，經驗觀察之成見，使得無視於自身論述之牢籠。所以，

我們其實需要深具彈性、在實踐中可修正變形之知識架構。不只於此，由於規劃與設計的實踐傾向，以及在空間—時間—向度上要求跨學域特性，使得它必需面對：只要這專業不自甘淪為資本之積累性工具與國家之官僚作業所左右，它就必需面對社會的變動，必需要求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一方面，社會關係的分析是前面所要求的分析時空形勢的核心，這是掌握動態社會政治過程的必要知識。另一方面，與實踐相連結，社會關係的分析甚至暗示了專業角色的多重性可能。同時，規範性的實踐目標也才能取得分析性的支持。

### (2)空間實踐過程之組織

行動取向的理論是由實踐的需要來建構理論。在實踐的過程中，目標的形成是集體力量與工作推動的基礎。一方面，空間實踐需不自限於程序性理論理性模型的工具性傾向與空泛，然而，另一方面，它也需拒絕意識形態層次的爭辯。流於純粹主義式的極端傾向，在規劃與設計過程中將只剩下政治立場之一再表白而已。空間實踐的過程中，對程序性理論理解的關鍵在於能形成技術上與時效上可以獲致的目標，而這目標是在動態的社會政治過程中的策略性戰鬥，因為它必需累積實踐過程所需的動員能量，它關係著社會學習的過程。

至於如何組織空間實踐的力量？有別於資本之積累，著眼於生產力，而對勞動過程施以管理與組織，空間實踐的組織可類近於運動之動員，它需以目標來形成共識。它要求靈活、機動與彈性以因應時空形勢之變化，而關鍵處在於資訊流動的網絡與團結網絡(network)節點上作用者的主動性。對我們的文化與社會言，這裡同時潛存的挑戰是：要求民主關係下地位平等的成員是否得以產生行動的力量，而得以避免封建文化中所遺留的父權支配關係，從而解放想像力的活動？

### (3)替代性空間計劃之建構

社會變動要求專業者有理論診斷之能力以界定問題與多面向之目標，這為的是研擬可行的替代性空間計劃。另類替代式的社會改革計劃需要特定的空間形式做物質性之表現。

另類替代計劃可以做為一種動員弱勢群體的政治計劃 (political project)，藉以使得特定的或相關的社會群體得以由之辨認自己，社會結構間不同的作用者也得以經由互動的系統，經營團結的網絡。因為資本與國家均非自主的，在資本、國家與社會之間，計劃總是歷史地賦予在社會之上，是社會地選擇了計劃，以求能更好地吻合於社會既定權力關係之中。因此，人們經常以計劃相互對抗。

在空間實踐所提供之分析架構之下，我們可以較具體地處理空間意識與空間結構間的互動課題，這也就是說，由空間體驗的社會性建構，或者說，感覺的結構的建構，以掌握空間的特殊性與實踐所需的規範性目標。面對當前社會之片斷化、異質化與兩極化趨勢下，矛盾的多重性特質，就空間與社會的新歷史關係角度，以下我們用進步專業者與社會運動的某些訴求做為具體例子，在最後就社會實踐的角度對空間的文化形式所要求的特殊性略做補充。

當今進步的都市設計者強調的空間與城市的“使用價值”之品質，這不但挑戰了今日植基於“交換價值”之以佔有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與城市 (Castells, 1982)，同時它表現的文化價值與都市社會運動，尤其是婦女運動密切相關。除了她們對經濟與政治層次的抗爭之外，在文化的層次上，婦女運動的主張與造成的論戰有深刻的涵意，婦女運動要求的社會關係之轉化其實是社會一般角色的改變，它關乎整個社會的文化轉化，而不僅僅是婦女而已。女性主義的文化要求不經歷社會變遷的過程不可能實現，也因此，婦女運動必需進一步發展為一種歷史的社會運動。它要求的社會變革包括了對所有人自身的改變，因為問題的深刻遠超過早期挑戰的表面，問題深藏在吾人的人格中，深藏在成長的文化之中，在文化特殊性所展現的特殊壓迫之中，在幾乎所有的象徵符碼、語言與媒介的美學支配之中，在對主體經驗的重視之中。而泰雷·伊格頓根本強調：人類的歷史若不“女性化”，世界根本就難以生存下去 (Eagleton, 1983: 150)。然後，轉譯為空間，社會運動期待城市之變遷，轉化城市。“女性主義的城市”對抗

的是“性別歧視的城市”(sexist city)，使其朝向一個有意義的空間，轉化單向度的功能性經驗為多重向度的經驗。這關係著使用價值之實現過程中的直接消費經驗（或是為了更準確而改口說，遊戲經驗）。它期待的是一種不以佔有為前題的，不同的，平等的，無異化狀態之愉悅感，一種賀龍·巴赫德曾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了的遊戲中的快感。

或許，這種無異化空間的消費（或者說，遊戲）所關連到的愉悅感，仍然是一種空間文化形式之社會建構，因此，傳統美學中康德主義所預設的美感經驗之無利害關係性（dis-interestedness），以及，現象學所強調的本質真實（authenticity）與圓滿性（wholeness）才得以經由對審美評價的社會批判之後而重新獲致了意義。（參見第四章）由巴赫德提供的理論角度，空間正文之愉悅得以放手處理：假如我們能記取巴赫德個人無盡符徵遊戲之孤立語言與論述和歷史的陷阱，在愉悅（快感）與政治關係的困境上，巴赫德為了超過布爾喬亞的愉悅與快感範圍所獲致的自由感覺領域，仍然是我們值得在空間的文化形式層次的“情色遊戲閱讀”中做進一步發展的。巴赫德已經區分了“作品的消費式閱讀”與“正文的遊戲式閱讀”。為了顛覆“作品”的“獨特風味”（布萊希特與巴赫德均指出這是階級基礎的美感經驗），巴赫德認為“正文的愉悅”強調一種唯物主義身體的理論，同時，這場精緻的情色遊戲關乎符徵的物質性，它是愉悅感之源，是修辭學。那麼，在空間形式方面，這就是營造的措詞，經由設計，而使論述具體有形地外顯，成為溝通的符碼。正文却是社會的空間，它未使語言能孤立於社會之外，然而却也不能讓任何主體站在裁判長的立場發言，空間正文的理論需與空間實踐符合一致。而文化特殊性所展現的特殊壓迫，可以在空間情色遊戲的閱讀之中，在“城市的情色”與都市論述無窮盡隱喻中抽取資訊做“多重之解讀”與戰鬥，而這正與婦女狀況直接相關的任務之一。（參見第六章）

所以，婦女狀況與女性主義經由運動與論戰，在社會創新的過程中形成新的角度，做為文化與政治的反霸權領導權戰鬥的課題，它關



係著未來城市之政策與未來城市之形式。這種正文的愉悅與城市的論述需要能經由對現實的分析方得以聯繫上歷史作用者之行動與其在都市文化形式上之結構性展現…，這時，資本主義已悄悄完成了再結構。

## 五、結語

大體來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有關的空間論述中面臨的是一種主流霸權解除後的多元發展狀態，這種多範型抗爭的局面中，對學術研究言是思想解放的百花齊放狀態，馬克斯主義與非馬克斯主義並存。以結構化歷程的概念對空間有關的研究為例，受到結構—作用者理論概念影響的主要成員源自不同結構化歷程的概念的知識傳統，却在對結構主義之反省與質題下逐漸形成接近的看法。然而，它却不形成一個學派，其成員也不必然激進，其哲學立場可能有極大的出入。以對社會思想中的不同空間概念研究為例，羅伯·大衛·沙克 (Robert David Sack) 的空間論著作 (1980)，以實在論為出發，却被蘇雅評之為康德主義式範疇的雙元論，脫離了社會物質條件的影響 (Soja, 1985: 102)，可見一斑。其實，就德瑞克·葛里哥雷 (Derek Gregory) 與約翰·尤瑞 (John Urry) 所合編的重要著作《社會關係與空間結構》《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為例，其中不同作者之間，無論是政治與認識論立場上均出入甚多。若由這些無法取得一致性的替代理論的研究者中，勉強要找出其中的共同觀點的話，或許在於：

1. 要求社會學與地理學的重新合流，
2. 對結構主義的再擴展，以及對經驗現象複雜因果關係的注重。

於是，其中部分的研究者，譬如說，約翰·尤瑞、亞蘭·華德 (Alan Warde) 等，開始轉身注意資本邏輯的勞資關係以外的群族、性別、國家等關係，以及空間變化的地域性，將之重新結合為再結構 (restructuring) 的理論角度 (Bagguley et al., 1990)。可是，即使是蘭開斯特區域主義研究群 (Lancaster Regionalism Group) 的集體研

究系列中，雖然他（她）們提出了有野心，也有說服力的經驗研究，也聲稱結合了理論的實在現象的“空間性”，也指出因果元素中空間範域（spatial ranges）的影響，而連結上地域性（locality）的課題（p.4, 10-11）。然而，若基於對空間理論建構的期望而言，空間性與地域性概念架構的界定仍然不理想。面對雜陳的經驗因素如何避免武斷之排除？在要求提出“實體的課題”之問題外，應該可以試著把不同的元素與向度組織到一起，以一種更有分析性的角度，更有意義，深中要害，回答提出來的問題。同樣的，今天除了自甘於故步自封於常規論述的象牙塔保護內的專業者外（它自外於歷史的變遷之外，不自覺地與自覺地鞏固於既定體制的權力結構），我們要回答什麼是空間？已經不能由建築的論述中劃地自限，而必需面對空間論述的變動與歧異，也必需面對因自身缺乏理論所造成的語言貧困，以及缺乏理論對象，而沒有什麼獨立的空間理論的挑戰。空間的科學是實驗科學，而不是學院中智識的遊戲。我們已經強調過，關於空間的本質的哲學式問題，解答的過程在於人類的實踐。實踐所需的是一個開放性的理論假說，而不是重建定於一尊的，形式化的理論。空間論述中這種多範型抗爭的局面，其實也被稱為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的“精神分裂”狀態（Castells,1989a）。這種對學術研究的美好無定一尊狀態並未持續下去，社會不是被動的，靜止的，歷史總是不等人的。1970年初的資本主義危機之後，資本主義進行了再結構。目前在主要的先進工業國，已經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再結構。

空間有關的領域，在英國，新保守主義的建築史學者，已經完成了對代表自由黨思想的批判工作，為保守黨的意識形態，在建築史學院中清除了道路（如 Wakin, 1977,1980）。在建築設計領域，後現代主義的建築完成了對現代主義的清除工作後，竟然公然退回最保守的形式主義陰影之中。在幾所最有影響力的大學建築系中，環境行為的課程居然大量流失選課學生，成功的開業建築師重新成為學生的偶像。在都市計劃與都市設計的領域，保守的專業主義悄悄登場，却表現出

前所未有的形式主義。在另一端，爲了反應戴希達“建築性思考”思想實驗的魅力，建築理論的重構做爲一種啓迪計劃的冒險也被提了出來。面對對所有基本思想信心幻滅的時勢，建築與哲學一起，被當做是建構性的實踐 (constructive practice)，畢竟，建築是改造環境的勞動，而不只是在世界上放置一個容器的勞動 (Diani and Ingraham, 1989: 67。)

這些都僅僅是空間論述中新變動的一角，而且，這些變化並非是偶然的事件。新的論戰其實早已登場，新的課題正等待研究者提出。經濟的再結構催動著當前空間再結構的趨勢，高科技與資本國際化的過程使得流動的空間 (a space of flows) 迅速的替代了地方的空間 (a space of places)，時間與空間的意義相當程度地爲它們在交換網絡中的地位所決定，爲戰利國家 (the warfare state) 與資訊生產方式所支持的資本主義新的成長引入了新的疆域分工，在極化成長與選擇性發展的基礎上，在區域間分裂、都會區的雙元性與大城市同時崛起與衰落反應它自己…這趨勢在 1980 年代之後在加速進行 (Castells, 1985)。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特殊的資訊發展方式的空間表現爲資訊城市之建構。資訊城市是資訊發展方式的都市形式，是社會空間組織的新形式，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流動空間取代了地方空間。這是經濟層次資本功能邏輯的極致表現。基於實踐的要求，我們需要有想像力的計劃，它植基於社會意義的戰鬥之中。地域性的特殊角色，地方政府的作用，與地區組織的活力在新的歷史時勢下有可能成爲推動社會與歷史變遷的力量。新的資訊城市是在市民和地方聯盟的動力下賦與空間新的意義，重建地域之意義，而這是挑戰國際性壟斷資本，搖撼制度的短視之支點。柯司特的新著提供了有想像力計劃所需的分析性診斷之起點 (Castells, 1989b)。那麼，面對正處在經濟、政治劇烈變動的台灣，我們不正是需要重新發問：空間是什麼？空間正在被什麼人爲了什麼，又如何賦與什麼樣的新的意義？在這個新的歷史任務的催迫之下，空間的功能正在如何地作用？以及，空間文化形式的象

徵性表現（這原是最狹義的建築師的工作）做爲新的再現與表徵方式（mode of representation）又是如何？這其實是期待空間的專業者能躋身社會歷史的變動中心，經由社會創新過程，提出新的理論角度與替代性的空間計劃，使個體與集體之主體得以辨明自身，獲得行動的能力，追求有意義的空間。台灣之地域性的文化、地方政府與地域活力，或許得以在新的形勢下開展不同面貌。所以，讓我們來面對台灣的社會與歷史。

哈里·布雷弗曼在討論勞動與勞動力時曾經引用保羅·瓦萊里（Paul Valery）與阿爾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話幫助我們理解人類勞動的特徵，它可以轉引做爲本書的結論：

“人們行動；他把力量用在一種在他本身以外的物質材料上，他使他的各種操作脫離其物質的基礎結構，他對這點了解得很清楚。因此，在展現它們以前他就能想出各種操作，並使它們互相協調；他能給自己規定各種各樣的任務，並能適應各種的材料。他稱之爲才智的，正是這種指揮他的意圖，或者把他的計劃分爲各項操作的能力。他並沒有同他所從事的材料合併在一起，而是從這種材料出發到形成他的心智圖象，從心靈到形成他的模型，每時每刻都把他想做的事情變成他能做的事情，把他能做的事情變成他能完成的事情。”（Braverman, 1974: 46）。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 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都市計劃室 (1979) 〈澎湖觀光發展主要計劃〉,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
- 林宣 (1972) 〈中國古代建築工師的地位和作用〉, 《建築師》, 北京。
- 夏鑄九 (1979) 〈探索感覺的跡路〉, 《建築師》, 12月號, pp.27~24。
- 夏鑄九、陳志梧 (1988) 〈台灣的經濟發展、蘭嶼的社會構造與國家公園的空間角色〉,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一卷, 第四期, 冬季號, pp.233~246。
- 梁濃剛 (1989) 〈快感與兩性差別〉, 台北: 遠流, p.68。
- 謝國雄、邢幼田 (1988) 〈訪問曼紐·卡斯提爾〉,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一卷, 第二、三期合刊, 夏、秋季號, pp.339~360。

## 〈英文部分〉

- AAM, (1978) *Rational Architecture Rationnel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ity*, Bruxelles: AAM Editions.
- Aciman, Andre (1984/1985) "deliberating Barthes", *Social Text*, No. 11, Winter, pp.110-117
- Aczel, Richard (1986) "Eagleton and English", *New Left Review*, No. 104, Nov.- Dec., pp. 13-123.
- Adorno, Theodor W. (1970/1984) *Aesthetic Theory*, trans. C. Lenhardt,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Van Maren King, Sara Ishikawa (1965) *390 Requirements for the Rapid Transit Station*, Berkeley, Ca.: Library of the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59) "Perception and Modular Coordination", *RIBA Journal*, Vol.66, No.12, Oct., pp.425-429.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0a) "A Result in Visual Aesthe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Oct., pp.357-371.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0b) "The Revolution Finished Twenty Years Ago", *Architect's Year Book*, No.9, pp.181-185.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1) "Information and an Organized Process of Design", *Proceedings of the BRI*, Washington, D.C., Spring, pp.115-124. (reprinted from *New Building Research*).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2) "The Origin of Creative Power in Childre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2, No.3, July, pp.207-226.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3a) *HIDECS 3: Four Computer Programs for the Hierarchical Decomposition of Systems which have an Associated Linear Graph*, Cambridge, Mass.: School of Engineering, M.I.T.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3b) "The Determination of Components for an Indian Village", in J. Christopher Jones, and D.G. Thornley, ed. *Conference on Design metho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4a) *Note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4b) "The Year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Design", Berkeley, California.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5a) "A City is Not a Tree", *Forum*, April-may, pp.58-62.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5b) "The Question of Computers in Design", *Landscape*, Vol.14, No.3, Spring, pp.6-8.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5c) "The Theory and Invention of Form", *architectural Record*, Vol.137, No.4, april, pp.177-186.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6a)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Urban Rule System",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6b) "From a Set of Forces to a Form", in Gyorgy Kepes, ed. *The Man-Made Object, Vision and Value Series*, Vol.4,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pp. 96-107.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6c) "The Pattern of Stree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32, No.5, Sept., pp.273-278.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7a)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Theory,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Brochur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7b) "Rejoind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33, No.6, sept., pp.414-417.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7c) "The city as a Mechanism for Sustaining Human Contact", in William R. Ewald, ed. *Environment for Man: The Next Fifty Year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60-102.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7d) "Systems Generating Systems", *Booklet, Inland Steel, 1967*, Vol.45, No.11, nov., pp.39-44. (Also in *Architecture Canada* 1968).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8a) "The Bead Game Conjecture", *Lotus*, no.5, pp.151-154.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8b) "Major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Form Required by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s", Second International Seminar, Japan Center for Area Development Research, Japan. (Also published in *Ekistics*, Vol.28, No.165, Aug., 1969).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8c) "Thick Wall Patt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38, No.7, July, pp.324-326.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69) "Alexander, Christopher--Bibliographies", Berkeley, Calif.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0) "The Environment", *The Japan Architect*, No.165, July, pp. 52-54.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1) "A Refutation of Design Methodology", *Design Methods News Letter*, Vol.XLII, No.12, Dec., pp.768-770. (Reprinted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Dec., 1971).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3)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tern Language*, Vol.7, No.3, pp.24-29, 67-68, Stockholm: Working Paper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4a) "An Attempt to Derive the Nature of a Human Building System from First Principles", in Edward Allen, ed. *The Responsive Hous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pp.22-32.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4b) "An Early Summary of '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 1970", in Joh Lang, et al. ed. *Designing for Human Behavi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ehavioral Science*, Stroudsburg, Pa: Dowen, Hutchison & Ross, pp.52-59.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7) "The Architect Builder: Toward Changing the Conception of What an Architect is", *San Francisco Bay Architects Review*, Sept., p.4.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7b) "On Value", *Concrete*, Vol.1, No.8, Oct., pp.1,3,6-7.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9) *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81a) *The Linz Ca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81b) "Beyond Humanism", An Interview by Howard Davis,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Vol.35, No.1, Fall pp.18-24.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83) "The Style of the 21st Century: An Essay on Technology, Geometry and Style", *Concrete*, Vol.17, No.3, pp.6,7,11.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84) "Introduction of 'Mexicali Revisited'", *Places*, Vol.1, No.4, pp.76-77.
-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85) "The Nature of Order", Manuscript, Berkeley, Calif.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A.W.F. Huggins (1963-64) "Main Structure Concept", *Landscape*, Vol.13, No.29, Winter, pp.17-20.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A.W.F. Huggins (1964) "On Changing the Way People See",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Vol.19, No.1, Aug., pp.235-253.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Barry Poyner (1966) "The Atoms of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London: Ministry of Public Buildings and Works, Directorat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3016. (Also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July 1966; reprinted in Gary Moore, ed. *Emerging Methods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Planning*,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1, pp.308-321.)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Howard Davis, Halim Abdelhalim (1974) *People Rebuilding Berkeley: The Self-Creating Life of Neighbourhoods*, Report to the Master Plan Revision Committee, City of Berkeley, Calif.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Ingrid King, Walter Wendler (1975) *Three New Apartment House*, Berkeley Ca.: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Marvin L. Manheim (1962a) *HIDECS 2: 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Hierarchical Decomposition of a Set Which has an associated linear Graph*, Cambridge, Mass.: School of Engineering, M.I.T.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Marvin L. Manheim (1962b) *The Design of Highway Interchanges: Engineering Design Problems*, Cambridge, Mass.: School of Engineering, M.I.T.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Marvin L. Manheim (1962c) *The Use of Diagrams in Highway Route Location: An Experiment*, Cambridge, Mass.: School of Engineering, M.I.T.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66d) "Relation of Complexes in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Record*, Vol.140, No.3, Oct., pp.185-190.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67) "Design Innovation: an Exchange of Ideas",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Nov., pp.126-131.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Sara Ishikawa, Murray Silverstein (1967)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of th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Susan Carey (1968) "Subsymmetries",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 Vol.4, No.2, Feb., pp.73-77.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Sara Ishikawa, Murray Silverstein (1968) *A Pattern Language Which Generates Multi-Service Centers*,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Sanford Hirshen, Sara Ishikawa, Christie Coffin, Shlomo Angel (1969) *Houses Generated by Patterns*,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70) *A Human City*, Tokyo: Kajima.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73) *The Grass Roots Housing Process*,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Max Jacobson (1974) "Specifications for an Organic and Human Building System", in Edward Allen, ed. *The Responsive Hous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pp.33-51.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75a) "Tourism in Andalusia: Making Buildings and Communities Which Really Live", *Architectural Live*, Vol.45, No.1, Jan., pp.33-37.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75b) *The Oregon Experi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76) "Th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 Pattern". *PARAMETRO*, Vol.7, No.3, Feb., pp.24-29, 67-68.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Sara Ishikawa, Murray Silverstein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Peter Eisenman (1984) "Discord over Harmony in Architecture: The Eisenman/Alexander Debate", *HGSD News*, March/April, pp.12-17.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85a) *The Production of Hous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1985b) "Battle: The History of A Crucial Clash between World-System a and World-system B", *The Japan Architect*, No.340, Aug., pp.15-35.
- Alexander, Christopher, and Artemis Anninou, Hansjoachim Neis (1987) *A New Theory of Urban Desig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pere, Jean (1984) "Manfredo Tafuri", *Arkitektur*, Vol.84, No.5, June, pp.21-25.
- Althusser, Louis (1965/1969)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Allen lane.
- Althusser, Louis (1965/1969) "The 'Piccolo Teatro': Bertolazzi and Brecht", (in Althusser 1965/1969)
- Althusser, Louis (1966/1971) "Cremoni, Painter of the Abstract", (in Althusser 1965/1971).
- Althusser, Louis (1969/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Althusser 1971).
-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Althusser, Louis (1966/1971) "A Letter on Art In Reply to Andre Daspre", (in Althusser 1971).
- Althusser, Louis (1968/1970)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ltman, Irwin (1975)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Behavior*, Monterey, Calif.: Brooks/Cole.
- Altman, Irwin, and Martin Chemers (1980)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Monterey, Calif.: Brooks/Cole.
- Altman, Irwin, and William W. Haythorn (1967) *The Ecology of Isolated Groups*, "Behavioral Science", No.12, pp.169-182.
- Anker, Andrew, and Mark Kessler, W Scott Clark, ed. (1984) "Autonomous Architecture", *The Harvard Architecture Review*, Vol.3, Winter.
- Appleyard, Donald (1970) "Styles and Methods of Structure a C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1, No.2, pp.100-118.
- Appleyard, Donald (1977a) "A Planner's Guide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No.43, April, pp.184-189.
- Appleyard, Donald (1977b) "Rev. of Managing the Sense of a Region, by Kevin Lynch",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43, No.3, July, pp.323-324.
- Appleyard, Donald (1978) "The Major Published Works of Kevin Lynch: An Appraisal",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49, No.4, Oct., pp.551-557.
- Appleyard, Donald (1979) "The Environment as a Social Symbol: Within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Percep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45, No.2, April, pp.143-153.
- Appleyard, Donald, and Kevin Lynch (1974) *Temporary Paradise?: A Look at the Special Landscape of the San Diego Region*, San Diego City Planning Dept.
- Appleyard, Donald, and M. Sue Gerson, Mark Lintell (1981) *Livable Stree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ppleyard, Donald et al. (1982) *Humanist Manifestation*, Berkeley: U.C. Berkeley.
- Aragones, J.I., and J.M. Arredono (1985) "Structure of Urban Cognitive Map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5, No.2, June, pp.197-212.

- Argan, Giulio Carlo (1963) "On the Typolog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55, No.5/6, pp. 49-51.
- Aymonino, Carlo et al. (1964) "Dibattito", *Casabella*, No.289, July, pp.4-15.
- Bakhtin, Mikhail M., and P.M. Medvedev (1928/1978) *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Poetics*, in Trans. Albert J. Wem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ldwin, J. (1986) "The Production of Houses", *Whole Earth Review*, No.50, Spring, p.85.
- Bandini, Micha (1981) "Aldo Rossi", *AA FILES*, No.1, Autumn, pp.106-111.
- Bandini, Micha (1984) "Typology as a Form of Convention", *AA FILES*, No.6, May, pp. 73-82.
- Banerjee, Tridib (1985) "Environmental Desig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ome Thoughts on Design Education",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ol.5, No.1, pp. 28-38.
- Banham, Reyner (1986a) "Interview with Reyner Banham", by Aralice D. Boles and Susan Doubilet,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March, pp.75-77.
- Banham, Reyner (1986b) "Changing Tack on the Timeless Wa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3, pp.15-16.
- Barker, Francis (1981) "Ideology, Production, Text: Pierre Macherey's Materialist Criticism", *Praxis*, No.5, pp.99-108.
- Barker, Roger G., (1968) *Ecological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 of Human Behavior*, Stanford, 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ett, Jonathan (1985) "Rev. of Site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51, No.3, pp.390-391.
- Barthes, Roland (1953/1967) *Writing Degree Zero*,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54) *Michelet par lui-meme*, paris: swuil.
- Barthes, Roland (1957/1970) *Mythologi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57/1972) *Mythologies*, Selected and Trans.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60/1964) *On Racine*,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64/1972) *Critical Essay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Barthes, Roland (1964/1967) *Elements of Semiolog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66/1987) *Criticism and Tru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rthes, Roland (1967/1970/1971/1973) "Semiology and Urbanism," *VIA*, No.2, pp.155-157.
- Barthes, Roland (1967/1983) *The Fashion Syste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68/1977)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Image-Music-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68/1979) *The Eiffel Tower and Other Mythologi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70/1974) *S/Z*,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70/1982) *The Empire of Sig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71/1976) *Sade, Fourier, Loyol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73/1975) *The Pleasure of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75/1977)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77) *Image-Music-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77/1978) *A Lover's Discours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81/1985) *The Grain of Voi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82/1985)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Critical Essays on Music, Art,*

- and Representation,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hes, Roland (1984/1986) *"The Rustle of Language"*, London: Blackwell.
-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ossori: Telos Press.
- Bechtel, Robert B. (1977) *Enclosing Behavior*, Stroudsburg, Penn.: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Beckley, Robert M. (1984) "The Studio is Where a Professional Architect Learns to Make Judgments", *Architectural Record*, Vol.172, No.10, oct., pp.101,105.
- Bender, Rechar and John Parman (1984) "The Question of Style in Research", James C. Snyder, ed. *Architectural Research*,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Benevolo, Leonardo (1967) *The Origins of Modern Town Planning*, Cambridge, Mass: The MITI Press.
- Benjamin, Walter (1968/1969) *Illuminations*, in Hannah Arendt e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Bennett, Tony (1979) *Formalism and Marxist*, London: Methuen.
- Bennett, Tony (1985) "Really Useless 'Knowledge': A Political Critique of Aesthetics", *Thesis Eleven*, No.12, pp.28-52.
- Benton, Ted (1984)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New York: St. Martin's.
- Berger, John (1972) *Ways of See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erger, John (1978) "In Defence of Art," *New Society*, No.28, Sept., pp. 702-704.
- Berman, Marshall,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 Bhaskar, Roy (1983a) "Beef, Structure and Place: Notes from a Critical Naturalist Perspectiv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Vol.13, No.1, March, pp.81-95.
- Bhaskar, Roy (1983b) "Theory of Knowledge", in Tom Bottomore, et al.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54-262.
- Bishop, Jeff (1985) "An Unrecognized Legacy--Children, the Environment and Kevin Lynch", *Children's Environments Quarterly*, Vol.3, Fall, pp.7-9.
- Boberts, David (1985) "Marxism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Thesis Eleven*, No.12, pp. 53-63.
- Bois, Yve-Alain (1977) "Rev. of M. Tafuri's Theories et historie de l'architecture", *Oppositions*, No.11, Winter, pp.118-123.
- Bois, Yve-Alain (1981) "Francastel's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Art", Porphyrios, demetri, 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London: Architectural design, pp.59-60.
- Bourdieu, Pierre (1963/1972/1979) *Algeria 1960*, Trans. Ricard Nice, 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68) "Outline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Art Percep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20, No.4, pp.589-612.
- Bourdieu, Pierre (1972/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79/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1970/1977) *Pep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Boyer, M. Christine (1983) *Dreaming the Rational City: The Myth of American City Planning*,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Boyer, M. Christine (1984) "Rev. of Gg. Ciucci et al.'s The American City", *Design Book Review*, Spring, pp.111-112.

- Brill, Michael and Marguerite Villecco (1981)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Concepts, Methods, and Values", Washington D.C.: The Design Arts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 Broadbent, Geoffrey "Architects and their Symbols", *Built Environment*, Vol.6, No.1, pp. 10-28.
- Broadbent, Geoffrey (1979) "Alexander's Pattern Languag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Vol.11, No.4, Fall, pp.58-59.
- Broadbent, Geoffrey, Richard Bunt, and Thomas Llorens, ed (1980) *Meaning and Behaviour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Chichester an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Brower, Sidney (1985) "A Memorial to Kevin Lynch", *Design Research News*, Vol.16, No.1, p.3.
- Brown, Denise Scott (1980) "Architectural Taste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The Harvard Architecture Review*, Vol.1, Spring, pp.41-51.
- Buchanan, Peter (1981) "Patterns and Regeneration",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Vol.170, No.1018, Dec., pp.331-333.
- Burch, (1971) "Images of Future Leisure", in Bell, W., and J.A. Mau, ed., *The Sociology of Future*, New York: Russell Sage.
- Bugguley, et al., (1990) *Restructuring: Place, Class and Gender*, London: Sage.
- Burger, Peter (1974/1984)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Trans. Michael Sha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uttimer, Anne (1976) "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6, No.2, June, pp.277-292.
- Buttimer, Anne, and David Seamon, ed. (1980)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London: Croom Helm.
- Cacciari, Massimo (1980) "Eupalion or Architecture", *Oppositions*, No.21, Summer, pp.106-116.
- Callenbach, Ernest, and Steward Brand (1981) *The Next Whole Earth Catalog*, Second ed. Sept., p.217.
- Callinicos, Alex (1976)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 Canter, David (1970) *Architectural Psychology*, London: RIBA Pub.
- Canter, David (1975)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Canter, David (1977) *The Psychology of Pla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arr, Stephen, and Lloyd Rodwin, Gary Hack (1984) "Kevin Lynch -- Desinging the Image of the C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50, No.4, pp.523-525.
- Carr, Stephen (1985) "A Tribute to Kevin Lynch", *UD Review*, Vol.8, No.2, pp.3.
- Carr, Stephen, and Kevin Lynch (1979) "Open Space: Freedom and Control-Changing Social Customs are Reflected by Use", in Lisa Taylor, ed *Urban Open Space*, New York: Rizzoli, pp.17-18.
- Carson, Daniel H., and Peter H. Roosen-Runge (1967) "Comments on 'The Pattern of Stree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33, No.6, Sept., pp.409-414.
- Carstens, Diane (1985) *Open Space in Elderly Housing*.
- Castells, Manuel (1972) "Symbolique urbaine et mouvements sociaux", *VS*, No.2, pp.81-92.
- Castells, Manuel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French Original 1972/1976)
- Castells, Manuel (1978) *City, Class and Power*, Trans. Elizabeth Leba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80)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American Socie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82)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ol.2, No.1, Summer, pp.3-4.
- Castells, Manuel (1984)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Berkeley: IU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Castells, Manuel, ed., (1985a) *High Technology, Space,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Castells, Manuel (1985b) "Rev of C. Boyer's dreaming the Rational City", *Design Book Review*, No.7, Summer, pp.94-95.
- Castells, Manuel, and Alejandro Portes (1986) "World Underneath: The Origins, Dynamics, and Effect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formal Sector*, Harper's Ferry, West Virginia, Oct. 2-6.
- Castells, Manuel (1989a) "The New Directions of Urban Studies in the Last Decade", A Seminar on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New Stage,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Jan.9.
- Castells, Manuel (1989b)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Castells, Manuel, and Emilio de Ipola (1976) "Epistemological practice and the Social Scienc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5, No.2, May, pp.111-240.
- Chermayeff, Serge, and Christopher Alexander (1963) *Community and Privacy: Toward a New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 Choay, Françoise (1090/1971) "Some Remarks on Urban Semiology",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No.153, Dec.-Jan.
- Clarke, Simon et al. (1980) *One-Dimensional Marx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 Clavan, Benjamin (1979) "Christopher Alexander and The Pattern Language: from Theory to Reality",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No.111, Dec., pp.87-98.
- Collins, Peter (1974) "Theory of Architectur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pp.?
- Colquhoun, Alan (1981) *Essays i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Histor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Cooke, Philip, (1983) *Theories of Planning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London: Hutchinson.
- Copper, Marcus, Clare (1974) "Children in Residential Areas: Guidelines for Designer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o.65, Oct., pp.372-377, 415-419.
- Cooper, Marcus, Clare (1975) *Easter Hill Village: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Desig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Cooper, Marcus, Clare (1979) "How to Solve Problems without Really Trying",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No.32, May, pp.12-14.
- Cooper, Marcus, Clare (1985) "Design Guidelines: A Bridge Between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Paper presented at U.S.-Japan seminar o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Dep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 Cooper, Marcus, Clare, and Lindsay Hogue (1977) "Design Guidelines for High-Rise Family Housing", in Don Conway, ed. *Human Response to Tall Buildings*, Stroudsburg: Dowden, Hutchinson and Ross.
- Cooper, Marcus, Clare, and Wendy Sarkissian (1986) *Housing as if People Mattere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 Press.
- Cosgrove, D. (1976) "Place Landscape, and the Dialectics of Cultural Geography", *Canadian Geographer*, Vol.XXII, No.1, pp.66-76.

- County council of Essex, (1973) *A Design Guide for Residential Areas*, Essex: Anchor press.
- Craik, Kenneth H. (1970)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K.H. Craik, et al., ed., *New Directions in Psychology*, Vol.4, New York: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 Craik, Kenneth H. (1977) "Multiple Scientific Paradigms 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12, No.2, pp.147-157.
- Craik, Kenneth H. (1973)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24, pp.403-422.
- Crane, David (1960) "The City Symbol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26, No.4, pp.280-292.
- Crane, David (1965) "Rev. of The Image of the City, by Kevin Lyn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27, No.2, pp.152-155.
- Crane, David (1961) "Rev. of The Image of the City, by Kevin Lyn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27, No.2, pp.152-155.
- Cranz, Galen (1982) *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 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Crosset, Pierre-Alain (1984) "Rev. of A. Foscari and M. Tafuri's 'armonia E I Conflitti'", *Design Book Review*, No.5, pp.52-54.
- Crow, Dennis ed. (1990) *Philosophical Street: New Approaches to Urbanism*, Washington D. C.: Maisonneuve.
- Culler, Jonathan (1983) *Barthes*, London: Fontana.
- Curtis, William (1981) "Rev. M. Tafuri and F. dal Co's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K. Frampton's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XL, No.2, pp.168-170.
- Dal Co, Francesco (1978) "Criticism and Design: For Vittorio Savi and Aldo Rossi", *Oppositions*, No.13, Summer, pp.1-21.
- David, Laing (1978) *The Marxist Theory of Art*,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 Davis, Douglas, and Brian Eads (1986) "Soaring Into the Future: High-Rise in London and Hong Kong Go High Tech", *Newsweek*, April, 14, pp.77, 79.
- de Jonge, Derk (1982) "Image of Urban Areas: Their Structure an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28, No.4, pp.266-276.
- de Queiroz, Pinheiro (1985)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in Brazil: A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perience", *Design Research News*, Vol.14, No.6, Nov.-Dec., pp.1.5-6.
- De Zurko, Edward R. (1974) "Rev. of Histoire de l'art lutte des classes, by Nicos Hadjinicolaou," *The Art Bulletin*, Vol.LVI, Sept., pp.466-467.
- Dewey, John (1935-1939) *"Intellig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John Dewey's Philosophy"*, Joseph Ratner, ed.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 Diani, Marco, and Catherine Ingraham, ed. (1989) *Restructuring Architectural Theor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Dikens, Peter (1979) "Marxism and Architectural Theory: a Critique of Recent Work",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Vol.6, pp.105-116.
- Dickens, Peter (1980) "Social Science and Design Theo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Vol.7, pp.353-360.
- Dickens, Peter (1981) "The Hut and the Machine: Towards a Social Theory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32, No.1-2, pp. 18-24.
- Donald, James (1980) "Editorial", *Screen Education*, No.36, Autumn, pp.1-4.
- Downs, Roger M. and David Stea, de. (1973) *Image and Environment: Cognitive Mapping and Spatial Behavior*, Chicago: Aldine.
- Dumazedier, J. (1967) *Towards a Society of Leisure*,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 Drakakis-Smith, David (1985) *The Third World City*, London: Methuen.

- Drzewiecki, Henry (1979) "Rev. of Growing up in Cities by Kevin Lynch,"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50, No.1, pp.104-106.
- Duncan, James and David Ley (1982) "Structural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 Critical Assessm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72, No., pp.30-59.
- Duncan, S.S., ed. (1979) "Critique: Tafuri's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3, pp.204-212.
- Eagleton, Terry (1975a) "Macherey an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Fall, *The Minnesota Review*.
- Eagleton, Terry (1975b) "Ideology and Literary Form", *New Left Review*, No.90, March-April.
- Eagleton, Terry (1976a) *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
- Eagleton, Terry (1976b)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agleton, Terry (1976c)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Eagleton, Terry (1976d) "Criticism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 *New Left Review*, No.95, Jan.-Feb.
- Eagleton, Terry (1977a)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pp.85-91.
- Eagleton, Terry (1977b) "Ecriture and 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 in Francis Barker et al. e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Essex: Essex University Press.
- Eagleton, Terry (1978a)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New left Review*, No.107, Jan.-Feb. pp. 21-34.
- Eagleton, Terry (1978b) "Tennyson: Politics and Sexuality in 'the Princess' and 'in Memoriam'", pp.97-106.
- Eagleton, Terry (1979) "Ideology, Fiction, Narrative", *Social Text*, No.2, Summer, pp.62-80
- Eagleton, Terry (1980a) "Text, Ideology, Realism", in Edward W. Said e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149-173.
- Eagleton, Terry (1981)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Eagleton, Terry (1982a) *The Rape of Clarissa*, London: Verso.
- Eagleton, Terry (1982b) "Wittgenstein's Friends", *New Left Review*, No.135, pp.64-90.
- Eagleton, Terry (1983)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agleton, Terry (1984)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 Eagleton, Terry (1985)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Thesis Eleven*, No.12, pp.95-104
- Eagleton, Terry (1986a) *Against the Grain*, London: Verso.
- Eagleton, Terry (1986b) *William Shakespeare*, London: Blackwell.
- Eagleton, Terry (1986c) "Meaning and Material",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p.477.
- Eagleton, Terry, et al. (1979) "E.P. Thompson's Poverty of Theory: A Symposium",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5:2, Autumn, pp.139-224.
- Eagleton, Terry, and Peter Fuller, (1983) "The Question of Value: A Discussion", *New Left Review*, No.142, Nov.-Dec., pp.76-90.
- Eagleton, Terry, and Andrew Milner (1985) "Notes and Discussi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Thesis Eleven*, No.12, pp.130-144
- Eco, Umberto (1968/1986) "Function and Sign: 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in M.Gottdiener, and A.Ph. Lagopoulos ed. *The City and the S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55-68.
- Eco, Umberto (1972) "A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Sign/Column", *Semiotica*, Vol.2, pp.97-117.

- Ellis, W. Russell (1971/1972) "Planning Design and Black Community Style: The Problem of Occasion Adequate Space",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RA 3, Los Angeles.
- Ellis, W. Russell (1974) "The Environment of Human Relations: Perspective and Problems",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Vol.27, No. 2.3, pp.11-18,54.
- Ellis, W. Russell (1978) "Dwelling, Media and Public Life", Sociolog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Seventy-Third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Sept., pp. 4-8.
- Entrikin, J. Nicholas (1976) "Contemporary Humanism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6, No.4, Dec. pp.615-632.
- Evans, Gary W., (1980)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88, No.2, pp.259-287.
- Falude, Andreas (1984) "Forword to 1984 Reprint", in Andreas Falude, *Planning Theory*, Oxford: Pergamon.
- Falude, Andreas (1973) *Planning Theory*, Oxford: Pergamon.
- Festinger, Leon, and S. Schachter, K. Back (1950)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Filler, Martin (1983) "Zen and the Art of Building Design", *Ambassador*, Nov., pp.53-63.
- Fisher, Thomas (1986) "Christopher Alexander", *P/A Profile,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Vol.6, No.86, June, pp.102-103.
- Fishman, Robert (1980)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Vol.XXXIX, No.2, pp.153-155.
- Foucault, Michel (1969/1979) "What is an Author?", *Screen*, Vol.20, No.1.
- Frampton, Kenneth (1978) "Art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Appreciation of Work of Art", *Proceedings of the Caucus for Marxism and Art at the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Convention*, No.3 Jan., pp.9-12.
- Frampton, Kenneth (1982) "Production, Place and Reality," *9H*, No.3, pp.13-14.
- Frampton, Kenneth (1983) "Prospects for a Critical Regionalism," *Perspecta*, Vol.20, pp. 147-162.
- Francis, Ray (1983) "Symbols, Imag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Urba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No.30, pp.115-145.
- Friedmann, Arnold, and Craig Zimring, Ervin Zube (1978) *Environmental Design Evalu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 Fromm, Dorit (1985a) "Peru: Previ",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Vol.178, No.1062, Aug., pp. 48-54.
- Fromm, Dorit (1985b) "Mexicali Patterns,"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Vol.178, No.1062, Aug., pp.55-57.
- Fromm, Dorit, and Peter Bosselmann (1984) "Mexicali Revisited: Seven Years Later", *Places*, Vol.1, pp.30-34,50.
- Gallagher, Nora (1986) "Coming Home: The Making of a House", *Image*, April 27, pp.30-34,50.
- Gans, Herbert (1962) *Urban Villagers: Groups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ns, Herbert J. (1969) "Planning for People not Building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No.1, pp.33-46.
- Gauvain, Mary (1985) "A Legacy for People not Buildings," *Children's Environments Quarterly*, Vol.2, No.3, Fall, p.r.
- Gehry, Frank O. (1980) *Architecture 1980: The Presente of the Past, Venice Bionnale*, New York: Rizzoli, pp.154-157.
- Gehry, Frank O. (1985) "Norton House, Venice, California", *Architectural Record*, Mid-



- April, pp.86-.
- Gerald, Dix (1983) "Rev. of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by Kevin Lynch",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54, No.1, pp.119-120.
- Gerratana, Valentino (1977) "Heidegger and Marx", Trans. Kate Soper, *New Left Review*, No.106, Nov.-Dec., pp.49-58.
- Gibbs, Jody, (1984)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Sunbelt", in Richard Hatch, ed. *The Scope of Social Architecture*, New York: Van Notstrand Reinhold, pp.339-344.
- Giddens, Anthony,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3)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Vol.13, No.1 March, pp.75-80.
- Giedion, Sigfried, (1941)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rvin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Gathering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oodey, Brian (1980)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the Designer: the Anatomy of Illness as Perceived by the Almoner", *Built Environment*, Vol.6, No.1, pp.5-9.
- Goodey, Brian (1982) "Cut Down to Size? Christopher Alexander's 'a City is Not a Tree'", *Built Environment*, Vol.8, No.4, pp.258-261.
- Gottdiener, Mark (1982) "Disneyland: A Utopian Urban Space", *Urban Life*, Vol.11, No.2 July, pp.139-162.
- Gottdiener, Mark (1985)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ottdiener, Mark, and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 ed. (1986) *The City and the S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ould, Peter, and Gummar Olsson, ed. (1982)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Pion Limited.
- Grabow, Stephen (1983) *Christopher Alexander: The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 Oriel Press.
- Gregory, Derek, and John Urry, ed., (1985)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regory, Derdk, (1986) "Spatiality", in Johnston, R. J. et al., ed.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p.451-453.
- Gregotti, Vittorio (1968) *New Directions in Italian Architecture*, London: Studio Vista.
- Gregotti, Vittorio (1985) "Territory and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55, No. 5-6, pp.28-34.
- Gulick, John (1963) "Image of Arab C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29, No.3, pp.179-198.
- Gutman, Robert, ed (1972) *People and Buildings*,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bermas, Jurgen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Boston : Baeon Press.
- Habraken, N.J. (1982)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ite*, Awater Press.
- Hadjinicolaou, Nicos (1973/1978) *Art History and Class Struggle*, Trans. Louise Asmal London: pluto Press.
- Hadjinicolaou, Nicos (1978) "Art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Appreciation of Works of Art", *Proceedings of the Caucus for Marxism and Art at the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Convention*, Jan., pp.9-12.
- Hadjinicolaou, Nicos (1982) "On the Ideology of Avant-Gardism," *Praxis*, No.6.
- Hall, Edward T. (1959) *The Hidden Dimension*,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Press/Boubleday.
- Hall, Edward T. (1976) *Beyond Cultur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

- leday.
- Hancock, John (1980) "Rev. of Giorgio Cirucci et al. ed., *The American C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46, No.4, Oct., pp.469-471.
- Harvey, Davi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user, Arnold (1951)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New York: Vintage. (4 volumes)
- Hauser, Arnold (1982) *The Sociology of 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wkes, Terence (1977)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idegger, Martin (1971) *Peo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 Hellman, Louis (1982)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Built Environment*, Vol.8, No.4, pp. 267-271.
- Higuchi, Tadahiko (1975/1983) *The Visu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Landscape*, Trans. by Charles Terr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Hillier, Bill and Adrian Leaman (1973) "The Man-Environment Paradigm and Its Paradoxes,"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43, No.8, Aug., pp.507-511.
- Hillier, Bill and Julienne Hanson (1984)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tchcock, Henry-Russell, and Philip Johnson, (1932)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 New York: Norton.
- Hofstadter, Hans H. (1970) *Living Architecture: Gothic*,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 Holahan, Charles J. (1978)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A Dynamic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 Holahan, Charles J. (1982)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Holly, Michael Ann (1984) *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 of Art 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olquist, Michael (1986) "Answering as Authoring: Mikhail Bakhtin's Trans-Linguistics," in Gary Saul Morson ed. *Bakhtin: Essays and Dialogues on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ltz, Hanz Heinz (1975) *Tendensen in Het Europese Marxisme*, Amsterdam: Socialistiese Uitgeverij Nijmegen.
- Hsia, chu-Joe (1981) *The Study of Urban Image in Taipei Area*,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summary published on *Bullitin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ol.1, No.1, Sept., 1981, pp.49-102.
- Hudson, Ray (1979) "Spac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Methodolog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3, No.1, pp.169-174.
- Hudson, Ray (1982) "The Legibility of the City: A Question of Measurement", *Built Environment*, Vol.8, No.4, pp.262-266.
- Hurt, Stern (1985) "The Design Studio -- Another Opinion in Defense of the Obvious and not so Obvious", *Architectural Record*, Vol.173 No.1, Jan., pp.49-54
- Ingersoll, Richard (1986) "Zeitgeistbuster: A Mandate for Architectural Critics", *Design Book Review*, Spring, pp.12-15.
- Ittelson, William H., et al. (1974)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Ittelson, William H., et al. (1975)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Experiencing the Environment, Clark University.
- Jacobs, Jane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 Jacobs, Allan B. (1981) "Rev. of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47, No.3, pp.356-357.
- Jameson, Fredric (1980) "Cognitive Mapping", in Nelson, Cerl,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Jameson, Fredric (1983) "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 *Formations of Pleasure*, pp.1-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Jameson, Fredric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46, pp.53-92.
- Jameson, Fredric (1985) "Architec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in Joan Ockman ed.,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PP. 51-87.
- Johnson, Pauline (1984) *Marxist Aesthe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Jones, Peter Blundell (1975) "Wrong Tim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Vol.7, No.1, pp.61-63.
- Juhasz, Joseph B. (1981) "Christopher Alexander the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1, No.3 Sept., pp.241-246
- Juhasz, Joseph B. (1984)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istory of Ar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4, No.33 pp.253-263.
- Kafka Wagner, Sherry (1985) "Remembering Kevin," *UD Review*, Vol.8, No.1&2, pp.5.
- Kearney, Richard (1986) *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Keller, Suzanne (1986) *The Urban Neighborhood: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elly, J.R. (1983) *Leisure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 Kendrick, Walter (1985) "God Didn't Invent Literary Critics",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No.33, March, pp.6-7
- Keniger, Michael (1980) "The Romance and Illusion of the Architecture of High Technology", *Transition*, Nov., pp.36-40.
- King, Anthony D (1976)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King, Anthony D. (1980) *Building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King, Anthony D. (1984) *The Bungalow: The Production of a Glob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King, R.J., (1988) "Urban Design in Capitalist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8, Vol.6, pp.445-474.
- Kneivitt, Charles (1986) "Architecture's 57 Varieties" *Art and Design*, Feb. p.5.
- Koenic, D., and C. Rusch (1965) *Design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Komninos, Nicos (1984)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Urban Space", in Enric Pol, and Josep Muntanola, Montserrat, ed. *Man-Environment Qualitative Aspects*, pp. 220-229, Barcelona: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 Kotsiopoulos, Tassos M. (1982) "Reading The Oregon Experiment",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Vol.17, No.2, pp.69-85.
- Krampen, M (1976) *Meaning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London: Pion Limited.
- Kreimer, Alcira (1980) "Building the Imagery of San Francisco: an Analysis of Controversy over High-Rise Development, 1970-71", *Meaning and Behaviour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pp.195-214.
- Krier, Leo (1979) "The Cities Within the City II Luxembourg", *Architectura Design*, Vol.49, No.1, pp.19-32.

- Krier, Rob (1970) "Typ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Elements of The Concept of Urban Spac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49, No.1, pp.1-18.
- Kricer, Rob (1982a) *Rob Krier: Urban Projects 1968-1982*, New York: Rizzoli.
- Krier, Rob (1982b) *On Archite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Academic Editions/St. Martin's Press.
- Krier, Rob (1983)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53, No.9/10, pp.1-88.
- Krier, Leon (1981) *Drawings 1967-1980*, Brussels: AAM Editions.
- Krupat, Edward (1980)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Levi-Strauss to Foucaul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upat, Edward (1985) *People in Cities: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Its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rzweil, Edith, ed. (1980)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dd, Florence C. (1970) "Black Youths View Their Environments: Neighborhood Map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1, No.2, pp.74-99.
- Ladd, Florence C. (1985) "An Interview with Kevin Lynch", *Children's Environments Quarterly*, Vol.2 No.3, fall, pp.4-6.
- Lang, Jon (1986) "Rev. of Kevin Lynch's Good City Form", *Design Book Review*, pp.87-89.
- Lang, Jon, et al. ed. (1974) *Designing for Human Behavi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Stroudsburg, Penn.: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Latunmer, Dan (1984) "Jameson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No.148, Nov.-Dec., pp.116-128.
- Lavers, Annette (1982) *Roland Barthes: Structuralism and After*, London: Methuen.
- Ledrut, Raymond, (1970/1986) "The Images of the City", in Goddiener, M., and Alexander Lago poulos, ed. *The City and the S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19-240.
- Ledrut, Raymond (1973/1986) "Speech and the Silence of the City", in M. Gottdiener and A. Ph. Lagopoulos ed., *The City and the Sign*, pp.114-13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e, Terence (1971a) "Psychology and Architectural Determinism (part 1)", *The Architects' Journal*, Aug. 4, pp.253-262.
- Lee, Terence (1971b) "Psychology and Architectural Determinism (part 2)", *The Architects' Journal*, Sept. 1, pp.475-483.
- Lee, Terence (1971c) "Psychology and Architectural Determinism (part 3)", *The Architectural Journal*, Sept. 22, pp.651-659.
- Lefebvre, Henri, (1976)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 Lefebvre, Henri, (1977)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Pest Richard, ed., *Radical Geography*, Chicago: Maaroufa Press, pp.339-352.
- Lefebvre, Henri (1983/1987) "An Interview with Henri Lefebvre",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5, No.1, pp.27-38.
- Lenntorp, Bo (1978) "A Time-Geographic Simulation Model of Individual Activity Programmes", in Tommy Carlestein, et al., ed *Human Activity and Time Geography*, Vol.2,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Leu, Chin-Wen (1985) "Ten Years' Experience with the Oregon Experiment: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a Campus Planning Process", master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 Levy-Leboyer, Claude (1979/1982) *Psychology and Environment*, Trans. David Canter and Ian Griffiths,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ey, David (1981) "Cultural/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5,

No.2, pp.249-257.

- Ley, David, and Marwyn S. Smauel (1978)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Chicago: Maaroufa Press.
- Lichtheim, George (1970) *Lukacs*, London: Fontana/Collins.
- Lindheim, Roslyn (1983) *Course Description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gramming and Evaluation*. Architecture De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Lindheim, (1972) Roslyn, and Helen H. Glaser, Christie Coffin, ed. *Changing Hospital Environments for Childr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ndheim, Roslyn, et al. (1975) *Social and Behavioral Factors i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valuation of a Training Progra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Lipman, Alan (1976) "Professional Ideology: the Architectural Notion of 'Us Requirements'",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Vol.5, No.2 Aug., pp.12-55.
- Lipman, Alan, and Howard Harris (1980)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 a Sterile Research Enterprise", *Built Environment*, Vol.6, No.1, p.63-74.
- Livingston, D.N., and R.T. Harrison (1983) "Reflections on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No.3, pp.295-296.
- Llorens, Thomas (1981) "Manfredo Tafuri: Neo-Avant-Garde and History",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file*, pp.83-95.
- Loercher, Diana (1972) "Can a Housewife Design a Hom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8, Friday, p.4.
- Logan, John R., and Harvey L.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w, Setha M. (1987)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Desig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Zube, Errjn H., and Gary T. Moor, ed. *Advances in Environment, Behavior, and Design*, Vol.1, New York: Plenum, pp.279-303.
- Lowe, Stuart (1986) *Urban Social Movements: The City After Castells*, London: Macmillan.
- Lu, Weiming (1976) *The Role of Urban Design in Local Government*, Dallas, Texa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Lu, Weiming (1985) "In Memory of Kevin Lynch", *UD Review*, Vol.8, No.1&2, pp.4.
- Ludz, Peter C., (1979) "Hauser and Lukacs", *Telos*, No.41, Fall, pp.175-184.
- Lynch, Kevin (1954) "The Form of Cities", *The Scientific American*, Vol.190, No.4, April, pp.54-63.
- Lynch, Kevin (1958)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24, No.1, pp.16-24.
- Lynch, Kevin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ynch, Kevin (1961) "The Pattern of the Metropolis", *Deadalus*, Vol.90, No1, Winter, pp. 79-98.
- Lynch, Kevin (1965a) *Visual Analysis of Brookline*, Brookline, Mass.: Community Renewal Program.
- Lynch, Kevin (1956b) "The City as Environment", in Scientific American ed., *Cities*, pp. 192-201,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Lynch, Kevin (1956c) "The Visible Shape of the Shapless Metropolis", Sept., Mimeo.
- Lynch Kevin (1966a)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Urban Pattern", June,
- Lynch, Kevin (1966b) "Quality in City Design", in Laurence B. Holland ed., *Who Designs America?*, pp.120-171,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Lynch, Kevin (1968a) "City Design and City Appearance", in William Goodman, and Eric Freund ed.,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pp.249-276, Washington, D.C.: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ynch, Kevin (1986b) "The Possible City", Jan. in William R. Ewald, Jr. ed., *Environment and Policy*, pp.137-157,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ynch, Kevin (1972a) *What Time Is This Pla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ynch, Kevin (1972b) "The Openness of Open Space", in Gyorgy Kepes, ed.*Arts of the Environment*, pp.108-124, New York: Braziller. (1st published 1964).
- Lynch, Kevin (1973) *Looking at the Vineyard: A Visual Study for a Changing Island*, West Tisbury, Mass.: Vineyard Open Land Foundation.
- Lynch, Kevin (1974) "Urban Desig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Vol.18, pp.1053-1065.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 Lynch, Kevin (1975) "Ground for Utopia", in B. Honikman ed.,*Responding to Social Change*, EDRA 6, pp.27-46, Stroudsburg, Pa.: Dawen, Hutchinson and Ross.
- Lynch, Kevin (1976a) "Statement for Dallas Conference, on the Role of Urban Design in Local Government", in Weiming Lu, *The Urban Design Role in Local Government*, p.44, Dallas, Texas.
- Lynch, Kevin (1976b) "Forward", in Gary T. Moore and Reginald G. Goolledge ed. *Environmental Knowing: Theories, Research, and Methods*, pp.v-viii,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Lynch, Kevin (1976c) *Managing the Sense of a Reg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ynch, Kevin (1977) *Growing up in Citi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Lynch, Kevin (1980) "City Design: What I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Taught", *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 Vol.1, No.2, pp.48,49,52,53.
- Lynch, Kevin (1981a)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ynch, Kevin (1981b) "Identity, Power, and Place: A Review of Donald Appleyard's Unfinished Manuscript", *Places*, Vol.1, No.1, Fäll, pp.3-6.
- Lynch, Kevin (1984a) "The Immature Arts of City Design", *Place*, Vol.1, No.3, Spring, pp. 10-21.
- Lynch, Kevin (1984b) "Reconsidering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Lloyd Rodwin, and Robert M. Hollister ed., *Cities of the Mind: Images and Themes of the C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151-161. New York: Plenum Press.
- Lynch, Kevin, and Alvin Lukashok (1956) "Some Childhood Memories of the C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Planners*, Vol.22, No.3 Summer, pp.142-152.
- Lynch, Kevin, and Lloyd Rodwin (1958) "A Theory of Urban Form,"*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24, No.4, pp.201-214.
- Lynch, Kevin, and Malcolm Rivkin (1959) "A Walk Around the Block",*Landscape*, Vol.8, No.3, Spring, pp.24-34.
- Lynch, Kevin, and Lloyd Rodwin (1961) "A World of Cities", *Daedalus*, Vol.90, No.1, Winter, pp.4-10.
- Lynch, Kevin and Donald Appleyard, John R. Myer (1964) *The View from the Road*,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ynch, Kevin, and Stephen Carr (1968) "Where Learning Happens",*Daedalus*, Vol.97, No.4, Fall, pp.1277-1291.
- Lynch, Kevin, and Philip Herr (1973) "Performance Zoning: The Small Town of Gay Head Tries It", *Planner's Notebook 3*, V.3, No.5, Oct., pp.1-4.
- Lynch, Kevin, and Donald Appleyard (1974) *Temporary Paradise?: A Look at the Special Landscape of the San Diego Region*, San Diego City Planning Dept.
- Lynch, Kevin, and Tridib Banerjee (1977) "On People and Pla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of Adolescence",*Town Planning Review*, Vol.48, No.2 April, pp.105-115.
- Lynch, Kevin, and Stephen Carr (1979) "Open Space: Freedom and Control -Changing

- Social Customs are Reflected by Use", *Urban Open Space*, pp.17-18, New York: Rizzoli.
- Lynch, Kevin, and Peter Droege, Tunney Lee (1983) "What Will Happen To Us?", *Space and Society*, No.22, July, pp.86-97.
- Lynch, Kevin and others (1983) "A Tribute to Donald Appleyard", *Places*, Vol.1, No.1, Fall, pp.3-17.
- Lynch, Kevin, and Gary Hack (1984) *Site Planning*, 3rd ed.,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st ed. 1962, 2nd ed. 1971)
- Macherey, Pierre (1966/1978)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cherey, Pierre (1977a) "Problems of Reflection", in Francis Barker et al. e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pp.41-54, Essex: Essex University Press.
- Macherey, Pierre (1977b) "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Macherey", *Red Letters*, No.5, Summer.
- Macherey, Pierre (1978) "The Image in the Mirror", *Red Letters*, No.8, pp.4-16.
- Macherey, Pierre and Etienne Balibar (1974/1978/1981) "Literature as an Ideological Form: Some Marxist Propositions", *Praxis*, No.5, pp.43-58.
- Marans, Robert W. (1984) "Evaluation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in James C. Snyder, ed. *Architectural Research*, pp.113-124, Van Nostrand Reinhold.
- Marans, Robert W., and Kent F. Speckemeyer (1981) *Evaluating Built Environments: A Behavioral Approach*, Ann Arbor,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Architectural Research Laboratory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Marder, Tod A. (1958b) "Gehry House", in Tod A. Marder, ed. *The Critical Edge: Controversy in Recent American Architecture*, pp.101-112,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Marder, Tod A., ed. (1985a) *The Critical Edge: Controversy in Recent American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Margolin, Victor, (1989) *Design Discourse: History, Theory, Criticism*,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kus, Thomas A., (1982) "Introduction", in Markus, Thomas et al., ed. *Order in Space and Society*, Edinburgh: Mainstream, pp.1-24.
- Massey, Doreen, (1979)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Regional Studies*, Vol.13, No.2, pp.233-243.
- Massey, Doreen,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Methuen.
- Massey, Doreen, (1985) "New Direction in Space", in Gregory, Derek, and John Urry, ed.,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9-19.
- Marx, Karl, and Frederic Engels, (1945-46/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Marx, Karl, and Frederic Engels, (1969)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 Marx, Karl, (1957/1939/1973)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lican.
- Marx, Karl (1861-79/1977) *Capital*, New York: Vintage.
- Maxwell, Robert (1977) "Tafari/Culot/Kriet: The Role of Ideolog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3, No.77, pp.187-212.
- McLeod, Mary (1984) "Rev.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by Aldo Rossi", *Design Book Review*, Winter, pp.49-55.
- McLeod, Mary (1985) "Introduction", in Ockman, Joan, et al., ed.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pp.7-11
- McLeod, Mary (1987) "On Criticism", *Places*, Vol.4, No.1, pp.4-6.

- Mcturk, Louis (1975) "Rev of Pierre Macherey's pour une Theorie de laproduction Litteraire", *Radical Philosophy*, No.11, Summer , pp.35-39.
- Mead, Christopher (1983) "Rev. of Survey and Comparison of Buildings of all Types, by Jean-Nicholas-Louis Durand", *Design Book Review*, Summer, pp.12-15.
- Mekean Charles, (1979) "Community Action in Britain", in Donald Appleyard, ed. *The Conservation of European C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369-281.
- Meining, D.W., et al. ed. (1979) *TEh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pes: Ge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ichelson, William (1970) *Man and His Urban Environmen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Mikellides, Byron, ed (1980a) *Architecture for People: Explorations in a New Humane Enviro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Mikellides, Byron (1980b) "Architectural Psychology and the Unavoidable Art", in Buron Mikellides, ed. *Architecture for People : Explorations in a New Humane Environment*, pp.9-33, New York :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Minett, John (1975) "If the City is not a Tree, nor is it a System" , *Planning Outlook*, Vol. 16, Spring, pp.4-17.
- Misra, R.P. (1981) "The Changing Perception of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R.P. Misra and M.Honjo ed., *Changing Perception of Development*, Hongkong: Maruzen, pp. 7-37.
- Moneo, Rafael (1978) "On Typology", *Oppositions*, No.13, Summer, pp.23-45.
- Montefiore, Janet (1984) "The Rhetoric of Experience", *New Left Review*, No.145, May-June, pp.122-128.
- Moore, Charles W., and Kent Bloomer (1977) *Body, Memory, and Architectut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Gary T. (1976)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Knowing", in Gary T. Moore and Reginald G. Golledge, ed. *Environmental Knowing: Theories, Research, and Methods*, pp.138-164 , Stroudsburg, Penn.: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Moore, Gary T. and Reginald G. Golledge, ed. (1976a) *Environmental Knowing: Theories, Research, and Methods*, Scroudsburg, Penn: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Moore, Gary T. and Reginald G. Golledge (1976b) "Environmental Knowing: Concepts and Theories", in Gary T. Moore and Reginald G. Golledge, ed. *Enviromental Knowing: Theories, Research, and Methods*. pp.3-24. Stroudsburg, Penn.: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Moore, Gary and Reginald G. Golledge (1976c)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in Gary Morre and Reginald G. Golledge ed. *Environmental Knowing "Theories, Research, and Methodss"*, pp.297-299. Strondsburg, Pennsylvania: Dowden, Hutchinson and Ross.
- Moore, Gary T. (1979a) "Knowing about Environmental Know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11, No.1, March, pp.33-70.
- Moore, Gary T. (1979b) "Environment-Behavior Studies," in James C. Snyder and Anthony J. Catanese, ed.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pp.46-71. New york: Mcgraw-Hill.
- Moore, Gary T. (1984) "New Directions for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in James C. Snyder, ed. *Architectural Research*. pp.95-112 .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Moore, Gary T., D. Paul Tuttle, and Sandra C. Howell, ed. (1985)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Directions: Proc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raeger.



- Moore, Robin (1974) "Childhood City: Some Orientations and Foci," in Daniel H. Carson, ed. *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EDRA 5.
- Morachillo, Paolo (1985)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55, No.5/6, pp.70-71
- Mulhern, Francis (1978) "Marxism in Literary Criticism", *New Left Review*, No.108, Maech-April, pp.77-87.
- Newman, Oscar (1976) *Design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 Washington)
-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1971) *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1975) *Meaning in West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1974/1975/1980) *Meaning in West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1979/1980)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1984) *Dwelling*, New York: Rizzoli.
- Ockman, Joan (1985)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Osman, Fred Lin (1971) *Patterns for Designing Children's Centers*, New York: Educational Facilities Laboratories.
- Palmer, M (1981) *The Architect's Guide to Facility Programm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 Panofsky, Erwin (1924/1968) *Idea: A Concept in Art History*, Trans. Joseph in J.S. Peake, New York: Harper & Row.
- Panofsky, Erwin (1939/1962)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Mary Flexner Lectures on the Humanites.
- Panofsky, Erwin (1976) *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 An Inquiry into the Analogy of the Art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Meridan.
- Panofsky, Erwin (1982)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et, Richard, and Nigel Thrift, (1989) "Political Economy and Human Geography", in Peet, Richard, and Nigel Thrift, de., *New Models in Geography: Th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London: Unwin Hyman, pp.3-29
- Parker, S. (1981) "Choice, Flexibility, Spontane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Leisure", *Social Forces*, Vol.60, No.2, pp.323-331.
- Perico Bru, Antonio (1984)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s a Pattern Language 'Avant la Lettre' Menorca, and Example", in Enric Pol, Josep Muntanola, and Montserrat Morales, ed. *Man-Environment Qualitative Aspects*, pp.415-420, Barcelona: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 Perin, Constance (1970) *With Man in Mind: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spectus for Environmental Desig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Perin, Constance (1982) "Rev. of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by Kevin Lync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2, No.3, Sept., pp.259-262.
- Perlman, Janice E. (1976)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vsner, Nicolaus, (1936) *Pioneers on Modern Design: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 Piagets, Jean (1970/1972) *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Trans. Wolfe May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Pickvance, C.G. (1976)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Pipkin, John S. (1983) "Structuralism and the Uses of Cognitive Images in Urban Planning", in Pipkin, John and Mark La Gory, Judith R. Blau, ed., 1983, *Remaking the City: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Urban Desig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51-76.
- Pocock, Douglas and Ray Hudson (1978) *Images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ol, Enric and Josep Muntanola, Morales Montserrat, ed. *Man-Environment Qualitative Aspects*, Barcelona: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 Porphrios, Demetri (1982) *Sources of Modern Eclecticism: Studies on Alver Aalto*,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 Porphrios, Demetri (1985) "On Critical History", in Joan Ockman et al. ed.,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p.16-2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Porphrios, Demetri (1981b) "Note on a Method",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file*, pp.96-104.
- Porphrios, Demetri, ed. (1981a) *On the Methodolog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London: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file.
- Porteous, Douglas J. (1977) *Environment & Behavior: Planning and Everyday Urban Lif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Poster, Mark (1975)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ulantzas, Nicos,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Poulantzas, Nicos (1968/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Verso.
- Pred, Allan (1983)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Vol.13, No.1, pp.45-68.
- Pred, Allan, (1985) "The Social Becomes the Spatial, the Spatial Becomes the Social: Enclosures, Social Change and the Becoming of Places in the Swedish Province of Skane", in Gregory, Derek, and Jon Urry, ed.,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337-365.
- Proshansky, Harold M., and William H. Ittelson Leanne G. Rivlin, (1976) e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eople and Their Physical Setting*, 2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st ed. 1970)
- Protzen, J.P. (1977) "The Poverty of the Pattern Language", *Concrete*, Vol.1, No.6, Nov.1, pp.1,5 (part I). (No.8, Nov.15, p.1,4 (part II)).
- Quinney, Richard (1982) *Social Existence: Metaphysics, Marx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Rabeneck, Andrew (1979) "Rev. of A Pattern Language, by Christopher Alexander, Sara Ishikawa and Murray Silverstei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49, No.1, pp.19-20.
- Ranciere, Jacques (1974) "O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Radical philosophy*, No.7, Spring, pp.2-15.
- Rapoport, Amos (1969) *House Form and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Rapoport, Amos (1977) *Human Aspects of Urban Form: Towards a Man-Environment Approach to Urban Form and Design*, Oxford an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Rapoport, Amos (1982) *The Mea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 London and Beverly Hill, Ca.: Saga.
- Rapoport, Amos (1984)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Dominance of the Studio", *Architectural Record*, Vol.172, No.10, Oct., pp. 100, 103.
- Rapoport, Amos, ed. (1976) *The Mutual Interactions of Peopl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Hague: Mouton.
- Register, (1987) *Ecocity Berkely: 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 Berkeley, Ca.: North Atlantic Books.

- Rolph, Edward (1970)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Canadian Geographer*, XIV, No.3., pp. 193-201.
- Rolph, Edward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 Robey, David (1973) *Structuralism: an Introdu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oberts, David (1985) "Marxism,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Thesis Eleven*, No.12, 1985.
- Rodwin, Llyrd, and Robert M. Hollister (1984) *Cities of the Mind; Images and Themes of the C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Rojek, Chris, (1985) *Capitalism and Leisure Theory*, London: Tavistock.
- Romer, Stephen (1986) "Images of Ontolog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No. 4343, 27 June.
- Rossi, Aldo (1966/1982)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Trans. Diane Ghirardo and Joan Ockma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Rossi, Aldo (1979) *Aldo Rossi in America: 1976 to 1979*,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
- Rossi, Aldo (1981) *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Trans. Lawrence Venuti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Rossi, Aldo (1983) *Aldo Rossi: Selected Writings and Projects*, London: Architectural Design.
- Rudolfsky, Bernard (1969)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New York: Doubleday.
- Russell, James A. and Lawrence M. Ward 1982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33, pp. 651-688.
- Samona, Giuseppe (1971/1985) "An Assessment of the Future of the Cit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55, No.5/6, pp. 16-18.
- Samona, Giuseppe (1971/1985) "Architectural Tradi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55, No.5/6, pp. 57-59.
- Samona, Giuseppe (1985) "Why Not?",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55, No 5/6, pp. 4-14.
- Sanchez, Euclides, and Esther Wisenfeld, Karen Cronick (1985)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in Latin America", *Design Research News*. Vol.14, No.6 Nov.-Dec., pp. 1.3-4.
- Saunders, Peter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New York : Holmes & Meier Pub.
- Sayer, Andrew (1979a) "Epistemology and Conceptions of People and Nature in Geography", *Geoforum*, Vol.10, No.1, pp.19-44.
- Sayer, Andrew, (1979b)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Urban and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Sympathetic Critique", University of Sussex,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14.
- Sayer, Andrew, (1985) "The Difference that Space Makes", in Gregory, Derek, and John Urry ed.,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85, pp. 49-66.
- Scott, Allen J. (1982) "The Meaning and Social Origins of Dis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in Peter Gould and Gunnar Olsson, ed.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Pion Limited pp. 141-156.
- Scott, Geoffrey, (1924/1960)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aste*, New York: W. W. Norton.
- Scott, Brown, Dennis (1976) "On Architecture Formalism and Social Concern: A Discourse for Social Planners and Radical Chic Architects", *Opposition*, vol? , No.?
- Scudo, Gianni (1974) "Towards a Political Theory for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44, No. 4, April, pp. 247-248.
- Seamon, David (1985)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Seamon, David (1980) "Rev. of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by James Turner, *Landscape*, Vol. 24, No. 1, pp. 30-31.

- Seamon, David (1982)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logy*, No. 2, pp. 119-140.
- Seamon, David, (1987) "Phenomenology and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Zube, Ervin H., and Gray T. Mooreed., *Advances in Environment, Behavior and Design*, Vol. 1, New York: Plenum, pp. 3-27.
- Seamon, David, and Robery Mugerauer, ed., (1985)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ment*, Boston: M. Nijhoff.
- Semerani, Luciano (1984) "Why Not?", *Arachitctural Design*, Vol. 55, No. 5/6, pp. 4-14.
- Shipskiy, James (1984) "Christopher Alexander, Theory and Practice", *Architecture*, July, pp.54-63.
- Shirvani, Hamid (1985) "The Contributions of Kevin Lynch"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ol. 5, No. 1, Autumn, pp. 60-61.
- Sillverstein, Murray, and Max Jacobson (1978) "Restructring the Hidden Program: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Social Change", in Wolfgang F.E. Preiser , ed. *Facility Programm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Stroudsburg, pp. 7- 26, Pennsylvani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Smith, Steven B. (1984) *Reading Althuss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Susan J. (1984) "Practicing 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rgraphers*, Vol. 74, No. 3, pp. 363-374.
- Smithson, Peter, et al. (1975) "Team 10 at Royaumont 1962", *Architctural Design*, Vol. 45, No. 11 Nov., pp. 664-689.
- Snyder, James C., ed. (1984) *Architctural Research*,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Sommer, Robert (1974) *Tight Space: Hard Architecture and How to Humanize It*, Englewood Cliff, N. J. : Prentice-Hall.
- Soja, Edward W.,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ē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Sommer, Robert (1969) *Personal Space: the Behavioral Basis of Design*, Sommer, Robert (1983) *Social Design: Creating Buildings with People in Mind*, Eng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Sontag, Susan (1982) *A Barthes Read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Southworth, Michael (1970) "An Urban Service for Children Based on Analysis of Cambridgeport Boy' Conception and Use of the Cities", Dissertantaion of M. I. T.
- Southworth, Michael (1985) "Shaping the City Image",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ol. 5, No. 1, Autumn, pp. 52-59.
- Southworth, Michael, and Susan Southworth (1974) "Educative City," in Gary Coates *Altern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pp., Stoudsburg, Pa.: Doween, Hutchinson, and Ross.
- Stea, David (1969) "The Measurement of Mental Maps: An Experimental Model for Studing Conceptual Spaces", No. 17, in K. R. Cox and R.G. Golledge e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Geography Evant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tudies in Geography.
- Stea, David (1980)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Stea on 3-P' s of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Perception, Positivism, Participation (April 22, 1981)",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Vol. 6, No. 2, Fall, pp. 101-126.
- Stea, David (1984) "For Kevin Lynch: In Appreciation", *Jouranal of Environ mental Psychology*, Vol. 4, No. 3, Sept., pp. 197-199.
- Stewart, Susan (1986) "Shouts on the Street: Bakhtin's Anti-Linguistics", in Gary Saul Morson ed. *Bakhtin: Essays and Dialogues on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wart, David (1975) "Rev. of Manfredo Tafuri: Theorie e Storia dell' architettura, " A+U, Vol. 12, No. 60, pp. 27.

- Stockman, David (1983) *Antipositivist Theories of the Sciences: Critical Rationalism, Critical Theory and Scientific Realism*, Dordrecht and Boston : D. Reidel.
- Stokols, Daniel (1978)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29, pp. 253-295.
- Stokols, Daniel (1983)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oretical Directions of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 15, No. 3 May, pp. 259-273.
- Strauss, Anselm L. (1976) *Image of the American Cit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 Sturrock, John (1979)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From Levi-Strauss to Derrid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tton, Sharon E. (1984) "Should Behavioral Studies Be Integrated into Design Studio?", *Architectural Record*, Vol. 172, No. 7, July, pp. 43, 45 47, 49.
- Tafuri, Manfredo (1963) "Architettura e socialismo nel pensiero di William Morris", No. 280, Oct., pp. 36-41.
- Tafuri, Manfredo (1964) *Ludovico Quaroni e lo sviluppo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in Italia*, Milan: Comunita.
- Tafuri, Manfredo (1965a) *L'architettura moderna in Giappone*, Bologna, Cappelli.
- Tafuri, Manfredo (1965b) "Borromini e l'esperienza della storia", *Comunita*, No. 129.
- Tafuri, Manfredo (1966a) *L'Architettura del Manierismo*, Roma: Officina.
- Tafuri, Manfredo (1966b) "La poetica borrominiana: mito, simbolo e ragione", *Palatino*, Vol. 3, No. 4.
- Tafuri, Manfredo (1969a) *L'architettura dell'Umanesimo*, Bari: Laterza.
- Tafuri, Manfredo (1969b) *Jacopo Sansovino e l'architettura del 1500 a Venezia*, Padova: Marsilio.
- Tafuri, Manfredo (1969c) "R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 *Contropiano*, No.1.
- Tafuri, Manfredo (1972a) "Il metodo di progettazione nel Borromini," Vol. II Roma, in Accademia Di San Luca ed. *Studi sul Borromini*. Tafuri, Manfredo (1972b) "Design and Technical Utopia", in Emilio, ed. *Italy: The New Domestic Landscap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Italian Design*, pp. 388-404,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 Tafuri, Manfredo (1974b) "German Architecture: 1923-1933", *WERK*, Vol. 61, No. 3, March, pp. 308-319.
- Tafuri, Manfredo (1975) "Toward the 'Socialist City': Research and Realiz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between the NEP and the First Five Years Plan", *Lotus*, No. 9, Feb., 76-93.
- Tafuri, Manfredo (1976a)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Original Italian Edition 1973).
- Tafuri, Manfredo (1976b) "Les cendres de Jefferson (The Ashes of Jefferson)",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No.186, Aug/Sept.
- Tafuri, Manfredo (1976c) "European Graffiti' Five x Five = Twenty-Five", *Oppositions*, No. 5, pp. 35-74.
- Tafuri, Manfredo (1976d) "Order and Disorder--The Dialectic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U*, Vol. 10, No. 70, pp. 97-120.
- Tafuri, Manfredo (1976e) "This is not a Pipe," *Lotus*, No. 13, Nov./ Dec., pp. 10-13.
- Tafuri, Manfredo (1977a) "Giuseppe Terragni: Subject and 'Mask'", *Oppositions*, No. 11, pp. 1-25.
- Tafuri, Manfredo (1977b) "The Dialectics of the Avant-Garde: Piranesi and Eisenstein", *Oppositions*, No. 11, pp. 72-81.
- Tafuri, Manfredo (1977c) "Arquitectura e linguaggio", *Casabella*, Vol. 41, No. 429, Oct.,

- pp. 9-30, 63.
- Tafari, Manfredo (1977d) "Arquitectura e historiorafia: una propuesta de metodo", *Arquitectura*, No. 204-205.
- Tafari, Manfredo (1978a) "Das Konzept der typologischen Kritik," *Arch+37*, pp. 48-49, 63.
- Tafari, Manfredo (1978b)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Skyscraper," *Wonen-TA/ BK*, No.11, June, pp.25-34.
- Tafari, Manfredo (1979a) "The Historical 'Project'", *Oppositions*, No.17, Summer, pp.55-75.
- Tafari, Manfredo (1979b) "Main Lines of the Great Theoretical Debate ove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1960-1977", *A+U*, Vol.1, No.100, Jan., pp.133-154.
- Tafari, Manfredo (1979c) "Discordant Harmony from Alberti to Zuccari", *Architectural Design*, No.5/6, pp. 36-44.
- Tafari, Manfredo (1979d) "Borrimini nud Piranesi: Die Stadt als <zersprengte Ordnung>", *Weerk/Architese*, No.33-34, Sept/Oct., pp. 6-12.
- Tafari, Manfredo (1980a) "The Watercolors of Massimo Scolari", *Massimo Scolari: Architecture Between Memory and Hopes*, New York: IAUS.
- Tafari, Manfredo (1980b) "Nature/Artificial: The Architecture of Franco Purini", *A+U*, No. 119, pp. 35-40.
- Tafari, Manfredo (1980c) "Aldo Rossi a Venezia," *Domus*, No.602, pp. 7- 11, vi.
- Tafari, Manfredo (1980d) "La Cattedrale Sommersa," *Domus*, No.608, July/ Aug., pp.8-15.
- Tafari, Manfredo (1980e) "Das rote Wien' Politica e forma della residenzanella Vienna socialista 1919-1933", in *Vienna Rossa*, Milano: Electa, pp. 7-148.
- Tafari, Manfredo (1980f)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Harper. (Original Italian edition 1968/1970/1076)
- Tafari, Manfredo (1981a) "Am Steinhof: Centrality and 'Surface' in Otto Wanger's architecture," *Loutus International*, No.29, pp. 72-91.
- Tafari, Manfredo (1981b) "The Uncertainties of Formalism: Viktor Skiovskij and the Denuding of art", *Architectural Design*, No. 6/7, pp. 73-77.
- Tafari, Manfredo (1981c) "Interview", *Transition*, Sept/Dec., pp. 7-12.
- Tafari, Manfredo (1981d) "IACP Housing at Corviale", *Domus*, No. 617, May, pp.22-26.
- Tafari, Manfredo (1981e) "The Analyst of Fragments." *MODO*, Vol.5, No. 41, July Aug., pp. 14-17.
- Tafari, Manfredo (1982a) "Adventure of the Object: The Architecture of Vittorio Grotti", in Manfredo Tafuri et al. ed. *Vittorio Grotti: Buildings and Projects*, pp. 7-30, New York: Rizzoli.
- Tafari, Manfredo (1982b) "vorm en veradiging: Tang's werken in de jaren 50", *Thema*, plan 2, pp.24-33.
- Tafari, Manfredo (1982c) "Architecture and 'Poverty'", *Architectural Design*, July-Aug., pp. 57-58.
- Tafari, Manfredo (1982d) "The 'new Constaipo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novatie' in Venice During the Humanism (1450-1509)", *Ressegna*, No.9, pp. 25-38.
- Tafari, Manfredo (1984a) "Interview", *Domus*, No. 653, Sept., pp. 26-28.
- Tafari, Manfredo (1984b) "Marchine et mimorire' La citta nell' opera di Le Corbusier", *Casabella*, Vol. 48, No.502, May, pp. 44-45.
- Tafari, Manfredo (1984c) "A Theatre a 'Fountain of the Sil' and a Pretty Little Hill: Alvise Cornaro's Redesign of San Marco Basin Venice", *Lotus*, No.42, pp. 41-45.
- Tafari, Manfredo (1984d) "Carlo Scarpa and Italian Architecture," in F. Dal Co and G. Mazzariol, ed. *Carlo Scarpa: The Complete Works*, pp.7-30, New York: Rizzoli.
- Tafari, Manfredo (1985) "U.S.S.R. — Berlin 1922: Form Populism to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in Joan Ockman et al. ed.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rinceton*, pp.

- 121-181, N.J. :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Tafuri, Manfredo (1986a) "There is No Criticism Only History", *Design Book Review*, No. 9, Spring, pp. 8-11.
- Tafuri, Manfredo (1986b) "Humanism,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Rhetoric: the Debate in Renaissance Venice", Walter Groupius Lecture April 30,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Design.
- Tafuri, Manfredo (1987a) "Machine et memoire: The City in the Work of Le Corbusier", in Allen Brooks ed. *Le Corbusi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furi, Manfredo (1987b) *The Sphere and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Original Italian edition 1980).
- Tafuri, Manfredo, and Francesco Dal Co (1979) *Mod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Henry N. Abrams.
- Tafuri, Manfredo, et al. (1980) *The American City: Form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Tafuri, and Georges Teyssot, (1982) *Classical Melancholies*,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2, No. 5-6, pp. 7-17.
- Tagg, John (1978) "Rev. of Art History and Class Struggle, by Nicos Hadjinicolaou", *Red Letters*, No.8, pp. 77-79.
- Tedeschi, Enrico (1970) "Two Tools of Theory", *Architectural Review*, Vol. CXLVII, No. 877, p.4.
- Teymur, Emel and Necdet Teymur (1980) "Understanding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 as a 'System?'",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Vol.6, No. 1, Spring, pp. 55-66.
- Teymur, Necdet (1982)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London: Question Press. Teymur, Necdet (1980) "Design Discourse: Doing Versus Saying—A Dubious Dichotomy," *9H*, Vol.2, pp. 47-49.
- Teymur, Necdet (1981a) "Aesthetics' of Aesthetics: Aesthetic Question in Architectural Urban Discourse",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Vol.7, No.1, Spring, pp. 77-96.
- Teymur, Necdet (1984) "Economic Signification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in Enric Pol, and Josep Muntanola, Montserrat, ed. *Man Environment Qualitative Aspects*, pp. 230-236, Barcelona: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 Teymur, Necdet (1981b) "The Materiality of Design: Science: Method: Proceedings of the 1980 Design Research Society Conference, pp.106-111, Guildford, Surrey: IPC Press.
- Teyssot, Georges (1983) "Marginal Comments on the Debate Between Alexander and Eisenman", *Litus International*, Vol.4, No. 40, pp. 69-73.
- Thody, Philip (1977) *Roland Barthe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impanaro, Sebastiano (1975) *On Materialism*, London: New Life Books.
- Tuan, Yi-Fu (1971a) *Man and Nature*,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Resource Paper.
- Tuan, Yi-Fu (1971b) "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Canadian Geographer*, Vol. XV, No.3, pp.181-192.
- Tuan, Yi-Fu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Tuan, Yi-Fu (1975)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LXV, No.2, April, pp. 151-165.
- Tuan, Yi-Fu (1976) "Humanistic Geographers, Vol.66. No.2. June, pp. 265- 276.
-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Tuan, Yi-Fu (1982a) "Rootedness Versus Sense of Place," *Landscape*, Vol. 24, No.1, pp. 3-8.
- Tuan, Yi-Fu (1982b)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urner, John (1976) *Housing by People*, London: Marion Boyars.
- Turner, John, and R. Fichter (1972) *Freedom to Build: Dweller Control of the Housing Process*, New York: Macmillan.
- Tzonis, Alexander (1985) "Rev. of Christopher Alexander," *Design Book Review*, No. 8 Winter, p.63.
- Ungar, Steven (1983) *Roland Barthes: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Van der Ryn, Sim, (1965) *Amenity Attributes of Residential Locations*, San Francisco, Calif.: San Francisco Community Renewal Program.
- Van der Ryn, Sim (1974) "Natural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44, No.1, Jan., pp. 9-10.
- Van der Ryn, Sim, and Murray Silverstein (1967) *Dorms at Berkeley: An Environmental Analysis*, New York: Educational Facilities Laboratories.
- Van Oudenallen, Harry (1985) "Rev. of Christopher Alexander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Vol.38, No.3, Spring, p.32.
- Vance, James E., Jr. (1980) "Rev.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 Geographical Essays, by D.W. Meinig", *Landscape*, Vol. 24, No. 2, pp. 29-33.
- Vider, Anthony (1976) "Oppositions", No.7, Winter, pp. 1-4.
- Vidler, Anthony (1977a) "Special Issue Paris under the Academic: City and Ideology", *Oppositions*, No.8, Spring.
- Vidler, Anthony, (1977b) "The Idea of Type", *Oppositions*, No.8, Spring 1977.
- Vidler, Anthony (1977c) "Commentary", *Oppositions*, No.9, Summer, pp.3-5.
- Viladas, Pilar (1986) "Harmony and Wholeness",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Vol. 6, No. 86, June, p. 92.
- Villecco, Marguerite, and Michael Brill (1981)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Concepts, Methods, and Values*, Washington, D.C.: The Design Arts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 Violich, Francis (1983) *An Experiment in Revealing the Sense of Place: A Subjective Reading of Six Dalmatian Towns*, Berkeley: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Von Eckardt, Wolf (1978)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Planning Livable Cities*, Washington, D.C.: New Republic Books.
- Wakin, David, (1977) *Morality and Archite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kin, David, (1980) *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lach, Alan (1982) "In Search of a Marxist Art History", *Praxis*, No. 6, pp. 177-180.
- Ward, Peter, ed. (1982) *Self-Help Housing A Critique*, London: Mansell.
- Ward, Tony (1978) "Handmade Housing: A Search for Identit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48, No.7, July, pp. 480-488.
- Ward, Tony (1979) "Rev. of A Pattern Language, by Christopher Alexander, Sara Ishikawa and Murray Silverstei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49, No. 1, pp. 15-17.
- Whyte, William H. (1980)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Washington, D.C.: Th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 Whittick, Aunold, ed (1974) *Encyclopedia of Urban Planning*, New York: McGraw-Hill.
- Williams, Raymond (1961/1965)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81/1982)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New York: Schocken.
- Wohlwill, Joachim F., and D.H. Carson, ed. (1972)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Wohlwill, Joachim F., and Gerald D. Weisman (1981)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nd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 Wojtowicz, Jerzy (1984) *Illegal Facades*, Hong Kong: Jerzy Wojtowicz.
- Wolff, Janet (1981)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olff, Janet (1983) *Aesthe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Ar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Wood, Denis, and Robbert Beck (1976) "Talking with Environmental A, and Experimental Mapping Language", in Gary T. Moore and Reginald G. Golledge ed. *Environmental Knowing: Theories, Research and Methods Stroudsburg*, pp. 351-361,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Yates, Dame Frances (1981) "Architectural Themes", *AA FILES*, No.1, Autumn, pp. 29-53.
- Young, Robert, ed. (1981) *Untying the Text*,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Zeisel, John (1975) *Sociology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Zeisel, John (1981) *Inquiry by Design: Tools for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Zeisel, John, and Gayle Epp, Stephen Demos (1977) *Low Rise Housing for Older People: Behavioral Criteria for Design*, Washington, D.C.: U.S. Dep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 Zevi, Bruno, (1957) *Architecture as Space*, New York: Horizon.
- Zimring, Craig M., and Janet E. Reizenstein (1980)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An Overview,"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 12, No.4, Dec., pp.429-450.
- Zube, Ervin H. (1980)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Perception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ube, Ervin, H. and Gary Moore, ed. (1987) *Advances in Environment, Behavior and Design*, Vol. I, New York: Plenum.
- Zube, Ervin, H., and Gary Moore, ed. (1989) *Advances in Environment, Behavior and Design*, Vol. 2, New York: Plenum.

## 索引

**一劃**

一元的中心價值模型 102

一統性 111

**二劃**

丁潘拿諾 110,111

人文主義 12,23,24,29,30,35,42,43,45,72,  
74,79,129,133,139,197,199,200,201,  
205,206,213,215

人道主義 31,36,43,55,83,90,91,95,97,114,  
194,199,202,203,215

人與環境的最適化 51

人與環境研究 16,50,56

人與環境研究學會 16,56

**三劃**

土地入侵 92

大匠 11

女性主義批評 153

小商品生產 119

小資本主義生產 119

工師 11

**四劃**

中介 3,4,5,23,30,31,41,61,64,72,79,96,  
114,117,118,119,142,150,151,179,188,  
189,220

中心 2,17,18,39,43,45,46,55,71,73,90,92,  
93,94,97,98,99,100,101,102,103,104,  
105,107,109,110,111,113,114,117,118,  
120,137,142,146,147,148,152,153,156,  
161,162,168,170,179,181,183,190,195,  
197,200,211,213

中心化的過程 97,100

丹下健三 128

分散式決策 91

分散的 24,110,197,200

反文化的設計師 92

反文化運動 134

反映論 153

反霸權的戰鬥 102

天賦論 52,61,79,110

巴布提斯特 42

巴克 54,61

巴奇拉 194,195

巴斯卡 79

巴斯坦 13

巴斯蘭 92

巴爾扎克 166,205

巴赫定 36,188,189,202

巴赫德 7,135,137,140,149,157,158,159,  
160,162,163,164,165,166,167,168,169,  
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  
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  
188,189,190

巴黎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165

幻覺 133,143,155,172,206,210

心象圖 27,58

戈德曼 196,200

手工藝的進步運動 96

文化研究 3,5,7,16,194,195,207

文學性 164

文學符號學 157,160,184

比卡 165

水晶宮 13

牛津大學 199

**五劃**

世界系統A 117

- 主體 4,7,8,27,30,35,39,40,41,58,61,62,72,  
73,75,76,78,79,98,99,100,107,139,140,  
144,149,151,153,154,155,156,163,164,  
167,169,170,172,176,182,184,185,186,  
189,190,197,198,201,204,206,214,215,  
217
- 卡西阿尼 127
- 卡西爾 133,135,216
- 卡迪那 131
- 卡勒爾 165,166,174
- 卡爾 1,23,32,208
- 卡薩貝拉 130,131,132,133,138
- 去語意化 182
- 可辨認性 28
- 古德曼 121
- 史卡帕 131
- 史托克爾 51
- 史特勞斯 83
- 史崔格 56
- 史登 42
- 史戴 37,55,81
- 尼采 138,143,144,149,177,180
- 市民社會 102,174
- 布希亞 181
- 布朗 150
- 布萊希特 163,164,176,196,202
- 布雷弗曼 122,273
- 布魯涅內斯基 129
- 弗朗克斯提爾 196
- 正文 6,41,139,140,141,142,143,144,149,  
150,151,160,164,166,167,168,169,170,  
171,172,173,174,175,176,177,180,181,  
182,184,186,187,188,189,190,195,198,  
200,201,203,206,207,211,212,215,220
- 正文之間 142,164,187
- 正當化、合法化 219
- “正統”馬克斯主義 161
- 民粹主義 96
- 甘特 56
- 甘斯 42,51,55
- 生存空間 36
- 用後評估 53,62,67,68,69,70,80
- 白色寫作 163
- 皮亞傑 78,79
- ## 六劃
- 交流溝通 178,181
- 亥克 23,45
- 伊甸生 49,54,55,57,61
- 伊波拉 6
- 伊格頓 113,116,146,162,166,168,190,191,  
192,193,195,196,198,199,200,201,202,  
203,206,207,208,209,210,211,212,213,  
214,215
- 共時性的 163
- 列伏斐爾 110,220,259
- 吉伯倫 96
- 吉姆林 69
- 同形異質體 186
- 地方 1,4,9,10,11,22,26,27,28,29,31,32,36,  
38,40,43,44,46,49,51,53,54,65,66,76,  
91,94,95,97,102,103,104,105,106,107,  
109,111,114,116,118,120,138,151,155,  
182,183,189,195,197,199,208,209
- 地方感 4,11,27,28,76,151
- 地域性 30,71,92
- 多重閱讀 36,72,170
- “多價值”模型 101
- 存在主義 160,161,162,163,193,201
- 存有於世 99
- 托爾斯泰 205
- 有節制的醉 176,177
- 有機建築學會 130
- 米爾頓·津 89
- 米蘭 900 130
- 老子 96,177

考夫曼 83  
 考斯多夫 157  
 自由主義 42,43,45,90,114,134,199,215  
 自助式住宅 45,92,93,119  
 自明性 27,28,29,169,174,175,212  
 艾力斯 83  
 艾思曼 97,100,111,113,115  
 艾柯 188  
 艾菲爾鐵塔 178,179,181,182  
 西門 42  
 西曼 83  
 西摩爾 54  
 西歐奇 127  
 西默爾 143,144  
 西默蘭尼 131

**七劃**

佛利 88  
 佛明頓 150  
 佛斯卡利 127  
 何遜 92  
 作用者 5,7,35,40,45,75,79,116,155,157,  
 162,170,182,214,220  
 作者 7,15,68,69,75,89,94,148,160,163,  
 165,169,170,175,187,197,200  
 作品 12,14,26,34,36,37,55,70,72,78,80,89,  
 99,100,101,108,121,127,128,131,132,  
 133,136,139,140,142,146,147,148,160,  
 162,163,165,166,167,168,169,170,173,  
 174,175,176,179,180,187,190,196,197,  
 200,203,205,206,207,208,209,216

伯吉 128  
 伯辛斯基 49,54,55  
 伯里昂 133  
 伯度 194,260  
 伯洛米尼 129  
 克雷克 55,57,61,69  
 克雷姆爾 181

克雷彭 182  
 克魯泡特金 117  
 克羅 16  
 克麗斯蒂娃 166  
 技術官僚之理性 23  
 批判的歷史 126,127,145,146,147,148,157  
 改良主義 152,202  
 泰倫斯·李 54,55  
 湯尼·李 23  
 李文斯派 199  
 李拉 181,182,189  
 李維司陀 158,160,163  
 杜威 21,25,38,40,42  
 杜蘭 138  
 沙那維諾 133  
 沙特 160,161,162,163,193  
 沙莫那 127,131  
 狄卡洛 131  
 系譜學 137,143,144,149,216  
 言語 164,169,174,178,179,180,185,187  
 言辭或說話 164  
 里哥 130,133,216  
 里爾克 177

**八劃**

亞當斯 22  
 亞歷山大 7,52,55,83,86,87,88,89,90,91,  
 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  
 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  
 113,114,115,116,117,120,121,122,162,  
 170,181  
 使用者準則 70  
 兩元對立 180,185,211  
 刺激—反應(S-R)理論 61  
 制度 6,14,15,35,38,44,45,51,55,56,57,67,  
 68,73,74,88,94,102,116,119,120,131,  
 135,136,139,144,145,149,150,151,155,  
 164,165,198,203,207,209,210,213,214,

- 219,220
- 孟福 42
- 居所 77,92,99,113
- 延意 40,41,164
- 拉哥波羅斯 41
- 拉普普 51,55,57,58,62,63,67,75,77,104
- 抽象 3,8,27,36,38,39,44,62,75,77,79,98,  
99,105,108,109,111,153,154,156,172,  
173,182,188,196,210,213
- 明白性 28
- 杭士基 96,110
- 林罕 92
- 林區 7,16,20,21,22,23,24,25,26,27,28,29,  
30,31,32,33,34,35,36,37,38,39,40,41,  
42,43,44,45,46,47,55,72,111,181
- 波伊斯 139,149,150,151
- 波德 21
- 法外營造者 92
- 法斯丁格 54
- 法蘭西學院 157,160,168
- 版權 175
- 社區行動計劃 91
- 社區設計 33,90,91,95,96
- 社會計劃 72,82
- 社會理論 2,3,4,17,62,108,153,194,195
- 社會設計 53,95
- 社會運動 3,15,43,78,81,90,91,102,120,  
134,135,138,155,199,201,210,213,214,  
218,219,220
- 社會運動 3,15,43,78,81,90,91,102,120,  
134,135,138,155,199,201,210,213,214,  
218,219,220
- 社會學的美學 2,3,4
- 社會關係 4,8,11,17,31,35,38,40,41,43,44,  
45,64,65,66,76,77,78,80,81,84,102,104,  
105,111,113,114,118,120,143,151, 152,  
155,156,157,173,175,176,177,188,189,  
190,196,206,209,212,218,220
- 空間 1,2,3,4,5,6,7,8,9,11,12,13,14,16,17,  
22,23,24,25,26,27,28,29,30,32,33,34,  
35,36,38,39,40,41,42,43,44,46,47,48,  
50,53,55,57,58,61,62,63,64,68,71,72,  
74, 75,76,77,78,80,81,82,83,88,89,92,  
94,96,97,98,99,100,103,104,106,108,  
109,111,113,114,115,116,120,121,134,  
138,139,140,141,143,144,146,147,149,  
150,151,152,153,154,156,157,169,174,  
176,178,179,180,181,182,183,184,185,  
186,188,189,195,196,204,205,210,211,  
212,215,216,217,218,219,220,221
- 空間形式 2,3,4,5,6,7,8,26,27,28,30,34,35,  
38,40,41,57,58,61,64,72,75,78,83,96,  
98,109,111,116,138,139,146,150,151,  
152,153,154,156,157,169,189,204,215,  
217,220,221
- 空間的文化形式 2,3,8,13,16,72,121,156,  
195,217,218,219
- 空間措辭 12,212
- 空間結構 26,28,40,78,103,116,120,188
- 空間意識 3,39,114,116
- 空間語彙 36,72
- 花園市 42
- 表意系統 44,77
- 表意實踐 143,151,175,210,213
- 表徵 5,38,39,41,44,58,61,63,79,98,126,  
129,150,151,152,156,159,164,165,174,  
179,185,186,189,191,198,216
- 邵斯華茲 23,25,29
- 安東尼·金 83
- 阿比尼 131
- 阿多諾 142
- 阿伯提 12,129
- 阿岡 131,138
- 阿斯丁哥 131
- 阿圖塞 6,7,79,137,139,160,192,193,194,  
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

- 204,205,206,207,212,215,217,219  
 阿圖塞主義 139,192,193,195,198,200,  
 201,204,206,217  
 阿圖塞學派 7,200  
 雨果 183  
 非正式部門 45,86,117,118,119,121  
 非正式營造系統 86,87,97,100,116
- 九劃**
- 俄耳菲 159  
 前衛主義者 150  
 品味 13,14,29,70,105,175,176,209,210  
 品質 12,14,24,26,27,29,32,33,46,49,52,68,  
 69,71,72,76,77,95,98,99,100,103,107,  
 109,111,115,118,121,134,143,147,161,  
 175,176,182,193,199,207,213  
 哈佛 89,97  
 哈佛學會 89  
 哈齊尼可拉 194,195,196,205,206,215,  
 216,217,218,220  
 威尼斯大學 128,131,138  
 威尼斯學派 7,126,127,129,133,138  
 威廉斯 75,76,199,200  
 威瑪共和的社會民主與城市 128  
 客體 8,27,30,39,40,41,45,52,58,61,62,72,  
 78,79,98,99,100,107,116,139,140,147,  
 149,151,152,154,162,167,169,170,171,  
 182,204,206  
 建構主義 52,61,62,78  
 建築 1,2,3,5,6,9,10,11,12,13,14,15,16,17,  
 19,20,21,22,23,26,29,32,34,36,48,49,  
 50,55,56,62,66,67,68,70,74,77,81,86,  
 87,88,89,90,91,92,95,96,97,98,99,100,  
 101,104,105,106,108,110,111,113,114,  
 115,116,117,118,121,126,127,128,129,  
 130,131,132,133,135,136,137,138,139,  
 140,141,144,145,146,147,148,149,150,  
 152,154,155,157,158,159,169,170,175,  
 179,180,181,184,185,186,192,210,211,  
 216,217  
 建築批評 70,127,135,145,170  
 建築物類型 66,138  
 建築的自戀症 81  
 建築師 1,11,12,13,16,19,22,26,34,62,66,  
 68,91,92,97,100,101,108,110,113,114,  
 117,118,127,129,132,133,136,139,145,  
 146,148,150,152,154,155,169,186  
 建築理論 2,9,10,11,14,15,16,88,90,108,  
 114,210,211  
 建築與行爲 56  
 建築與烏托邦 136,150  
 建築與規劃研究 56  
 後馬克斯主義 138,201  
 後現代主義 2,15,24,81,100,121,127,136,  
 212  
 後設理論 73  
 後結構主義 138,144,149,150,156,158,  
 159,160,166,167,168,170,173,174,176,  
 179,183,184,187,189,190,191,201,202  
 恰賓 88  
 拜物教秘密 143  
 指意的 40  
 政治的批評 135  
 政治經濟學 2,3,136,153,181,194  
 柯司特 6,17,43,77,156,182,195,215,217,  
 218,219,220,221  
 柯必意 13,32,44,128  
 柯貝 42  
 柯林斯 13  
 柏克萊加州大學 87,218  
 柏青哥 181,187  
 柏蘭札斯 196  
 段義孚 83  
 派夫斯勒 11,141  
 派克 21,38,42,54  
 派拉底歐 128

- 洛倫茲 79  
 紀德 163  
 耶魯 22  
 范求利 141,150  
 范德靈 91,92,95  
 英格罕 16  
 計劃書製作 50,67,68,69,80,81,92  
 韋伯 54,88,135,153,194  
 風格式的分類法 148  
 風範主義 129,132
- 十劃**
- 修辭 141,148,163,172,189,206,207,211,212,213,215  
 原型 4,33,34,71,103,109,110,138,143,180,186  
 原樣 166,202  
 哥曼 55,61  
 展現 14,26,27,29,31,32,33,34,44,116,133,151,156,176,181,182,186,212,221  
 時勢 2,7,8,16,18,22,41,42,53,73,84,89,90,110,117,147,157,189,194,195,219,220  
 柴菲 130,131  
 柴榮 57  
 格雷夫 104,105  
 泰勒 216  
 海曼 19,48,80,86  
 海德格 97,99,101,113,138,140,161  
 特米斯 129  
 特蘭尼 129  
 班哲明 137,142,149,157,197,202,212  
 神話 40,105,135,137,142,144,149,152,162,163,164,168,169,170,173,174,179,181,185,188,190,200  
 神話學 135,137,149,162,163,164,173,174  
 索緒爾 151,163,169,179,181,188  
 紐約五人團 128  
 紐約市立大學 55
- 紙板風格 100  
 脈絡批評 142  
 馬丁 64,92,97,106,182,194  
 馬克斯主義 3,18,83,91,110,111,128,134,135,136,137,138,140,153,160,161,162,165,193,194,195,198,199,200,201,202,203,205,219  
 馬里瑞—伊里亞 128  
 馬拉美 186  
 馬庫色 136,153,161,194,201  
 馬庫思 57  
 馬格瑞提 126  
 馬凱 42  
 馬歇雷 194,195,196,197,198,199,200,202,206,212  
 馬歇爾重建計劃 130  
 高迪 41,90  
 高迪勒 41
- 十一劃**
- 偽正文 41,182,189  
 偏離作用 186  
 區域性的文化 92  
 區域與都市政策 3  
 參與性設計 53,67  
 國立科學研究中心 162  
 國家 1,3,14,15,17,23,38,42,43,45,55,56,57,72,73,78,81,82,83,84,88,90,96,102,110,115,116,117,118,119,120,130,134,155,161,164,165,167,173,174,178,190,196,197,203,213,218,219,220  
 基督教民主黨 130  
 婦女運動 134,199,203,210,213  
 常道 87,95,97,113,122  
 康維特 118  
 康德 52,61,62,78,79,100,133,139,143,149,155,156,201,204,214,216  
 康德主義 52,61,62,78,79,133,139,143,

- 149,155,156,201,204
- 強生 128
- 情色遊戲 171,179,183,184,202
- 控制參數 133
- 措辭 12,148,206,207,211,212,215
- 曼罕 89
- 曼都西諾 114
- 梅洛—龐蒂 161,193
- 理性主義 52,61,90,91,97,130,132
- 理性主義運動 130
- 理論 1,2,3,4,5,6,7,8,9,10,11,14,15,16,17, 18,20,21,24,25,26,27,29,30,31,32,33, 34,36,37,38,39,43,44,45,49,52,53,54, 55,57,58,61,62,63,64,65,66,69,73,74, 75,76,77,78,79,80,82,83,86,88,89,90, 93,94,95,96,97,98,100,101,103,104, 105,106,107,108,110,111,113,114,117, 120,121,126,127,128,129,131,132,133, 135,136,137,138,139,141,142, 144,146, 150,153,154,155,156,158,160,161,162, 163,165,169,172,176,180,182,184,185, 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 197,199,200,201,202,203,204,205,206, 207,209,210,211,212,213,214,215,216, 217,218,219,220
- 理論提綱 18,225,226,234,235,239,240
- 現代運動 13,121,133,136
- 現代雜誌 161
- 現象學 11,18,36,37,52,61,76,82,83,97,99, 121,139,140,151,201,215
- 疏離效果 164
- 笛卡兒 9,90,100,110,172
- 第三世界 17,18,21,45,46,56,57,82,92,97, 118,119,134,138,203,210,213,218
- 符合性 28
- 符旨 142,143,149,163,169,170,175,179, 183,187,188
- 符號消費 181
- 符號學 7,157,160,163,164,165,166,168, 170,174,179,180,181,182,183,184,186, 187,188,189,191
- 符號學分析 163,164,170,179,180,181, 182,186
- 符徵 113,142,143,149,163,167,169,170, 171,172,174,175,176,179,180,183,184, 187,188,190
- 莎娜·石川 93,96,111
- 規律系統(語言系統、自然語言、語言結構) 164
- 規劃 2,5,7,17,21,22,23,24,25,29,30,31,32, 33,34,36,42,44,46,50,52,53,54,55,56, 66,67,68,72,74,80,81,82,84,88,89,91, 93,94,95,96,101,127,128,150,152,155, 157,173,179,183,186,211,218
- 規劃的理論 2
- 規範性理論 16,26,29,30,31,43,44,146
- 設計 2,4,5,6,7,15,17,19,20,21,22,23,24,25, 26,27,29,31,32,33,34,36,44,45,46,49, 50,52,53,54,55,56,62,65,66,67,68, 69, 70,71,72,74,77,79,80,81,83,84,88,89, 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 102,103,105,106,107,111,113,115,120, 130,131,132,133,136,142,144,152, 155, 157,169,170,172,173,180,184,185,186, 206,211,221
- “設計方法”團體 133
- 設計理論 2,4,6,17,20,21,52,62,83,89,94, 103,106,107,133,184
- 設計準則 25,33,53,67,68,70,71,72,80
- 透納 45,92,93,119
- 郭若尼 129,130,132
- 都市之象徵 219
- 都市更新 23,90,134
- 都市社會運動 81,90,91,134,182,218,219, 220
- 都市社會學 2,5,194,219



都市設計 5,21,23,25,26,29,32,34,66,72,  
97,101,221  
都市實踐 41,219  
都鐸 57,64,65  
雪梅也夫 89  
麥可生 55  
麥克里斯 16,80  
麻省理工學院 22,29,32,89

## 十二劃

傅利葉 42,166  
傑可布 23,29,94  
凱恩斯經濟模型 117  
勞林 132,133,135,137  
勞動 1,3,5,40,79,113,117,118,119,122,  
143,148,149,154,181,197  
堪尼拉 131  
循環 51,148,154  
愉悅(快感) 160,167,170,190  
提默 74  
提蘇 128  
斯湯達 177  
普內尼西 129,136,137  
普拉生 96  
普瑞尼 129  
無利害關係性 151  
無欲 177  
結構化歷程 184  
結構主義 18,28,40,78,110,138,140,144,  
149,150,155,156,158,159,160,161,162,  
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3,  
174,176,179,182,183,184,186,187,189,  
190,191,193,194,197,200,201,202,219  
結構性的循環 148,154  
華格 117,128,177  
華堡 215,216  
華德 91,113,114,137  
著作業 169,175

萊布尼茲 100  
萊特 22,44,130,218  
菲勒 106  
虛構 113,172,212  
象徵 13,15,16,23,27,28,30,31,38,39,41,42,  
46,58,62,63,72,75,81,90,104,105,113,  
132,133,143,146,147,152,154,156,157,  
165,171,181,182,183,184,185,186,187,  
188,195,205,216,219,221  
象徵互動 30,62  
象徵形式 133,171  
象徵的實踐 186  
費奧蘭提諾 129  
超級符徵 113  
開放性 25,44  
開放空間 25,44,71  
開派希 36  
雅可布森 163,164  
集體消費 88,90,134,219  
黑格爾 12,133,161,195,199,216

## 十三劃

傾向 23,27,31,50,51,52,57,58,69,74,81,88,  
89,91,94,95,110,113,119,130,132,140,  
146,153,155,173,175,188,195,199  
塞提 45,197,204  
塔夫利 7,126,127,128,129,130,131,132,  
133,135,136,137,138,139,140,141,142,  
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2,  
153,154,155,156,157,186  
奧立崗 95,114,121  
奧圖曼 55,57,64,65,75,76,77  
意味與展露 28  
意象 1,21,24,25,27,28,29,30,31,35,36,37,  
38,39,40,41,44,46,47,58,61,62,63,71,  
72,75,77,104,108,111,115,117,135,141,  
147,151,152,172,175,177,179,181,186,  
189,196,200,205,206,217,220

- 意象化的意識形態 189  
 意識形態 2,3,4,5,6,8,9,13,16,23,24,36,37,  
 38,39,41,42,43,44,46,55,72,73,74,75,  
 76,77,79,80,81,83,84,88,91,102,105,  
 109,110,111,114,115,116,117,121,127,  
 129,133,134,135,136,137,139,140,141,  
 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  
 151,152,154,155,156,157,161,162,164,  
 165,167,169,170,174,176,187,188,189,  
 190,194,195,196,197,198,199,200,201,  
 203,204,205,206,207,209,210,211,212,  
 213,214,215,216,217,218,219,220  
 意識形態的元素 36  
 意識形態的分析 36,37,139  
 意識形態的最小單位 189  
 意識形態的機器 3  
 感覺結構 4,76  
 愛坡亞 23,29,30,31,41,45  
 新政 42,136  
 新馬克斯主義 3,83  
 新康德主義 52,61,78,139,201  
 瑞夫林 49,54,55,61  
 瑞琪 193  
 經濟主義 139,218  
 經濟危機 15,72,81,95,134,189,201,218  
 經驗主義 18,28,35,37,39,45,61,76,109,  
 139,154,181,199,200,201  
 葛里高蒂 127,129,131,132  
 葛拉伯 98  
 葛雷馬斯 162  
 葛蕾芝 83  
 葛蘭西 138,220  
 解秘 4,5,136,143,148,167,174  
 解構 5,73,74,136,137,143,156,198,202,  
 206,210  
 詹明信 37,39,115,127,140,146,189,190  
 資本 1,2,3,15,16,17,23,24,36,43,44,55,73,  
 74,76,77,80,81,84,87,88,89,90,92,96,  
 102,113,117,118,119,120,121,127,130,  
 134,136,145,151,155,156,167,168,169,  
 181,186,187,194,196,197,201,215,218,  
 220  
 賈可柏 42,51,55,91,216  
 道家 177  
 達哥 127,138  
 違建運動 134  
 鄔斯特 42  
 鄔爾芙 207  
 雷爾夫 83  
 預設 16,35,36,52,74,149,187,188  
 鼓吹式規劃 91
- ### 十四劃
- 圖南 220  
 圖象學 216  
 圖解 12,30,39,94  
 實質環境 25,26,27,30,37,50,54,64,65,76,77  
 實踐 2,4,5,6,8,9,15,17,18,22,25,26,32,34,  
 38,39,40,41,44,45,46,47,55,65,71,75,  
 76,79,80,82,93,101,104,105,106,113,  
 115,120,121,129,132,134,135,137,139,  
 140,141,143,145,146,147,149,151,152,  
 154,155,156,167,171,175,176,180,184,  
 185,186,189,194,195,198,202,204,205,  
 206,207,210,211,212,213,214,215,217,  
 218,219,220,221  
 實證主義 2,15,16,36,37,50,51,52,57,61,  
 62,65,72,73,78,80,83,96,99,100,101,  
 107,133,165,216  
 對象性 109,154,166,187  
 構成 10,14,73,74,133,175,209  
 疑旨 7,8,14,37,39,40,73,74,75,77,79,80,  
 132,133,147,163,169,187,188,197,204,  
 212,215,216  
 福利國家 15,42,43,55,72,73,81,83,84,88,  
 90,110,117,130,134,161,174

福利國家社會 15,73  
 福格森 13  
 福勒 209  
 福寇 116,137,144,147,149,153,158,160,  
 167,192,198,201,202,206,209,212,213,  
 214  
 精神分裂狀態 17  
 維立克 83  
 維拉 196  
 維根斯坦 89  
 聚合 99  
 蒙田 163  
 蓋第斯 42  
 語意化 179,180,182  
 語意學的結構 99  
 認知表徵 58,63  
 認知圖 39,58,63  
 認識論批判 6,7,9,20,21,48,49,86,87,100,  
 195  
 豪威爾 57,64,65  
 豪塞 153,194  
 隙縫 152  
 領導權 (霸權) 15,44  
 齊默 64,65,75,76,77,137  
 齊默爾 64,65,75,76,77

## 十五劃

劍橋大學 89  
 德勒茲 190  
 徵候閱讀 197  
 摩里斯 121,128,161,193  
 摩拉奇洛 128  
 摩爾 25,54,57,61,64,65,77,78,89  
 模式 4,14,26,33,35,51,68,70,71,82,86,87,  
 93,94,95,96,97,98,99,100,104,105,106,  
 109,110,111,113,114,115,116,119,120,  
 121,151,186,217  
 模式語言 4,68,71,86,87,93,94,95,96,97,

99,100,104,105,106,110,111,113,114,  
 115,116,120,121,186  
 樋口忠彥 40  
 歐文 42,133,153,195,215  
 潘諾夫斯基 133,135,153,195,215,216,217  
 範型 2,3,15,16,22,36,50,57,71,73,75,82,  
 83,98,106,121,149,187  
 調適性 25  
 論述 3,4,5,7,8,9,10,12,13,14,15,16,17,22,  
 23,24,27,28,29,31,35,36,37,39,40,41,  
 42,43,44,45,46,47,49,50,51,53,54,55,  
 57,71,72,73,74,75,78,79,80,81,82,83,  
 88,90,91,99,104,108,111,113,115,116,  
 121,129,130,132,133,135,136,138,139,  
 140,142,143,145,146,147,148,149,150,  
 151,152,153,155,156,157,160,162,164,  
 166,168,169,170,171,172,173,174,176,  
 178,179,180,181,183,184,185,186,187,  
 188,189,191,192,197,198,200,201,202,  
 203,206,207,209,210,211,212,213,214,  
 215,219,220,221  
 論述的理論 16,207  
 論述實踐 147,186,206,210,211,212,221  
 魯卡奇 194,197,200  
 魯斯布魯克 177  
 魯道夫斯基 91

## 十六劃

戰利國家 84  
 操作性批評 135,136,141,149  
 歷史之診斷 135  
 歷史主義 139,201  
 歷史寫作 131,137,148,153,157  
 歷時性的 163  
 盧偉民 23  
 蕭伊 115,182  
 親成長的聯盟 88  
 賴却克 91,92

霍華 22,42,44,94

霍爾 54,186,194

## 十七劃

戴安尼 16

戴希達 116,137,149,166,167

戴高樂主義 161

營造 1,2,3,4,5,8,9,11,12,13,14,15,49,63,  
64,65,68,69,72,80,86,87,90,92,93,95,  
96,97,98,100,102,103,104,105,106,107,  
108,113,114,115,116,117,118,120,122,  
139,144,145,147,149,151,152,157,175,  
210,211,212,217

營造形式 3,116,152,212

環境—行為研究 7,48,49,50,51,52,53,54,  
55,56,57,58,61,62,64,65,67,68,71,72,  
73,74,75,77,78,79,80,81,82,83,84,94

環境人 55

環境心理學 2,48,50,56,66

環境主義 61,79

環境可能論 51

環境決定論 51,61,78,82,218

環境知覺 53,58,62

環境計劃書 67,68,69,70,81

環境設計研究 50,52,53,56,65,67

環境結構研究中心 92,93

環境評估 53

環境評價 58,63

環境意象 27,35,38,39,46,47,58,61

環境意義 29,41,63

環境與行為 50,51,52,56,65,70,80

環境認知 21,37,53,58,62,64,72

環境論述 22,23,43,49,72,73,80,82,83

隱藏的計劃書 69,81

## 十八劃

藍松式批評 165

## 十九劃

羅文 22,25

羅伯—修茲 36,83

羅格斯 130,131

羅馬大學 128

羅馬學派 132

羅傑 45,54,117

羅斯金 121

羅斯福 42

邊緣性理論 82

關塔內 190

韻味 142,176

類型 4,6,7,27,34,36,40,58,66,68,69,71,72,  
83,115,116,127,131,132,133,135,136,  
138,156,157,171,173,188,200,206

類型學 127,133,136,138,171,188

## 二十劃

蘇里大學 56

蘇勒 166

蘇默 49,53,54

釋明 143,152,155,157,177,180,182

## 二十一劃

蘭西爾 212

蘭嶼 38

## 二十二劃

權力 13,14,29,41,46,78,84,99,102,114,  
118,119,120,121,130,131,144,145,151,  
152,153,154,155,156,157,160,164,167,  
178,180,186,189,190,198,200,201,207,  
209,211,212,213,214,218

## 二十五劃

觀念論 29,52,61,79,154